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1卷10期
2025年11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文化与文学研究

源起·要义·启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探微——基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考察 - 苑程杰，马泽轩 - 1-5

明清时期徽派建筑马头墙的建筑风格研究 - 刘士嘉，曹宇欣，冯艳阳 - 6-9

南宋文化危机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诗学抵抗 - 段佳彤 - 10-13

露珠里的宇宙——评杨本芬《浮木》 - 周承宇 - 14-16

教育理论与实践

OBE 理念下“双循环”劳动教育的课程评价建构——以肇庆端砚非遗研学为例 - 陈文俊 - 17-21

体医融合背景下“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在慢性病康复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 吕瑞芳 - 22-27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 谯阳阳，秦媛，俞晓婷 - 28-31

能力导向下高职《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 杨洁 - 32-37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转型的机制、困境与进路 - 梁舒乔，訾扬州 - 38-41

AI 赋能高中原创音乐剧——基于自主协作与工具融合探索 - 张怡 - 42-46

艺术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与策略 - 丁慧智 - 47-50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合唱课教学测评指标建构研究 - 许汉林，易秀华 - 51-56

AI 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心理建设与适应策略研究 - 关晓颖 - 57-61

社会与治理

绥靖政策下英国陆军的医疗服务建设 - 曹晓敏 - 62-66

以太极之柔，铸青春之刚：论太极对当代“脆皮大学生”健康促进的多维作用 - 乔伟，杜嘉俊 - 67-71

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及协同治理研究 - 李矛威，杨成 - 72-75

后疫情时代美国医药政策的走向与效应 - 吴玺瀛 - 76-81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与养老体验研究 - 覃柳一格 - 82-87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研究 - 陈阳，杨成，沈鑫 - 88-91

互联网医院扩张对线下就诊行为的影响：挤出还是互补——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实践与理论分析 - 徐文聪，麦咏欣 - 92-96

健康素养视角下高校助力社区医养服务路径研究 - 钟海权，赵晓沁，赵隽鹏 - 97-103

全球大变局下的时代本质与人类发展方向：基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 - 李佳雪 - 104-107

基于 CHARLS 数据的老年人糖尿病影响因素研究 - 王少锋，梁鸿 - 108-114

经济与管理研究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 宋怡, 黄巧婷, 许杰 - 115-118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荔枝品类评价 - 周一辰, 李珈言 - 119-123

合肥市产业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的成效及路径探索——以建行设立 AIC 试点基金新业务为例 - 郑敏, 楼方舟 - 124-127

基于 SEM 模型的吴江区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 张惠媛 - 128-132

英国仲裁法 2025: 仲裁员视角下的重要变革——保密义务的法典化及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引入 - 饶康 - 133-137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成都大运体育赛事遗产的利用与传承研究 - 刘浩宇, 韩晨, 黄蕾 - 138-141

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非版权性与侵权责任分配 - 赵嘉雯 - 142-147

大模型技术驱动的品牌营销变革 - 崔海强 - 148-151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新进展 - 谢天 - 152-156

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 杨斌, 黄巧婷, 许杰 - 157-162

传媒与艺术研究

基于 NVivo 内容分析的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网络评论研究 - 储紫玲 - 163-168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影视短剧赋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 - 夏新 - 169-172

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生成模式与视觉叙事建构 - 张茂铃 - 173-176

喝不喝: 多媒介视域下酒桌场景性别角色期待与反思 - 王路宁 - 177-181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可视化分析 - 黄蕾、韩晨、刘浩宇 - 182-187

以情动人: 微短剧中的情感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关照——以《家里家外》为例 - 陈矿, 姜文瑾 - 188-192

湿热地区独立式住宅绿色建筑被动式设计策略 - 周澧骊, 陈翠婉, 李妙玲 - 193-197

数字人赋能江苏吴江古镇文化传播机制与文旅产业升级研究 - 张蕴 - 198-204

阿彼察邦《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的梦境叙事与文化意蕴 - 陈矿, 杨贺 - 205-209

基于符号转译的红色文化活化设计与品牌传播策略研究——以江西抚州为例 - 杨菁 - 210-213

商业人像摄影中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平衡策略研究 - 汤成琦 - 214-217

源起·要义·启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探微 ——基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考察

苑程杰¹ 马泽轩²

(1.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海淀 100044, 2.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 西城 100044)

摘要: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之上, 将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创造性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思想。《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著作, 较为完整地蕴含着毛泽东关于新文化的相关理论, 标志着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初步形成。其中所蕴含的关于意识形态本质、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意识形态功能等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意识形态创新理论,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彰显出毛泽东思想跨越时空的思想张力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 意识形态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4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毛泽东 1940 年 1 月 9 日于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经过修改和补充后在《解放》第 98、99 期合刊发表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键著作, 《新民主主义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大领域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 关于新文化的完整阐述更标志着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

一、思想源起：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阐发最早见于他的博士论文; 在《德法年鉴》时期产生了意识形态理论的雏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明确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 并就意识形态进行了完整阐述; 在《资本论》的准备、撰写与成书时期, 真正切入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第一, 《德法年鉴》时期,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 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 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1], 马克思从德国现实出发所批判的这种作为颠倒的世界观的宗教, 正是在落后于同时代的德国现实基础上所产生的和反映的一种观念上层建筑, 即一种颠倒的意识形态雏形。同时, 马克思指明了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即现实活动的作用, 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一方面在批判鲍威尔政治解放观念的狭隘性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揭露了人的解放问题的实质是其背后所矗立的当时市民社会中异化为货币拜物教的犹太精神, 是反映犹太人世俗生活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意识形态”(Ideologie)概念, 并进行完整阐述。其一, 从内涵理解, 意识形态首先是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 为落后的德国现实辩护的德国哲学。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1]46。其二,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解,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 意识形态作为现实世界在观念上的反映, 内在、本质地受市民社会及经济基础所决定和制约。其三, 从阶级立场理解, 意识形态作为市民社会在观念上的反映, 必然是具有一定阶级属性的。

第三, 在《资本论》的准备、撰写与成书时期, 马克思真正切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该时期, 马克思

作者简介: 苑程杰(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马泽轩(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讯作者: 苑程杰

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61-1863 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等,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从哲学批判彻底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言之,马克思中后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中。

二、理论探微:抗战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内涵要义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中。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是契合中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学说。

(一) 关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

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握,首先需明确意识形态内在的阶级属性以及阶级附归的特性。毛泽东立足于抗日战争时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特别是被压迫阶级,指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归属应该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1.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归属是无产阶级。其一,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定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2]668}。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也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无产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必然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阶段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归属也是无产阶级。其二,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任务,毛泽东认为要“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进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698}。

2.始终贯彻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领导,对于中国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指导以及在思想文化,特别是在新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是抗日战争走向伟大胜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核心因素。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决定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中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2]674},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资产阶级所不能承担的责任,领导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实施民主政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坚定的信念信仰,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在意识领域形成强有力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 关于构建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2]665}因此,新文化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的扬弃以及新话语体系的建构。

1.立足中国革命现实,扬弃旧式民主主义的话语范式。其一,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扬弃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了性质上和领导阶级上的转移。毛泽东指出“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2]667}。其二,对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扬弃的核心是中国革命的“两步走”理论。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认识,正是对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的突破。他指出,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已经发生改变,“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2]666}其三,扬弃三民主义话语逻辑。“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2]693},中国革命实际的改变意味着指导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也必将由此发生变化。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言,毛泽东认为不落实联俄,中国就无法在抗战阶段站在社会主义苏联方面与帝国主义抗衡;不落实联共,虚假的旧的三民主义者就会成为汉奸沦为日寇的傀儡;不实行农工政策,就不能真正地唤起民众投身革命。

2.植根人民群众,以大众化语言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就已经通过社会调查清醒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3]21}。然而,农民因其阶级地位无法接受到系统教育,因此,如何让厚重的理论内容深入农民阶级,是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708},中国革命若想胜利,抗日战争若想成功,必须将科学正确的理论以大众化方式进行阐发,破除理论隔膜,构建属于人民大众的通俗易懂的富有生动气息的新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毛泽东在思想宣传和理论写作中就深入贯彻了

这一方法。面对资产阶级顽固派,毛泽东指出务必要尽早觉醒,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也”;面对封建地主,毛泽东指出“有饭大家吃”^{[2]683};在论述对待文化的态度时毛泽东又灵活比喻,巧妙地把文化产品比作食物,指出“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2]707}。综上所述,新的符合现实的符合人民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708}。

(三) 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阐发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毛泽东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认为它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1.意识形态因其阶级性具有文化革命功能。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决定党的意识形态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所必然具备的文化革命功能。“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2]66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生力军,意识形态领域与文化领域的革命力量也必然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生力军。第二,关于“文化革命”的必然性。“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695}第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在针对时局之中国的历史特点进行阐发时指出,“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2]665}。第四,文化革命必须具有相应的革命理论阵地。例如,《向导周报》《民国日报》等“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2]701}。

2.意识形态因其所属阶级的先进性所具有引领指导功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并通过其理论、价值观、道德准则等形式,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和指导作用。这种功能体现在意识形态能为社会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塑造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被视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的思想工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革命的,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意识形态要发挥其引领功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663}论及意识形态之于革命事业胜利的引领与指导作用,毛泽东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2]706}。由此得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对中国革命现实具有科学正确的引领作用。

三、以文鉴今:抗战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时期不断推进和实现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该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使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积累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思想张力以及丰富的价值启示。

(一) 扭住关键:坚决落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领导,对于中国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指导以及在思想文化,特别是新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使得抗日战争走向伟大胜利,使得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第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之“魂脉”。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4]100}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旗帜。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思想根源上筑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坚定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第二,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还需毫不动摇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并坚持把中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即今天所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往来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绝非教条,不是背诵的一成不变的理论,而是指导革命、指导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实践的能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落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一

方面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毫不动摇,另一方面要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所发展的、与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同样会发展变化。究其根本,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顺应时代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 话语建构: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4]35},由此可见,只有牢牢夯实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塑造和发扬主流舆论新格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才能有效提升正向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巩固和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第一,推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世界历史深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近代以来世界落后国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后发国家在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免处于西方话语体系的范式之中。谁掌握舆论,谁就掌握主导权。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只有通过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的建构,才能破除西方话语意识形态垄断的遮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重要立足点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激活并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在“两个结合”中创设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文明倡议”等能够准确表达中国立场、观点和主张的标识性概念、范畴以及表述。

第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传播能力。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方面需要话语内容,另一方面还亟需行之有效的传播手段。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当今社会跃迁至以人工智能技术为赋能的数智时代。在豆包、DeepSeek、KIMI+等生成式AI技术的支持下,应当提升网络AI应用的甄别能力,利用大模型、高算力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资源,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结合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即时监控舆论动向,回应社会关切并引导正确走向。同时,培养一批既懂理论又擅长传播的专业人才,让中国声音能够更好地被国际社会听见、听清、听懂。

(三) 文化引领: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激发先进文化引领力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各大大国……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5]41},只有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型凝聚力,牢固掌握党的宣传文化思想工作的主动权,在“两个结合”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进而行之有效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力驳斥“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弥彰。

第一,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文化向度深入发展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概括凝练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本质特征,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等问题。其中,“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其所蕴含的“天下为公”“君舟民水”的人文情怀昭示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独特性;以其“国之富者在乎丰民”的发展逻辑契合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其“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重要命题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基本要求,以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丰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文明底蕴;以其“和合”的社会思想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道路意蕴。

第二,以新的文化生命体驳斥“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驳斥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不适今,古今断裂”的有力破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不是凭空出现、一蹴而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形态也不是全新孕育、无根生发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吸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伟大经验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则同样是在贯通古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概言之,“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理论的一部分,整合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古”与“今”,从根本上对西方所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驳斥。

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对“文化虚无主义”的驳斥就是进一步对“西方中心论”“现代化=西方化”等错误思潮的破解。“西方中心论”作为一个持久出现并受到广为讨论的文化概念,对其最普遍、确切的理解即它是发端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丰富于西方世界殖民扩张实践、广泛传播于当代国际文化交往与输出间的一种以西方为尊、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适价值”。“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理论的生动实践,更是相对于世界文明花

园中的一朵靓丽鲜花。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有利于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破除文化虚无主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守正创新的姿态，使独立的民族特色消解“西方中心论”所宣扬的中西文明对冲，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贡献独属于中国的智慧与璀璨的文明成果。

综上所述，“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两个结合”的生动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文化向度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资源。只有以中国特色的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才能进而化被动为主动，在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正向传播中巩固意识形态主导权。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Origins, Core Tenets, and Implications: A Probing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Ideological Though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A Textual Exegesis of On New Democracy

Yuan Chengjie¹, Ma Zexuan²

(¹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²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Mao Zedong integrat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o Marxist theory and thereby Sinicized it, creatively constructing an ideological system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pivotal work of Mao Zedo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On New Democracy contain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hi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new culture" and marks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ideological thought. The rich ideological contents embodied in this work—includ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ssence of ideology,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functions of ideology—constitute an innovative ideological theory roo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is theory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the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trans-temporal ideological vitality and practical value of Mao Zedong Thought.

Keywords: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Mao Zedong; Ideological Theory; On New Democracy

明清时期徽派建筑马头墙的建筑风格研究

刘士嘉¹ 曹宇欣¹ 冯艳阳¹

(1.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本文以明清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为研究对象, 探讨主流文化思想与该建筑风格之间的关系。通过剖析马头墙的建筑特点, 追溯儒家礼制对形制规范的塑造过程, 阐释空间布局中风水思想的具体实践, 论证了地域文化物质载体建筑要素的核心价值, 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表明, 马头墙深刻反映了徽州地区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念, 还具有满足防火功能需求的实用功能。以及马头墙对现代建筑的影响进行研究,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传统文化和建筑艺术之间的相互关联。

关键词: 徽派建筑; 马头墙; 明清时期; 儒家思想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27

徽派建筑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流派之一, 其独特的构造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直备受关注。在诸多承载地域特征的建筑构件中, 马头墙凭借独特的造型特征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尤为引人注目。本研究以明清时期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作为研究对象, 着重分析这一时期的思想观念如何渗透并塑造了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 儒家思想、风水观念和人文精神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实践。马头墙作为徽派建筑的标志性元素, 不仅体现了徽州地区的建筑智慧, 更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和社会价值观。本研究将从马头墙的建筑特征入手, 分析儒家思想对其设计的影响, 探讨风水观念和人文精神在其建筑风格中的体现, 并考察马头墙对现代建筑的启示。通过这一研究, 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与建筑风格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当代建筑设计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启示。

一、绪论

(一) 课题研究背景

徽派建筑的历史脉络可上溯至唐宋时期, 在南宋阶段徽州地区因商贸发达经济繁荣, 为徽派建筑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徽州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孕育出特有的文化基因, 这一文化背景深刻影响着建筑风貌的生成。至明清两代, 随着徽商群体的壮大, 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积累了大量财富, 并将资金投入到家鄉的建筑建设上, 形成了以马头墙、小青瓦、木雕、砖雕、石雕等为主要特征的独特风格体系, 如黟县西递、宏村等都是徽派建筑的代表。通过精妙的布局构思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无一不展示出徽派建筑的独特魅力。

徽派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主流文化思潮在其风格塑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化是建筑的灵魂, 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思潮犹如一股无形的力量, 深刻地影响着建筑的形式、布局、装饰等各个方面。在徽派建筑的发展历程中, 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徽商文化等主流文化思潮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共同塑造了徽派建筑独特的风格。

(二) 课题研究意义

从文化与建筑融合的角度深入研究主流文化思潮与徽派建筑风格之间的关系,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 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建筑文化研究的领域, 以往对于徽派建筑的研究, 多集中在建筑的形式、结构、装饰等方面, 而从文化思潮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相对较少。通过本研究, 可以揭示文化思潮对建筑风格形成的内在机制, 为建筑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进一步完善建筑文化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于徽派建筑风格的研究, 也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理解, 徽派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蕴含着

作者简介: 刘士嘉(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建筑风格研究、室内装饰设计研究;

曹宇欣(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遗传播、数字艺术设计;

冯艳阳(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通讯作者: 刘士嘉

儒家、道家、徽商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研究其风格与主流文化思潮的关系,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领域的体现和传承。

在实践方面,一些徽派建筑面临着自然破坏、人为破坏、城市化进程的侵蚀等。深入了解主流文化思想与徽派建筑风格,能够更好理解徽派建筑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对徽派建筑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方案。既要注重建筑实体在实际操作中的修复与维护,又要注重建筑所承载的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使之在现代社会得以延续与发扬。体现在徽派建筑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精工细作的匠人传统,既能满足功能需求,又能更好地体现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实现古今对话的建筑语言。

二、相关概念阐述

(一) 徽派建筑历史溯源

徽派建筑从东晋起源,历经唐宋的发展积累,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其风格的形成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徽派建筑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传承与演变,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里的独特瑰宝。它深深烙印着徽州地区的往昔岁月,全方位展现了当地的文化脉络,是地域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生动见证。

明清时期,徽派建筑达到了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徽商崛起,他们在商业领域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徽商们秉持着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观念,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家中的建筑建设中。他们招揽技艺精湛的工匠,对宗祠、牌坊、住宅等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与美化,使徽派建筑在结构设计、装饰艺术及工艺水平上都攀登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建筑装饰方面,木雕、砖雕、石雕等“三雕”艺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么被广泛应用于门楼、梁柱、窗棂等部位,图案题材丰富多样,既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有风景如画的山水景致,还有娇艳欲滴的花卉和活灵活现的鸟兽,这些图案不仅美观大方,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彰显了徽商的富足生活和高雅品味。在色彩方面,也继承着徽派独有的粉墙黛瓦的组合形式。粉墙黛瓦前小桥流水洗涤了远山如黛,组成了一幅黑白灰的传统山水墨画,给人以中式独有的含蓄内秀,营造简约、雅致的建筑空间,身临其中平复心情^[1]。

(二) 明清时期徽派建筑马头墙的建筑特征

马头墙从实用功能上讲,最初叫“防火墙”,以防火为主要功能。离屋面较高的马头墙可有效阻隔火势在火灾发生时的蔓延,为邻近建筑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实现这一功能,既体现了古人对建筑防火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体会,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重视。

从结构视角分析,马头墙设计极为精巧。它依据屋面坡度层层迭落,按照斜坡长度划分成若干档。这种构造方式,既契合力学原理,又切实增强了建筑的稳定性。在建造过程中,工匠们根据屋面的坡度和建筑的规模,合理确定马头墙的档数和高度,以保证其与建筑主体紧密结合、浑然一体,从而使马头墙的整体美观大方,将三排檐砖挑在墙顶,用小青瓦盖住,这样的做法既可以保护墙体不被雨水冲刷,又可以增添马头墙的精致美感。

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使徽州地区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对建筑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马头墙作为建筑的外观特征,彰显着家族的财富与地位。它的造型也更加丰富多样,采用了多种建筑风格,如房直型、圆翘型、重叠型和单一型等^[2]。

三、影响徽派建筑风格的主流文化思想

(一) 儒家思想对马头墙设计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徽派建筑尤其是马头墙的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等级观念在建筑中的体现尤为明显,马头墙的高度和层数往往与主人的社会地位相关,官宦人家的马头墙通常更高大、更复杂,而普通民宅则相对简单。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社会等级,还体现了儒家“礼”的思想,即通过建筑形式来规范和强化社会秩序。

宗法制度对马头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筑布局上,徽州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同姓同族家庭聚族而居,不仅有利于抵御外族的侵扰,而且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3]。重视家族观念,民居建筑往往以祠堂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家族成员的住宅,形成以祠堂为中心的村落格局。祠堂作为家族权力的象征,建筑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民居建筑中常见“四水归堂”的天井布局,象征“聚族而居”的家族理想,天井四周的房间按辈分和性别分配,体现严格的等级秩序,体现了徽州传统文化中的宗族观念。血缘相连的族人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群体,民居群落的设计与修建要考虑全体成员的整体利益。这种谦和细心的设计体现出徽州人聚族居住时对于彼此的谦让和包容。徽州民居布局中的设计构思,每一种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将宗族间的血脉亲情转化为建筑的形态符号^[3]。

在伦理道德层面上,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人们。马头墙的装饰纹样,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儒家道德寓意,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化的效果,“以礼治家”的思想在人们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常见的二十四孝之类的人物故事砖雕,以直观的形式展示了儒家的孝道观念,教育家族成员要做到尊老敬老,恪守孝道,为人师表,为人处世。还有一些以“仁义礼智信”为主题的图案,也是在时刻提醒人们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成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二）风水观念与马头墙的建筑风格

风水观念强调建筑要与自然环境相契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建筑要与自然环境相一致，马头墙的布局，在徽派建筑中，常依周围山水地势而设计。村中的马头墙会高低错落，蜿蜒曲折，或随山势起伏，或随江水走向，与自然山水浑然一体，构成一幅和谐的山画卷。

风水理论认为，要能聚气藏风，才能有良好的生活环境。马头墙围合的建筑空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庭院或天井，有助于聚集和保留“生气”。马头墙高而相通，可阻隔外界气流，使建筑内部形成安定的气场，符合风水上“藏风聚气”的要求，为居住者营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装饰艺术中特别显著的是祈福、避邪的功能。如兽头、葫芦等吉祥元素常被点缀在墙顶，被视为守家御灾之神。兽头装饰以其威严之势，表现的是力量和魄力，仿佛可以震慑一切邪恶的力量，守家的安宁，而葫芦造型装饰则寓意着为居住者带来幸福和吉祥的福禄双全。

（三）人文精神在马头墙中的体现

马头墙不仅是功能性建筑元素，更是徽州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有的墙壁上能见雕刻名家诗句，或以书法的形式呈现的吉祥语。徽州地区文风鼎盛，孕育了无数文人雅士，他们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人墨客的感情融于其中，以山水画为题材的砖雕、仿文人画的装饰图案，将文化修养与生活品位在每一处细节中流露出来，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体现。

墙头形式多样，有“鹊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坐吻式是在座头上安装烧制成形的吻兽，显示出主人渴望读书做官的美好追求。而鹊尾式是指在坐斗上安装一块像喜鹊尾巴的构件，广泛应用于明清两朝。最后印斗式就是将带田字纹的方斗砖作为构件，价格低廉，又由于斗托的构造不同又分为坐斗式和挑斗式^[4]。它与粉墙黛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体现了徽派人民追求自然、质朴之美的黑白分明、简洁淡雅的视觉效果。此外，墙檐下彩绘及墙面上的砖雕装饰，工艺精湛、题材广泛，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艺术的喜爱，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展现了徽派建筑高超的艺术水准。

隐逸思想的表达是马头墙文化内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徽州商人虽然在外经商，但内心深处仍向往田园生活，马头墙的设计常常体现出这种矛盾心理：高耸的墙体象征着对外部世界的防御，而墙内的庭院则营造出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宁静，这种设计反映了徽州人“外儒内道”的精神追求。

四、建筑案例分析

（一）宏村马头墙建筑

宏村整个村落设计成牛形，给整个村子带来了生气，三面环山，构造上基本保持坐北朝南形态，山川围绕，湖和楼房院子相互依衬。周围的山和白墙、瓷砖映入湖中，山、水、人融为一体，宛如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5]。这种独特的布局不仅使宏村的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优美的田园风光，还体现了风水观念中对吉祥寓意的追求，展现了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智慧。宏村的水系规划同样精妙绝伦，它充分利用了地势落差，引水入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网系统。宏村的水系主要由河流、埭坝、水圳、月沼、南湖和庭院水塘水榭组成，分为外水系和内水系两部分。

水系规划与马头墙建筑的融合，使宏村村落的村庄布局与水系规划相得益彰。墙顶高低错落，起伏有致，与村落“牛”形布局、水系蜿蜒相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韵律美。在宏街巷中漫步，马头墙与水圳、月沼、南湖相伴的美景随处可见，水中倒影着白墙青瓦，如同一幅流淌的画卷，令人陶醉其中。在装饰上也简洁大气，更注重整体效果与环境的融合，宏村的承志堂、木雕十分精美，更注重与建筑整体风格的协调统一，强调大气磅礴的视觉效果，“龙凤呈祥”、“松鹤延年”等图案寓意深刻，表达了徽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二）西递村马头墙建筑

西递村的马头墙建筑布局与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宗法秩序和等级观念密切相关，在西递村，敬爱堂作为西递胡氏家族的祠堂，位于村落的中心位置，是家族祭祀祖先举行重大仪式的场所，代表着家族的尊严和传承。围绕敬爱堂，不同辈分的房屋分布有着严格的规定，长辈的房屋通常靠近祠堂，以显示其在家族中的尊贵地位；晚辈的房屋则依次向外排列，体现了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这种布局方式充分体现了程朱理学中“礼”的观念，强调了家族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尊卑关系。

西递村不少民居的马头墙采用“印斗式”造型。该造型由窑烧制成的，带有“田”字纹且形似方斗的砖搭建而成，从侧面看，墙头宛如一块庄重金印，所以也被叫做“金印式”。“印斗式”马头墙在文人雅士住所较为常见，反映出主人对读书进取的执着以及对仕途的憧憬。明清时期，科举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读书入仕被看作光宗耀祖的绝佳途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印斗式”马头墙在文人居所出现，正是其对仕途追求的一种外在呈现，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呼应。西递村的徽商家族虽然以经商为业，但他们深知文化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印斗式”马头墙的出现，正是这种价值

观念的体现，它激励着家族子弟勤奋读书，追求功名。

五、马头墙对现代建筑的影响与启示

（一）文化内涵在建筑中的呈现

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应充分借鉴徽派建筑与主流文化思潮融合的成功经验，注重建筑的文化内涵表达。使现代建筑不能只满足于功能上的需要，还应该承载着某种文化上的含义，马头墙元素提取运用时，建筑设计师需将传统元素和现代手段、审美相融合，运用符号简化等设计手法，进行设计处理^[6]。在建筑外观设计上，可以借鉴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元素，进行现代的演绎，使其既有传统建筑的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在一些现代居住社区的设计中，以白色外墙、黑色屋顶线条、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等徽派建筑元素，营造出清新淡雅的居住氛围，同时也将徽派建筑的文化特色传承下来。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马头墙研究对当代建筑实践的重要启示，马头墙的设计理念，如注重环境和谐、体现人文精神等，对现代建筑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全球化浪潮下，当代建筑师面临着—项关键课题，怎样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建筑需求，从而打造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适应性的建筑作品。建筑设计师可以在造型上进行创新，保持马头墙基本形态，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审美趋势，将其与现代几何形态、流线型设计相结合，创造新颖的视觉效果^[6]。通过深入挖掘马头墙的文化底蕴与设计精髓，为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丰富思路与有效方法。马头墙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的生命力和创新潜力。

六、结论

通过对明清时期徽派建筑马头墙的分析，可以得出主流文化思想与建筑风格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马头墙不仅承载着儒家思想的精髓、风水观念的智慧，还凝聚着徽州地区的人文精神。本研究揭示了马头墙如何通过建筑语言传达文化理念，强化地域认同，它不仅对后世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当代建筑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如何理解和借鉴传统建筑文化，创造出既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又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建筑作品，是当代建筑师面临的重要课题。马头墙的研究既丰富了对徽派建筑的认识，又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功能需求如何结合，对徽派建筑在当代社会如何传承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余泽天,余义亮. 马头墙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J].景德镇学院学报,2022,37(06):125-128.
- [2] 曾金妹. 徽州古民居建筑特色探究[J].城市建筑,2021,18(01):79-82.
- [3] 陈又林. 明清徽派民居建筑特色解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3,26(02):119-123.
- [4] 胡朝焜,肖官衍,丁雅芬,等. 徽州传统民居墙体营造技艺之马头墙[J].科学技术创新,2019,(11):121-122.
- [5] 黄璐. 徽派建筑风格与人文研究——以宏村为例[J].居舍,2022,(04):28-30.
- [6] 张梦慧.徽派马头墙：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N].大河美术报,2025-07-04(011).

A Study on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Horse-Head Walls in Hui-Style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ijia Liu¹, Yuxin Cao¹, Yanyang Feng¹

(¹ Faculty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horse-head walls in Ming and Qing Huizhou architec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stream cultural thought and this architectural style. By analyzing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rse-head walls, tracing the process by which Confucian rituals shaped design norms, and illustrat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Feng Shui concepts in spatial layouts, it demonstrates the core value of regional cultural material carriers in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delves deeply into them. The study shows that horse-head walls profoundly reflect the religious belief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values of the Huizhou region, while also serving practical fire prevention functions. Additionally,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horse-head walls on modern architecture, offe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chitectural art.

Keywords: Anhui architecture;Horse-head wall;Ming and Qing dynasties;Confucianism

南宋文化危机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诗学抵抗

段佳彤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南宋偏安之际面临严峻的文化认同危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借复古主张与诗学革新构建起蕴含政治隐喻的文化抵抗策略。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分析,聚焦“羽翼盛唐”这一核心,深入剖析“别材别趣”“妙悟”等诗学命题,揭示其对理学话语的消解、对文化正统的重构,以及强化汉族文化主体性的深层意图。严羽诗学不仅是美学层面的创新,更是一场借助文学展开的文化政治实践,为后世在文化危机中维护主体性提供了关键借鉴。在全球化浪潮下,其“盛唐气象”所蕴含的符号意义启发我们通过审美自律来坚守文化独特性。

关键词: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盛唐气象;妙悟;别材别趣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48

一、引言

《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诗辨》作为阐述严羽诗歌理论观点的核心部分,是《诗话》的总纲。其基本宗旨是指出诗歌艺术独有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触及到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一些基本属性,总体而言是强调诗歌艺术和审美鉴赏的特殊内在属性¹。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沧浪诗话》整本著作,较少针对《诗辨》一章进行深入研究;对《诗辨》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妙悟”与“别材别趣”,对盛唐气象及其政治寓意的研究较少,对“诗学抵抗”尤其是与理学的对抗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从盛唐气象、以禅喻诗及妙悟、别材别趣入手,探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下严羽如何通过构造“诗统”应对,揭示其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南宋文化危机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中原沦陷,“中国”地理概念破碎;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形成南北对峙格局,传统“大一统”观念被颠覆。在固有观念里占据中原的政权会获得文化正统,而南宋偏安一隅,文人士大夫面临文化正统的丧失。

在文学道统上,朱熹《伊洛渊源录》构建了一套以周敦颐为开山鼻祖、以程颢、程颐为核心的理学谱系,将文学纳入“载道”工具,文化的道统面临理学垄断;禅宗“不立文字”与全真教“三教合一”对儒家文化正统形成冲击。

而宋代文学创作也出现“异化”,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四灵派”和江湖诗人“稍稍复就清苦之风”即“自谓之唐宗”,抛弃了诗歌应有的品质。

三、“盛唐气象”政治隐喻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通过重构诗学谱系与美学范畴,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中形成了一套隐性的政治抵抗话语。其核心策略是以“盛唐”为典范,通过对“气象”的政治编码和文学记忆的再造,以文学记忆重构“文化中

作者简介:段佳彤(2004—),女,本科,云南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段佳彤

1 王骏飞:《回归“诗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现代阐释》,《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

国”。

盛唐的“浑沌”气象恰是文化完整性与政治向心力的象征。严羽从文学理论角度再造地理空间,反复标举的“汉魏盛唐”在地理上实指被金人占据的中原故土。通过诗学话语,他完成了一种“文化收复”:正所谓“国破山河在”,盛唐诗人笔下的“河岳”成为文学版图上的“失地”,而严羽的诗学体系则成为抵抗地理断裂的符号武器。其“心理安慰”与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契合²。安德森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依赖于成员对“共享文化符号”的认同,即便这种认同超越了地理或政治边界。严羽通过诗学经典化,让南宋士人在阅读盛唐诗歌时,跨越现实疆界,共享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严羽的努力类似于时间上的“逆殖民叙事”。严羽将盛唐确立为不可逾越的典范,“学其上,仅得其中”,实则是以文化时间对抗政治时间。理学提倡格物致知,强调当下道德学习与实践;而严羽以盛唐为法,将盛唐塑造成永恒的黄金时代,以此在心理上掩盖南宋在军事上的弱势。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通过总结历史规律强调“汉唐”的不可复制性,以“夷夏之辨”平衡清军入关建立政权的现实挫败感。严羽的诗学话语正是这一“逆殖民叙事”的先声。

四、以禅喻诗与“妙悟”

(一) 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类比思维,将“禅”与“诗”结合起来以诗的形式诉诸出来。“禅”包括禅理、禅法、禅趣等广泛内容,“诗”则涵盖诗派、诗人、诗作以及相关创作、赏析、评价等方面。以禅喻诗用了佛教禅宗中“参”和“熟参”的概念。严羽的“参”,是指对诗歌的阅读和体验;而“熟参”则是指精细熟练地研读和探究,表示参的频率和程度。参是一种直寻,主体鉴赏时由参而悟³。“妙悟”作为以禅喻诗的理论核心,将在后文展开论述。

严羽“以禅喻诗”的局限在于没有深入研究禅学,类比本身就不严谨。《诗辨》原文写道:“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严羽将汉魏盛唐列为第一义,这毋庸置疑。又以大历为小乘禅,晚唐为声闻辟支果,而乘只有大、小之别,声闻辟支也即在小乘之中。也就意味着严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大历以还之诗”和“晚唐之诗”归到了同一层级;又不知禅家只有南北之分,而临济元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并出南宋,原无高下胜劣可言,且临济、曹洞俱是最上一乘,严羽的类比直接把曹洞拉低为小乘,很难不会引发误读⁴。

(二) “妙悟”

严羽在《诗辨》中提出的“妙悟”是其诗学理论的核心,矛头直指理学及其影响下的江西诗派等。悟是一种“不涉理路”的感性直觉,妙悟则是悟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主体对感性生动对象的直觉体验,反映了主体先天诗性素质的觉醒,超越了知识和经验,包含着透彻的洞见和创造性的诗思⁵。妙悟与禅宗顿悟有深刻关联。严羽借禅喻诗,以“透彻之悟”形容诗歌的最高境界,实则是以禅宗的“直指本心”对抗理学的“外求于理”。

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个体情感置于“理”的约束下。理学的核心方法论是“格物致知”,主张通过理性分析、逻辑推演来把握事物的“理”,投射到诗学中表现为以道德教化、义理阐发为诗歌的最高目标。朱熹从理学角度解读诗经,“郑、卫之乐,皆为淫声。……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⁶”,认为相比于卫,郑的淫奔之诗占比更大,内容更加奔放且“无耻”。由此提出的著名的“郑声淫”观点长期占据主流,对后世正常解读《诗经》中的情诗产生了不良影响。

除了直接批判爱情诗,朱熹还试图曲解其主旨以服务于理学的教化。在解读《诗经·关雎》时,他毫无根据地认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姬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又赞颂“其相与和乐而恭敬”,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审美情感强行纳入“文王之德”的政治伦理框架,又冠

2 班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六页

3 朱志荣:《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歌主体论》,《人文杂志》2014年第12期。

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440页

5 朱志荣:《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歌主体论》,《人文杂志》2014年第12期。

6 (宋)朱熹注:《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2页

之以“和乐而恭敬”的道德伦理，称此诗“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⁷，把一首简单直率的情诗解读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诗歌沦为道德和学问的附庸。

严羽则强调“诗道亦在妙悟”，将诗歌创作与鉴赏归结为一种直觉式的、非逻辑的审美体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他以孟浩然与韩愈对比，高扬诗人的主体直觉：“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即“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这里“学力”代表知识积累，“妙悟”代表直觉审美；韩愈“以文为诗”体现理学家的格物路径，孟诗“一味妙悟”则是直觉把握。严羽借此表明，诗歌的价值不在于符合理学标准，而在于诗人个体的灵性体验。他主张诗歌的本质在于“吟咏性情”，明确反对以“理”和“学问”作为诗歌的核心，抵制道德说教和理性思辨。“不涉理路”的思维方式直接否定了朱熹“格物穷理”的诗学路径。

严羽的“妙悟”重新赋予了诗人以自由审美的权利，试图打破理学僵化的思维范式，将诗歌拉回“兴趣”“意境”等审美本体。他提出“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将诗人的直觉感悟视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动力。然而严羽的“妙悟”仅仅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根本制约作用，“妙悟”指导下的诗歌常常因缺乏思想内涵而成为一纸空文。

五、“别材别趣”说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在《诗辨》中提出的“别材别趣”对理学主导的文化秩序进行了深刻解构，瓦解理学将文学纳入道德体系的企图。他激烈批判理学化的诗歌倾向，提出“诗有词理意兴”，并以盛唐诗为例：“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别材”的内涵存在争议，一说侧重于创作主体即诗人的能力，一说指使诗歌成为诗歌的真正“材料”，两者意思相近。“别趣”内涵相对明确，在《诗辨》中也叫“兴趣”，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与理学的“义理”截然对立。“别材”“别趣”意义相似，有人据文义认为“别材”与“别趣”可以理解为互文或互义，二者当是同义复指⁸。

在认知层面，“别材别趣”直接挑战了朱熹“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基础，试图恢复诗歌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地位。严羽通过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使诗歌摆脱理学工具化的命运，回归艺术本体。此外，严羽强调“兴趣”的审美独立性，明确指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将诗歌从理学的认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知识权力的争夺上，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创作方法实质上是科举应试技巧的文学延伸，文学在理学影响下出现政治工具化倾向。对此严羽在《诗辨》中尖锐批评“近代诸公”的创作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不仅针对诗学方法，更是对文学沦为政治附庸的抵抗。

别材别趣与格物致知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虽然严羽认为别材别趣无关乎书和理，但他实质上并不反对多读书、多穷理，而是指出应当如何读书与如何用书、如何穷理与如何说理的问题⁹。

六、历史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深受严羽影响，进一步发展复古理论，强调文学发展是不断演变的过程，各时代有独特风格，同时应继承前代优秀传统。基于此，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文学创作与理论领域掀起复古思潮；模仿盛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追求雄浑壮阔的意境和豪放洒脱的情感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盛唐诗歌的风貌，对纠正明代初期文学创作的萎靡之风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明代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严羽的诗学理论对清代诗学也产生了重要启示。明末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类似于严羽的“兴趣”说，强调诗歌要具有含蓄蕴藉、空灵淡远的意境，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¹⁰，对严羽的诗学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境界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严羽的“妙悟”等思想，强调诗歌创作要通过直觉和感悟来营

7 《诗集传》，第2页

8 王骏飞：《回归“诗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现代阐释》，《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

9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14页

10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造独特的境界。

七、结论

严羽的“妙悟”“别材别趣”通过否定理学认知路径、重建创作主体性、回归诗歌审美本体，实现了对南宋理学诗学观的解构。与朱熹“以理统诗”的路径相比，严羽的“以悟破理”不仅是对江西诗派和理学诗学的反拨，更是在南宋文化认同危机下的一种诗学抵抗——通过恢复诗歌的独立价值，对抗理学对文学的霸权挑战。严羽通过文学复古强化文化认同，为当代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历史经验；“盛唐气象”的文化符号意义也启示我们如何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独特性。而严羽的理论困境在于，他将“盛唐”本质化为完美典范，反而限制了诗学的批判维度。明代前后七子机械模仿盛唐的失败恰恰印证了抵抗性理论被体制化后的悖论。然其启示依然珍贵：在《诗辨》结尾对“叫噪怒张”诗风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了对文化抵抗策略的深刻反思——真正的抵抗需要避免沦为简单的姿态对抗。

参考文献

- [1] 郭绍虞, 王文生. 中国历代文论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2]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 (宋)朱熹注.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 班尼迪克·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5] 王骏飞. 回归“诗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现代阐释[J]. 当代文坛, 2005(4).
- [6] 朱志荣.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歌主体论[J]. 人文杂志, 2014(12).

Poetic Resistance in Yan Yu's *Poetry Discourse: The Poetry Critique* Under the Cultural Crisi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an Jiato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s period of partial rule, it faced a severe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Yan Yu, in *The Critique of Poetry* from *The Poetic Discourse*, constructed a cultural resistance strategy laden with political metaphors through his advocacy for reviving ancient styles and poet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through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historical contextual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core concept of "reviving the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delving into poetic propositions such as "alternative talents and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ful comprehension." It reveals Yan Yu's intent to dismantle Neo-Confucian discourse, reconstruct cultural orthodoxy, and reinforce the subjectivity of Han Chinese culture. Yan Yu's poetic theory is not merely an aesthetic innovation but also a cultural-political practice conducted through literature, offering crucial insigh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safeguard cultural subjectivity amid crises. Under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his "Tang Dynasty grandeur" inspires us to uphold cultural uniqueness through aesthetic autonomy.

Keywords: Yan Yu; *The Literary Mind: The Art of Poetry*; Southern Song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the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Atmosphere; Insight; Unique Talent and Unique Interest

露珠里的宇宙 ——评杨本芬《浮木》

周承宇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浮木》是南昌作家杨本芬继其处女作《秋园》之后出版的第二本自传性小说。《浮木》接续了《秋园》的苦难叙事,既讲述了无法回避的厄运给人带去的苦难,又以人祸的作茧自缚拷问了人性的良知。在苦难之外,作者还讲述了其晚年的欢乐与宁静,由此呈现出“人生有苦亦有乐”的生命图景。

关键词:杨本芬;自传性小说;苦难叙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61

引言

苦难同生老病死一样,是人一生当中所无法规避的。周国平把苦难分为两类: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在我们与亲人休戚与共的命运里,我们和他们的苦难也是一体的。当人祸与挫折同时袭来,如何面对苦难就足以考验一个人。2020年,80岁高龄的杨本芬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秋园》。在这本书里,她通过自己一家人颠沛流离、充满苦难的过去,告诉读者她是怎样面对苦难的。她的写作动机很单纯:想写本书纪念母亲,想让女儿以己为傲。通过《秋园》的序,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当时已处花甲之年的老人在狭小杂乱的厨房里弓着身子,在一高一矮两张小凳上一笔一画辛苦写作的身影。在《秋园》顺利出版并得到不小反响后,她依旧没有停止工作,在对过去的书稿进行整理的基础上,补充了部分文字,于2021年推出了《秋园》的姊妹篇——《浮木》。在《浮木》里,她扩大了苦难的叙事范围,讲述了在《秋园》里未竟的故事:不幸夭折的幼弟杨锐短暂的一生,意外损伤容貌却迁怒于女儿的曹七巧般的文秀,中年得女却又不幸失女的货郎,等等。在这本小书里,她将视野延伸到了乡亲和自己的后半生上,并于叙述苦难之外,写了自己与外孙女的天伦之乐以及老两口在南昌度过的幸福晚年。杨本芬的生活仍在继续,她的写作也在继续。

一、苦难命运中的人

《浮木》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接续了《秋园》的苦难叙事。这种苦难是命运中不可避免的,是难以预料也难以摆脱的。例如第一章《家》中的第一个故事《写给杨锐》。亲人离去的场面已经在杨本芬的笔下出现过多次,但《写给杨锐》却具有格外打动人心的力量,它写了特殊年代下人对死亡的麻木感知,以及在麻木过后那迟来的、深入骨髓的痛。

杨锐是杨本芬最小的弟弟,是她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可母亲却在产下弟弟后说了句“儿啊,你来得不是时候啊!”他出生时正值物质极度困乏、百姓普遍贫困的年代,食不果腹是常态,路有饿殍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正因如此,弟弟病死时“我”表现得十分麻木,不但没有感到悲伤,没有哭泣,还觉得弟弟的死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以后不用体会“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了。但是这种麻木却随着日后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消失不见,被麻木的情感一直压抑着的悲痛与思念终于浮上心头:“反而在日后,生活有了余裕,麻木与迟滞消失了,每每想起早夭的小弟弟,都感到锥心刺骨的疼痛。当我八十岁时,杨锐依然一岁多,模样如在目前。我记得他曾有过的活泼的生,记得他不得不为的安静的死。我记得,统统记得!这只在人间停留一年有余的生命,从未在记忆中消失。”岁月从不会真正抹除记忆,岁月只会把记忆冰冻起来,以待来日的某个契机将其解冻。与这记忆有关的所有情感也如暗流一般在冰面下缓缓流动,等待着在冰面融化时喷涌而出。杨本芬对幼弟迟来的悲痛是她苦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周承宇(1997—),男,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思潮及当代文学评论。

通讯作者:周承宇

然而这种苦难，同时也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共同经历过的。它还发生在第二章《乡》中讲述的许许多多人的身上。

《陈家冲人家》里，陈家老二陈友华和他老婆二宝原本日子还算幸福，只是一直膝下无子。二宝是个朴实敦厚的女人，她性格开朗，活泼善良。为了求子，她不知从哪听说偷来的菩萨像最灵验，于是和“我”的母亲还有同村的李娣合伙从庙里偷了一座菩萨像，供在家里虔诚敬拜。似乎菩萨真的显了灵，二宝觉得自己的肚子有了动静，陈友华也大为欣慰。一天，二宝出门去拜菩萨后，陈友华准备下地耕田，却被耕牛用角顶死。如此变故使得二宝大病一场。之后她又被检查出已经宫颈癌晚期，没过多久就病死了。就在以为生活马上要出现起色时，变故却突然降临，命运给这个母亲口中的“好人”带去了最为沉重的苦难。《消失的货郎》里李货郎和他的妻子也一直苦于没有孩子，两人商量再三，决定收养一个女儿。于是六岁的秀莲来到了李货郎的家里，给家中增添了不少的欢乐，也使夫妇二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后秀莲不慎被毒蜂蛰到，丢了性命。自那以后，夫妇二人极少出门，李货郎也不再做生意，两人不到六十岁就双双辞世。在足以毁灭生活的苦难面前，人是如此地脆弱。如果说这些苦难只能让人发出“命运无常”的感慨，那么那些人为制造的苦难则更加令人扼腕。

二、人制造的苦难

如果将那些突如其来的变故视作“天灾”，视作命中的劫数，那么另一类苦难则是完完全全的“人祸”。这类苦难也更值得读者深思。

第二章《乡》的第一篇《文秀》讲述了一个类似张爱玲《金锁记》的故事。文秀和她的丈夫松林是一对璧人，他们的婚姻在当地人眼里是一段佳话。然而，怀胎四个月的文秀却在一次砍柴的途中不慎从山顶上滑落。因为护着了肚里的胎儿，无暇顾及脸，树桩刺穿了她的腮帮子。破相后的文秀性情大变，变得不爱见人，多疑，喜欢生气，甚至还闹自杀。她把自己损毁的容貌归咎于女儿何美丽，对女儿百般刁难。美丽割猪草时结识了一位英俊的青年，春生。二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春生甚至说要娶美丽。然而这一切却被文秀察觉了，她跑到春生的家里，扬言说如果如果他再和美丽来往，就要放火烧掉他的屋子。二人只好断了来往，美丽被母亲许给了一个叫老五的男人。

美丽所遭受的苦难全来源于她的母亲。她本可以拥有幸福的童年，像其他孩子一样享受母爱，也本可以体验爱情，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但这一切全因文秀扭曲的心理变得无法实现。这让人联想到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曹七巧在情欲和财欲的控制下变得扭曲、乖戾，她亲手毁掉了自己女儿的幸福；而文秀则因一次意外损毁了她最引以为傲的面容，并将其归咎于腹中胎儿，最终也毁掉了自己女儿的幸福。但是，若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曹七巧尚能让人产生怜悯之心，文秀的行为却只能让人难以接受。曹七巧所处的姜家是一个无法逃离的幽闭型空间，为了对抗来自周遭的恶意，她在欲望的驱动下，从起初较为收敛的圆滑走向了最终的疯狂与反理智。但文秀所处的大屋场却是一个开放的、和谐的空间。她的丈夫松林没有始乱终弃，在文秀破相后多次劝说她放宽心，向她立下不离不弃的誓言。她的婆婆，也就是松林的母亲，并没有因此嫌弃她，对她的好一如从前。她的女儿美丽也一直试图讨好她，希望能获得来自母亲的关爱。然而，这一切在文秀的眼中都产生了扭曲，这些善意与爱意都被文秀赋予了恶毒的释义。她制造了禁锢自己的牢笼，最后还把女儿也关了进去。

《定坤叔》讲的是一位残疾老人因没有看护好自己的孙子，导致其溺毙，最后在儿子的冷漠和儿媳的怒骂下远走他乡消失不见的故事。他的儿子良心发现后试图去寻找父亲，但他跑遍了许多县城，找了十几年，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父亲的消息。痛失孙儿的定坤叔没有得到安慰，反而遭到了更为恶劣的对待，这种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的家人加在他身上的。在《李娣》里，李娣的大儿子终于娶到了媳妇，但夫妇二人却因为丈夫至今仍要和母亲一起睡觉、给她暖脚这件事吵了起来。大儿媳把这件事闹得村里人尽皆知，羞愧不堪的李娣最终上吊自杀。《老四》里的保田老倌因和四儿子对象的父母闹过矛盾，坚决不同意这对年轻人在一起，逼得儿子喝农药自杀，这成为了他余生最大的痛。他为儿子和自己都制造了巨大的苦难。如果说因意外造成的苦难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这些人为造成的苦难却不得不令人反思自我与自我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得不令人追问：我们有没有在无形之中，在无意之间，把枷锁套在亲近之人的脖子上？

三、苦难之外的欢乐

《浮木》的第三章《我》写的是杨本芬本人的故事，可以看作《秋园》的后传。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作者本人看来，有“拉杂之嫌”，它讲了在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讲了与孙辈的隔代之情，以及作者本人和老伴安乐祥和的晚年生活。总体上来说，这一章的笔调较为轻松，它写了苦难之外的温情与欢乐。即使是在写诸如遇到骗子等令人难过的事时，也带有一种自嘲的口吻。这也许是一位耄耋老人对生活的参透和感悟。

《苹果园历险记》写了“我”和丈夫陪一位出了车祸的女士上北京装假肢时发生的故事。其中写到了在假肢厂

遇见的一对父子：儿子没有双腿，父亲没有双手。他们合作生活，没有被苦难击倒；他们依旧在坚强地活着。《讨债路上》写“我”和同事出差去外地讨债，迷了路，在山里遇见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淳朴善良，热情地招待了“我”和同事，他们身上闪耀着一种自然、质朴的人性美。《和秋秋在一起的日子》写了作者和外孙女一起度过的温情时光：去公园里玩乐，掏墙上洞里的虫子并给它们搭房子，收养流浪小狗，外孙女躲着妈妈和自己一起睡觉等趣事。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祖孙情，一帧帧零散的画面拼凑出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图，读来令人动容。《小庐山》里写了小区里的老人如何把一处空地改造成话家常、做运动的休闲宝地。《晚年小景》则描绘了作者和老伴晚年的日常，写了他们互相逗趣、拌嘴，写了老伴怎样被一群老太太打趣儿，写了他们捡樟树叶子吹口哨的滑稽行为，写了老伴用的竹拐杖是自己在小区公共用地里砍的，等等。读到这些时，笔者感到了安慰，这样一位久经苦难、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安慰，收获了生活的喜乐与幸福。人生总是有苦有乐，苦尽总会甘来，这也许是杨本芬真正想告诉读者的。命运虽如流水般飘荡不定，反复无常，但只要硬咬着牙坚持下去，覆在这命运之水上的浮木也终会漂到可以容纳自己的河岸。

结语

托斯陀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集中营服刑时曾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如果我们受过的苦和罪无法让我们成长，那么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没有价值的。《浮木》里许多人受过的苦难也许是没有价值的，杨本芬把它们一一厘清，呈现给读者，正是想给予我们一份抗击苦难的勇气，想让我们学会从苦难中成长；毕竟她自己总算熬过来了，而且最终获得了幸福。在序里，杨本芬把她的文字比作一颗露珠的记忆。露珠微小、脆弱，并终会蒸发、破灭，但是一滴露珠里也能容纳一个广阔的宇宙。至少通过《浮木》这滴露珠，我们看见了作者前半生的苦难和后半生的安乐，我们看见了其他许许多多已经消失不见的人曾经有过的生活。露珠会消失，文字会长存。这也许正是杨本芬勉力写作的原因：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曾经存在于一滴露珠里的宇宙的广阔。她在序里写下的这段话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

“一个最微小的个人，也可以呈现与记录鲜活的历史。一个平凡的生命，当你如实呈现，也会焕发出感召他人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杨本芬.浮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 [2]行超.写作的尊严——杨本芬和她的“看见女性三重奏”[J].创作评谭,2022,(05):4-5.
- [3]一石.心里满了，就从笔下溢出——杨本芬与她的写作[J].创作评谭,2022,(04):40-42.
- [4]陈蔚文.“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杨本芬访谈[J].创作评谭,2022,(04):43-48.
- [5]杨本芬自传体小说：女性话语、历史诗学与个人家族史的建构[N].文艺报,2023-04-21(007).
- [6]李万霞.普通女性的命运交响曲：杨本芬的个人家族史书写[J].长江小说鉴赏,2024,(20):16-19.
- [7]张瑶侯.论杨本芬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困境书写[J].名作欣赏,2025,(20):109-111.

The universe in the dewdrop -- Review of "Floating Wood" by Yang Benfen

Zhou Chengyu

(Jiangx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Abstract: "Floating Wood" is the second autobiographical novel by Nanchang-based writer Yang Benfen, following her debut work "Autumn Garden". "Floating Wood" continues the narrative of suffering from "Autumn Garden", depicting the unavoidable misfortunes that bring people suffering, while also interrogating human conscience through the self-imposed bondage of man-made disasters. Beyond the suffering, the author also narrates the joy and tranquility of her later years, presenting a life picture of "life has both suffering and joy".

Keywords: Yang Benfe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narrative of suffering

OBE 理念下“双循环”劳动教育的课程评价建构 ——以肇庆端砚非遗研学为例

陈文俊

(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本研究针对劳动教育文化载体短缺与形式化问题,以OBE理念构建“内循环标准建构-外循环实践迭代”双循环模型。以肇庆端砚非遗研学为载体,采用德尔菲专家法、李克特量表和SPSS聚类分析,开发出包含理论认知、工具技能与创新应用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了劳动教育课程评价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指标的转化思路,为劳动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提供了可测量、可迁移的实施方法。

关键词: OBE 理念; 劳动教育; 非遗研学

基金项目: 广东省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X20251058005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88

1. 引言

中小学劳动教育正处在从“边缘化”“简单化”活动向系统化、课程化教育转型的关键阶段^[1],其核心挑战就在于怎样发掘富有文化内涵的实践载体,并形成可评估、可革新的有效模式,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把“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当作核心原则,为破除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2],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含有的技艺实践属性与文化综合属性,恰好能为劳动教育提供理想的实践场景以及文化载体^[3]。

尽管现存研究分别探讨了OBE和劳动教育^[1]、非遗和劳动教育的融合^[3],但匮乏一个将三者系统性整合起来且具有自我优化机制的顶层模型,本研究想要填补这一空白,把OBE理念当作框架,构建起“内循环标准建构-外循环实践迭代”的双循环劳动教育模式,并以肇庆非遗研学为案例实施实证探索,盼着为劳动教育的深化改革与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一条可模仿的新路径。

2. 理论基础与综述

2.1 OBE 理念: 系统化设计的方法论支撑

OBE理念主张教育应从期望的最终学习成果出发实施反向设计,它已由工程教育拓展至技能实训^[4]、课程思政^[5]等多个范畴,证明了其凭借“目标-过程-评价-改进”闭环机制在解决复杂教学问题方面的有效性,为这项研究构建可迭代、可优化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核心的方法指引。

2.2 劳动教育 OBE 化: 从活动走向课程与评价体系

劳动教育改革的潮流是构建目标导向的课程及综合评价体系,其OBE化改革着力于建立贯穿培养全过程的系统化课程^[1],并设计一套涵盖劳动技能、习惯和价值观、精神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6],这为本研究让劳动教育成效的可衡量性得到保障提供了直接依据。

2.3 非遗研学: 劳动教育的文化与实践载体

非遗研学发展已将展示性活动深化为体验式、项目化学习^[7],其与劳动教育融合的要点是借助“生活·实践”

作者简介: 陈文俊(2005—),男,本科生,肇庆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通讯作者: 陈文俊

策略,把非遗项目添加到课程、生产与生活中,达成“知行合一”的育人目的^[3],这为本次研究把肇庆非遗当作具体实践载体打下了坚实基础。

OBE 理念给出了方法,劳动教育 OBE 化研究厘清了方向,非遗研学为劳动教育供给了场域与对应内容,现存研究的空白是没把三者进行有机整合,形成有动态优化能力的完整模型,本研究构建起来的“双循环”模式,正是打算连接上述三个维度,其创新方面在于不仅去关注“外循环做什么”,更聚焦“内循环怎样做得更出色”,意在系统地回应劳动教育和文化传承协同育人的现实诉求。

3.“外循环”模式的内涵与运行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作为一种具身性的劳动知识集合体系,与突出“手脑并用”的劳动教育在本体论层面相契合,为化解传统非遗研学“博物馆化”所造成的认知脱嵌和价值悬浮困境,现今搭建一种叫做“外循环”的实践模式,此模式把具身认知理论当作基础,搭建“身体在场—工具操作—文化感知”三位一体的学习路线。其核心之处在于推动研学从“知识传递”过渡到“体知转化”的范式转变,使学习者在亲力亲为的劳动里,把抽象的操作知识以及价值观念内化为具身的感知,以此促成非遗劳动教育认知路径的进阶,

4.“内循环”模式的内涵与运行机制

内循环是依托 OBE 理念的课程标准迭代机制,其运行逻辑是从预设好的课程目标及评价标准起,紧盯教学实践,进而借助实践数据检验标准的有效性,且以证据为基础进行归因分析与标准改动,最终实现课程质量呈螺旋式上升,该机制恰如其分地回答了“怎样建立基于目标的评价模式”和“怎样实现课程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两大核心问题。

4.1 以评促践:基于预设目标的科学评价体系构建

内循环的起点即,遵循 OBE 理念,通过三轮严谨的步骤,系统构建了非遗劳动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

4.2 基于专家访谈的指标池构建

首轮研究采用访谈 7 位涵盖非遗传承人、教育学家等领域专家的方法,初步采集了 32 项能力指标,实施背对背咨询与语义去重步骤,最终认定了 12 项核心能力指标,即:石材鉴定、质量标准、课程设计、创新设计、价值阐释表达、安全规范制度、教学能力、历史知识、保养知识门道、刀法工具运用技巧、纹样解读心得、工具使用习惯,其中包含材料科学以及工艺技术多层面维度。

4.3 基于李克特量表的指标量化

七位专家针对12项肇庆端砚非遗研学能力指标的五级评分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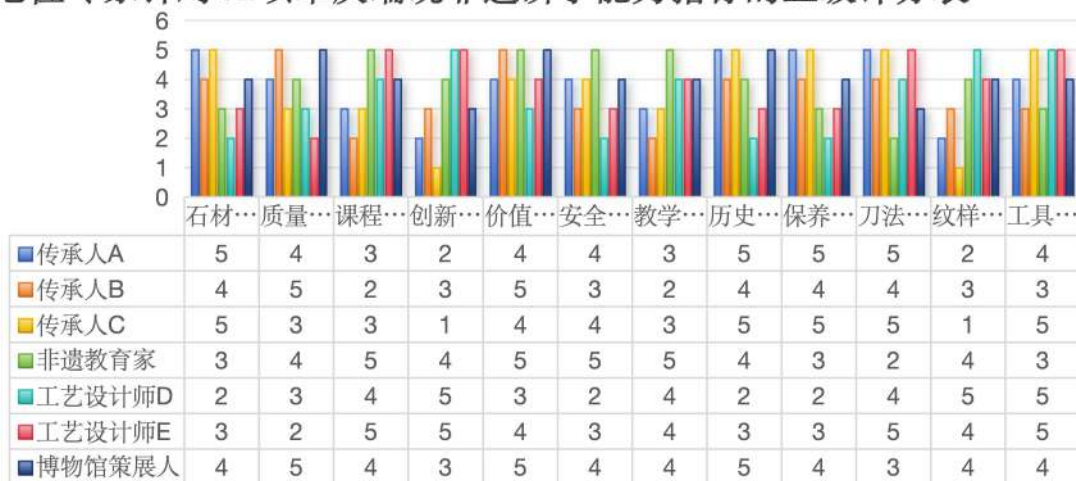


图 1 七位专家针对 12 项肇庆端砚非遗研学能力指标的五级评分表

在第二轮专家评议阶段中,本研究找来四个领域的专家组,对初步构建好的12项指标进行李克特五级重要性打分,以此实现对各个指标重要性的量化考量,为保护专家隐私,防止身份公开也许会引发的争议,全部专家均采用“传承人A”等方式进行匿名标注。

基于这一基础,采用可视化分析方式,清晰展现了各专家群体在指标重要性认识上的系统性差异,传承人群体一般更在意“石材鉴别”“刀法工具”等传统技艺类相关指标,而设计师群体则更聚焦于“创新设计”“纹样解读”等创新融合类指标,该方法有效防止了对评分结果实施简单平均可能造成的关键信息丢失,为后续指标体系优化及权重明确提供了充足、细致的数据支撑,相关分析的结果见如图1。

4.4 基于聚类分析的核心指标提炼

第三轮运用SPSS对评分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根据谱系图,12项指标可被科学归纳为三个核心维度,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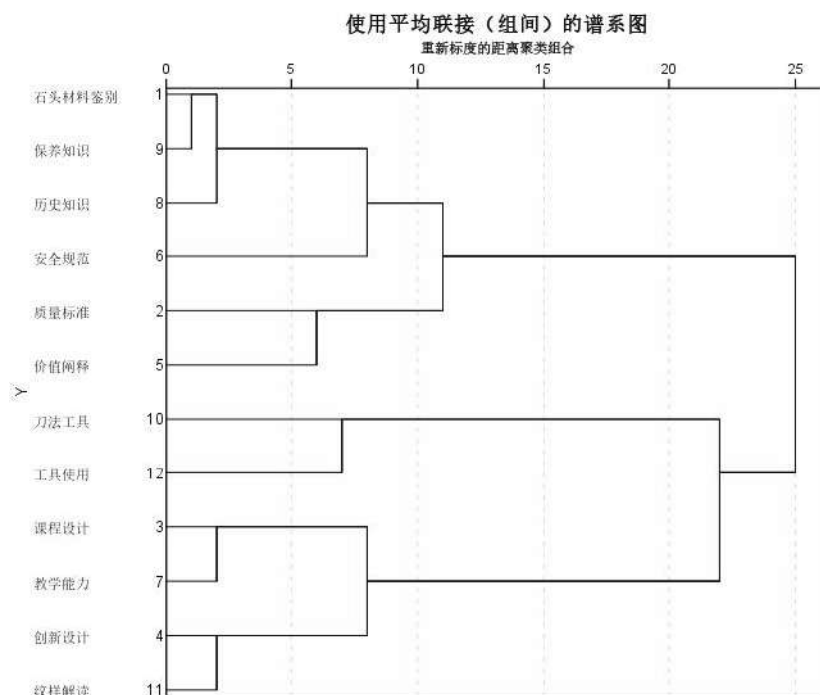


图2 使用平均联接（组间）的谱系图

借助聚类分析得到的12项能力指标谱系图2来看,在本研究涉及的谱系图里面,可以明显地发觉,当聚类距离大致小于15的时候,各分类内部的聚合进程较为平稳;当聚类距离差不多为15的时候,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垂直跨越,这次聚合会跨越多个原本差异明显的小类,表明这次合并将造成类别内部的同质性大幅减弱,把此次显著聚合形成之前的状态,也就可以归成3类,判定为最能平衡类别间区分度与类别内一致性的最优分类方案,这个判断依照了系统聚类分析里“类间差异最大化,类内差异最小化”的核心要求。

按照前面的分析,本研究将12项能力指标合理地总结为三个核心维度,这三大类别在概念内涵里同样呈现出高度的聚合效度,分别对应劳动教育不同的能力层级,各项内容见表1。

表1 OBE理念下的劳动教育课程评价能力指向——以端砚课程为例

变量类别	归纳后的能力指向
第一类包含: 石材鉴别、保养知识、历史知识、质量标准、价值阐释	理论知识类的能力指向
第二类包含: 刀法工具、工具使用、安全规范	工具操作类的能力指向
第三类包含: 学习能力、创新设计、纹样解读	教学以及设计创新类的能力指向

理论认知维度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8]学构建框架,规划从把握历史脉络、阐释技艺原理到考量文化价值的认知进阶体系,重点培育学生对非遗起源、工艺逻辑与美学内涵的深刻认知,进而提升其对文化的认同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工具技能维度依照着具身学习理论,构建起从工具认知、技法训练到安全实践的递进式路径,利用匠人示范及系统实操,引导学生掌握端砚刀具运用与刀法把控等核心技能,把非遗技艺变为身体里的记忆元素,给技艺传承打下坚实基础。

创新应用维度参照威金斯提出的迁移、创造这类高阶思维能力,意在推动非遗元素融入现代生活的跨界融合与场景化应用,以组织非遗主题文创设计及社会传播实践为途径,引导学生达成传统文化跟现代需求的有机互动。

该分类命名并非主观揣度,而是对在数据驱动下的指标聚合关系和 OBE 教育目标分类学进行的一次理论性映射,保证评价维度的科学性、完整性与时代性得以实现。

4.5 以践验评:通过教学实践反馈驱动评价标准迭代

借助从繁杂的数据中精准提炼出三类关键指标,即理论认知维度目标、工具技能维度目标与创新应用维度目标,将先前劳动教育与研学教育中抽象的“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细化为具体、可衡量的学习目标维度。以这三大能力指标为基石,逆向设计课程,以践验评,在教学实践中验证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并根据学生实际调整。

5. 结论

研究按照 OBE 教育理念开展,构筑了“外循环实践驱动 - 内循环标准迭代”双循环劳动教育理论模型,研究把肇庆端砚非遗研学当成具体的研究场域,其核心实证成果为系统构建出一套科学、可度量的劳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为应对劳动教育效果评估困难这一状况提供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

研究凭借严谨的三轮专家咨询与数据研究分析,成功把劳动教育里抽象的“工匠精神”“文化认同”等概念转变为可观测、可衡量的具体指标,内循环机制首阶段运行的结果表明,依靠 SPSS 系统聚类分析等工具,可把从专家访谈时收集的杂乱初始指标,科学合理地提炼归纳成三大核心维度:也就是由理论认知、工具技能和创新应用构成,这为劳动教育精准评判和目标设定筑牢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把 OBE 理念“持续改进”的核心原则落实到具体操作中,制定了一个以评价标准构建与替换为驱动核心的“双循环”模型,为劳动教育和非遗研学融合的范畴提供了可复制的顶层设计构架,实践价值是交付了一套由专家进行效度检验的、针对端砚非遗研学的具体评价标准,为后续教学活动的谋划、开展及效果评估提供了确切指引。

但是,研究作为模型搭建和标准制定的初步阶段,局限性在于初步构建的评价标准没能完整应用到课程设计及教学实践里,内循环中“以践验评”环节的有效性,得靠后续研究来验证,研究下一步打算以本评价标准为基础,以逆向方式设计端砚非遗劳动教育课程,并在教学实践里检验标准的有效性,启动内循环的反复优化进程,最终达成课程质量与评价标准呈螺旋上升的闭环。

参考文献:

- [1] 邹昱音. OBE 教育理念下高职教育劳动教育模式的构建分析[J]. 2022.
- [2] 冀燕丽, 罗熊, 陈建. 基于 OBE 的教学大纲编制理论框架与实践应用研究[J]. 2025(02): 57-64.
- [3] 蒋凤娟. 非遗融入劳动教育的“生活·实践”维度研究[J]. 2025
- [4] 刘峰. OBE 理念下技能类实训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绳索救助技术”课程为例[J]. 教育训练研究, 2025(02): 84-90.
- [5] 黄宗翔, 张军. 基于 OBE 理念的“三位一体”全过程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以“数据库原理与应用”为例[J]. 2025(15).
- [6] 陈尚尚. 基于“五育融合”的高校劳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J]. 天津理工大学学报, 2025.
- [7] 刘敏.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教育的实践——以非遗研学为中心的探讨[J]. 2023.
- [8] 本杰明·布卢姆等.《教育目标分类学 第一分册: 认知领域》[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50-60 页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 for "Dual-Cycle" Labor Education

Under the OBE Concept: A Case Study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y

Tour of Zhaoqing Duan Inkstones

Chen Wen Jun

(Zhaoqing University,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new-era labor education faces the dual challenges of a shortage of cultural carriers and a tendency to become formalized and rigid. Guided by the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ncep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ual-cycle theoretical model of labor education featuring "internal cycle for standard construction and external cycle for practice iteration", with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y tour of Zhaoqing Duan Inkstones as the practical carrier, and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within the internal cycle.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the Delphi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Likert scale quantification, and SPSS cluster analys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develops a labor educ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vering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cognition, tool skill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he internal cycle mechanism of this model effectively drives the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from abstract concepts to specific indicators, providing an operable method for assessing labor education outcomes. The main achievement of this study lies in comple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evaluation standards within the dual-cycle model. This not only lays a solid theoretical and data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se standards but also identifies a measurable and improvable approach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OBE concept; Labor educ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udy

体医融合背景下“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在慢性病康复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吕瑞芳¹

(1.吉利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摘要: 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主要因素, 运动康复在慢病防治与康复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推进, 体医融合理念逐渐成为教育与服务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 传统康复教育存在学科壁垒、实践不足和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康复人才的培养质量。基于此, 本文旨在探索“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在慢性病运动康复教学中的应用路径。在研究框架的构建上, 本文以体医融合与协同育人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由高校课程体系、医院临床实践和社区健康服务共同支撑的教学模式。实践表明, 该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知识、临床技能和社会服务能力, 增强了就业竞争力。但该模式仍存在机制不稳固、师资不足和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不仅有助于推动运动康复教育的改革, 也为完善慢病防治体系和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经验。未来, 应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 健全长效运行机制, 并积极引入数字化与智慧化教学手段, 以推动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体医融合; 校-院-社; 协同育人; 慢性病康复; 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 吉利学院“三个校园”教学改革项目(2025SGXYJG09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5

1 引言

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慢性病占全球死亡的 70% 以上,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肿瘤最为常见 [1]。在我国, 慢性病患者人数持续增长, 约占疾病总负担的 70% 以上,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医疗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2]。运动康复作为非药物干预的重要手段, 已被证实能有效改善心肺功能、增强肌肉健康、降低代谢风险, 促进心理健康 [3-4]。基于此, 国家大力推进“体医融合”战略, 强调体育与医疗的深度合作, 以实现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的协同发展 [5]。然而, 传统康复教育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科壁垒明显、社会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 导致康复人才难以满足复杂的慢病管理需求。“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由高校提供系统理论与科研支撑, 医院提供临床实践平台, 社区承担康复延伸与服务场景, 形成教学、科研与服务一体化机制。这不仅符合教育部关于协同育人的政策导向, 也为慢病康复人才培养提供了新路径。该模式在学术上推动学科交叉, 在教育上强化知行合一, 在社会上惠及患者,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国际上, 跨专业教育与协作实践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 Collaborative Practice, IPECP) 已被广泛应用于慢病康复人才培养, 强调多学科协作满足人群健康需求 [6]。以土耳其为例, 2022 年起实施的基于 ARCS-V 动机模型的 IPE 项目, 以“慢性病管理与病人安全”为主题,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结果显示学生在学习动机和跨专业学习准备度方面显著提高 [7]。慢性病照护模型 (Chronic Care Model, CCM) 则突出社区资源、临床支持与患者自我管理的结合 [8]。同时, 运动医学指南不断更新, 为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阻肺等患者提供循证运动处方, 推动“运动是良医”理念在公共卫生和社区推广 [9]。

在国内, 国家政策文件如《健康中国 2030》和《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出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相结合的全周期理念, 为体医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 [5, 10]。近年来, 国内学者围绕体医融合的人

作者简介: 吕瑞芳 (1996—),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运动医学

通讯作者: 吕瑞芳

才培养、校院合作与社区康复开展探索,部分高校与医院、社区合作开设慢病康复课程和实践项目,取得积极进展[11, 12]。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其一,体系化研究和长期随访有限;其二,校、院、社之间缺乏统一的能力框架和评价标准,协同运行多依赖经验推动;其三,跨学科师资不足,资源配置不均;其四,社区场景嵌入深度不够,连续性管理不足;其五,政策导向与院校课程体系之间衔接有待完善。

总体而言,国际模式在跨学科整合与评价体系建设上更为成熟,而我国的体医融合仍处于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阶段(见表1)。因此,本文拟在体医融合背景下,探讨“校-院-社”协同育人在慢性病康复教学中的实践路径,力求为康复人才培养、社区健康服务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范式。

表1 国内外慢性病康复教育模式比较

指标维度	国际模式 (IPECP、CCM 等)	国内模式 (体医融合探索)	特点与差距
理论框架	IPECP、CCM 模型,强调跨专业协作、连续照护	健康中国 2030,强调体医融合与健康促进	国际更注重循证与连续性,国内处于制度建设阶段
教学模式	多学科课程、社区嵌入式实践	校—院—社合作,项目化推进	国内缺乏长期机制与统一标准
课程体系	跨学科整合(医学、护理、社工、康复)	偏向康复与体育结合,跨学科课程不足	需增加健康心理、信息化模块
评价方式	能力导向、循证反馈	课程考核和实习报告为主	评价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2 理论基础与模式框架

2.1 体医融合和协同育人的理论支撑

体医融合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慢性病康复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医学强调疾病的预防、诊断与治疗,体育学注重运动技能、体能训练和运动处方,两者在服务对象、干预方法和健康目标上高度契合。将运动训练的科学与原理与康复医学的临床经验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患者在疾病治疗后恢复功能,还能通过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实现“治已病”与“治未病”的统一。由于慢性病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单一医疗干预往往存在局限性,WHO 倡导的“整体健康观”提出应从身体、心理与社会功能三个层面进行综合干预,这也为体医融合理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的提出既是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也是多学科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该模式强调教育过程中多方主体在目标、资源和过程上的协作与共享,突出优势互补与共赢。教育学视角强调知行合一,要求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实现知识与能力的统一;社会学视角突出教育与社会的互动,使协同育人不仅成为教学方法创新,更成为社会健康治理的重要环节;康复学视角则注重功能改善与社会参与,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临床实习与社区服务,能够掌握慢病评估、干预与随访等完整流程[12-13]。体医融合与协同育人共同构成了慢性病康复教育的重要理论支撑。

2.2 模式构建框架

在体医融合和协同育人理论的共同推动下,慢性病运动康复的“校-院-社”协同模式逐渐形成。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根据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突出跨学科教学,涵盖慢性病康复学、运动处方学、健康管理学和康复心理学等内容,强化学生的知识储备与科研能力。医疗与康复机构作为实践平台,承担学生的临床训练和案例教学任务,帮助其在真实康复场景中掌握疾病评估、运动干预和康复随访的技能。社区作为康复服务的延伸场所,既是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健康服务的实践场景,也是验证教学成效的重要环节。通过健康讲座、康复工作坊、慢病干预项目,学生能够直接参与公共健康管理,提升社会服务意识与实践能力。三方通过制度化合作、双向师资聘任、资源共享和实践考核,逐渐构建起“教育链—医疗链—健康链”贯通的运行体系。该模式实现了课程教学、临床实训与社区服务的良性互动,不仅提高了康复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也为慢性病防治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提供了可持续的教育保障。

3 实践探索与实施路径

3.1 教学目标与定位

在体医融合战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慢性病康复教学的目标不仅局限于知识传授,更强调复合型、实践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按照运动康复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教学定位应面向社会健康服务与临床康复双重需求,突出理论素养、临床技能与社会服务能力的整体融合。通过“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学生应在掌握康复基础理论和现代康复理念的基础上,能够熟练开展康复评估、运动处方制定与实施,并在社区与医疗机构中承

担慢性病健康教育与康复干预的工作。该模式的最终定位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既能服务医疗体系又能支撑社区康复与健康促进的复合型康复人才，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教育支撑。

3.2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的设计坚持“理论—实践—应用”递进原则，以课程体系为核心，逐步形成多维度、模块化的人才培养路径。在理论课程方面，除开设《慢性疾病运动康复》《运动体适能》《健康管理学》等必修课程外，还结合康复学科发展趋势增设《康复心理学》《运动营养与膳食》《数字康复技术》等模块，使学生能够理解慢性病发生发展的机理，掌握运动干预和健康管理的基础理论。在实践课程方面，突出康复评估、运动处方和社区干预三大环节，同时融入传统康复治疗（推拿、拔罐、灸法）及作业疗法、言语治疗等特色内容。例如，在康复评估课程中，学生需掌握关节活动度、肌力、平衡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测评；在运动处方制定课程中，学生需根据不同慢病患者的病情与体质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在社区干预项目中，学生通过慢病患者健康教育、康复训练营和随访管理，形成康复知识转化为社会服务的能力。通过课程体系的纵深拓展，实现理论知识、技术技能与社会实践的全面贯通。

3.3 教学方法与形式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多样化与创新性，强调“课堂—临床—社区”的一体化实践。课堂教学方面，采用案例教学与情景模拟，借助典型病案和虚拟情境训练，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与应变能力。在临床教学环节，学生分阶段进入不同科室，如物理因子治疗、运动疗法、传统康复岗位和相关科室康复岗位，在临床带教教师指导下，参与神经康复、肌骨康复及儿童康复等康复操作。在社区实践环节，学生通过健康讲座、康复工作坊和志愿服务，深入社区人群，承担健康教育和运动干预的任务，强化沟通技巧与服务意识。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康复教学逐渐成熟，线上平台和虚拟仿真系统广泛用于教学与考核。通过线上案例库、远程康复监测和虚拟仿真操作，学生不仅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还能获得个性化学习体验，进一步提高康复操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3.4 协同机制与运行模式

“校-院-社”协同机制是实践教学顺利实施的制度保障。高校在课程体系设计、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和科研训练中发挥主导作用，确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前瞻性。附属医院和合作医疗机构则提供临床见习与实习平台，学生在不同病种和康复科室的轮转中，逐步掌握从康复评估、干预操作到康复随访的完整技能链条。社区作为康复服务的延伸场所，为学生提供慢病患者真实干预与健康教育的环境，使学生在社会服务中强化康复理念的转化与应用。三方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联合指导小组和共享教学资源，实现制度化与常态化协作。例如，高校与医院共同开发案例库与临床技能考核标准，社区与高校联合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并反馈教学质量，医院导师与高校教师双向聘任，共同承担教学任务。通过这一机制，逐渐形成“教育链—医疗链—健康链”贯通的运行模式，推动教育质量提升与社会健康服务效益双向发展。表2展示了“校-院-社”三方在教学实践中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三方通过资源共享、双向师资、联合评价，逐渐形成完整的运行体系。

表2 “校-院-社”协同育人运行机制

环节	高校（校）	医院（院）	社区（社）	协同特色
教学资源	课程体系建设、教材编写、科研训练	临床案例提供、带教导师	健康教育资源、患者群体	教学资源共享
实践安排	理论授课、科研指导	临床见习、轮转实习、病例教学	康复工作坊、健康讲座、志愿服务	教学与服务结合
师资力量	专任教师、科研导师	临床专家、康复医生	社区健康管理人員	双向聘任与合作
质量评价	课程考核、论文评审	临床技能考核、导师评价	社区反馈、康复效果评估	多维度评价体系

4 案例分析与实践成效

4.1 实践案例

以吉利学院运动康复专业为例，该校在体医融合理念指导下，依托附属医院与地方社区共建实践教学平台，逐步探索“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学院先后与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四川省康复医院、简阳市人民医院、

绵阳市骨科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建立高水平临床实践基地。在实习环节中,学生需经历岗前培训、物理因子治疗、运动疗法、传统康复、作业及言语治疗等多个岗位轮转,集中实习期达24周,覆盖神经康复、肌骨康复和儿童康复等典型病种。此外,学生还进入社区承担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教育与康复指导,形成课堂教学、临床实习与社区服务的互补格局。通过制度化安排和多部门协作,逐渐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实践育人案例。

4.2 教学效果与反馈

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从学生层面看,多数实习生能够较好地适应医院科室轮转,熟练掌握康复评估、运动处方制定及干预实施等技能,其临床操作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显著提升。根据实习中期检查结果,集中实习学生的报到率和适应性均保持较高水平,医院对其实习态度、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给予了积极评价。部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获得医院表彰,甚至收获患者及家属的书面感谢信,体现了其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提升。从院方和社区反馈看,带教导师普遍肯定学生在康复实践中的学习热情和责任感,但也提出学生在循证思维与自主康复方案设计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就业流向显示,完成协同育人模式培养的学生更容易进入康复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或相关科研岗位,整体就业质量得到改善。

4.3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校-院-社”模式在慢性病康复教学中展现出积极价值,但实践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其一,合作机制尚不够稳定,不同医院和社区在资源供给、带教规范及考核体系上存在差异,影响了教学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其二,师资与资源不足仍是突出矛盾,尤其是兼具教学与临床能力的双导师数量有限,制约了个性化指导。其三,学生参与积极性不均衡,部分学生存在实习报告敷衍、签到不及时、主动性不足等情况。其四,实习内容与岗位匹配度不高,个别学生反映康复科轮转时间不足,部分科室与专业相关性有限,导致学习深度不够。其五,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实习脱节,部分人未能合理平衡实习任务、论文撰写与未来发展需求。针对这些问题,学院和合作单位已尝试采取措施,如建立“校—院—社”三方责任协议、优化科室轮转安排、强化实习纪律管理、引入“校友邦”等信息化平台加强过程监管,并通过中期检查与师生座谈及时反馈和整改。

5 讨论

5.1 模式的优势与创新点

“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在慢性病运动康复教学中的实施,凸显了多方面的优势与创新。首先是学科交叉的优势。医学与体育学在慢病康复中的深度融合,使得课程体系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学科局限,形成了理论与技能与健康管理综合培养路径。学生不仅学习康复医学知识,还在运动训练、康复心理、健康管理等领域获得跨学科素养,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宽度与厚度。其次是教学与社会服务的紧密结合。通过医院轮转和社区实践,学生能够将课堂所学直接应用于临床与公共健康服务,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表3 协同育人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维度	优势	不足	改进方向
学科交叉	医学与体育结合,培养复合型康复人才	课程设置仍偏重本专业,跨学科不足	增加心理学、营养学、信息化等模块
实践环节	临床与社区结合,强调应用导向	社区实践持续性不足	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增强连续性
师资队伍	双导师制逐步推行,提升教学与临床衔接	兼具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复合型师资不足	加强教师培训与双向流动
评价机制	初步形成课程与实践结合的考核体系	缺乏标准化和系统化评价指标	构建“知识—技能—素养”三维评价体系

实践过程中,部分学生不仅在医院得到导师表扬,还因服务态度和康复效果赢得患者的感谢信,反映出该模式对学生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塑造作用。最后,该模式体现了应用导向的人才培养特色。传统教学偏重理论灌输,而协同模式突出实践与就业导向,使学生毕业后能快速适应康复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岗位需求,提升了人才培养的社会适配度。综上,该模式在慢性病康复教学中既展现出优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为便于对比分析,其优劣势归纳如下(见表3)。

5.2 模式的局限性与改进方向

尽管协同育人模式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制度与政策支持不足。当前合作机制多依赖学校与个别医院、社区的项目化合作,缺乏稳定的制度化保障,导致在实践内容、带教标准和考核方式上存在差异。其次,实践环节的可持续性不足。由于经费投入有限,部分社区康复项目难以长期维持,学生在社区干预环节存在“短期介入、效果难以延续”的问题。第三,师资与资源供给不均衡。大多数附属医院和实习基地能够满足基本教学需求,但具备丰富临床经验和教学能力的“双导师”数量有限,部分学生在个性化指导和科研训练方面的支持不足。此外,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目前评价多集中于考勤、实习报告和阶段性考核,缺乏对跨学科能力、循证思维和社会服务能力的系统化评价。因此,需要在政策层面推动校-院-社三方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在管理层面强化经费与制度保障,并在教学层面构建“知识—技能—素养”三维一体的评价体系,从而不断改进与完善该模式。

5.3 对教学改革的启示

在慢性病运动康复教育中,“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均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教育创新,深化跨学科课程建设,拓展数字康复、运动营养、康复心理等新兴模块,将体医融合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另一方面,应建立长效机制和标准化运行模式。学校、医院和社区应形成常态化合作关系,在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习管理和质量评价方面形成制度化安排,避免合作松散和项目化短期运行的问题。同时,应加快推进信息化与智慧康复教学的应用,借助虚拟仿真、远程康复监测和案例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和精准教学,推动教育的公平性与普及性。最后,应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提供资金和制度支持,推动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的广泛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式。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运动康复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还能在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服务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6 结论

在体医融合背景下,探索“校-院-社”协同育人模式对提升慢性病康复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模式通过课程体系的优化、临床实践的强化以及社区服务的延伸,逐步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与社会互动的多元育人格局,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知识、临床技能与社会服务能力。从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医融合不仅是高等教育培养复合型康复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协同育人模式实现了教育链、医疗链与健康链的有机衔接,为社会提供了契合需求的康复人才和健康服务。展望未来,该模式仍需在制度建设、标准化运行和长效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并进一步加强信息化与智慧康复教学的应用,以推动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实践。随着不断优化与深化,其在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将愈加凸显,为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教育保障。

参考文献:

-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EB/OL]. (2024-12-23)[2025-09-15].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noncommunicable-diseases>
-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23.
- [3] Liguori, Gary, and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20.
- [4] 万莲莲.体医融合背景下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2022.
-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Z]. 2016-10-25.
- [6] Shuyi, Amelia Tan, et al.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medical and nursing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on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 74 (2024): 103864.
- [7] Başer, Aysel, and Hatice Şahin. “An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program based on the ARCS-V motivation model on the theme of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nd Patient Safety”: action research.” BMC Medical Education 25.1 (2025): 532.
- [8] Guzmán-Leguel, Yisel Mi, and Simón Quetzalcoatl Rodríguez-Lara. “Assessment of patients’ quality of care in healthcare systems: a comprehensive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Healthcare. Vol. 13. No. 14. MDPI, 2025.
- [9] Mendola, Nicole. “Exercise Evolved: Exciting New Updates in 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ACSM's Health & Fitness Journal 29.2 (2025): 44-47.

[10]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20,24(36):5905.

[11] 张阳,吴友良.健康中国战略下体医融合的实践成效、困境与推进策略[J].中国体育科技,2022,58(01):109-113.

[12] 现代职业教育聂应军,赵元吉,郑湘平,等.我国体医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多维逻辑、影响因素及实践路径[J].体育学刊,2022,29(03):40-50.

[13] 邵媛,顾小花,周霁,等.医养结合视域下康复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2025,(26):49-52.

Exploration of the “School Hospital Socie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in Chronic Disease Rehabilitation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Ruifang Lyu¹

¹ School of Sports and Health, Geely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Chronic diseases have become a major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and exercise-based rehabilit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oth prevention and recover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strategy,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ng medicine and sport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 key direction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nd health servic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disciplinary barriers, insufficient practical training, and limited utiliz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which to some extent hinders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 hospital –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in the teaching of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for chronic diseases. Building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edicine – sports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a teaching framework supported by university curricula, clinical practice in hospitals, and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Evidence from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linical skills, and social service capacity, while also enhancing their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Nevertheless, challenges remain, such as unstabl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faculty resources, and incomplete evaluation systems. Overall, the “university – hospital – community” model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reform of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new insigh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improving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well as for advanc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Looking ahead, greater policy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mechanisms, and the activ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aching tools are needed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is model.)

Keywords:Medical-sports Integration; University-Hospita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hronic Diseases Rehabilitation; Teaching Reform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譙阳阳 秦媛 俞晓婷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在新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 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重塑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路径。本文从辅导员的视角出发, 探讨如何利用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通过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 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研究发现, 借助新质生产力, 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个性化和智慧化, 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适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本研究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辅导员; 数智化转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6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应用, 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新质生产力, 正日益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国家层面不断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 在此背景下,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与现实挑战。高职院校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不仅肩负着传授知识与技能的使命, 更肩负着育人育德的社会责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 其质量与成效直接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思想素养提升和综合能力发展。然而, 当前高职思政教育在内容更新、教学方式、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瓶颈, 亟需借助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与理念实现创新与突破。因此, 系统研究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不仅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也是提升育人实效、培养德技并修人才的重要路径。本文立足当前教育变革大势, 围绕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逻辑, 系统分析其在高职思政教育中的应用价值与实施路径, 旨在为相关政策制定与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操作参考。

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随着新质生产力理念的逐步深化与推广, 高职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基本构建起以课程思政为主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体系。然而, 面对日益严峻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与时代发展的新挑战, 当前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仍面临以下问题与困境:

(一) 教育内容相对传统, 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内容

当前多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经典内容为核心, 内容体系较为固化, 未能及时融入当代科技发展、社会热点和青年关切等元素。例如, 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社会公民素养、绿色发展战略等议题的内容较少, 导致课程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脱节, 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思想共鸣。这种传统内容导向, 不利于实现思政教育的“铸魂育人”目标, 也难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时代认知与责任感。

(二) 教育方式单一, 线上线下融合度不高, 互动性不足

作者简介: 譙阳阳(1994—), 女, 博士研究生, 助教,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专职辅导员;

秦媛(1992—), 女, 硕士, 助教,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专职辅导员;

俞晓婷(1996—), 女, 硕士, 助教,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专职辅导员。

通讯作者: 譙阳阳

虽然“课程思政”理念的推广带动了一定的教学方式改革，但在具体实施中，多数高职院校仍以讲授式课堂教学为主，缺乏基于新质生产力技术支撑的混合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在线课程多为视频播放与在线测验，缺少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智能交互系统等技术为支撑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导致学生学习参与感和主动性不高。教学场景与手段的滞后直接影响了教育效果的达成，也限制了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

（三）教育评价体系滞后，缺乏对学生思政素养提升的有效评估机制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体系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主要通过期末考试来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忽视了学生在平时学习、网络表达、社会参与中的思想变化与道德认知。缺乏基于行为数据、学习过程、情感态度等多维指标的动态评估体系，导致教育者难以精准掌握学生的思想成长轨迹，也不利于个性化教育干预和及时调整教育策略。

（四）教育资源不均衡，信息化基础设施尚不完善

尽管部分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已具备较好的信息化教学条件，但整体来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在资源配置上仍存在显著差异。部分院校受限于资金投入不足，智慧教室建设滞后，数字资源匮乏，教师数字素养也有待提升，制约了数字化思政教育的深入推进。此外，优质思政教学内容主要集中于“头部院校”，中小型高职院校获取与本地特色融合的内容资源较难，导致教育内容同质化、碎片化问题较为严重。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推动教育理念更新，适应新时代教育目标

新质生产力所代表的创新要素不仅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也对教育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知识传授+价值灌输”的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讲授，而是走向多元互动、个性生成的教育生态，从而实现从“育分”向“育人”转变，促进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

（二）提升育人质量，增强思政教育的时代感和针对性

在数字化时代成长的高职学生普遍拥有较高的信息获取能力和自主表达欲望，他们关注国家发展、社会热点，也更容易对真实、生动、富有时代感的内容产生共鸣。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有助于思政教育与时俱进，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融入他们的兴趣点与生活经验，提升教育的贴近性和针对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从而提高育人实效。

（三）拓展教育手段，实现从“灌输式”向“生成式”转变

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接受者，而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教育手段趋于多样化、智能化。借助智能推荐、数据跟踪、情境模拟等技术手段，思政教育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兴趣偏好提供个性化内容，实现因材施教、互动生成，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思考深度，真正实现从“教师教什么”向“学生需要什么”的转变。

（四）提高学生数字素养，促进全面发展与综合能力提升

数字素养已成为新时代公民的基本能力之一。将新质生产力引入思政教育过程，不仅可以在技术使用中提升学生的数字工具应用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其信息辨别能力、数据伦理意识、网络安全意识和媒介批判能力，从而实现思想素养与技术素养的融合发展，为其未来走向社会、服务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技术进步则是生产力变革的核心因素之一。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正在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产方式的变更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革。”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不仅提供了技术工具与教育手段的革新平台，更在观念层面引发教育模式、育人逻辑、价值传达方式的深刻变革。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出发，运用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为实现教育与时代同频共振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依据。

（二）教育现代化理论

教育现代化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技术手段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公平普惠。该理论强调要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抓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推动教育从传统“经验型”向“数据驱动型”、“智慧引领型”转变。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集中体现，天然契合教育现代化的要求。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智能化教学辅助，通过大数据进行个性化分析，通过虚拟现实丰富教学情境，使思想政治教育摆脱传统灌输模式的局限，向智慧育人、系统育人迈进。教育现代化理论为新质生产力深度嵌入教育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发展方向。

（三）教育信息化理论

教育信息化是新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标志，其理论体系主张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化、教育评价的多元化、教育方式的智能化。该理论认为，信息技术不只是教学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生态构建力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信息化不仅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实现知识传播的多样化，还能通过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动态掌握学生思想状态，实现“可视化、可量化、可调节”的教育管理目标。新质生产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动力，充分体现了教育信息化理论中的关键特征，为思政教育向“精准化”“智能化”迈进提供了有效的技术路径与方法论支撑。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演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需主动顺应教育数字化、智能化趋势，全面融入现代科技元素，创新理念与方法，推动教育范式转型。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特性和时代价值，本文提出以下五条具体实践路径：

（一）构建数字化育人平台

新质生产力强调以数据、算法和智能系统为核心驱动，为数字化思政教育平台建设提供技术保障。高职院校应借助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打造集教学、管理、评价于一体的智能育人系统：建设“智慧思政课堂”平台，实现教师授课内容与学生学习反馈的实时交互；实施统一资源管理，推动课内外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引入学习分析模块，实时采集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如点击率、参与度、互动频率，形成个性化数据画像，辅助精准决策；创设“线上线下一体、教师学生共创”的立体化教学环境，实现教育全过程数字追踪和动态管理。

（二）创新教育内容与方式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教育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内容与形式。高职院校应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青年现实关注，动态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提升教育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文化自信等现代议题融入思政课程，引导学生理解国家发展逻辑与制度优势；运用项目式学习（PBL）、情境模拟、VR 虚拟体验等多元教学方式，模拟真实社会情境，使学生在“学中做、做中悟”中深化理解；设计跨学科主题任务，将专业知识与政治价值结合，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国家认同。

（三）建立协同育人机制

新质生产力强调系统集成与协同协作理念，这一理念应延伸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推动“大思政”格局建设：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双线融合，组织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开展联合教研与备课，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的协同育人模式；强化学校各育人阵地联动，包括学生事务管理、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等，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发挥社会资源、校企合作基地等作用，将校外实践与校内教学相结合，构建“课堂—社会”联动的教育共同体。

（四）强化大数据支持与个性化服务

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大数据与 AI 赋能教育治理，为思政教育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借助学习管理系统（LMS）与校园管理平台，收集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课堂参与、作业质量、心理测评等综合数据；运用 AI 算法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生成学生的思想成长画像，从中识别其价值观认知、心理状态、行为倾向等；实施分层分类指导与个性化干预机制，实现“一人一策”动态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发现思想滑坡、心理危机等苗头性问题，实施精准干预和人文关怀。

（五）构建反馈与评价体系

评价是教育闭环的关键一环。思想政治教育应突破“以分数论思想”的传统方式，构建全过程、多维度、数据

驱动的新型评价体系：综合运用课堂互动情况、网络平台活跃度、思想汇报内容、社会实践反思报告等多源数据，动态评估学生思想发展轨迹；引入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真实、可溯源，提升评价公正性与数据安全性；将评价结果用于课程优化、资源配置与个性辅导，实现从结果评价向过程评价转变，从单向评估向多元反馈演化，推动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与自我革新。

五、结语

随着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驱动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的关键力量，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机遇。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与教育信息化理论，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与具体路径，指出其不仅能够推动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更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在实践层面，高职院校需紧跟技术变革步伐，积极构建数字化育人平台，创新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健全育人协同机制与评价体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讲授型”向“智能生成型”转变。同时，要注重师资能力提升与制度环境优化，确保新质生产力在教育领域的有效嵌入和持续赋能。

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仍需在“人—机—环境”协同机制中持续探索，不断完善教育生态系统。只有不断深化新质生产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以科技赋能育人、以育人服务社会的教育使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林夕宝,余景波,宋燕.高职院校助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探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09):15-23.
- [2]郭爱国.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及思政教育工作对策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4,(29):153-156.
- [3]金权,廉超.新质生产力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1-8.
- [4]徐俊.新质生产力理念融入思政课：意义、原则与路径[J].思想政治课研究,2024,(03):4-13.
- [5]赵建超,温晓青.思想政治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成基础、运行机理与发展路径[J].理论导刊,2024,(08):101-107.
- [6]卢岚.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逻辑进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3):67-72.
- [7]万馨,聂秦勇,易显飞.高校思政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现实之需与纾解之策[J].当代教育论坛, 2024 (04): 92-99.DOI: 10.13694/j.cnki.ddjylt.20240604.001.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ve Pathway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Qiao Yangyang, Qin Yuan, Yu Xiaoting

(Shaanxi Technical College of Finance & Economics,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entered on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with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ese forces are reshap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practical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ors, this study explores innovative ways to empow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vocational students. By integrat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search promotes 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enhancing its effectiveness and appea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achieve precision, person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evolu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stering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le cultivating versatile talents suited to the digital era. This research provid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nselo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能力导向下高职《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杨洁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在数智化背景下, 会计行业对财务人才能力结构提出更高要求, 传统“核算导向”的课程体系已难以满足岗位胜任力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以能力导向教育理念为核心, 融合任务驱动教学法与信息化平台支持, 构建适用于高职《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改革模型。研究从岗位需求出发, 重构课程目标与内容体系, 设计覆盖典型财务业务的10项教学任务, 并嵌入金蝶云星空、用友U8、Excel、PowerBI等主流系统, 形成“理论导入—任务实操—系统操作—反思提升”的闭环式教学流程。通过教学实验对比法, 评估新模式在知识掌握、系统操作、任务完成质量与学习满意度方面的成效。结果显示, 改革组学生在各维度表现均优于对照组, 验证了“能力导向+工具嵌入+任务驱动”教学路径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研究为高职会计课程改革提供了实践范式, 具有较强的推广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 能力导向; 财务会计; 教学模式; 数智化; 高职教育

基金项目: 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金资助 (项目编号: 2025YB1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28

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普及, 会计行业正加速迈入“数智财务”时代, 企业对财务人员的能力要求已由单一核算转向系统操作、数据分析与财务判断的综合融合。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的高职会计课程, 难以适应岗位胜任力培养的新需求。

《财务会计》作为高职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不仅承担夯实理论与核算技能的任务, 更是学生理解财务逻辑、接触企业系统的重要入口。然而, 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三方面问题: 课程内容滞后于行业技术, 缺乏信息化工具嵌入; 教学方式单一, 与真实业务脱节; 课程评价与能力达成脱钩, 难以反映学生的职业适应力。

国际上, 以AACSB为代表的会计教育认证体系已将“数据素养”和“技术敏感性”列为核心培养目标, 欧美高校普遍将SAP、Oracle等ERP系统纳入教学, 强调学生的实操与综合能力。国内《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标准》(2020年)亦提出“推进课程项目化、教学任务化”, 推动课程与企业技术接轨。尽管已有研究在“岗课赛证融合”、信息化教学与模块化改革方面取得进展, 但针对高职《财务会计》课程如何实现“能力导向—任务驱动—工具嵌入”的系统衔接与评价闭环, 仍缺乏深入探索。

基于此, 本文以职业能力导向为核心, 融合任务驱动教学与信息化平台支持, 构建适用于高职《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改革路径。通过典型教学任务设计与工具平台嵌入, 重构课程体系与教学流程, 并在实践中开展验证, 为高职会计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推动课程由“核算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型, 实现教学与岗位的深度融合。

2. 教学改革的理论与研究基础

本研究以能力导向教育理论为核心指导思想, 融合任务驱动教学理念与信息化教学模型, 构建“工具嵌入—任务驱动—能力达成”的三位一体教学改革框架。该体系强调课程围绕职业能力目标开展内容与方法设计, 并借助主流财务系统与数据工具支撑教学实践。

2.1. 理论基础

(1) 能力导向教育理论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

能力导向理论主张以学习者可测量的能力为培养目标, 强调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综合运用知识、技能与态度解

作者简介: 杨洁(1989—),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

通讯作者: 杨洁

决问题 (Tuxworth, 1989)。在高职教育中, 该理念逐渐取代“知识导向”, 成为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 尤其在财经类专业中, 职业能力已成为课程评价的核心。

(2) 任务驱动教学理论 (Task-Based Instruction)

任务驱动教学通过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中实现知识与能力的融合。该理论强调过程性评价与阶段性成果达成, 注重以完整业务链条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实践能力 (Willis, 1996), 为会计课程的“模块化+项目化”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3) 信息化教学理念

信息化教学倡导利用 ERP 系统、财务建模软件与数据可视化平台等工具, 提高教学的交互性与真实性。当前“数智财务”背景下, 高职会计课程已从 PPT 讲授逐步转向平台实训, 强调以工具为中介促进知识迁移与结构理解 (杜海霞, 2021)。信息化工具不再是辅助, 而成为学生构建财务逻辑与模拟业务流程的关键载体。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较早关注信息技术对会计教育的重塑。Hilton & Platt (2020) 指出, 会计教学应突破“核算为本”模式, 引导学生借助软件工具理解企业运作。AACSB (2021) 在《会计教育认证标准》中将“技术敏感性”与“数据素养”列为核心培养目标。

国内研究中, 杜海霞 (2021) 提出高职会计教育应“从核算走向判断”, 强化系统操作与数据分析能力; 于江龙 (2023) 认为应通过 Excel、PowerBI 等平台提升学生数据处理与表达能力; 徐晓坤等 (2024) 提出“平台—任务—能力”三维联动是教学设计关键。部分职业院校 (如北京市商贸学校、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已探索“岗课赛证”融合路径, 构建“能力导向—模块教学—证书评价”一体化体系, 取得初步成效。但也有研究指出, 财务系统工具嵌入深度不足, 任务链条与业务逻辑衔接不畅, 学生岗位适应力仍有待提升。

2.3.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在能力导向教学理念、任务驱动路径以及信息化工具嵌入方面已开展了初步探索, 部分高职与应用型高校也在“岗课赛证”融合、“平台实训嵌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 聚焦《财务会计》课程的系统性改革研究仍相对匮乏, 具体表现为: 一是多数研究聚焦于课程模块设计或教学平台选用, 缺乏系统的“能力目标—教学任务—工具平台—评价机制”闭环构建; 二是教学改革多停留在理论探讨或问卷调查阶段, 缺乏教学实验与实证分析的支撑; 三是教学资源标准化程度不高, 尚未形成可推广、可移植的课程改革范式。基于此, 本文以高职职业能力要求为逻辑起点, 融合能力导向教育理念、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与信息化平台应用, 系统设计覆盖 10 项典型业务流程的教学任务, 嵌入金蝶云、用友 U8、Excel、PowerBI 等主流系统平台, 构建“理论导入—任务实操—系统操作—成果反思”的教学流程, 并通过实证教学实验进行全过程、多维度成效评估, 力图在实践路径、实证验证与推广价值方面弥补当前研究空白, 形成具有复制性与应用价值的高职《财务会计》教学改革模式。

3. 教学改革思路与路径设计

为回应“数智财务”时代对高职会计人才的新要求, 本文以“能力导向、任务驱动、工具嵌入”为核心理念, 围绕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流程与资源支撑四个维度, 构建系统化教学改革路径, 旨在推动《财务会计》课程由“知识传授型”向“能力生成型”转型。

3.1. 明确职业能力导向的教学目标

在数智化背景下, 会计岗位对人才能力结构提出更高要求。通过文献分析与企业访谈, 本文提炼出四类关键能力目标: ①基础会计核算; ②财务信息系统操作; ③财务数据理解与处理; ④业务情境下的财务判断与表达。这些能力以岗位真实任务链条为依托相互交织。例如在“固定资产购置与核算”任务中, 学生需同时掌握会计处理、金蝶系统操作、数据识别及折旧判断等多项能力。

课程设计将四类能力分解为若干“教学能力点” (Teaching Competency Unit), 成为课程模块设计的直接锚点, 并相应调整评价方式——由“知识记忆与笔试”转向“综合能力表现与过程性考核”, 促进课程从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转型。

3.2. 构建以任务为载体的课程内容体系

为实现能力的真实达成, 课程以企业典型财务业务流程为主线, 设计 10 项教学任务, 覆盖资产确认、成本归集、报表编制与财务分析等关键环节。任务开发遵循“岗位真实—能力导向—工具支撑”原则, 强调内容与业务逻辑的对接。

任务设计兼顾“情境真实性”与“层级挑战性”: 在业务背景中引导学生进入会计角色, 任务难度由浅入深, 依次为“模板填制型—多步骤操作型—综合判断型”, 实现从模仿到独立解决问题的过渡。所有任务均配套任务

指引书、模板与成果样例，并结合 Rubric 评分量表，形成标准化、可操作的任务体系。

表 1 任务模块设计示意

模块名称	对应岗位任务	教学能力点	相关工具
任务 1: 原始凭证填制	处理购销类原始单据	核算准确性、凭证格式规范	Excel、金蝶云
任务 4: 固定资产入账与折旧	固定资产录入与折旧计提	折旧方法选择与判断能力	用友 U8、Excel
任务 7: 费用归集与成本结转	工资、租金、水电等费用分类处理	成本中心配置、期间结转操作	金蝶云、U8
任务 10: 财务报表分析与表达	编制并解读三大报表	财务数据理解与语言表达	PowerBI、Excel

3.3.工具嵌入的教学机制

为形成“能力导向—任务驱动—工具支持”的闭环教学体系，信息化工具嵌入被视为能力迁移与真实模拟的核心路径。本文结合课程任务特点，选取金蝶云星空、用友 U8、Excel 与 PowerBI 四类工具分阶段融入教学，构建贴近企业真实环境的操作体系。

在初级阶段（如凭证填制、账簿登记），使用 Excel 训练基础核算逻辑；中期阶段（如固定资产核算、费用归集、成本结转）嵌入金蝶云或用友 U8，完成凭证录入、账簿核算与结账操作；后期阶段（报表分析与业绩判断）引入 PowerBI，实现数据可视化与经营分析，强化学生的财务洞察与表达能力。

为保障工具教学效果，课程配备操作流程圖、演示视频与错误清单，教师采用“演示—引导—答疑”模式提升学生技能熟练度；系统后台自动记录学生操作频率、错误率与完成时长，为过程性评价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工具嵌入，学生不仅提升财务操作熟练度，更加理解业务流程与系统逻辑，实现从“学做账”到“做业务”的能力跃升。

3.4.重构以任务为核心的教学流程

在任务与平台基础上，本文重构以“任务驱动”为主线、“工具操作”为支撑的教学流程，形成“理论导入—情境引入—任务执行—系统实操—成果输出—反思提升”六阶段模式，强化知识、技能与态度的协同发展。

理论导入：教师讲授任务对应核心知识点，帮助学生理解会计原理与业务逻辑；

情境引入：通过真实或虚拟案例引导学生进入岗位角色，如在“成本结转”任务中扮演企业成本会计；

任务执行：学生小组依据任务书完成操作并提交中期成果，强调条理与合作；

系统实操：在金蝶云或用友 U8 平台中完成凭证录入与结账，实现纸面成果的数字化再现；

成果输出：整理业务报告或财务报表，并利用 PowerBI 进行可视化展示；

反思提升：教师组织汇报、点评与答疑，学生书写任务反思简报，梳理问题与收获。

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理论导入与任务说明线下完成，系统操作与成果提交线上进行，反思环节结合 Padlet 平台反馈，形成多元协同的教学生态。

3.5.教学改革模型与逻辑阐释

为整合教学目标、任务内容、工具平台与教学流程，本文提出“目标牵引—任务驱动—工具支撑—流程闭环—能力达成”教学模型（见图 1）。该模型以高职学生职业胜任力为核心，将教学要素纳入统一结构，实现“教、学、做、评”深度融合。

第一层（能力目标）：明确基础核算、系统操作、数据处理与财务判断四类核心能力；

第二层（教学任务）：以 10 个典型业务任务映射能力点，构建岗位导向的内容体系；

第三层（平台工具）：嵌入金蝶云、用友 U8、Excel 与 PowerBI，增强任务真实性；

第四层（教学流程）：形成“理论导入—任务执行—系统实操—成果输出—反思提升”的教学闭环；

第五层（评价机制）：采用“过程+终结”双重评价，通过任务表现、系统日志、测试成绩与满意度反馈进行多维评估。

该模型体现“以学为中心、以用为导向、以评促教”的理念，强化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的结构化协同，为高职《财务会计》教学质量提升与持续改进提供系统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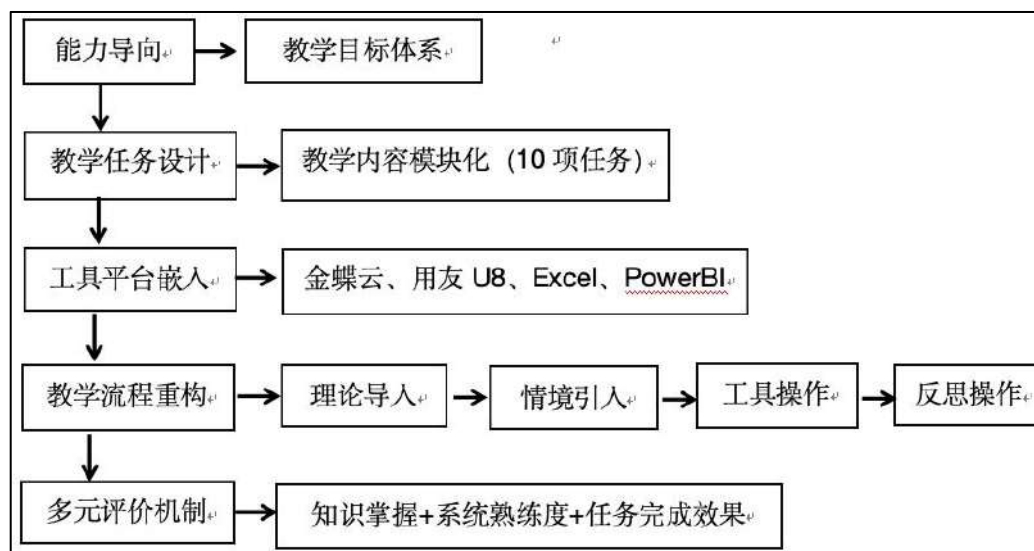


图1 教学改革路径框架图

4. 教学实践与效果评估

为检验“能力导向+任务驱动+工具嵌入”教学模式在高职《财务会计》课程中的适用性与成效，本文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开展教学改革实验。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从知识掌握、系统操作、任务完成与学习态度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以验证教学模式的科学性与推广价值。

4.1. 教学实验设计

实验在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实施，选取同年级两个班级（各45人）作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周期为16周。实验组采用改革教学模式，实施任务导向教学、信息化工具嵌入与分阶段能力评价；对照组沿用传统讲授与纸质作业方式，无系统操作与任务型设计。两组学生在性别比例、入学成绩与课程基础方面基本一致，具备可比性。

课程内容涵盖资产核算、费用确认、报表编制与分析等模块。实验组以“任务包+平台实训”为单元，小组协作完成凭证填制、账簿录入、财务分析等完整业务流程。为控制变量，授课教师团队一致、教学进度同步、评价工具统一。教学效果通过前后测成绩、过程作业、系统日志与满意度问卷等方式，从认知、技能、行为与情感四维度综合测评。

表2 教学实验设计表

分组	教学模式	工具使用	教学任务形式	教学支撑
实验组	能力导向+任务驱动	金蝶云星空、用友U8、Excel、PowerBI	项目任务+小组协作+系统实操	数字资源包、操作视频、任务指引
对照组	传统讲授	无	教材例题+个别演练	纸质教材、板书

4.2. 教学评价体系设计与成效对比分析

为全面反映改革成效，本文构建“多维度、全过程、可量化”评价体系，涵盖学业认知、技能表现、学习行为与学习反馈四类维度，并配套量化指标。

设计说明：

- 前后测题目紧扣课程知识点，检验知识迁移与理解深度；
- 系统日志包含登录频率、错误率、任务时长等指标；
- Rubric评分标准包括操作规范（30%）、逻辑准确（40%）、表达完整（30%）；
- 满意度问卷涵盖内容设计、工具体验、任务协作与总体感受；
- 注重过程性数据与行为数据采集，避免单一化的终结性评价。

基于教学前后测、任务结果、系统日志与问卷反馈，实验组在多数指标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图2展示了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知识掌握、系统操作能力、任务完成质量与学习满意度四项维度的得分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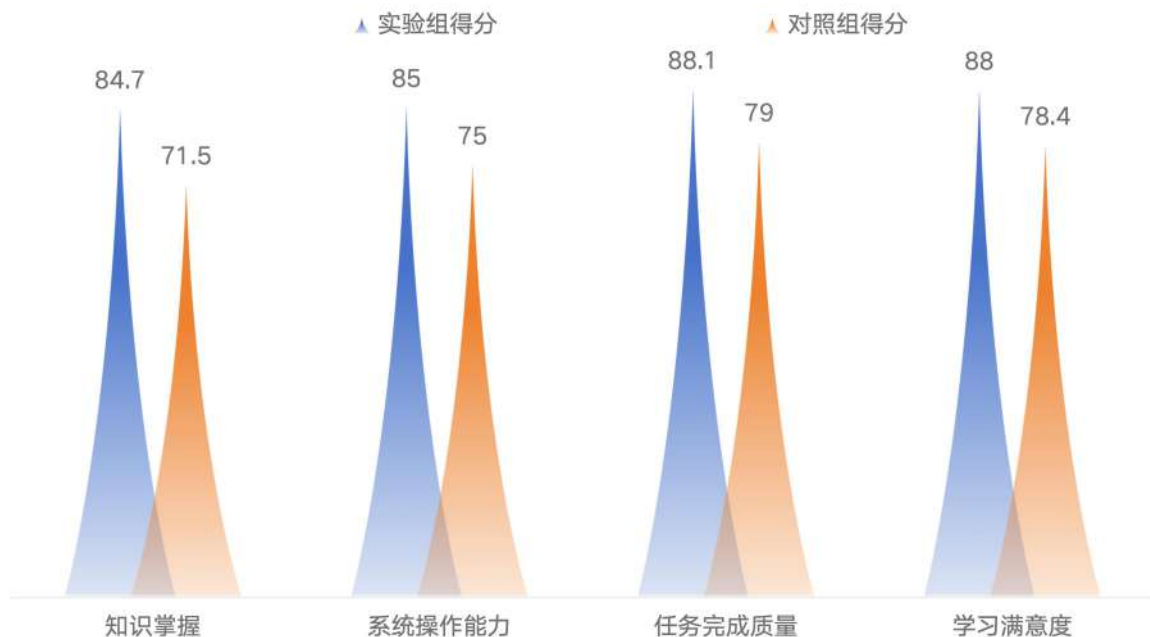


图2 教学效果对比图

(1) 知识掌握显著提升

实验组平均成绩由 63.4 分升至 84.7 分，标准差由 10.2 降至 7.1；对照组由 62.8 分升至 71.5 分。实验组整体提升更显著且分布更集中，说明任务驱动模式能显著增强知识理解与结构化掌握。

(2) 任务完成质量更高

在固定资产核算、费用归集、报表编制、损益结转与财务分析五个模块中，实验组平均得分 88.1 分，高于对照组的 79 分。教师评分显示，实验组在逻辑性、报表准确性与表达完整性方面更优。

(3) 系统操作能力显著增强

实验组学生平均每周登录 ERP 系统 13.4 次，任务完成时长较对照组缩短 18%，错误率由 21.2% 降至 5.8%。对照组虽完成纸面任务较快，但缺乏系统化操作经验。

(4) 学习行为更积极

实验组中超 90% 的学生参与课堂展示、小组答辩或 Padlet 互动，高于对照组的 57.5%。教师观察表明，实验组学生提问频率、协作时间与提交率均更高。

(5) 满意度与学习态度显著改善

86.7% 的实验组学生对该模式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72.5% 认为“有助于理解财务流程”，68.3% 希望其他课程也采用类似模式。对照组反馈多为“中性”或“基本认同”。

4.4. 教学反思与改进建议

尽管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仍存在若干改进空间：

- (1) 部分学生初期对 ERP 系统不熟，建议增加“平台预热任务”，逐步降低技术门槛；
- (2) 任务难度分层不足，后续可设“基础—进阶—挑战”三级任务，增强自主选择与成就感；
- (3) 部分模块教学节奏偏紧，应建设微课视频库与操作演示资源，形成“课堂—课后—查阅”一体化支撑；
- (4) 评价机制仍以人工评分为主，后续可引入智能数据分析生成学习画像，提升个性化反馈能力。

综上，改革模式已验证其实效，但仍需在任务优化、资源建设与智能评价方面持续完善，以增强可持续性与推广适应性。

5. 结论与建议

在数智化转型背景下，会计行业对人才能力结构提出新要求，高职教育亟需从“核算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型。

本文基于能力导向教育理论,融合任务驱动与信息化教学理念,构建“工具嵌入—任务驱动—能力达成”教学模式,并通过实证对照实验验证其有效性。

研究明确了高职财会学生应具备的四类核心能力:基础核算、系统操作、数据处理与财务判断。课程围绕10项典型业务任务重构教学体系,嵌入金蝶云、用友U8、Excel与PowerBI等系统,形成“理论导入—任务实操—系统操作—成果反思”六阶段教学流程。

实验结果表明,改革教学模式在知识掌握、技能表现、学习参与与满意度方面均显著优于传统教学,促进了学生从“学做账”向“做业务”的能力跃迁,实现了“学—做—用—评”一体化的教学闭环。

同时,研究发现改革仍面临学生系统适应期、任务梯度与资源支持等问题。未来应强化任务分层设计、建设模块化教学资源库,并引入智能分析技术,提升教学精准度与可持续性。

综上,本文构建的高职《财务会计》教学改革路径具有良好实践性与推广价值,不仅回应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培养诉求,也为高职财会课程的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1]阮红霞.基于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高职会计教学模式改革研究[J].商业会计,2013,(05):103-104.
- [2]朱红梅.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会计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25-08-04].DOI:10.7666/d.y1949881.
- [3]李文勤,葛军.数智化背景下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供需矛盾与路径探索[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03):74-80.DOI:10.16515/j.cnki.32-1745/c.2023.03.011.
- [4]吕明月.“岗课赛证”背景下高职税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3,26(02):224-226.
- [5]徐晓坤,任思维,张学梅.数智化视角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探讨[J].教育进展,2024,14(5):51-56.
- [6]白婕,王燕.“产教融合”模式下高职院校管理会计教学改革研究[J].教育研究,2020(24):59-62.
- [7]教育部.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标准(高等职业教育)[S].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20.
- [8]教育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Z].教育部官网发布,2020.
- [9]Tuxworth, E.(1989).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ackground and origins. 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13(2), 11-21.
- [10]Burke, J. W. (1989).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almer Press, 45(2), 474-476, 478-479, 481-482. DOI:10.1080/00098655.1979.10113640.
- [11]García-Osma, N., García Osma, B., & García-Sánchez, I.-M. (2023). Accounting educ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A new perspective after the pandem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65, 100823. <https://doi.org/10.1016/j.jaccedu.2023.100823>
- [12]Biggs, J. (1996). Enhancing teaching through constructive alignment. Higher Education, 32(3), 347-364.
- [13]Tan, L. M., & Laswad, F. (2018). Professional skills required of accountants: What do job advertisements tell us? Accounting Education, 27(4), 403-432.
- [14]AACSB. (2021). 2021 Accounting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Competency-Oriented Teaching Reform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imes

Yang Jie

(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the accounting industry places higher demands on the competency structure of financial personnel.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oriented” curriculum system can no longer meet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job competenc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integrates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s with digital platforms, and constructs a reform model for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real job demands,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content system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10 teaching tasks designed to reflect typical financial operations. Mainstream systems such as Kingdee Cloud Xingkong, UFIDA U8, Excel, and PowerBI were embedded to form a closed-loop teaching process of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task practice—system operation—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was adopted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model in four dimensions: knowledge acquisition, system operation skills, task completion quality,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across all dimensions, confirming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etency-oriented + digital tool embedded +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l.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reform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strong implications for broader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financial accounting; teaching model; digital intellige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转型的机制、困境与进路

梁舒乔¹ 瞿扬州²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2.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在人口结构、教育政策以及产业升级的多样背景下, 我国民办本科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正面临转型挑战, 该核心困境源于“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与“育人为本”的价值理性二者之间失衡, 依托于韦伯的理性二分法, 结合哈贝马斯、诺丁斯再加上麦金泰尔的理论, 搭建哲学—伦理学的分析框架, 系统挖掘工具理性驱动转型的外在逻辑和内在的局限, 展现其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承认正义与教师德性实践当中的伦理困境。提出应运用沟通理性重塑治理架构, 运用补偿正义优化制度内容, 经由关怀伦理重构课程与师生关系, 培育“反思性实践相关的工作者”, 进而助力学前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及社会公平使命。

关键词: 民办本科; 学前教育; 专业转型

基金项目: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校级课题—学校相关专业的一般研究课题“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转型发展的机制研究”(SD-YB202504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2

一、生存压力与价值迷失：转型时代的现实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与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把民办本科高校推到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关键转折点, 以应用型、市场化专长著称的学前教育专业, 第一个冲上去应对变迁, 生源一直缩减、国家对学前教育师资培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以及社会对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的急切期盼, 共同描绘出一幅繁杂又严峻的图景。随着“全面三孩”政策效应渐渐消退[1], 新生儿数量一直走低, 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呈现出结构性的数量规模下降, 直接冲击秉持规模扩张传统生存逻辑的民办高校, 国家政策层面不断提高学前教育师资准入的标准以及培养质量要求, 恰似《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正式开展实施, 进一步拉高了民办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压力。新时代家长对学前教育的期望不再只局限于“看护”和“启蒙”这两点, 而是寻觅更科学、体现个性且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服务, 这也为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设定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这样的背景, “转型”已成为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寻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与核心要点, 纵观现今的转型实践尝试, 多数讨论都集中到操作层面, 诸如课程模块的增减变动、实践学时的延长安排、校企合作的拓展举措等, 这些探讨实际上有现实意义, 却大多仅停留在技术与策略层级, 欠缺对转型自身价值前提及伦理后果的反思[2]。实际实践时常见的“转型”往往演变成一种应激反应, 好似盲目开设“热门”方向课程、追求就业率的表象提升, 或是过度迁就市场的短期需求, 无视教育内在规律及学生长远规划, 若仅仅把转型理解为应对危机的“技术调整”或“市场策略”, 就容易陷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醒过的“工具理性”铁笼(iron cage)里——也就是为了达成生存和效率的目的, 进而在无意识间牺牲掉教育的终极价值与人的意义。

民办本科层面学前教育专业的转型, 首先必须是一番价值的廓清与哲学的叩问, 迫切要回应: 转型的终极目

作者简介: 梁舒乔(1999—), 女, 硕士,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社会学;

瞿扬州(1998—), 男,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通讯作者: 瞿扬州

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大学的财务报表收支，还是为了教育本身的美好？是为了高效地造就“标准化”教师[3]，还是为了培育怀有爱心、正义感与反思能力的“完整个体”？这些问题的答案和结论，任何技术方案都远远无法给出，亟需回到教育哲学与伦理学的范畴，去查找方向的指引。超越单纯的教育学论辩，引入一套跨学科的“哲学—伦理学”分析架构，采用韦伯提出的理性二分法，批判地审视转型动因是怎样被工具理性所“僭越”的；依靠罗尔斯、弗雷泽的正义理论以及诺丁斯、麦金泰尔的伦理学主张，深度分析转型进程中显现的正义与伦理的困境；试图搭建一个以“价值理性”为引领，以“沟通行动”当作办法，把“关怀关系”及“实践智慧”作为实践路线的转型策略，以期为民间本科的学前教育专业后续发展，供给一种拥有伦理高度与哲学深度的理论指引。

二、效率至上何以僭越育人本位？——工具理性的批判视角

民办本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碰到的转型压力，从直观层面讲，源自生源、政策与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变迁[4]，然而它的深层动力机制展现出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的扩张和价值理性 (Value Rationality) 的衰微，对这一动因进行哲学层面的批判，是理解一切后续困境的逻辑起点[5]。

工具理性是一种突出手段有效性及行动效率的思维类型，谋求以最小代价得到最大收益的思维样式，在民办高校开展转型决策的阶段，这种逻辑展现得一览无余，出生率走低首先被解读成“生源市场”的萎缩，生源就等同于财源；国家推出的各类标准被当作必须实现的“严格约束”和“进入市场”的门槛；所谓“错位竞争”策略往往会把目光投向支付能力更强的细分市场。这种工具理性的驱动，在组织的生存层面存在现实合理性，但它把教育这一培养人的复杂事儿，简化为一种能计量、可预测的“生产—消费”进程，专业、教师、学生在整个生产流程里都被“物化”为“资源”与“产品”，教育过程被量化成诸如就业率、考证通过率、项目经费等指标，教育的丰富层面和人文意蕴被极大压缩。与工具理性形成对照，价值理性相信行为本身存在价值与意义，而不是聚焦于其达成的结果，它留意着“是否应当是这般情形”的终极性问题，学前教育的价值理性内涵，起始于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核心使命：它不只是聚焦于技能的传授，更在于为孩子一辈子的“善好生活”夯实基础，照看其好奇、天真与创造能力；它本质上内含着一种伦理责任，即为社会培养促进教育公平的实践人员，降低社会不平等水平；就学生而言，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成为饱含同情心、正义感、批判思维和审美情趣的“完整的人”，而不只是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人力资本”。好比杜威所言，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个人成长，其根本目的不是达成那些外在的功利目标，而在于达成个人的内在价值与构建美好生活，现阶段转型的深层矛盾在于，引导转型的是工具理性的效率逻辑，而衡量转型是否成功的终极准则，却是价值理性的实现程度。这种“动力”跟“目的”之间的脱节与错离，是致使后续一连串伦理困境的关键源头，民办高校的转型过渡，若无法率先达成从被动适应工具理性到主动探究价值理性的“哲学观转向”，则所有技术层面的改善都可能是舍本逐末之举，只有依靠价值理性的指引，转型才会真正回归到教育本质，实现育人该承担的使命。

三、主体性遮蔽与正义性缺失：转型中的多维伦理困境

由强大的工具理性所主导，转型的具体实践活动在治理、资源分配、课程以及师生关系等多个范畴，都面临了棘手的伦理难关，突出体现为正义性的不足与主体性的遮蔽。

站在资源分配的维度上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主张资源要向“最不利者”倾斜，以最大程度地让最不利者的处境变好，体现差别原则当中的补偿正义，可现实却是，民办高校在财政支持、师资配置、生源质量等方面，相较于公办院校呈现出结构性弱势。政府财政投入主要是往公办高校流动，民办高校的收入大多依赖学费，资金来源单一，稳定性欠佳；师资队伍内高层次人才占比偏低，教师出现较大程度的流动，科研及教学投入的力度不足；录取分数线一般比公办院校低，生源基础高低错落，这种起始阶段的不公正，让民办专业转型在资源限制的困境中难以前行，不能保障其学生享有同等水平的教育条件，加剧了高等教育体系里的马太效应，与教育公平的伦理原则相悖。

从治理参与的维度考量，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着重提出借助主体间的真诚交流来达成共识[6]，打造一个依靠理性沟通的民主决策进程，但现阶段的转型决策多是由上级下达的行政命令，学生、教师乃至未来即将服务的儿童作为核心利益关联对象，其声音、需求与体验老是被置于边缘位置，成为缄默的“边缘人”。转型方案的设计一般由行政管理人员掌管，缺少一线教师、学生代表及用人单位的实质性融入，这种对“他者”主体属性的漠视与遮隐，与列维纳斯所强调的“他者”伦理学相悖，也就是说伦理的根源是对“他者”面孔的回应与责

任,只要教育转型失去多元主体参与和对话,就容易与真实需求产生偏差,成为少数人意志的现实反映。

在承认正义的维度层面看,南茜·弗雷泽称,正义不仅囊括资源的再分配,还涵盖文化层面的承认以及制度方面的代表权,民办学前教育专业及其师生老是被贴上“分数低”“基础差”“商业化”等标签,对此类符号化的贬低和错误认知形成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损伤了他们在职业上的认同与尊严,社会对民办教育的歧视、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看轻,以及内部管理当中重使用而轻培养的趋向,都造成师生难以获取应有的尊重与认可,弱化其专业自信以及归属感[7]。

从考量教师发展的维度看,转型过度聚焦对教师进行技能化、标准化的“培训”,却无视了对教师作为道德主体的“培育”事宜,在工具理性的驱动情形下,教师发展项目往往把重点放在教学技能、信息技术应用、项目申报等可量化能力的提升上,却忽略了教师教育信念、伦理意识、批判反思能力等内在素养的培育[8]。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着重强调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也就是在复杂状况下做出明智判断与道德抉择的能力,其培养空间正不断缩小,这让教师在复杂的教育情形里难以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其工作陷入“去技能化”与“去道德化”境地,最终削弱了其职业的神圣感与内在价值,陷入麦金泰尔提及的“德性实践”空荒困境。

四、走向关怀共同体与反思性实践者:价值重构的实践进路

试图突破上述困局,肯定要进行一场深刻价值观引领着的范式变革,把价值理性再度摆到中心区域,这说明需要一套融合哲学智慧及伦理关怀的系统性方式。

从治理这个层面,应汲取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与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形成一种关系性的治理模式,决策者得跳出“控制-服从”的怪圈,过渡到一种“感知-回应”的关怀关联,设立包含政府、高校、幼儿园、社区、学生及其父母的“关怀共同体”,采用常态化的对话途径与民主协商进程,诸如转型听证会、师生专题座谈会、校企合作理事会议事等,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声音能被听取,切实推动决策调整,治理过程须呈现公开透明,决策依据要充分展现多元主体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使治理成为一种落实程序正义与承认正义的伦理实践方式。

就制度与资源层面而言,必须切实贯彻罗尔斯的补偿正义原则,国家教育政策应丢掉“一刀切”的评估模式,认识到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在起点方面的差别,为私立高校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转型扶持资金、师资培训安排,而且在质量评估当中纳入其服务区域经济、吸纳多种生源、增进教育起点公平等特色化贡献指标。可设立针对民办教育发展的专项基金,支持民办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开展课程革新、推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提升教师科研水平;给评估指标添加“教育公平贡献度”“区域服务满意度”等质性评价维度,指引民办高校走特色与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在专业内部范畴,资源分配应当果断地朝内隐且关乎长远发展的“质量建设”倾斜,如支持教师开展与行动相关的研究、建设高质量实习据点、开发特色课程模块单元等,而不只是把资源投入到外显且可量化的指标。

在课程及教学范畴开展一场以“实践智慧”培育为核心的改进,课程重构应把培养师生的“实践智慧”作为目标[9],教学内容应当超出技术性知识范畴,大量引入涉及伦理决策、价值辨析的案例教学及项目学习,开设“学前教育伦理专题”“儿童权利与教育正义”之类的模块,引导学生聚焦教育中的伦理问题;采用服务学习、参与式行动研究等途径,把教学区域从课堂扩展到真实的幼儿园情形,鼓励师生针对复杂的、“境遇性的”实践问题开展合作探究与反思性对话[10]。教学评价同样应从强调知识记忆转向关注批判思维、伦理敏感性与实践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教师得以从知识的机械传导者转变为凭借德行引领学生成长的“人师”,学生则会成长为不光“明白”怎样做,更知晓行动动机、饱含责任担当与关怀情怀的反思性实践者,由此真正实现学前教育专业从培养“技师”迈向培育“仁师”的显著转变。

结语

民办本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转型,归根到底是一场价值的对抗与哲学的转向,这并非一次专业的调整,而是一次再度探究教育本质、再次定位专业使命的实践,倘若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及其引发的伦理风险,转型很有概率在效率至上的误区里越走越偏,最终跟教育的核心价值背道越远。未来的实践路径在于,毅然打破“铁笼”的枷锁,靠沟通理性再度塑造共识,以关怀伦理达成人心凝聚,靠正义原则调理秩序,最后靠实践智慧为师生赋予力量,只有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递进,民办学前教育专业才会在这场大考里真正实现根本性蜕变,从被动抵御生存困境的“适应者”,成为主动开创未来教育新局面的“开创者”,在国内

教育的整体架构里，觅得它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与尊严的落脚点，切实扛起教育强国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 [1] 钱雨. “全面三孩”政策下我国学前教育福利的转型[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 (05): 20-28.
- [2] 高书国.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转型研究: 从快速成长到规范发展[J]. 教育科学研究, 2019, (06): 5-9+16.
- [3] 张炜. 教师职前培养质量标准化评价的定位及差异性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 2015, (08): 56-63.
- [4] 姜勇, 郑楚楚. 汇聚与变革: 改革开放 40 年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历程解析[J]. 学前教育研究, 2019, (03): 31-40.
- [5] 严仲连, 郭志辉.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风险及防范[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 (12): 66-71.
- [6] 尹新瑞, 吴帆. 文化遗产与沟通行动理论: 和谐代际关系建构的理论视角与方略[J]. 湖南社会科学, 2019, (05): 53-60.
- [7] 王嵩迪, 文雯. 从分配正义到承认正义: 高校专项计划生的教育经历研究[J]. 现代大学教育, 2023, 39(03): 79-86.
- [8] 丁俞文, 陆彬蔚, 许锋华. 有限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学前教育师范生从教意愿的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 2025, 37(03): 93-100.
- [9] 王萍, 张帆, 王炜楠. 国外学前教育本科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2): 64-73.
- [10] 张斌, 虞永平. 守正与创新: 指向中国式学前教育现代化的幼儿园课程改革[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 (06): 11-19.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 The Mechanism, Predicament and Approach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ShuqiaoLiang¹, YangzhouZi²

¹ Zhengzhou Shengd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Management, Zhengzhou, China

²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iverse background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China's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facing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The core predicament stems from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efficiency first" and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people-oriented". Relying on Weber's rational dichotomy and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f Habermas, Nordines and McIntyre,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hilosophy and ethics,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external logic and internal limi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veal its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practic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recognition of justice and the virtue of teacher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should be reshaped by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the institutional content should be optimized by compensatory justice, the curriculu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caring ethics, and "workers related to reflective practice" should be cultivated, thereby helping preschool education return to its essence of nurturing people and the mission of social equity.

Keywords: Privat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AI 赋能高中原创音乐剧

——基于自主协作与工具融合探索

张怡

(上海市奉贤中学, 上海)

摘要: 本文着重讨论在数字化艺术教育浪潮下笔者所在高中音乐剧社团开展的一项具有实验性的探索: 8名学生分为4个创作小组, 依托 DeepSeek 实现剧本架构与歌词生成、和弦派 (ChordPie) 完成作曲编曲, 结合戏剧集体创作法 (Devising Theatre), 计划共计使用约16课时完成原创校园音乐剧《笔下青春》(时长40分钟)的全流程创作。该案例首次验证了“学生主导创作方向、教师督导艺术质量、AI辅助技术实现”的“二导一辅”模式在中学艺术教育中的可行性, 为AI与美育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校本化路径, 更将整个过程内化为学生能力, 并进一步探索在脱离教师的监督下, 学生是否可以独立完成整部音乐剧创作。

关键词: 人机协同; 自主协作; 民主化创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49

中国音乐剧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西方经典剧目引入到本土化探索,再到数字化创新的演进过程。20世纪80-90年代,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院校率先开设音乐剧课程,标志着音乐剧正式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2000年后,随着《蝶》《金沙》等原创音乐剧的出现,高校开始探索本土化教学模式,并逐步形成表演、音乐、戏剧融合的培养体系。2010年后,音乐剧教育进入成熟期,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院校增设音乐剧编导、制作方向,并与国际院校合作,推动音乐剧教育的产业化发展。近年来,AI、VR等新技术的引入,使音乐剧教育进入数字化创新阶段,如上海戏剧学院的“音乐剧+AI”实验项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南京艺术学院合作的沉浸式音乐剧《来自远方》等,均探索了AI在剧本生成、虚拟舞台设计等方面的应用。当前国内音乐剧教育已形成表演、音乐、跨媒体三大培养体系,其发展脉络既反映了西方经典剧目的本土化适应,也展现出科技与艺术融合的鲜明时代特征,为研究AI赋能音乐剧教学提供了扎实的学科基础与创新空间。

国外高中在音乐剧教学中积极探索AI技术的融合应用,形成了多样化的实践模式。例如,英国博斯希尔寄宿中学 (Box Hill School) 在音乐课程中引入AI作曲实验室,学生可通过 MuseNet 软件与古典音乐家“跨时空合创”,同时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实现虚拟交响乐团合奏训练。美国 New Rochelle 高中采用 iPhone、iPad 等设备远程制作音乐剧,通过 iMovie 和 Final Cut Pro 完成剪辑,实现了线上演出与实时反馈。此外,剑桥大学 AI 戏剧艺术营项目将《仲夏夜之梦》与AI技术结合,通过虚拟角色和智能舞台系统增强戏剧表现力。

在“双新”政策与教育数字化双重背景下,国内高中音乐剧创作教学正面临从传统技艺传授向创造性思维培养的范式转型,开始新的探索:漯河市高级中学利用 Kinect 动作捕捉技术优化学生舞蹈表演,通过AI分析“节奏卡点准确率”和“动作幅度热力图”,实现精准教学调整。苏州第五中学则结合 ChatGPT 和AI作曲工具,将《雷雨》改编为音乐剧,探索AI在剧本创作和音乐制作中的应用。此外,部分高中实验课程尝试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为主题,利用AI生成剧本框架并创作音乐剧,促进跨学科整合。这些案例表明,AI技术能够提升音乐剧教学的效率,并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数字化素养。综上所述,AI技术在音乐剧教学中的应用已从基础辅助(如剧本生成、动作捕捉)逐步拓展至沉浸式创作(如VR剧场、智能作曲),为跨学科艺术教育提供了新范式。

然而,当前国内高中阶段利用AI开展音乐剧教学的模式仍面临挑战,如技术应用深度不足、本土化课程体系尚未完善、教师背景多样化、难以同时满足音乐剧教学需求以及如何平衡AI辅助与人文艺术教育的关系等。

作者简介: 张怡(1981—),女,学士,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AI作曲;

通讯作者: 张怡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双新”背景下,如何构建 AI 赋能高中音乐剧教学的培养方式,以具体案例《笔下青春》如何操作为载体,探索高中音乐剧教育从传统模式向“科技+艺术”融合模式的转型,并为未来音乐剧人才培养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一、困境与探索

(一) 国内高中原创音乐剧面临的困境

当前中小学音乐剧创作实践面临着诸多现实性制约因素。这些制约既体现在创作主体的专业素养层面,也反映在创作过程的资源配置环节,更与现行的教学时间安排形成结构性矛盾。

1. 专业门槛限制创作普及性

传统音乐剧创作对参与者的专业素养要求较高,需要掌握基础乐理、和声学、曲式分析等专业知识。教师层面,普通中学音乐教师往往缺乏系统的音乐剧创作训练;学生层面,非艺术特长生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剧本创作、旋律谱写、舞蹈编排等综合技能。这种专业壁垒导致校园音乐剧长期局限于少数特长生参与,难以实现“人人可创作”的美育目标。例如,上海市某重点中学调查显示,仅 3% 的非音乐特长生表示“有信心参与完整音乐剧创作”。

2. 创作周期与课时矛盾突出

在国内,大部分完整音乐剧创作通常包含剧本构思、作曲编曲、排练合成等环节,远超普通高中常规艺术课程每学期 16 课时左右的容量。即便简化流程,缩短时长也需要大量时间进行团队磨合,因而中学课堂往往只能压缩至“欣赏-模仿”的碎片化教学。某市中学生艺术节数据显示,93% 的参赛音乐剧作品采用现成音乐作品,原创率不足 7%,且大部分停留在歌词创作,很难实现音乐原创,反映出课时限制对创作质量的显著影响。

3. 资源配置制约创作深度

中小学普遍面临创作资源短缺:师资方面,同时具备戏剧、音乐、舞蹈教学能力的教师仅占中学艺术教师总数的 6.3% (2022 年全国艺术教育调研数据);设备方面,71% 以上学校缺乏专业录音棚、编曲软件等基础创作工具 (2020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这种资源困境导致多数校园音乐剧停留在“演唱+简单走位+非舞蹈性动作”的初级形态,难以实现多声部演唱、良好的音质、舞美等专业级呈现。

(二) AI 技术赋能打破传统创作壁垒的尝试

前面提到在传统音乐剧创作中,效率低、成本高、门槛高等问题长期存在。而 AI 工具的引入,正在从三个关键维度改变这一现状。这些改变不仅解决了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更重新定义了音乐剧创作的可能性。

1. 创作效率突破性提升

基于 DeepSeek 的 AI 剧本生成:经过集体讨论,设定后,仅在 3 课时 (3 小时) 内完成包含 4 个主要角色 (含人物性格设定与核心戏剧冲突) 的完整剧本框架创作,较传统人工创作模式效率大大提升,显著缩短创作周期。

2. 制作成本结构性优化

和弦派 (ChordPulse) 等免费 AI 编曲工具可满足 70% 的基础编曲需求,相较专业编曲软件的高额采购成本,实现零成本技术赋能,更加适合非专业高中的音乐剧创作。

3. 创作参与全面普及

AI 工具的应用使非音乐专业学生能够直接参与作曲创作,实验数据显示,采用 AI 辅助的小组作曲任务完成率从传统模式的 45% 提升至 100%,真正实现“零基础创作民主化”。

(三) 范式转型:从“教师中心”到“人机共生”

本实践创新性地突破了传统“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的单向线性教学模式,构建了“AI 技术赋能-师生协同创作”的双循环教学新范式。在这一模式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者转型为“创意引导者”和“质量把控者”,其教学干预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关键维度:

1. 版权伦理把关机制

在 AI 辅助创作过程中,教师承担着重要的伦理监督职责。典型案例显示,当 AI 作曲工具生成的旋律片段与某流行歌曲的相似度达到 72% 时 (经 Melodyne 软件检测),教师应当立即启动三级响应机制:首先暂停使用该生成内容,继而引导学生分析旋律结构的相似性特征,最后组织小组讨论原创性标准再决定是否修改。这一过程不仅解决了版权问题,更培养了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

2. 艺术真实感强化策略

针对 AI 作品常存在的“技术精准但情感单薄”问题,教师指导学生运用环境音效叠加技术增强作品的生活质

感。在音乐剧创作中,除了伴奏之外,教师还建议叠加真实的教室环境声(如说话声、课桌椅挪动声、脚步声等),通过剪映等软件进行多轨混音。学生在创作过程中表示“显著增强了场景代入感”。

二、存在问题以及优化方案

AI 剧本存在叙事缺陷、分组创作的故事情节跳跃,教师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专业修正,重点解决“情节跳跃”“情感断层”等技术短板。例如在各个小组独立创作的场景中,即便有 AI 辅助,场景之间相互联结最成问题,常常不知道上一场收尾在哪里,这就需要在每次课前交流时间由各小组学生负责人说明,并由指定的课堂记录员记录,最终形成前后联结。这是分组创作面临的问题,也是教师需要积极引导并特别关注的问题。

这种双循环教学模式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首先,创作流程上形成“AI 生成-师生优化-再生成”的迭代闭环,平均每个场景经历三次修订循环;其次,能力培养上实现“技术应用能力”与“艺术判断能力”的同步提升;最后,在作品质量上达到“技术精确性”与“人文感染力”的有机统一。

教学实践表明,这种新型模式有效解决了 AI 技术应用于艺术教育时的三个核心矛盾:技术效率与艺术品质的平衡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以及智能生成与人文底蕴的融合问题。其创新价值不仅体现在具体教学方法层面,更在于为人工智能时代学生自主音乐剧创作提供了可复制路径。

(一) 核心矛盾:技术效率与艺术深度的平衡挑战

当前 AI 技术在音乐剧创作中的应用,呈现出技术效率与艺术表现力“不平衡”的核心挑战。研究发现,AI 虽能快速生成基础内容,但在情感表达的细腻度、跨模态协同及叙事逻辑等关键艺术维度上仍存在明显局限。这一矛盾本质上反映了算法标准化输出与艺术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研究表明,建立“AI 生成-人工优化”的协同机制是当前可行的解决方案,即在保持 AI 效率优势的同时,通过教师指导在关键节点进行艺术修正。这一研究为平衡技术创新与艺术品质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后续 AI 音乐剧创作指明了方向。

1. 核心矛盾的具体表现

AI 音乐剧创作面临技术效率与艺术深度的本质性矛盾。典型表现为 AI 生成主角内心独白旋律时,采用了小调,但是创作团队希望能转变为大调调性,并能展表现主角内心充满希望的情况,而 AI 无法一次性做到,最终仍需学生手动添加离调和弦实现情感升华。这一矛盾揭示了 AI 算法标准化输出与艺术个性化表达之间的根本差异。

2. 现存技术瓶颈分析

- (1) 情感表达局限:仅能识别基础情绪标签,对复合情感(如“隐忍的愧疚”)的捕捉能力不足;
- (2) 跨模态协同障碍:歌词音节数与旋律模板错位时缺乏自主调整能力;
- (3) 叙事逻辑缺陷:场景转换生硬、角色动机模糊等结构性问题频发。

3. 矛盾的本质与启示

这些瓶颈反映了 AI 艺术创作的深层局限:算法追求效率最大化与艺术需要人性化表达之间存在矛盾,这要求在未来创作过程中力求建立新型人机协作机制,将 AI 的技术优势与人类的艺术判断力有机结合,而非简单替代。当前解决方案是:学生自主创作,过程中通过教师介入,在关键艺术节点进行指导以及人工优化调整,以达到最终创作目的。

(二) 实践探索:自主思维与 AI 共生的螺旋探索

本研究以原创校园音乐剧《笔下青春》为案例。作品聚焦校园“边缘人”的成长叙事,通过 AI 辅助创作实现了从构思到呈现的全流程赋能。研究采用“人机协同”模式,整合 DeepSeek、和弦派等工具,在剧本生成、音乐创作等环节取得一定成效。针对中学生特点,项目设计了“风格引导-伦理约束”的双重机制,既发挥 AI 优势,又培养学生创造力。目前已完成 70% 核心内容开发,验证了技术方案的可行性,为基层学校音乐剧教学提供了可复制的创新范式。后续将通过 2.0 版本迭代,重点优化情感表达与叙事连贯性,完善 AI 艺术创作方法论。以下是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问题:

1. 创作理念的创新性突破

《笔下青春》以校园“边缘人”的孤独困境为核心叙事,通过“小太阳”的主动关怀与“班霸”的群体压迫构建三重人物张力,并匠心独具地设定班主任与母亲(“边缘人”的母亲)为同一个人——这一双重身份的设计不仅强化了戏剧巧合性,更隐喻教育权威与家庭期待的双重挤压,使主角的疏离感更具社会深度。

作品开篇即打破传统音乐剧渐进式铺垫,以视觉与听觉的强对比展现冲突场景:欢快的集体舞曲中涌动青春

活力,主角在曲中蜷缩在舞台一隅,定位光下哼唱的独白旋律却阴郁低沉,瞬间建立观众共情。这种“冲突前置”策略有效适应了校园音乐剧的 40-50 分钟时长限制,压缩叙事时间的同时,通过音乐符号外化心理隔阂——如集体场景采用流行摇滚节奏,“边缘人”独白则尝试配以忧郁的钢琴与小提琴交织等手法作为伴奏,使情感冲击力倍增。

该剧的创作充分彰显 AI 技术对舞台艺术的赋能:基于青少年行为数据库精准提炼“边缘人”的肢体语言特征(如躲避视线的佝偻姿态、日记涂鸦的符号化投影),避免角色刻板化;智能生成符合学生语境的台词,使“班霸”的欺凌台词更具真实压迫感;以模块化舞美强化“无处逃遁”的窒息感。在主题表达上,作品突破校园剧的轻喜剧窠臼,借“小太阳”阳光的人物弧光以及“班霸”与“边缘人”的权力隐形对立结构,揭示青少年社交中的隐性暴力机制,使作品在紧凑时长内仍能承载对成长痛点的多维度探讨。

这种“短时长-强冲突-深共鸣”的创作范式,既延续了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以冲突推进人物的叙事传统(如冉阿让与沙威的二元对立),又以校园场景的普世性拓展了现实关怀的广度,为 AI 时代音乐剧的工业化生产与人文精神平衡提供了新路径。

2. 技术应用的关键流程

在数字内容创作领域, AI 工具的协同应用正在重塑传统工作流程。我们通过系统化的模块分工与多轮迭代优化,构建了一套自有创作方案,具体实施过程呈现以下技术特点与艺术考量:

(1) 剧本生成:采用 DeepSeek 生成初始剧本、人物设定(姓名、个性、甚至口头禅),再通过豆包优化台词使其更加贴切生活。特别要注重角色行为动因的合理性,避免 AI 常见的“情绪过剩但动机不足”问题。针对标志性口头禅的设计,确保每位角色至少拥有一个高频词汇且符合其社会身份背景。

(2) 音乐创作:对比使用和弦派和 SUNO 生成的音乐后,团队最终选择采用和弦派进行创作,通过对音乐风格、歌曲长度设置、基本属性等配置的调整,反复尝试,最终选择符合预期的成品。细节操作中,通过设置“乐曲风格+基调+行进模式”等约束条件,产出不同版本候选。鉴于时间限制,我们保证每首歌曲至少有两个以上版本,在集体讨论中进行筛选。

(3) 质量控制:采用“大浪淘沙”策略,通过大量生成作品后,迭代筛选最优版本,在师生共同欣赏鉴定下,反复修改并最终确认,确保艺术质量。

这套混合创作模式,既保持了 AI 的规模生产力优势,又通过精细化打磨确保了艺术表达的精确性。实践数据显示,相较传统流程,该方案使优质内容产出效率大幅提升,同时降低返工率,为 AI 时代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可复制范式。

3. 跨模块协同的解决方案

由于 8 名学生共分成 4 个小组,在创作时难免会出现“脱节”“割裂”等现象,在多次尝试后,采用如下方式进行调整和解决:

(1) 风格统一性:将前两首生成的音频作为第三首参考样本,在保持调性速度一致的前提下实现风格渐变;

(2) 技术适配:在相同风格音乐的创作上,教师给出已有音乐剧范本,限定需要风格,指明创作方向,比如“小太阳”和“班霸”争论之歌,借鉴《周生如故》中《血脉》这首歌的速度以及创作方式;开场曲由集体合唱到个人 solo,借鉴《马戏之王》中《This is me》;结尾部分参考《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世界之王》。学生在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风格之后,能更加明确自己所需要达到的目的并有针对性解决。

(3) 伦理讨论:在创作过程中,首先要允许学生自主创作旋律动机,对于剧本的框架、故事则需要全部由团队设定、AI 辅助修改,避免完全依靠人工智能,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

4. 实践成果的示范价值

目前,《笔下青春》AI 音乐剧创作项目已完成 70% 的核心内容开发,正处于关键整合阶段。项目团队计划于本年度学校年末晚会上首次公演 5 分钟左右精选片段,随后根据观众反馈和专业评审意见进入 2.0 版本的迭代优化。

项目预计于 2026 年 1 月-6 月完成 2.0 版本升级,重点优化:

(1) 情感表达的细腻度,特别是复合情绪的音乐呈现。

(2) 叙事的时空连贯性,强化“内心独白与现实场景”场景转换的戏剧张力。

这一持续优化过程本身即构成珍贵的研究样本,为 AI 音乐剧创作的迭代机制提供实证依据。

三、未来展望与反思

AI 技术在高中音乐剧创作中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专业门槛、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通过“人机协同”模式激发了学生的艺术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笔下青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验证了“二导一辅”(学生主导、教

师督导、AI 辅助)模式的可行性,为普通中学美育与科技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然而, AI 赋能音乐剧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 技术工具的局限性(如情感表达的单一性、叙事逻辑的薄弱), 要求教师在关键节点进行艺术修正, 确保作品的人文深度。其次, 如何在 AI 辅助下保持学生的自主创造力, 而非过度依赖技术生成, 是未来教学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此外, 版权伦理、风格统一性、跨模块协同等现实问题, 仍需通过更精细的教学设计和团队协作机制来解决。

未来, 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迭代升级, 音乐剧教育可能进一步迈向“智能共创”时代。例如, 结合大语言模型的剧本优化、基于情感识别的 AI 作曲、虚拟演员与真实学生的同台演出等创新形式, 均可能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 艺术教育的核心仍应回归“以学生为本”——AI 是工具, 而非替代者; 是助力, 而非主导。

本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学生相对独立地完成一部 AI 音乐剧创作, 更在于探索了一条科技与人文平衡的美育新路径。它证明, 在教师的引导下, 高中生完全有能力借助 AI 工具实现原创艺术表达。这一实践为“双新”背景下的跨学科艺术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也为未来 AI 与美育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实证基础。

最终, 我们期待《笔下青春》可以达成部分先演出、修改进阶版本后完整呈现成果的目的, 并能由此引发更广泛讨论: 当 AI 成为艺术创作的伙伴, 教育者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判断力、伦理意识与创新思维这一问题, 或许比技术本身更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 [1]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AI 技术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探索[C]. 广州: 华师音院研会, 2025.
- [2] 付晓东. 人机协同创作在高校音乐通识课的实践路径[J]. 中国音乐教育, 2025(1): 34-38.
- [3] 沉浸式音乐剧中 AI 技术的应用场景与伦理框架[R]. 北京: 人文学库, 2025.
- [4] AI+音乐创作的工具变革与教育适配性研究[EB/OL]. CSDN 博客, 2025.
- [5] Suno、MakeBestMusic 与 Mureka 的技术对比与版权分析[N]. 今日头条, 2025-03-29.
- [6] 2025 年主流 AI 音乐工具教学应用指南[N]. 今日头条, 2025-04-22.

AI-Empowered High School Original Musical Theater: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Autonomous Collaboration and Tool Integration

Zhang Yi

(Shanghai Fengxian High School, Shangha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conducted by the high school musical theater club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art education. Eight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reative groups, utilizing DeepSeek for script structuring and lyric generation, ChordPie for composition and arrangement, and integrating the Devising Theatre method. The project aimed to complete the entire creative process of an original campus musical, *Youth in Ink* (40 minutes in duration), within approximately 16 class hours. This case study valid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ual-guidance and single-assistance" model—where students lead the creative direction, teachers supervise artistic quality, and AI assists in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in secondary school art education. It provides a replicable, school-based approach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rnalizing the entire process as student competency while further exploring whether independent completion of the creation is possible without teacher supervision.

Keywords: human-AI collaboration, autonomous cooperation, democratized creation

艺术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与策略

丁慧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 上海 200083)

摘要: 本研究立足“大思政”建设深化推进与美育浸润行动全面落地的时代背景, 聚焦中学艺术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痛点, 系统探讨以“思政+艺术”跨学科融合为核心路径, 将思政教育价值引领融入中学艺术教学的具体方法, 旨在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情感体验与社会责任感。实践层面, 既通过《红旗颂》等经典作品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借助抗战歌曲培育优良道德品质, 结合时政热点强化实践能力; 也通过深挖教材思政元素、创新传统艺术演绎形式, 实现艺术审美与价值观教育的有机统一, 最终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与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中学艺术; 艺术教学; 思政教育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44

席勒在其著作《美育书简》中曾深刻指出, 教育的终极目的之一是“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①这一观点揭示了美育在塑造完整人格中的不可替代性。随着教育的不断深化, 艺术教育作为美育浸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 还可以有效承载思政内容。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核心素养背景下, 以中学艺术为主学科的思政教育有效融合策略与实践方法。希望通过设计与实施“艺术+思政”跨学科的教学活动, 加深学生对于文化的理解、丰富其情感体验, 并培养其社会责任意识,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以更生动直观的形式融入艺术学习之中。同时, 我们期望在此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能力, 为中学艺术教育提供新的教学模式, 并探索艺术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路径, 以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一、中学艺术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一) 艺术教学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

艺术教育能够通过艺术作品的情感感染力与号召力, 有效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 《红旗颂》这样的交响乐作品及《中国, 中国, 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这样的歌曲, 以其动人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深深打动学生心灵, 在音乐学习过程中让他们体会到国家的伟大与光明未来, 进而加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红旗颂》不仅展现了红旗所象征的奋斗精神与革命热情, 还通过其激越的节奏和悠扬的旋律让学生们感受到先烈们的坚定意志与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作品开头的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 其高亢的音区、明亮的音色、强劲的力度和宽广的节奏, 通过“同构联觉”原理, 直接在人心唤起了“庄严”、“崇高”、“振奋”的情感体验。^②此外《中国, 中国, 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则以简洁却富于深意的文字, 将新中国从成立到繁荣发展的辉煌历程, 刻画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使学生在歌唱时体会到一种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信心, 同时也体会到自己所肩负的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教师可以结合音乐会或合唱比赛等实践活动, 通过对这些作品背后所包含的历史背景、创作手法以及情感表达方式等进行细致讲解, 帮助学生对其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 使参与者亲身体验到音乐之美, 以及民族为民所共有的荣誉感。

此外, 在中学艺术教育中整合思想政治教育, 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还可以对学生历史担当方面的培养。通过鼓励学生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抒发对国家、对社会的看法, 能够促使学生对国家发展的重视,

作者简介: 丁慧智 (1992-), 中学一级教师, 研究方向为艺术 (音乐) 教学;

通讯作者: 丁慧智

从而加深学生作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还促进了他们对历史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成长为具有深厚情感与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

(二) 艺术教学能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塑造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在中学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教育在此阶段的作用尤为突出,因其坚守“审美育人”的根本宗旨,主张通过美的体验来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它不仅能够深化学生的情感世界,还能促进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艺术作品往往是情感丰富、历史文化丰富的,老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这些作品去共鸣他们背后的情感。如通过欣赏抗战时期的歌曲和反映社会变迁的乐曲,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先辈们为民族独立、为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从而激发学生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对历史责任的理解。这种深层次的情感交流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力,并培养出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最终帮助他们在道德层面上得到成长。

中学艺术教育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于促进学生之间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同理心的发展。当学生们参与到合唱团、乐队或音乐剧等集体活动中时,他们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音乐才能,更能深刻体会到合作的价值所在,学会相互尊重、理解与支持的重要性。这种通过共同努力达成目标的经历,对于塑造积极向人的性格特质至关重要。此外,聆听那些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音乐作品,展示社会的关怀,对激发学生的同理心也是很有帮助的。年轻人通过接触这些富有意义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而培养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个人与他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类实践活动及其带来的感悟,在帮助青少年成长为既充满人文关怀又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成员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正是艺术教育发挥其“情感教育”与“社会性教育”功能,实现道德培育目标的生动体现。ⁱⁱⁱ

(三) 艺术教学能提升综合素质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中学艺术课程中,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首先,通过选取那些蕴涵着社会正能量和人文精神的艺术作品,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方法上能够与情感上的共鸣、人文关怀进行有效结合。在对这些艺术作品的鉴赏中,鼓励学生抒发个人感受与真知灼见,这样的互动既使学生加深了情感体验,又对促进个体的发展、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有很大帮助。有助于学生形成更广泛、更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在课堂上讨论《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它不仅拥有动听的旋律,歌词中也蕴含着追求梦想与希望的信息。教师在欣赏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将自己对本曲的认识进行分享,并鼓励学生把自己在逆境中怎样坚持追梦的故事联系起来,联系自己的经历进行讲述。通过此类活动,学生们不仅能体会到艺术带来的力量,还能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同情,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人文关怀水平。

此外,艺术课程中的创意实践活动同样至关重要。教育者要激励学生积极地投身于艺术创作当中去,并指导他们探索如何利用艺术形式来传达个人见解及社会观察。这种练习不但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艺术才能的提高,更对促进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以及独立的判断能力的发挥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参与艺术作品的创造和讨论过程,学生们学习到了问题分析的方法以及解决方案的构思技巧,这为他们在未来的学术研究或职业发展中解决复杂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将艺术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审美素养,还能在激发情感共鸣、培养人文精神、促进创新表达及批判性思考等多个维度上推动其全面发展。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特质,助力他们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新一代青年。

二、“艺术+思政”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策略

(一) 深挖艺术教材中的思政内容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中学艺术教材的内容得到了显著扩充,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被收录其中,成为学生接触与学习艺术的重要渠道。这些教材不仅富含了广泛的艺术知识和技术指导,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因此,中学艺术教师应当调整教学策略,以跨学科融合的角度,深入探索教材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将其与艺术课程进行有机结合。^{iv}比如,在讲解《红旗颂》时,教师可以详细阐述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及其深远的意义,使学生能够理解该曲目如何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及爱国情怀,进而提高学生的思政素养。《红旗颂》由吕其明于1965年创作完成,作为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节的开场曲首次公演便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首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作品之一,其灵感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旨在赞颂红色旗帜以及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教师可以通过分享吕其明如何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几乎闭门不出地完成了初稿的故事,以及他是怎样将自己对党、人民以及胜利喜悦之情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去的过程来加深学生们的理解和感受。除此之外,通过对《红旗颂》音乐结构和内容的解析,还可以引导学生们认识到音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内音乐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该作品采用了奏鸣曲式的结构设计,其中前奏部分的小号旋律显然受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让人仿佛又回到了1949年10月1日那个振奋人心的建国大典时刻。通过这样有深度的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学到了音乐表达方法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中获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从而增强了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增强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此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红旗颂》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军魂》和《共和国之恋》这两首歌曲作为补充材料,以此丰富课程内容并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作为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歌,《中国军魂》将军人不畏艰险、英勇无畏的精神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共和国之恋》,则道出了科学家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片深情。通过这些歌曲的学习和演唱,使同学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无私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培养了同学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综上所述,中学艺术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内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艺术体验,还能在他们心中种下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的种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当学生们演唱那些富含深刻思想政治意义的歌曲时,不仅能掌握相关艺术知识和技术,还能在情感层面得到升华,这对塑造具备高尚情操和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结合时政热点开展艺术实践活动

时政热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与艺术实践活动相融合,能够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增加课程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李冲锋在其研究中强调,基于真实情境的实践活动是打破学科壁垒、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关键策略。^{iv}例如,在学校举办的国际文化节期间,可以将“敬”这一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艺术创作当中,以此来呼应当前的社会焦点。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我们可以组织一场主题为“敬自然”的艺术创作活动。学生可以通过绘画、摄影或雕塑等形式,展现大自然的魅力以及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表达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及保护环境的坚定信念。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还能加深他们对于全球性环境议题的理解,进而培养其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责任公民。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弘扬“敬人”与“敬德”的精神,并结合全球重要的时政事件,比如国际和平日、世界人权日等,组织一系列的艺术实践活动。学生们能够通过参与短剧表演、合唱以及风采展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来表达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和平及人权的渴望与尊重。此类活动不仅能够让参与者深入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同时也能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如何尊重并理解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成为具备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三) 创新传统艺术演绎,激活文化记忆

在艺术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需要以具体的音乐作品为载体,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实现文化浸润。以民乐合奏《花好月圆》的教学为例,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学习的《节日的天山》和《祝愿歌》,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民族节庆音乐的特点,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学生们在复习中特别关注了扬琴清脆明亮的音色特征,以及《祝愿歌》中维吾尔族舞蹈动作与欢快旋律的配合方式。

进入新课教学环节,教师采用分段赏析的方式,带领学生深入理解《花好月圆》的艺术特色。在分析A主题

时,着重讲解笛子与高胡的音色对比,笛子高音区的跳跃音型与高胡滑音的歌唱性形成生动对话。学生们通过绘制旋律线条图,直观感受五声调式的进行特点。B主题的教学则突出弹拨乐器与拉弦乐器的音色交替,教师引导学生用身体律动表现节奏的疏密变化,体会音乐中蕴含的舞蹈性。实践环节是本节课的重点,教师设计了丰富的音乐创编活动。打击乐小组尝试用铃鼓、木鱼等乐器模拟舞龙舞狮的节奏,通过强弱对比表现节日的热闹场景。部分学生还将维吾尔族舞蹈动作融入音乐表演,用手掌拍击和沙桶摇动等生活化方式表现春雨的意境。这些实践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音乐表现力,更让他们在亲身参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课堂总结阶段,教师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花好月圆》,引导学生思考传统音乐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发展。学生们积极讨论如何在不失本真的前提下赋予传统音乐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思考过程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课后,教师布置了延伸作业,要求学生收集不同地区的节庆音乐,比较其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为下节课的深入学习做好准备。

整个教学过程环环相扣,从作品赏析到实践创编,再到文化思考,综合运用了比较、探究、创编等多种跨学科教学策略。这种系统性的教学设计,通过教学方式的融合创新,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理解与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最终使传统文化成为学生可感、可知、可创的艺术体验,实现了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iv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中学艺术教育的跨学科融合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将艺术与思政教育相结合,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还能培养其思想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展望未来,教师们应当致力于研究和开发新的教学策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及跨领域教学技能,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全面人才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 [1]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 [2] 王次炤.音乐美学基本问题[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
- [3] 郭声健.艺术教育的审美品格[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4] 李冲锋.跨学科教学研究:内涵、设计与策略[J].教育科学研究,2019(10):52-57.

The Significance and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Art Teaching

Ding Huizh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Situ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adv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itiative and implementing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Infiltration Action,"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artistic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t proposes an interdisciplinary "Ideological-Political + Arts" model as a central approach, with a focus on infusing the value-guidance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art teaching process. The objectiv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comprehension, emotional engage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ally, the study employs classic works like Ode to the Red Flag to inspire patriotism, utilizes songs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cultivate moral character, and incorporates current political events to strengthen practical competencies. Furthermore, it involves a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inherent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nov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form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achieve an organic unity of artistic appreciation and values education, thereby fostering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humanistic qualities.

Keywords: Secondary School Art; Art Teaching;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学合唱课教学测评指标建构研究

许汉林 易秀华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本研究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为导向,结合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元智能理论,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构建了包含“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及“协作能力”五个维度共十六项指标的教学测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探索了形成性评价与表现性评价在合唱课评价中的结合运用,从而推动“以评促学”实现“教学评”一体化。旨在实现评价维度多元化,让评价更客观、科学。研究结果可为中学合唱教学评价提供实践参考,对促进落实核心素养理念、深化美育改革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教学评价;合唱教学;评价指标;以评促学

基金项目:湖北师范大学2025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课标下中小学合唱课教学测评指标建构研究》(2025Y13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5

一、引言

2020年10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评价方案”),在其中提到:改进美育评价促进学生形成艺术爱好、增强艺术素养,全面提升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这要求在开展音乐教学评价时,要打破价值导向缺失、侧重考试成绩、评价主体不当等评价困境,音乐教学评价要紧扣美育育人本质,在评价内容与形式上注重与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培育相契合,这些实践路径要求音乐教学评价要摆脱唯分数论的传统思维,让评价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育艺术爱好的媒介,提升评价的反馈与改进功能,助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力。“评价方案”的发表,标志着在音乐教学评价方面需要进行创新。

2022年4月国家教育部印发了最新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指出艺术课程要围绕核心素养,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坚持以美育人、重视艺术体验、突出课程结合,针对教学评价方面也给出了具体的评价建议,即坚持素养导向、坚持以评促学、重视表现性评价、坚持多主体评价。这些评价原则要求音乐教学评价要从传统的评价方式——教师主导、结果性评价、重知识轻能力的范式中走出来,注重以核心素养为指向的教学评价,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诊断、激励、改善功能,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新课标不仅是对教育教学及教学评价的最新要求与方向,更是关乎学生的成长发展和核心素养形成的重要蓝图。

中学合唱课的内容特点与《新课标》中的四维核心素养相契合,作为集体性课程,合唱课需要学生们学会各声部的旋律歌唱以及对歌词有一定的理解,在这一环节中,是对学生审美感知和文化理解的培养,而合唱课最终需要同学们的共同演出,这便会有排练形式上的创新,该环节可以考查学生的创意实践和艺术表现的素养能力。同时,与单一的声乐课或乐理课不同,中学合唱课以“多声部协作演唱”、“集体艺术呈现”为主要特点,不仅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音乐素养,同时需要学生具有声部配合、团队协作的意识,因此,中学合唱课的教学评价既考查学生的个人音乐素养,又能够考查学生在合唱中的集体活动表现。然而当前对于中学合唱课的教学评价仍然具有局限性:其一是评价主体以教师为主,缺少学生自评互评等。这并不符合《新课标》中的“多主体评价”的要求;其二是评价内容多为“旋律音准”、“节奏统一”等技能型内容,对“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维度的评价欠缺;其三是评价多以最终作品呈现为评价依据,忽视了在声部协作练习等过程性记录的评价,这与《新课标》中的“表现性评价”相悖。这些问题导致教学评价无法真实有效的测评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情况,

作者简介:许汉林(200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易秀华(1980—),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易秀华

也同时阻碍了合唱课的美育功能的发挥。

如何有效准确的测评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情况以及如何发挥评价的诊断、激励的效用,避免核心素养培养停留在形式上,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新课标》中提出的“素养导向”、“表现性评价”、“多主体评价”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原则指引。本研究选取中学合唱课这一突破口,来构建基于四维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价指标,对实现以评促学及教学评一体化,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核心素养导向下的中学合唱课

(一) 合唱课中的审美感知

在《美学与美育词典》中对审美感知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审美感知是审美感觉和审美知觉的总和,是对事物特性的反映,是主体感官与对象直接接触获得的感官印象。当我们因感知到某种色彩、声音等客观事物而产生愉悦等主观感觉时,这种感觉虽是生理层面的,但却是美感经验的基础,一切高级复杂的心理感受都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

而审美感知在《新课标》中被这样解释:审美感知是对自然世界、社会生活和艺术作品中美的特征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发现、感受、认知和反应的能力。审美感知具体指向审美对象富有意味的表现特征,以及艺术活动与作品中的艺术语言、艺术形象、风格意蕴 情感表达等,审美感知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发现美,感知美,丰富审美体验,提升审美情趣。前者从美学的角度解释了审美感知的内涵以及发生过程,后者则是对审美感知的细致化,但二者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审美感知是由对美的感受与认知共同组成的,同时也是对教学的首要要求。

“感受”与“认知”是构成审美感知的两部分,且“感受”是“认知”的基础,那么中学合唱课的审美感知素养的教学要求可以得出为:1、听觉感受方面,能够大致感知判断音乐变奏要素,能够听辨歌曲体裁和风格;视觉感受方面,能够正确识读乐谱;能够理解指挥手势;体态感受方面,能够感受演唱时的发声位置,能够作出与音乐情绪、特点相符的肢体动作。2、能够理解音乐要素的表达作用,能够准确判断音乐意蕴的表达;能够根据乐谱调整演唱,能够按照指挥控制速度力度地演唱。

审美感知作为核心素养的首位,是音乐艺术学习的基础,后续的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均需要审美感知贯穿其中。

(二) 合唱课中的艺术表现

艺术表现在《简明艺术辞典》中有这样的解释:艺术表现又叫做艺术表达或艺术传达,是创作者将头脑中构思的审美意象外化展示出来成为艺术作品的过程,艺术表现以艺术构思为基础,又是对艺术构思的延伸,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而《新课标》对艺术表现是这样概括的:艺术表现是在艺术活动中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情感、展现艺术美感的实践能力。艺术表现包括艺术活动中联想和想象的发挥,表现手段与方法的选择,媒介、技术和艺术语言的运用以及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艺术表现的培育有助于学生掌握艺术表现的技能认识,艺术与生活的广泛联系,增强形象思维能力,涵养热爱生命和生活的态度。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二者都将艺术表现定义为“创造艺术形象的实践活动”,在整个过程中涉及到了想象力的发挥、表现手段的选择,艺术语言的运用和情感的表达四个方面,在中学合唱课的学习中则可以细化为:1、能够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提出具有一定创意的合理改编;能够作出与音乐情绪情感特点相符合的即兴表演。2、具备多声部合唱的意识,能够在合唱实践中运用各种表现技巧。3、理解乐谱中的音乐术语并在是实践中能够正确表现和运用。4、能够正确的运用歌唱技巧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总体来说,中学合唱课的艺术表现素养是学生参与艺术活动的必备能力,是要学生在理解和完整演唱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知识来进行具有个性化的创造,以此表现自身的想法与个性。

(三) 合唱课中的创意实践

在词典中,“创意”一词被解释为有创造性的构思或想法。“实践”意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新课标》中对创意实践也做出了细致的解释:创意实践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紧密联系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创新和实际应用的能力。创意实践包括营造氛围,激发灵感,对创作的过程和方法进行探究与实验,生成独特的想法并转化为艺术成果。创意实践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形成创新意识,提高艺术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增强团队精神。可以看出“创意实践”的重点即是艺术创新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

在合唱作为一种集体艺术形式,其创意实践不仅体现在对作品的个性化诠释上,还包括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的个性化处理。例如对歌曲的节奏、力度、音色等进行合理改编,或加入适当的肢体语言、情景表演等,来增强

艺术感染力。此外,创意实践更体现在学生对合唱作品进行的二次创作,如通过声部分配、情感表达等方面的探索。

因此,中学合唱课中创意实践素养的教学要求可归纳为:1、具备参与创编的意识,能够主动思考并提出对歌曲处理的建议;2、具备一定的即兴与改编能力,能进行节奏、旋律或和声的简单创编;3、具备二度艺术处理能力,能够在集体框架中融入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实现对作品的个性化创造。

(四) 合唱课中的文化理解

《新课标》对文化理解的解释如下,文化理解是对特定文化情境中艺术作品人文内涵的感悟、领会、阐释能力。文化理解包括感悟艺术活动、艺术作品所反映的文化内涵,领会艺术对文化发展的贡献和价值,阐释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理解的培育有助于学生在艺术活动中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尊重文化多样性,增强文化自信。

在合唱教学中,文化理解素养体现为学生能否在学习音乐作品的过程中,理解作品的文化背景与人文精神。例如,演唱民歌时,学生是否能够了解该民族的音乐特色、语言习惯;演唱历史题材的作品时,能否理解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精神。文化理解不仅是对作品内容的学习理解,更是对音乐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把握,是学会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中学合唱课中文化理解素养的教学要求包括:1、能够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与文化渊源;2、能够识别音乐作品与特定地域、民族、历史时期的文化联系,感知文化特色;3、具备多元文化视野,通过演唱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增强文化认同,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三、理论基础

(一)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是教育学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它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家皮亚杰,他主张儿童是在与自身所处环境进行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出对客观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并且这种相互作用是可以归化为两个过程,即“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个体受达到外界刺激并将所获得的信息增加至自身原有的认知体系内,也就是对原有认知内容的补充增加和扩展;而顺应指的是个体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但此时自身原有的认知形态无法正确理解无法合理对信息进行“同化”,因此原有的认知体系会进行更新甚至是重构的过程,也就是形成新的认知体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主张的是学生应当在贴近现实生活的情境中,通过解决情境中的预设问题,基于自身的认知体系对所接触知识的自主建构的过程,要注意的是学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认知体系和认知经验,且不同学生之间有基础和经验上的差异。这对教学评价的启发有如下几点:1、教学评价应当针对的是一个完整情境中的完整过程;2、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评价中来;3、突出学生的中心位置,教师发挥引导作用,注重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接受的过程。

不难发现,建构主义理论的主张与《新课标》中的“重视表现型评价”、“坚持多主体评价”,以及“问题导向”有着极高的相似性,这也是本文选择建构主义理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原因之一。建构主义理论对合唱课教学评价的启示有以下几点:1、评价应重点关注学生在集体排练中的参与度,包括参与积极性、问题解决能力,例如学生是否会主动参与声部的配合、当学生发现声部之间的差异之后是否会主动进行调整,而并不是以一次合唱展示来形成对学生的评价;2、评价主体可以加入学生,展开学生自评与互评,互相成为听众也可以加深学生对合唱的理解;3、评价的内容不再局限在基础的音准、节奏等,还要注意到合作意识、情感表达、创意理念等,例如学生在演唱过程中是否会关注各声部的和声配合、能否准确传递出作品的情绪等等。

(二) 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最初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教育家加德纳提出的,当时传统的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是由语言和逻辑能力综合起来,可以借由统一的量化标准进行评定的,因此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教学评价较多采用的是测试的方式。而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主张人的智能是由多种智能组合而成的,他最初提出了七种智能,分别是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空间理解智能、体能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际智能、内省智能,这七种智能反驳了传统智能对人的智力理解的片面,字面测试的评价方式也与实际生活环境不符,更是把评价焦点聚集在了可被客观观察到的内容上,忽视了个体智能提升的内在过程。

多元智能理论的观点批判了传统智能理论影响下的评价方式存在片面的问题,评价关注智力的外化部分,即计算、语言、记忆等客观测评的内容,而忽视了智力活动的整体过程,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由多元化的内容构成的,不同于传统智能的语言、逻辑等的综合,它更关注学生的全方面智能的发展以及发展的过程。

这一点与《新课标》中的“坚持素养导向”、“重视表现性评价”的评价原则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且与多元智能理论对中学合唱课教学评价的启示有以下几点：1、教学评价应当要关注学生在合唱过程中的整体表现，即合唱过程的全时段、全范围的综合，反映学生的动态变化；2、评价维度不应当局限在音准、节奏、音色等学科智能，应当将更多内容纳入评价维度中，例如学生对歌词内涵的理解、对歌曲情感的个性化表现，同时还可以让学生自评自己的演唱成果，提升学生的改进反思能力；3、评价目的应当从“区分优劣”转变为“促进成长”，关注学生的全面成长和提升，例如对音准感受较弱但情感表达丰富的学生，可以鼓励他发挥感染力的特点，同时针对音准问题给出练习建议。

四、基于核心素养的评价指标建构

（一）当前合唱课教学评价的不足

基于前有文献研读发现，现行的中学合唱教学评价存在着评价内容不全面、评价主体单一、反馈效能不足、重结果轻过程等问题，部分学者针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下表：

表 1 前有研究中教学评价现存问题与解决方法总结表

作者	提出的问题	解决方法
王小虎(2023)	内容不全面	多元评价观
	方法不多样	内容综合化
	反馈效能不足	
朱义美(2022)	缺乏评价体系	科学评价观念
	内容存在偏差	多维分析结果
		多样化评价
梁春兰(2025)	忽视个体差异	评价主体多样化
	评价视角单一	评价内容多维化
		过程性评价
卜千万(2023)	针对性不强	规范教学目标设定
	体系不完善	重视评价成效反馈
		评价透明公开
季鹏飞(2020)	形式单一	营造适宜情境
	忽视学生主体	发展性评价
		构建评价指标
孙嘉(2022)	可操作性欠缺	构建评价指标
	标准设定偏差	评价方法多样化

（二）合唱课教学评价模型构建

不难发现，针对前文中提到的评价内容不全面、评价主体单一、反馈效能不足、重结果轻过程等问题，众多学者都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普遍提出的解决方法包括：多元评价（内容多维、方法多元）、创设评价情境、突出学生主体。本文同样遵从以上的评价方法与建议，以《新课标》中核心素养为依据，结合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构建针对中学合唱课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主要覆盖“音乐素养学习”和“音乐艺术实践”两个方面，并拟定了五个一级指标、十六个二级指标。相对于传统合唱课教学评价内容偏颇、评价主体单一、评价重结果轻过程等问题，本指标体系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兼用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具备了评价维度全面化、评价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旨在通过合唱课的艺术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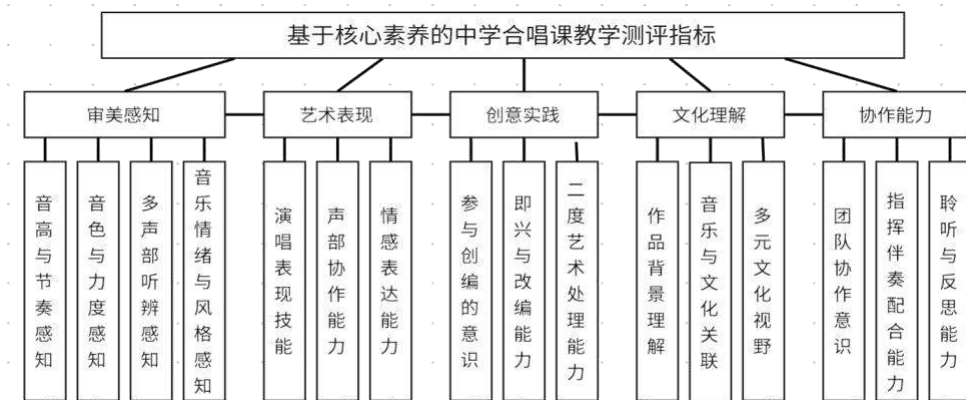


图 1 教学测评指标框架图

（三）评价模型指标分析

本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的设定，为《新课标》中“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的四维核心素养，《新课标》中还对教学评价提出了“重视表现性评价”的建议，同时前人研究中提到的“多元评价”、“过程性评价”，依据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设定了“协作能力”为第五个一级指标。审美感知指的是学生对合唱音乐中各要素及表现作用的感受、体验和认知能力；艺术表现指学生运用歌唱技能和艺术表现技能，表达合唱音乐情感与内涵的能力；创意实践指的是学生在合唱实践中进行即兴、编创以及二次艺术创作的能力；文化理解指学生对合唱音乐相关的文化背景、社会内涵及人文精神的认识与理解能力；协作能力指的是学生在合唱实践中，综合运用各项基本素养，最终呈现完整艺术作品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强调团队协作的精神和意识。

本评价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分化，首先是“审美感知”的二级指标分别是：音高与节奏感知、音色与力度感知、多声部听辨感知、音乐情绪与风格感知，这四个二级指标是对学生基本音乐素养能力的考查，“音高与节奏感知”要求能够准确感知并且辨别音准、节奏、速度等音乐要素，“音色与力度感知”要求的是能够听辨并感知统一的合唱音色，“多声部听辨感知”则要求能够初步感知和声色彩，听辨不同声部的旋律，“音乐情绪与风格感知”要求能够感受理解音乐所表达的情绪和风格特点。

“艺术表现”下的二级指标包括：演唱表现技能、声部协作能力、情感表达能力，“演唱表现技能”要求能够掌握正确的歌唱姿势、呼吸方法、发声技巧和清晰的咬字吐字，“声部协作能力”要求学生能准确、独立地完成本声部的演唱，并能倾听和配合其他声部，达到声部间的平衡与融合，“情感表达能力”则要求学生能根据作品要求，通过音色、力度、速度等变化，富有表现力地传达音乐的情感。

“创意实践”下的二级指标有：参与创编的意识、即兴与改编能力、二度艺术处理能力，其中“参与创编意识”指的是能够积极参与对歌曲演唱处理如力度、速度的讨论并提出个人的意见，“即兴与改编能力”要求能在教师指导下，尝试进行简单的节奏模仿或为旋律配置简单的和声伴奏音型，“二度艺术处理能力”要求学生能理解并执行指挥对作品的艺术处理，在集体框架内进行个性化的情感投入，共同完成对作品的二度创作。

“文化理解”下的二级指标包括：作品背景理解、音乐与文化关联、多元文化视野。“作品背景理解”要求了解所演唱歌曲的创作背景、词曲作者及基本的文化渊源，“音乐与文化关联”要求学生能理解音乐作品与特定地域、民族、历史时期的关联，感知其文化特色，“多元文化视野”需要学生通过演唱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作品，尊重和理解音乐的多样性，开阔文化视野。

“协作能力”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有：团队协作意识、与指挥伴奏的配合、聆听与反思能力。其中“团队协作意识”要求具备基本的团队意识，能遵守排练纪律，掌握自己声部的演唱，并能够配合其他声部较好的呈现作品，“与指挥伴奏的配合”要求学生能敏锐观察并响应指挥的手势和提示，与伴奏乐器形成良好的配合，“聆听与反思能力”则指的是能积极参与排练过程，善于倾听他人意见，具备初步的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的能力，能反思不足并寻求改进的意识与能力。

五、结论

本研究基于《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所提出的核心素养理念，结合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元智能理论，针对当前中学合唱课教学评价中存在的评价内容片面、主体单一、重结果轻过程等问题，系统构建了以

“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及“协作能力”为一级指标的教学测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细化为十六个二级指标。

本指标体系的建构,不仅将核心素养的理念具体化、操作化,更注重评价的过程性与综合性,强调学生在合唱活动中的参与、体验、协作与反思,体现了“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评价导向。通过融入多主体评价、表现性评价等现代评价理念,关注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全面成长与素养提升。

此外,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丰富了音乐教学评价的研究视角,在实践层面为中学合唱课的教学评价提供了可参照的指标框架,有助于教师科学、系统地观察与评估学生的素养发展情况,未来,本指标体系还需进一步通过教学实践进行验证与修订,增强其适用性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向吉梅,吴云鹏.普通初中学生评价机制的现实困境与突围路径——基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视角[J].新课程导学,2023,(31):79-82.
- [2] 顾建华,张占国主编.美学与美育词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第55-56页
- [3] 欧阳周,顾建华,曹治国主编.简明艺术辞典.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第9页
- [4] 亢世勇,刘海润主编.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 [5] 何克抗.新型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学者对西方建构主义的批判吸收与创新发展[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1,4(01):14-29.
- [6] 孙嘉.普通高中音乐鉴赏课教学评价指标的建构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2022.
- [7] 杨漫.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教学评价改革研究[J].英语广场,2025,(03):75-78.
- [8] 戴娱.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音乐教学评价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9,39(10):138-143.
- [9] 王小虎.基于CIPP评价模式的初中音乐教学评价策略研究[D].苏州大学,2023.
- [10] 朱义美.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音乐教学评价的策略研究[D].天水师范学院,2022.
- [11] 梁春兰.核心素养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学评价策略探究[J].教育,2025,(01):41-43.
- [12] 卜千万.初中音乐单元整体教学现状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23.
- [13] 陈红玉.初中音乐教学评价的调查与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5.
- [14] 季鹏飞.浅谈初中音乐课堂教学评价的现状与改进策略[J].北方音乐,2020,(03):121+123.
- [15] 吴训.中小学音乐教学评价机制与学生心理发展的适应性研究[D].江苏师范大学,2013.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Middle School Chorus Courses Based on Key Competencies

Xu Hanlin, Yi Xiuhua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Art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this study, integrating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o construct a teaching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consisting of 16 indicators across five dimensions: “aesthetic perception”, “artistic expression”, “creative practic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llaborative ability”. This indicator system explores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 chorus course evaluation, thereby promoting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nd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It aims to diversify evaluation dimensions and make evaluation mo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middle school chorus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have positi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key competencies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Keywords: Teaching Evaluation; Chorus Teach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I 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心理建设与适应策略研究

关晓颖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摘要: 本文结合职业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理论, 分析 AI 技术重塑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及馆员角色转型引发的心理挑战, 探讨心理状态、困境成因及适应策略, 为高校图书馆员管理及智慧图书馆发展的角色转换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强调未来需动态优化心理建设策略以适应 AI 技术迭代。

关键词: 人工智能技术; 高校图书馆员; 心理适应; 角色转型; 智慧图书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610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塑——智能检索系统实现了馆藏资源的“一站式”精准定位, AI 咨询机器人突破时空限制为师生提供实时解答, 大数据分析技术则能基于用户行为偏好推送个性化知识资源, 传统图书馆“以文献储藏为核心”的功能定位逐渐向“智慧知识服务枢纽”转型^[4]。这种转型不仅改变了图书馆的运营逻辑, 更对图书馆员的角色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原本以借阅管理、书目整理为核心的传统工作内容, 正逐步被智能化技术替代, 馆员需快速向知识导航者、科研支持者、AI 协同服务者等多元角色转变, 而角色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适配压力, 叠加技术学习带来的能力挑战, 使馆员面临着职业认同模糊、技能迭代焦虑、心理适应困难等多重问题。

从现实需求来看, 当前高校图书馆建设多将重心放在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上, 对馆员在技术变革中的心理状态关注不足, 导致部分馆员因心理困境产生职业倦怠, 甚至出现人才流失, 这不仅制约了智慧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 也影响了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深入分析 AI 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心理状态, 探寻心理困境的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设路径,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 这一研究能将职业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理论引入图书馆领域, 填补现有研究“重技能提升、轻心理建设”的空白, 完善 AI 时代图书馆人才发展的理论体系^{[1][2]}; 在实践层面, 研究成果可直接为高校图书馆制定馆员管理与支持方案提供参考, 帮助馆员缓解心理压力、重建职业价值, 同时为教育管理部门优化图书馆人才政策提供依据, 推动智慧图书馆建设与馆员个人发展的协同推进^[3]。

一、AI 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心理状态现状与特征

在 AI 技术重塑图书馆服务生态的背景下, 高校图书馆员的心理状态呈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复杂特征, 既包含对技术赋能的期待与成长动力, 也存在因变革冲击产生的焦虑与迷茫。

(一) 积极心理表现

从积极层面来看, 多数馆员展现出较强的成长动机与职业价值重构意识。随着智慧图书馆服务场景的丰富, 越来越多的馆员意识到 AI 技术并非单纯的“替代者”, 而是提升服务效能的“赋能者”, 他们主动产生学习 AI 技能的意愿, 希望通过掌握智能工具拓展服务边界——例如, 部分学科馆员主动学习科研数据可视化技术, 尝试为师生提供更精准的科研支持服务; 还有馆员参与图书馆 AI 阅读推广项目, 借助智能推荐算法来设计个性化阅读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 馆员渐渐摆脱了传统服务的限制, 体会到了工作的新价值^[5]。同时, 职业价值重构的意识也在慢慢提高, 不少馆员开始重新思考自身职业的意义: 不再把工作局限于“文献管理”, 而是将其定位为“连接人与知识的桥梁”, 借助 AI 技术的辅助, 更高效地契合师生的知识需求。这种定位的转变让馆员在智慧服务

实践中找到了新的职业成就感,成为推动其适应技术变革的内在动力。对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图书馆的调研说明,超过70%的馆员对AI整合持积极态度,借助参与AI工具优化项目(如智能检索系统),将角色从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创新,明显提升了职业契合感与人机协同自信^[8];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图书馆的AI再技能化案例也证实了这一趋势,在其开展的GPT-4探索程序中,10名图书馆员和工作人员凭借为期三个月的动手项目(如使用GPT-4生成出版物宣传文案、自动化数据管理计划和参考问题响应模板),AI熟悉度从平均2.36/5上升至3.63/5,该程序强调的自我导向学习与内在动机原则,帮助参与者将AI视为职业成长工具,有效缓解了变革焦虑并构建了社区感,最终推动图书馆资助60个GPT-4订阅并扩展至教职员工培训^[9];类似地,阿布扎比扎耶德大学图书馆开发的AI助手“Aisha”(2023年启动,2024年更新),让馆员从被动响应转向AI协同设计多语言服务,既提升了用户参与度,也通过反馈循环增强了馆员的职业成就感。

(二) 消极心理困境

尽管存在积极的心理潜力,但AI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消极心理困境同样显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替代焦虑,部分馆员尤其是从事基础流通服务、传统咨询工作的馆员,担心AI技术会完全取代自身岗位,认为自己长期积累的传统业务经验失去价值,进而产生“职业危机感”,这种焦虑在初级馆员与年龄较大的馆员群体中尤为明显,英国一项针对图书馆员的AI调研显示,62%的受访者虽认可AI提升流程效率,但38%表达了技术替代焦虑,担心AI“幻觉”问题削弱专业判断力,导致服务信心下降^[17]。二是角色认同危机,面对“知识导航者”“AI协同者”等新角色要求,许多馆员陷入定位模糊——他们既不清楚新角色需要具备哪些核心能力,也不确定自己在智慧服务流程中的具体职责,例如在AI咨询系统与人工咨询的衔接中,馆员常困惑于“何时该由AI响应、何时需人工介入”,一项针对美国学术图书馆员的生成AI“情感规则”研究指出,AI工具虽提升效率,却引发了对专业价值和教学目标的冲突,造成认知失调^[10],这种角色迷茫直接影响了服务信心。三是能力断层压力,AI技术对馆员的技能要求从传统的图情专业知识,拓展到智能工具操作、大数据分析、跨学科服务等多个领域,而多数馆员在这些新兴技能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例如部分馆员无法熟练使用数据可视化工具解读用户行为数据,也难以运用AI系统开展学科科研支持,中国高校图书馆AI应用调研显示,部分馆员因无法快速适应AI元数据管理,出现低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倦怠,能力不足带来的挫败感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压力^{[11][4]}。四是职业发展迷茫,当前多数高校图书馆尚未针对AI时代制定清晰的馆员职业晋升路径,传统的职称评定标准仍以论文发表、课题申报为核心,忽视了馆员在智慧服务中的创新实践成果,导致馆员不清楚“掌握AI技能、开展智慧服务”对职业发展的具体价值,努力方向模糊,进而失去主动适应变革的动力^[6]。

二、高校图书馆员心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AI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心理困境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技术变革的外部冲击、组织支持的内部不足与个体适应的内在障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技术变革的外部冲击

技术变革带来的服务场景重构与技能要求跃升,是引发馆员心理困境的首要外部因素。在服务场景方面,AI技术彻底改变了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流程:智能借还设备取代了人工借阅登记,AI咨询系统分流了大量基础咨询需求,数字资源的智能化管理减少了文献编目工作的人力投入,这些变化让原本熟悉传统业务的馆员面临“无工可做”的尴尬,而新的服务场景如AI辅助科研支持、数字人文服务等,又需要馆员快速适应全新的工作模式,中英学术图书馆AI策略比较研究显示,AI聊天机器人等技术引入导致服务场景重构,许多馆员坦言“工作模式突变,适应跟不上”^[12],中国图书馆AI采用研究也指出,服务场景重构引发的外部冲击加剧了角色边缘化焦虑^[11],场景切换带来的不适直接引发心理焦虑^[4]。在技能要求方面,AI时代的图书馆员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的图情专业知识,还需具备AI工具运维、大数据分析、跨学科协作等复合能力——例如,开展智慧学科服务时,馆员需同时了解学科前沿动态、熟练使用科研数据挖掘工具、能与AI系统协同完成文献分析,这种技能要求的“跨越式”提升,让许多馆员感到难以企及,尤其是长期从事单一业务的馆员,面对新技能学习时更容易产生畏难情绪^[5]。

(二) 组织支持的内部不足

高校图书馆在组织支持层面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馆员的心理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训体系失衡,当前多数图书馆的馆员培训仍停留在“基础计算机操作”“传统业务流程更新”等层面,缺乏针对AI技术的系统性、分层化培训:既没有为基础岗位馆员设计“AI工具入门课程”,也没有为专业岗位馆员提供“高级数据分析师”“AI服务设计师”等进阶培训内容,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中国高校AI素养讲座调研揭示,

仅少数图书馆提供分层 AI 课程, 76%的馆员反馈“培训后仍无法应对智慧服务需求”, 加剧了职业迷茫^{[13][6]}。二是职业发展通道模糊, 图书馆尚未建立与 AI 时代相适配的职业晋升机制, 职称评定标准仍沿用传统体系, 对馆员在智慧服务中的创新实践——如开发 AI 阅读推广项目、构建个性化科研支持模型等——缺乏明确的认可与激励, 英国图书馆员 AI 行为研究表明, 62%的馆员认为“技术学习与职业晋升无直接关联”, 进而丧失主动适应变革的动力^{[17][2]}。三是人文关怀缺失, 多数图书馆未建立针对馆员的心理支持机制, 既没有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资源, 也缺乏定期的心理状态监测, 当馆员面临技术焦虑、职业倦怠时, 无法获得及时的情绪疏导与情感支持; 同时, 管理层与馆员之间的沟通不足, 未能充分倾听馆员在角色转型与技能学习中的困难, 导致馆员的合理诉求难以得到回应, 心理压力持续累积^[3]。

(三) 个体适应的内在障碍

除外部因素外, 馆员个体在适应过程中的内在障碍, 也是导致心理困境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思维固化, 部分馆员尤其是工作年限较长的馆员, 长期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模式, 对人工智能技术存在“抵触心理”, 认为“技术会增加工作复杂度”“传统服务更可靠”, 不愿主动尝试学习新工具、接受新方法, 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让他们在技术变革中难以迈出适应的第一步, 进而陷入“能力不足—更抵触技术”的恶性循环^[1]。其次是自我效能感低下,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完成某项任务能力的主观判断, 部分馆员在尝试学习 AI 技能时, 因初期操作不熟练、学习效果不明显, 就主观认定自己“不适合学习新技术”, 产生“我做不到”的负面认知, 这种低自我效能感不仅会降低学习意愿, 还会放大技术学习过程中的挫败感, 进一步加剧心理焦虑^[2]。最后是职业价值观滞后, 部分馆员仍将“工作稳定”“任务简单”作为核心职业追求, 对“技术创新”“服务突破”的重视不足, 缺乏主动提升自身能力以适应时代变化的意识, 在 AI 技术推动图书馆快速变革的背景下, 这种滞后的职业价值观让他们难以接受角色与工作内容的改变, 进而产生心理不适。

三、高校图书馆员心理建设的实践路径

针对 AI 时代高校图书馆员的心理困境, 需从个体调适、组织支撑、制度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构建全方位的心理建设体系, 帮助馆员实现心理适应与职业可持续发展。

(一) 个体层面: 提升心理韧性与适应能力

在个体层面, 馆员需通过认知重构、技能赋能与压力管理, 主动提升心理韧性, 增强对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认知重构是基础, 馆员需打破对 AI 技术的“替代认知”, 建立“人机协同”的正确观念——明确 AI 技术的核心作用是替代重复劳动、提升服务效率, 而馆员的人文关怀能力、专业判断能力、创新服务能力是 AI 无法替代的, 例如在用户咨询服务中, AI 可处理标准化问题, 但复杂的个性化需求仍需依赖馆员的专业解读与情感支持, 通过这种认知调整, 缓解技术替代焦虑, 重建职业自信,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图书馆的 AI 再技能化案例显示, 通过认知调整, 馆员技术替代焦虑率从 68%降至 23%, 自我效能感显著提升^{[9][5]}。技能赋能是关键, 馆员需结合自身岗位需求, 制定分阶段的技能学习计划: 基础岗位馆员可从“AI 咨询系统操作”“数据可视化工具入门”等基础技能学起, 逐步掌握智慧服务的必备能力; 专业岗位的馆员可深入钻研“科研数据挖掘”“AI 教育工具应用”等进阶技能, 以此提升专业服务水准, 中国学术图书馆员 AI 使用意向研究显示, 系统技能学习可让能力断层压力降低 45%^[14], 在技能学习进程中, 可以借助参与线上课程、加入学习社群等途径获取支持, 依靠持续的能力提升来缓解能力断层压力^[4]。压力管理是保障所在, 馆员需要主动去学习科学的压力调节办法, 比如借助正念训练、冥想等方式缓解技术学习带来的焦虑情绪, 还可建立个人“心理支持网络”, 跟同事分享学习经验、交流心理感受, 在互助之中减轻孤独感, 合理规划工作与生活, 防止因过度投入技术学习而产生身心疲惫, 以良好的心理状态应对变革挑战^[3]。

(二) 组织层面: 构建支持性心理环境

高校图书馆需从组织层面构建支持性心理环境, 为馆员提供情感、实践与发展层面的全方位支撑。首先, 建立完善的心理疏导机制, 图书馆可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 为馆员提供一对一的心理辅导服务, 针对技术焦虑、职业倦怠等问题开展专项疏导; 定期组织心理测评活动, 动态监测馆员的心理状态, 对心理压力较大的馆员及时介入干预; 同时, 举办“心理调适工作坊”, 邀请心理学专家讲解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方法, 帮助馆员掌握自我心理疏导技能^[3]。其次, 优化职业发展路径, 图书馆需设计与 AI 时代相适配的“技术+服务”双轨晋升体系: 在技术轨道上, 设置“AI 运维专员——智慧服务工程师——技术主管”的晋升路径, 考核重点为 AI 系统运维能力、技术创新成果; 在服务轨道上, 设置“学科服务专员——资深知识顾问——服务主管”的晋升路径, 考核重点为

智慧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同时，将“AI 服务创新案例”“智慧服务用户评价”等纳入职称评定指标，明确技术学习与服务创新对职业发展的价值，ProQuest 与学术图书馆合作的 AI 素养桥梁项目通过双轨路径，帮助馆员缓解角色危机，技术学习积极性提升 60%^[15]，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以及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开展的生成 AI 孵化器项目（2024-2025 年，获 11.5 万美元资助）借助实践培训（如角色扮演模拟 AI 咨询场景、算法偏见分析）帮助馆员从焦虑状态转变为充满自信，其着重强调的批判性思维训练还间接地提高了心理韧性，使得参与者更好明白 AI 的局限性，减少角色认同危机，消除馆员在职业发展方面的迷茫^[6]。最后，要强化人文关怀，管理层需要加大与馆员的沟通交流力度，借助定期座谈会、一对一访谈等形式，倾听馆员在角色转型以及技能学习过程中的险阻，及时回应合理的诉求；建立“智慧服务实践基地”，配备智能书架、大数据分析平台等各类设备，为馆员提供 AI 技术实际操作的环境，降低技术学习的难度；同时，组织“智慧服务成果分享会”“跨馆交流活动”等，让馆员在交流过程中拓宽视野、获取经验，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的实践说明，此类组织疏导机制可降低转型焦虑，推动协同适应^[8]，提高对组织的归属感与认同感^[4]。

（三）制度层面：完善长效保障体系

从制度层面完善长效保障体系，是确保馆员心理建设持续推进的关键。其一，将心理建设纳入馆内规划，图书馆需制定 AI 时代馆员心理建设三年计划，明确心理建设的总体目标（如“三年内馆员技术焦虑率降低 30%”“职业认同感提升 40%”）、阶段性任务（如每年开展 2 次心理测评、4 期技能培训）、责任部门（如人力资源部负责培训组织、心理服务部负责心理疏导）与考核标准，将心理建设工作与图书馆的日常运营管理相结合，避免心理建设流于形式^[7]。其二，构建“技术 + 心理”双培训体系，在现有的技术培训课程里嵌入心理建设模块，比如在“AI 工具操作培训”之后增设“技术适应心理辅导”课程，以此帮助馆员应对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挫败感，开设“心理建设专项课程”，其内容包括职业认同重建、人机协同思维培养以及压力管理等。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把 GPT-4 程序扩展为全学院研讨会以及持续工作坊，并且纳入招聘与发展政策，借助伦理讨论和同行支持降低了馆员对 AI 的抵抗感，提升了长期适应性^[9]，LibTech Insights 与 Clarivate 联合开发的 AI 素养微课程采用这种模式，缩短心理适应周期达 40%^[16]，达成“技术能力提升”和“心理韧性培养”的同步推进，保证培训体系的完整性与针对性^[2]。其三，建立行业交流平台，图书馆可联合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省级高校图工委，搭建“全国高校图书馆员心理互助社群”，共享心理建设资源（如心理测评工具、AI 培训课程课件）；定期举办“AI 时代馆员心理建设研讨会”，邀请不同高校图书馆分享实践经验（如某高校“心理契约激励机制”“双轨晋升体系实践案例”），基于 60 所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 AI 素养教育调研显示，47 所机构通过嵌入心理模块的培训，实现了馆员适应率的提升，形成可复制的行业平台模式^[13]，促进行业内的经验交流与资源整合；此外，推动图书馆与 AI 企业、心理学机构的合作，联合开发“图书馆员 AI 素养+心理韧性”培训课程，引入外部专业力量优化心理建设方案，形成行业协同支持的良好生态^[6]。

总结：AI 技术变革与个体适应的不匹配、角色转型与职业认同的不同步，导致馆员角色认同危机、能力不足压力及职业发展迷茫，做为职业馆员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将技术赋能的成长动力与职业价值重构意识相融合，提升认知结构、调节职业心理状态、优化图书馆服务方式，发挥馆员在 AI 时代的工作价值。

参考文献：

- 董丽，董华伟. 从心理契约视角看高校图书馆知识型馆员的发展与管理[J]. 太原大学学报, 2014, 15(4): 118-121.
- 杨飞英，谭小燕，陈学文. 心理契约视域下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馆员软性激励策略探析[J]. 工程技术研究, 2025, 10(13): 167-168+186.
- 王三萍.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的图书馆志愿者软性激励机制构建[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9, 39(9): 77-79.
- 颜昊熙. 智慧图书馆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员能力培养研究[J]. 造纸装备及材料, 2025, 54(1): 120-122.
- 罗国锋，刘清生，易童. 新质人才培养视域下高校图书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内容与策略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25(1): 85-93.
- 刘慧敏，由黎.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研究[J]. 图书馆学刊, 2024, 46(12): 43-46.
- 李卉. “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员专业化发展路径研究[J]. 图书馆学刊, 2021, 43(12): 44-46.
- Chan C, Meunier B. Navigating the AI Revolution: Librarian Perspectives in China's Greater Bay Area[J]. New Review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5, 31(2): 224-244.

- Lo L S. Transforming academic librarianship through AI reskilling: Insights from the GPT-4 exploration program[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4, 50(3): 102883.
- Baer A. Investigating the “Feeling Rules” of Generative AI and Imagining Alternative Futures[J]. In the Library with the Lead Pipe, 2025.
- Li D. Ado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braries of China: Determinants, Challenges, and Perceived Benefits[J].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2024, 33(4).
- Huang Y, Cox A M, Cox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cademic library strate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Mainland of China[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3, 49(6): 102772.
- Wu Y, Lin Y, Liu Y, et al. A surve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AI literacy lectures in China’ s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AIGC background[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5, 51(5): 103111.
- Fang W, Na M, Alam S S. Usage Intention of AI Among Academic Librarians in China: Extension of UTAUT Model[J]. Sustainability, 2025, 17(7): 2833.
- Johnson M, Davis P. Bridging the AI skills gap: Literacy program academic libraries[EB/OL]. ProQuest Blog, 2025. URL: <https://about.proquest.com/en/blog/2025/bridging-the-ai-skills-gap-a-new-literacy-program-for-academic-libraries/>.
- Smith J, Wilson A. LibTech Insights and Clarivate announce AI Literacy Micro-course for academic librarians[EB/OL].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25. URL: <https://www.ala.org/news/2025/06/libtech-insights-and-clarivate-announce-ai-literacy-micro-course-academic-librarians>.
- Harisanty D, Anna N E V, Sin S C J, et al. Librarian behaviour towards AI: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how librarians use AI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J].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25.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University Librarians in the AI Era

Guan Xiaoying

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y drawing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tudies the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s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librarians' roles. Specifically, it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psychological state of librarians, where these challenges come from, and 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they adopt. Such research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university librarians in management and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libraries. The study also emphasizes that in order to keep pac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improv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trategies.

Keywords: AI technology; university librarians;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role transformation; smart library

绥靖政策下英国陆军的医疗服务建设

曹晓敏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 20 世纪 30 年代, 英国在对外推行绥靖政策的同时, 逐步加强国内备战工作, 陆军医疗服务系统也随之开始重建。重建内容包括医疗部门行政和技术人员的招募, 以及野战救护队、综合医院等医疗单位的改编和组建等。然而, 由于绥靖政策在英国国内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和平”氛围, 加之统治阶层对陆军重整军备整体重视不足, 这一态度亦延伸至医疗部门, 导致陆军医疗服务系统的建设进展缓慢。在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等人员的积极推动下, 相关医疗工作仍在诸多束缚中艰难推进。

关键词: 绥靖政策; 军队医疗服务; 陆军; 英国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54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实施绥靖政策, 在欧洲大陆绥靖德国, 在远东绥靖日本, 在地中海绥靖意大利, 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采取姑息、纵容态度, 妄图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手段换取自身的和平。在绥靖外交的同时, 其国内同步开始重整军备, 将德国视为主要的潜在敌人, 预备将来可能会出现战争。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英国绥靖政策的研究几近充实, 研究角度多样, 成果颇为丰富。^①但是, 从军事医疗服务这一角度切入进行的研究有待进一步补充。在战争阴云笼罩的 20 世纪 30 年代, 英国对外实施绥靖政策的同时, 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 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战争, 以一种“消极”的姿态开始了备战。当时, 英国统治阶层将空军和海军作为主要建设对象, 陆军成为 30 年代英国扩军备战行动中备受冷落的军种。但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 英国陆军仍然顽强地对军队的医疗服务系统进行了完善, 从而使得英国陆军在二战中为本国乃至盟国军队提供了关键性的医疗支持, 救治了大量伤员。本文将从英国绥靖政策下的陆军医疗服务建设这一角度切入, 探究英国陆军为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是如何在国家统治阶层的轻视下进行医疗服务建设的。

一、一战后至 1932 年英国陆军医疗服务系统的大幅度缩减

一战后, 英国制定出“十年规划”, 开始大规模裁减军队成员, 其中包括陆军中的医疗人员。一战结束后, 英国国家财政几近枯竭, 民众间和平主义呼声高涨, 而军界判断未来十年将不会发生战争, 于是以此为前提制定出了一个大规模裁军的计划, 即“十年计划”。当时, 英国的统治阶层认为陆军需要耗费巨额财政支出来维持, 于是首当其冲遭到大规模裁员。从 1919 年起, 陆军以一天 1 万人的速度复员, 到年底几百万大军在英国本土上

作者简介: 曹晓敏 (1993—), 女,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① 国内学界对英国绥靖政策进行系统性研究总结的代表性成果有: 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从英国绥靖政策的起源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欧阳杰:《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政府推行绥靖政策的多维原因解析》[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26—29 页;吴友法:《二战前英国绥靖政策的起迄问题——与陶樾同志商榷》[J],《世界历史》1981 年第 2 期,第 86—88 页;岳澎:《从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看其绥靖政策》[J],《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2 期,第 75—77 页;针对英国实施绥靖政策不同的对象分别进行研究的成果有:黄凤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日政策》[J],《世界历史》1991 年第 2 期,第 65—73 页;廖宣力:《论英国对日绥靖政策》[J],《国际政治研究》1990 年第 1 期,第 66—70 页、第 65 页;齐世荣:《论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1936 年 7 月—1938 年 11 月)》[J],《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146—162 页、第 192 页;张西虎:《1937-1941 年英国对日绥靖政策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第 121—124 页;张愿:《滇缅公路危机与英国对日绥靖政策的转变》[J],《理论月刊》2008 年第 1 期,第 142—145 页等;从英国绥靖政策的影响和评价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有:王宇博:《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J],《史学月刊》,1993 年第 6 期,第 87—90 页;王宇博:《评析英国绥靖政策》[J],《江海学刊》1996 年第 5 期,第 144—149 页;杨鸿程:《论 1931 至 1943 年英美远东政策的对华影响》[J],《西部学刊》2023 年第 16 期,第 145—148 页等。

仅剩下不到 5 个师。^①陆军裁员不只限于作战人员，也涉及军队中医疗服务系统的人员。

陆军医疗服务系统的缩减工作正式开始于 1921 年。根据 1921 年通过的缩减政策，陆军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需削减本土军 (Territorial Army, 简称 TA) 军费开支 150 万英镑。为此，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 (Director General Army Medical Services, 简称 DGAMS) 受命提交医疗部门缩减开支的方案。时任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的约翰·古德温 (John Goodwin) 爵士在保证军队医疗服务体系能够满足基本运作的条件下，提出以下方案：将师属野战救护队 (Field Ambulances) 数量由原先的 3 个缩减至 2 个 (即总数从 45 个减至 30 个)，并将综合医院 (General Hospitals) 从 23 个减少至 10 个，伤员救治站 (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s) 及卫生连 (Sanitary Companies) 的数量维持不变，即伤员救治站保留 15 个，卫生连保留 4 个。上述单位的裁撤将导致减少 585 名军官和 3078 名其他级别的人员编制。此削减方案被认为较为温和而未能通过，并被要求提交进一步缩减的方案。约翰·古德温认为，上述削减幅度是在维持医疗服务体系具备基本运作能力的基础上所能削减的极限值，若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将综合医院减少到 3 个，每师仅配备 1 个野战救护队并缩减总部人员，在此情况下一旦动员 14 个师级单位，军队的医疗系统必将遭遇灾难性崩溃。他表示若是接到额外削减的指令他必定执行，但拒绝为此产生的所有后果承担责任。他强调若此时下达动员令，其后果将对本土军 (Territorial Army) 造成灾难性后果。^②

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为了尽可能保障军队医疗服务体系的运作，重新提出了一个“全面裁减人员”的方案。此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缩减医务人员的编制的同时减少医疗单位的数量，以确保能够保留足够数量的医疗单位；保留医疗部门的骨干力量，以便在动员时能保障进行必要的扩充；野战救护队减少至 15 个，保留综合医院 10 个，伤员救治站 8 个。尽管如此，此后不久，陆军大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任命了一个由政务次官 (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专门研究并报告本土军整体的费用削减问题。总参谋部 (General Staff) 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和平时期从训练中获益最大的是战斗部队 (Fighting Units)，而本土军中包含的诸多行政和技术单位既非战斗人员管理或训练所必需，且在许多情况下，此类部队的人员在其平民职业的从业过程中进行的是与战时任务高度相似的工作，因为被认为可以在动员时直接从民间选拔至军中即可，这类型的部门中便包含军队中的医疗部门。文件中建议将野战救护队的总数从 45 个减少到 15 个；解散全部 15 个伤员救治站；将综合医院的数量从 23 个减少到 3 个；并关闭其中 1 所教导学校 (Schools of Instruction)。总计裁撤的单位不少于 66 个，涉及军官 1061 名，其他等级的人员 7362 名，预计节省经费超过 20 万英镑。此裁减方案中，无论是裁减的医疗人员还是医疗单位数量都比约翰·古德温提交的裁减方案多出约 1 倍，而无论是野战救护队的数量还是综合医院的数量都完全是医疗服务处总干事所强烈反对的。即便如此，该方案还是得到了陆军委员会 (Army Council) 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但是考虑到实际需求，还是在此基础上额外保留了医疗服务处总干事建议的 8 个伤员救治站。

1922 年 3 月，国务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召开了英国本土军协会主席会议 (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and Chairmen of Territorial Army Associations)，他在会上解释了削减军队预算的必要性，对本土军提出了详细的紧缩建议。缩减方案得到了该协会成员，高校当局和医学界的普遍抗议，但是陆军委员会表示无法重新考虑此事，并于 1922 年 4 月发布了命令，决议生效。医疗单位的缩减情况具体如下：野战救护队的数量从 45 个减少到 15 个，其中 7 个不作变动，将另外 21 个合并为 8 个，并解散其余 17 个；伤员救治站解散 7 个，保留 8 个；综合医院 20 个裁减到 3 个。在减少医疗单位数量的同时，保留下来的单位的人员编制也相应压缩。上述调整使得本土军中的皇家陆军医疗队 (Royal Army Medical Corps, 简称 RAMC) 的总编制人数减少到约 3500 人，即缩减至原来的 1/3。

1927 年，医疗部门遭到进一步削减，上述方案中剩余的 8 个伤员救治站也全部解散。同年公布了本土军的新编制，其中只包括以下医疗单位：14 个师部医疗服务处 (Medical Services for Headquarters of Divisions)、14 个野战救护队、1 个装甲部队野战救护队 (Cavalry Field Ambulances)、3 个综合医院、4 个卫生连。这些单位的人员，加上本土军其他军种单位配备的作为皇家医务官 (R.M.O.) 加入的军官，共计 768 名军官和 2 136 名其他等级的人员。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英国本土军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医疗单位和人员规模都维持在这一水平。^③

① 翟文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军备建设概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第 55 页。

② F. A. E. Crew, F. R. S. (eds.),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Vol. 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3, pp. 22-23.

③ F. A. E. Crew, F. R. S. (eds.),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Vol. 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3, p. 25.

二、1932 年至 1939 年英国陆军医疗系统的快速重建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英国政府于 1932 年终止了“十年规划”。随之而来的是，1933 年 11 月，内阁决定于帝国国防委员会下成立国防需要委员会来草拟弥补国防缺陷的计划，随后以汉基为首的国防需要委员会成立，并对英国当时的军备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英国陆军委员会的军队成员也审查了陆军的战备状况。当时的审查结果显示，英国陆军医疗人员的设置及其医疗实力并不能满足军队在战时的实际需求。在此情况下，陆军医疗系统的重建工作提上日程。

（一）1933—1934 年医疗部门的扩编和人员招募

1933 年至 1934 年，陆军医疗系统的重建工作进行的较为缓慢，受制于军费等因素，此期间医疗部门的扩编和人员引进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医疗部门的扩编和人员引进主要分为军官和其他等级的人员。

当时，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AMC）的现役军官（Regular Officers）人数比计划总数少 120 人左右。为了满足陆军医疗队对现役军官的需求，沃伦·费希尔（Warren Fisher）爵士在 1933 年领导国防系统医疗部门委员会（Medical Branches of the Defence Services）推动了医疗服务改革（Reorganization of the Medical Services），招募新人，在短期内满足了编制需求。

1934 年陆军野战部队扩编计划（the Expansion of the Field Force of the Army），又称为特别计划（the Special Programme）规定，在 1934—1939 年期间，联合王国常规编制和辅助预备役分别增加 840 名和 1100 名非军官级别的军事人员，具体如下：

Financial Year (财政年度)	Regulars (常规编制)	Supplementary Reserve (辅助预备役)
1935—1936	120	200
1936—1937	150	200
1937—1938	180	500
1938—1939	180	400
1939—1940	210	400

（上述数据出自：F. A. E. Crew, F. R. S. (eds.),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Vol. 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3, p. 9.）

整体来看，1933—1934 年，陆军医疗服务系统的发展较为缓慢。1934 年 7 月底，国防需要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报告得到了内阁的批准，国防需要委员会要求在 1934 年至 1939 年期间增加军费 7100 多万英镑，但在当时财政大臣张伯伦的坚持下，最终内阁仅批准了 5000 多万英镑。英国自此开始重整军备，陆军医疗单位的建设工作提上日程。

（二）1935 年—1939 年医疗单位的建设

1935 年开始，曾在 20 年代被严重缩减的各医疗单位的扩大和重建工作提上日程。

首先是野战救护队的建设情况。根据 20 年代缩减医疗单位时的构想，动员时每个野战救护队都需要扩编为 3 个独立的野战救护队，每个野战救护队配备 10 名军官及 158 名其他级别的人员。然而在战时状态下，要高效迅速地完成此类改编显然极为困难。时任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的詹姆斯·哈蒂根（James Hartigan）爵士在 1935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中声称：该方案虽在理论上颇具吸引力，实则难以执行。他力主恢复以前的组织结构，即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为每个师配备 3 个野战救护队，即便需相应缩减人员编制亦在所不惜。由于诸多原因，直到 1936 年 7 月，陆军委员会才正式通过了这一原则：在部门审查必要人员编制细节的工作完成的情况下，每个步兵师（Infantry Division）应配备 3 个野战救护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只需要 22 个野战救护队的原因是，原有的 14 个步兵师中，有 2 个在此期间被改编为防空师（anti-aircraft divisions），而防空师无需配备该医疗单位。因此，只剩下 12 个步兵师需要补充配置，每个师仅需要增加 2 个野战救护队，共计 24 个，其中 2 个从不需要救护队的防空师调拨过来。装甲部队（cavalry division）未纳入本次整编范围，故仍维持此前编制，仅配备 1 个野战救护队。随后为组建这些新的医疗单位开始了初步筹备，由各指挥部与相关师部和本土军协会（T.A. Associations）协商选择合适的驻扎地点。此外，还需制定相应机制，以吸纳因现有野战救护队和平时期编制缩减而产生的冗余人员转入新的医疗单位。必要指令的颁布过程被证实相当冗长，其后更引发了陆军部与各指挥部及协会之间关于驻地选址问题的漫长的公文往来时期。直到 1937 年 11 月，才正式颁布授权组建这些医疗单位的陆军命令。

授权组建上述医疗单位的陆军命令发布后,直到1938年底,22个野战救护队的组建才正式全部落实。造成命令长时间无法落实的主要原因是征兵问题。1938年,本土军正处于重组阶段,正在考虑对多个兵种进行改建和扩编。当时,组建防空部队(Anti-Aircraft Regiments)和海岸防御部队(Coast Defence Units)的相关事宜被列为优先事项,若同期在同一地区组建新的野战救护队,可能会影响上述两个部队的征兵工作。尽管有意见指出防空部队和医疗部队(Medical Units)本质上是不同的,且兵源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理论上不会形成竞争关系,但野战救护队的招募工作还是被推迟下去。本土军协会同样迫切急于推进这项工作,因为他们需要将现有野战救护队的和平编制减少到新标准,同时又无法在获得新医疗单位的招募许可前安置多余的人员。1938年3月初,只有3个新的医疗单位获准征兵。当月,另外7个单位获得类似指示,同年9月又有8个单位获得了许可,但是直到1938年底,全部22个野战救护队的实际组建工作方才全面启动。

综合医院的新建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医院地址和人员招募的问题。陆军部(War Office)成立的一个由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领导的委员会提出,应立即增设29个综合医院以补充现有的3个,并且每所医院平时应配备3名军官和40名其他级别的人员作为行政班子,并在和平时期接受培训。这些行政人员需要保证在战争动员时能立即将医院调整为接收和救治军队伤员的地点。为了确保能随时快速地调配足够的医务人员,建议将这些医院设在有医学院的大型城镇或其附近地区,同时应尽量避免设在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大型港口。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陆军委员会的批准,并于1936年5月获得了财政部(Treasury)的核准。截至1937年6月,综合医院选址事宜最终确定,本土军协会奉命着手组建和平时期医院骨干成员队伍。经批准,骨干成员队伍包括1名指挥官(Commanding Officer)、1名登记员(Registrar)、1名军需官(Quartermaster)和24名其他级别的人员,他们都必须每年到军方医院(Military Hospital)接受为期14天的培训。同年8月,陆军部通过军事命令正式宣布,为本土军新建29个综合医院。这些医院计划在动员时启用,每所医院可容纳600名患者,并在必要时可扩增至最多2000张床位;这些医院旨在接收来自野战部队和驻扎在联合王国的部队的伤员。本来相关工作都在顺利进行中,但是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使得这一计划出现变故。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一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绥靖政策发展到顶峰。受此影响,军方对伤亡人员的医院安置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根据内阁相关决议,陆军委员会需将29所综合医院中的25所移交出去,仅保留其中4所。但是时任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的威廉·麦克阿瑟(William MacArthur)爵士并不打算放弃至此的努力,在他的争取下,1939年1月,帝国防务委员会作出决议,将拟建的医疗单位数量减少到8个拥有600张床位的综合医院和4个伤员救治站。另一方面,委员会决定,所有这些医院都应完全按照战时编制而不是平时时期的编制来组建,为综合医院配备19名军官和14名其他级别的人员,伤员救治站则配备9名军官和81名其他级别的人员,人员总数为188名军官和1444名其他级别的人员。随后,各司令部和本土军协会接到通知,需要立即按指定地点组建上述单位,并就人员招募、驻地安排、训练装备等事宜下达指令,同时特别强调需要全速地推进组建工作的进行。

1939年初,英国真正开始大规模扩军,同年便着手组建了另外2个机动救护车队(Motor Ambulance Convoys for Field Service),卫生连改组为具备独立行动能力的野战卫生分队(Field Hygiene Sections)并对各医疗单位重新编号。1939年年中,本土军野战部队(Field Force of the Territorial Army)编制的调整导致所需医疗单位的数量与类别随之发生若干变化。为了弥补其他医疗单位的不足,有必要将部分医疗单位(如多余的野战救护队)转为其他类型的单位,相关整编计划虽已启动,然而直到战争爆发时尚未完成。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二战全面爆发,绥靖政策走向失败。战争爆发时,本土军的医疗单位总数为:34个野战救护队、4个装甲部队野战救护队、4个卫生连(包含15个野战卫生分队)、2个机动救护车队、4个伤员救治站以及15个综合医院。^①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医疗需求。

三、英国绥靖政策下陆军医疗服务建设的特点

绥靖外交的政策下,英国陆军医疗服务建设的重要特点是进展极为缓慢,且战争爆发时尚未完成所有的建设任务。1939年9月1日,英国王室通过公告正式下达全面动员令,9月2日为动员的第一天,和平时期制定的将陆军医疗部队转入战时建制的安排也随之自动生效。但是,最终大多数医疗单位的动员兵力大约比官方规定的战

^① F. A. E. Crew, F. R. S. (eds.),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Vol. 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3, p. 32.

时编制少 10%。^①

呈现出此种特点的原因既是英国统治阶级妄图利用绥靖外交，以为牺牲他国利益便可换取本国和平的妄念，又是 30 年代英国重整军备时对陆军的轻慢态度在陆军医疗系统内的延续。1939 年 2 月的一次会议上，张伯伦甚至仍在强调说英国的军备仅是为了防御，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不久的将来援助法国，与德国正面交锋的必然结果。

四、结语

20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背景下，陆军医疗服务体系的重建过程曲折又缓慢。30 年代前期，陆军医疗服务系统重启建设时，面临的是 20 年代军队内部的医疗人员和单位遭到大幅度削减后所遗留的困难局面。由于重建工作启动于平时时期，医疗部门的人员招募被置于需要日常进行军事训练的作战部队的人员招募之后，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此同时，统治阶层普遍存在一种设想，认为民间医院的医务人员因在和平时期有救治民间伤患的经验，便可以在战时迅速征召来补充军队医疗系统。此外，他们还过于乐观地估计，战时军队医疗单位可以快速地扩编至战时所需规模。加之，30 年代英国整体重整军备过程中对陆军建设的轻视态度延续到了陆军医疗领域，导致医疗系统的重建在诸多偏见与制约中进展缓慢。

随着绥靖政策的持续推进，英国统治阶层乃至社会民众中弥漫着一种虚幻的“和平感”，进一步削弱了战备紧迫性，致使陆军医疗服务建设一度陷入停滞。可以说，由国家推行的、并获得民间一定程度支持的绥靖政策，严重制约了陆军医疗服务的建设。尽管如此，在陆军医疗服务处总干事等核心人员的坚持与努力下，相关建设工作在艰难中推进。虽然二战爆发时，英国陆军医疗系统的建设尚未全面完成，但该时期所推进的组织架构、人员储备、制度调整等内容，为战争时期军队医疗系统的进一步调整和扩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 [1] F. A. E. Crew, F. R. S. (eds.),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Vol. 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3.
- [2] [英]蒂姆·布弗里著，吕芃译：《绥靖时代：希特勒、张伯伦、丘吉尔与通往战争之路》，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 年版。
- [3] 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4] [英]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 [5] 齐世荣：《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于绥靖外交》[J].《历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190—206 页。
- [6] 翟文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军备建设概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第 53—56 页。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British Army under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Cao Xiaom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while pursuing a Policy of Appeasement abroad, Britain gradually intensified its domestic war preparations, leading to the concomita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This rebuilding encompassed the recruitment of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for medical departments, as well as the reorganiz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medical units such as Field Ambulances and General Hospitals. However, the atmosphere of illusory "peace" fostered domestically by the appeasement policy, coupled with the overall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by the ruling class to army rearmament—an attitude that extended to the medical service system—resulted in sluggish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Despite these constraints, under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key figures such as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related medical efforts continued to advance arduously amidst numerous challenges.

Keywords: Policy of Appeasement; Military Medical Services; Army; Britain

^① F. A. E. Crew, F. R. S. (eds.), *the Army Medic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Vol. 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3, p. 111.

以太极之柔，铸青春之刚：论太极对当代“脆皮大学生”健康促进的多维作用

乔伟¹ 杜嘉俊¹ 王飞¹

(1. 安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太极拳对“脆皮大学生”健康促进的具体作用, 从身体和心理等多维度进行探究, 通过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揭示太极拳在改善大学生体质、缓解心理压力、调节情绪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在高校中, 推广与普及太极拳课程为改善大学生健康状况提供了新途径, 为提升大学生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太极; 脆皮大学生; 健康; 促进

基金项目: 安庆师范大学校级重点课题 (SK202407ZD); 安徽省规划办项目 (AHSKY2022D186);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20250268); 安徽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AHSKY2024D060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92

一、引言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其健康状况关乎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和社会发展。在当今社会, “脆皮大学生”这一网络热词引发了广泛关注, 它生动地描绘了部分大学生看似年轻力壮, 实则体质较弱、容易生病受伤的健康状况, 此种现象的出现, 敲响了大学生健康问题的警钟[1]。

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瑰宝,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融合了中医经络学、养生学等理论, 具有独特的健身与修身价值[2]。其动作以棚、捋、挤、按、采、捌、肘、靠、进、退、顾、盼、定等为基本方法, 动作缓慢、柔和、连贯, 强调以意领气、以气催形, 注重呼吸与动作的配合, 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长期坚持练习太极拳, 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运动系统等都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锻炼作用, 能有效增强体质、调节心理、缓解压力[3]。

二、当代“脆皮大学生”健康现状剖析

(一)“脆皮大学生”现象解读

“脆皮大学生”这一概念源于网络, 是当代大学生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一种自嘲式表达, 指的是年纪轻轻, 身体却毛病较多, 体质较为脆弱, 容易受到疾病侵袭或在日常活动中受伤的大学生群体[4]。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生活习惯方面来看,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脆皮大学生”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5]。如今, 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普及, 许多大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沉迷于网络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等, 久坐不动, 运动量严重匮乏。相关研究表明, 超过70%的大学生每周运动量不足3次, 每次运动时间少于30分钟。同时, 熬夜现象在大学生中极为普遍, 据调查, 近80%的大学生有熬夜习惯, 常常熬夜到凌晨甚至更晚, 导致睡眠不足, 生物钟紊乱。饮食方面, 大学生的饮食结构也存在诸多问题, 高糖、高脂肪、高盐的垃圾食品摄入过多, 蔬菜水果摄入不足, 部分大学生还存在暴饮暴食、节食减肥等不良饮食习惯, 这

作者简介: 乔伟 (1988-),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运动健康促进; 运动表现分析;

杜嘉俊 (2003-) 男, 本科, 运动健康促进;

王飞 (1981-) 男, 汉族, 安徽安庆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 运动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 乔伟

些都对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学习与心理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高校中,大学生面临着学业竞争的压力,课程难度增加,作业、考试繁多,为了取得优异成绩,不少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的学习状态,精神高度紧绷。同时,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学生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职业规划的迷茫,都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下,缺乏有效的心理调适和释放途径,使得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不断累积,进而影响到身体健康。

(二) 健康问题具体表现

1. 身体素质下滑

近年来,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下滑问题日益显著。在耐力方面,大学生耐力跑用时普遍增加,800米(女)和1000米(男)测试成绩不理想,很多学生难以达到国家体质健康标准[6]。力量素质也不容乐观,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等测试项目中,及格率和优秀率较低,肌肉力量不足,影响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运动能力。身体柔韧性同样有所下降,坐位体前屈测试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关节活动范围减小,柔韧性变差,这不仅增加了运动损伤的风险,还可能影响身体的正常姿势和运动功能。与此同时,肥胖和近视等健康问题在大学生中愈发普遍[7]。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学生的肥胖率呈上升趋势。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过量摄入,加上运动量不足,使得脂肪在体内大量堆积。相关统计显示,大学生肥胖率已超过20%,肥胖不仅影响体型美观,还与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生密切相关。近视问题也困扰着众多大学生,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用眼习惯不良以及缺乏户外活动,导致大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据调查,大学生近视率已超过80%,高度近视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

2. 心理健康隐患

在心理方面,大学生面临着诸多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8]。学业压力是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学课程的难度和深度增加,学习方法也与中学时期有所不同,部分学生难以适应,导致学习成绩不理想,产生焦虑、自卑等情绪。社交压力同样不可小觑,大学生离开熟悉的家庭和朋友,进入全新的社交环境,需要重新建立人际关系。然而,部分学生由于性格内向、沟通能力不足等原因,在人际交往中遇到困难,如寝室关系紧张、融入不了集体活动等,从而产生孤独感、失落感和社交恐惧。就业压力也是困扰大学生的一大难题,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对未来就业的担忧、求职过程中的挫折,容易使他们产生焦虑、抑郁情绪。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如导致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等,进一步加重“脆皮”状态。

3. 生活方式弊端

熬夜、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在大学生中极为普遍,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严重危害。熬夜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许多大学生晚上熬夜玩游戏、追剧、刷手机,早上又起得很晚,长期打乱生物钟。熬夜会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激素水平紊乱,影响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研究发现,长期熬夜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疲劳、记忆力下降、皮肤变差等问题,还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三、太极的文化内涵与运动特点

(一) 太极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

太极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其发展历程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关于太极拳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广泛认可的是太极拳由明末清初的陈王庭所创。陈王庭在继承家传武术的基础上,融合了道家的阴阳学说、儒家的中庸思想以及中医经络学、导引吐纳术等,创编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太极拳。道家思想是太极拳的重要哲学基础,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阴阳平衡”等理念。太极拳的动作以棚、掤、挤、按、采、捌、肘、靠、进、退、顾、盼、定等为基本方法,这些动作的运行体现了阴阳的相互转化和平衡,如动作的开合、虚实、刚柔等,都与道家的阴阳观念相契合[9]。练习太极拳时要求身心放松,排除杂念,以自然流畅的动作进行修炼,体现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

中医认为,人体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经络畅通则身体健康[10]。太极拳通过独特的动作和呼吸方法,能够促进经络气血的运行,调和脏腑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练习太极拳时,以意领气,以气运身,使气息沿着经络运行,滋养全身各个器官,如太极拳中的“气沉丹田”,就是通过调节呼吸,将气息下沉到腹部丹田部位,

增强丹田之气，从而提升身体的整体能量。

太极拳不仅是一种武术技能，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它将道家、儒家等哲学思想以及中医理论有机融合，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人生、宇宙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人类身心健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太极的运动特点与健身原理

太极拳具有独特的运动特点，其动作缓慢、连绵不断、刚柔相济，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在练习太极拳时，每个动作都要做到缓慢、均匀、连贯，避免出现停顿和跳跃，动作之间的转换要自然流畅，形成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11]。这种缓慢的运动方式能够让练习者更好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呼吸，调整身心状态，使身体各部位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放松。太极拳强调以意领气、以气催形，注重呼吸与动作的配合[12]。练习时，通过意念的引导，使气息随着动作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达到呼吸自然、深长、均匀的状态。这种呼吸方式能够增强肺部的功能，提高氧气的摄入量，促进气体交换，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同时，气息的顺畅运行也有助于调节人体的气血，使气血在全身循环流通，滋养脏腑组织，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太极拳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运动系统等都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锻炼作用[13]。在神经系统方面，太极拳的练习需要集中注意力，专注于动作和呼吸的配合，这有助于提高大脑的专注力和反应能力，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缓解精神压力和焦虑情绪。长期练习太极拳还可以促进大脑分泌内啡肽等神经递质，使人产生愉悦感和放松感，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太极拳是一种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练习的优秀健身运动。

四、太极对“脆皮大学生”身体健康的促进作用

（一）增强心肺功能

太极拳的动作与呼吸紧密配合，以意领气、以气催形，这种独特的运动方式对心肺功能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是因为太极拳的练习过程中，呼吸深度加大，频率相对降低，使肺部能够充分扩张和收缩，从而提高了气体交换效率，增强了肺部的通气功能。在心脏功能方面，太极拳的缓慢、匀速运动能使心率保持在相对稳定且适度的水平，减轻心脏的负担。同时，太极拳的运动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练习时，全身肌肉有节奏地收缩和舒张，如同“泵”的作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减少血液在血管壁的淤积，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二）提升肌肉力量与骨骼强度

太极拳的动作丰富多样，涵盖了全身各个关节和肌肉群的运动，通过反复练习，能够有效锻炼肌肉，增强肌肉力量。以某高校开展的太极拳课程为例，学生经过一学期的系统学习和练习后，肌肉力量测试结果显示，握力平均提高了约 5-8 公斤，腿部力量也明显增强，在立定跳远等测试中成绩有显著提升。这是因为太极拳的动作要求身体各部位协调配合，注重肌肉的发力和控制，如“揽雀尾”“搬拦捶”等动作，都需要腿部、腰部和上肢肌肉的协同用力，长期练习使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肌肉纤维增粗，肌肉力量和耐力增强。太极拳练习时，身体处于半蹲位等多种姿势，腿部承受一定的负荷，刺激骨骼生长和重建，促进钙的吸收和沉积，从而增加骨密度。研究表明，长期练习太极拳的大学生，其腰椎、股骨等部位的骨密度较不练习者有明显提高，有效降低了骨质疏松症的发病风险，为骨骼健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促进新陈代谢

太极拳通过调节人体内分泌和代谢系统，有效提高了身体的代谢水平。练习太极拳时，身体的运动和呼吸的调节能够刺激内分泌腺的分泌，促进激素的平衡。从中医角度来看，太极拳以意领气，使气息在经络中运行，调和气血，促进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有助于调节人体的内分泌和代谢。在练习过程中，身体各部位的活动和呼吸的配合，能够按摩和刺激腹部脏器，如脾胃等，促进消化吸收功能，提高营养物质的利用率，进一步增强身体的代谢能力。长期坚持练习太极拳，可使大学生的身体代谢处于良好状态，增强身体的活力和免疫力，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的各种挑战。

五、太极对“脆皮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一）缓解压力与焦虑

太极拳的动作缓慢、柔和，要求练习者在练习过程中全身心地放松。当大学生沉浸在太极拳的练习中时，身

体的肌肉逐渐放松,紧张感得以缓解。比如在练习“云手”动作时,手臂缓缓地划动,身体随之转动,每个动作都流畅自然,让大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身体的舒展和放松,如同紧绷的弦慢慢松开,压力也随之释放。太极拳强调呼吸与动作的配合,采用腹式呼吸法,呼吸深长、均匀。当大学生处于焦虑状态时,往往呼吸急促、浅短,而通过练习太极拳,学习正确的呼吸方法,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系统,使身体从应激状态中恢复过来。研究表明,当人们进行腹式呼吸时,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降低心率和血压,缓解紧张情绪。在练习太极拳的“起势”动作时,大学生会被引导进行深呼吸,将气息深深地吸入腹部,再缓缓地呼出,随着呼吸的调整,内心逐渐平静下来,焦虑感也会减轻。在练习太极拳时,大学生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动作、呼吸和意念上,排除外界的干扰和杂念。这使得他们从对压力源的过度关注中转移出来,将注意力投入到当下的练习中。例如,在练习“白鹤亮翅”动作时,大学生要专注于手臂的伸展、身体的平衡以及呼吸的配合,此时他们的大脑被这些具体的动作和感受所占据,不再被焦虑情绪所困扰,从而达到缓解压力的效果。

（二）改善情绪状态

太极拳对提升大学生的情绪稳定性、增强积极情绪和减少负面情绪具有显著作用。长期练习太极拳,能够调节大学生的神经系统,能够帮助大学生建立起更加稳定的情绪模式,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例如,在面对学习上的挫折时,经常练习太极拳的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过度沮丧或焦虑,而是以更加平和、冷静的心态去分析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太极拳还能有效减少大学生的负面情绪。许多大学生由于面临各种压力,容易产生抑郁、烦躁等负面情绪。太极拳通过调节身心状态,帮助大学生释放负面情绪,改善心理状态。如练习太极拳时的冥想和放松环节,能够让大学生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情绪,将内心的烦恼和负面情绪释放出去。

（三）促进自我认知与心理成长

太极拳在帮助大学生增强自我意识、提高自信心和促进心理成长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练习过程中,大学生通过对动作的感知、呼吸的调节以及意念的运用,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身体机能和心理状态。比如在练习“野马分鬃”动作时,大学生需要注意身体重心的转移、手臂的伸展以及呼吸的配合,这使他们更加敏锐地感知自己身体的动作和状态,随着太极拳练习的深入,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会更加自信。当大学生能够熟练地完成一套复杂的太极拳套路时,会对自己的能力有更清晰的认识,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种自信心的提升不仅体现在体育活动中,还会延伸到学习、社交等其他方面,使大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时更加从容,在人际交往中更加自信、开朗。

六、推广太极,助力大学生健康发展的策略

（一）高校层面的推广措施

在课程设置方面,高校应优化太极拳课程体系,丰富课程内容。除了常规的太极拳套路教学,还可以开设太极拳文化、太极拳与养生、太极拳实战技巧等校选修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高校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太极拳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高校可以举办太极拳文化节,成立太极拳学生社团,鼓励支持开展包括太极拳表演、讲座、比赛、展览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太极文化氛围。定期开展太极拳比赛,鼓励学生参加校外的太极拳比赛,与当地社团协会交流切磋,积极参与当地区、市的全民健身运动会,提升学生的技术水平,拓宽学生的眼界。

（二）社会层面的支持与合作

社会应加强对太极拳的宣传推广,提高公众对太极拳的认知度和认同感。邀请太极拳名家、学者开展讲座、访谈节目,分享太极拳的魅力和经验,提高社会对太极拳的关注度。政府和社会应加大对体育设施的投入,在公园、广场、社区等公共场所建设适合练习太极拳的场地,配备必要的设施和器材。鼓励高校与周边社区、企业合作,共享体育场地资源,为学生和社会人士提供更多的练习空间。例如,高校可以在课余时间向社区开放体育馆、操场等场地,供居民练习太极拳。社会各界可以组织太极拳公益培训活动,邀请专业教练为大学生、社区居民等免费授课,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太极拳。开展太极拳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扩大太极拳的普及范围。举办太极拳公益表演,向公众展示太极拳的魅力,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到太极拳运动中来。通过这些公益活动,让太极拳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七、结语

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瑰宝,对当代“脆皮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预防和缓解疾病,还能调节心理状态、促进心理成长,是一种适合大学生练习的优秀健身运动。推广太极拳对于提升大学生健康水平、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应在高校和社会中大力推广和普及。

参考文献:

- [1]丁利娟.青年大学生“脆皮”现象的价值反思与回归[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02):90-96.
- [2]李广跃,叶菲楠.从理论到实践:太极拳的哲学知识默会[J].武术研究,2025,10(06):46-48.Doi:10.13293/J.Cnki.Wskx.011193.
- [3]王存良.太极拳的生活智慧与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17,(06):66-69.Doi:Cnki:Sun:Tyws.0.2017-06-015.
- [4]丁利娟.青年大学生“脆皮”现象的价值反思与回归[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02):90-96.Doi:10.19847/J.Issn1008-2646.2025.02.010.
- [5]王纯.“脆皮”与“韧性”:当代大学生心态透视与引导策略[J].青年学报,2024,(06):43-47.Doi:Cnki:Sun:Qngl.0.2024-06-007.
- [6]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 [7]Chen X,Cui J,Zhang Y,Et Al.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mi And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Across-Sectional Study[J].Bmc Public Health,2020,20(1):444.
- [8]李玲,李卓航.从“脆皮”到坚韧: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培养策略研究[J].青年学报,2024,(06):54-58.Doi:Cnki:Sun:Qngl.0.2024-06-009.
- [9]周伟良.试论武当太极信仰的文化成因——兼论张三丰与武当内家拳[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5,42(03):257-274.Doi:10.16063/J.Cnki.Issn1001-747x.2025.03.001.
- [10]陆颖,李洁,赵晓霆.健康中国背景下太极健康服务的现状与实践路径[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5,23(02):192-196.Doi:Cnki:Sun:Zzyy.0.2025-02-060.
- [11]孙思哲,王天乐.论传统太极拳的“慢练”与“快练”[J].武术研究,2024,9(11):4-6.Doi:10.13293/J.Cnki.Wskx.010834.
- [12]李全海,金玉柱,陈保学,等.太极拳架的构造、蕴化理义与生命学意涵[J].中国体育科技,2024,60(08):88-97.Doi:10.16470/J.Csst.2024076.
- [13]王军.健康中国视阈下的太极养生观述论[J].武术研究,2024,9(06):4-8.Doi:10.13293/J.Cnki.Wskx.010548.

With the Softness of Tai Chi, Forging the Vigor of Yout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ole of Tai Chi in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Contemporary "Fragile College Students"

Wei Qiao, Jiajun Du, Fei W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city,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role of Tai Chi in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crispy college students", exploring i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it reveal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ai Chi in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relieving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regulating emo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ing and popularizing Tai Chi courses provides a new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status, and offer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ir health level.

Keywords: Tai Chi; crispy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promotion

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 及协同治理研究

李矛威¹杨成²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2.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 成都 610599)

摘要: 本文围绕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川南地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展开研究, 首先阐述了当前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现状, 揭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接着, 深入探讨了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机制, 分析其内在逻辑与实践挑战。随后, 通过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 提出了优化公共体育服务的具体策略, 包括多主体间的协调合作、资源整合及政策创新。通过本文的研究, 旨在为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提升提供学理支持和实践指引, 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做出贡献。

关键词: 和美乡村建设; 川南农村; 公共体育服务; 运行机制; 协同治理

基金项目: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项目“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及协同治理研究”(项目编号: SQZL2024B0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25

1.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1.1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设施与资源供给现状

川南地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与机遇。根据统计数据, 川南共有8个地州市, 涵盖4500多个行政村, 农村人口近1500万。现有的公共体育设施不足, 许多村庄缺乏基本的体育场地与器材, 大多数村庄的运动场所仅限于闲置的空地, 难以满足基本的健身需求。现有乡镇体育设施覆盖率仅为35%, 其中标准化体育场地的建设普遍滞后, 显著阻碍了群众健身活动的开展。调查数据显示, 85%的农村居民认为健身器材数量难以满足需求。

1.2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现状

在运行机制方面, 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过程中采用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模式。根据2022年的相关政策, 川南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及专项资金支持农村体育发展, 预算经费的年均增幅达到10%。通过引入社会力量, 鼓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增强资源的共享与利用效率。然而, 由于缺乏明确的运行机制, 导致资源配置不均, 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不足。

1.3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参与现状

协同治理的层面上, 川南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也经历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与互动。政府、学校、企业及村民组成多元化的参与方, 通过定期召开协调会议, 制定年度体育服务实施计划。这种多方协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 然而, 由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不一致, 存在执行层面的难题。以学校为中心的体育活动虽丰富, 但少数村庄的学校设施利用率亦明显偏低, 调查显示, 村小学周边的联动活动空间利用率不超过40%。

1.4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活动组织与居民认知现状

作者简介: 李矛威(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杨成(1974—), 男,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学、学校体育、民族传统体育。

通讯作者: 李矛威

当前,川南区域内的公共体育活动组织形式多样,涵盖了农民健身广场、体育赛事、小组联赛等多种活动类型。近两年,新增的社区运动会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次,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参与感。尽管如此,活动组织的专业性及系统性不足,普遍缺乏专项指导与培训,农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调研显示,参与者中老年人占比仅约20%。此外,体育文化建设滞后,缺乏有效的宣传与推广,导致农村居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认知度不足。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现状显示出系统建设的重要性,现阶段需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与实施,提高设施建设的标准化与科学化。同时,推动多方合作,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管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以丰富体育服务内容。此外,加强对活动参与的组织与培训,尤其是提升专业教练与志愿者的培养,能够有效提升服务的质量与参与度。

2.和美乡村建设政策演变及其对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要求

2.1 和美乡村建设及相关政策演变梳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川南地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提升成为重要任务。政府通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引导各级政府落实奖补机制,明确资金来源和使用方向。在政策层面,建议制定相关政策框架,明确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保障、设施建设标准、服务供给及管理目标等。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农村公共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同时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此外,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带动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支持,提升公共体育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2.2 和美乡村建设与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关联性分析

公共体育服务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影响到农村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当前,川南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以政府为主要服务提供者的传统模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需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构建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治理机制,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及社区之间的资源和经验,实现信息共享与互惠互利,可提升体育服务质量,增加农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认可度,并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做出贡献。

2.3 和美乡村建设对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核心要求

针对川南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美乡村建设要求构建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建立区域性合作平台,开发数字化平台,促进农业与体育的结合,鼓励农民利用闲置场地举办农村体育活动,提高参与度,有效解决体育资源不足问题。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制定科学的管理和评价体系,确保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的高效与透明,确保服务对象的反馈与需求被及时纳入决策过程,可通过定期开展民意调查,收集农民对体育设施和服务的意见。在资源分配上,应当优先考虑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村落,以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公共体育服务差距。同时,强调生态环境与公共体育服务的关系,通过结合当地文化、传统体育项目,开展适合农村特点的体育活动,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优化公共体育服务的宣传方式,利用传统与新媒体,宣传体育的益处,增强农民的健康意识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主动性,推动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的和美愿景。

3.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构建

3.1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的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

在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机制中,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是核心要素。政府通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引导各级政府落实奖补机制,明确资金来源和使用方向。以2019年为例,省级财政对农村体育服务的投入达到3000万元,为具体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根据2022年的相关政策,川南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及专项资金支持农村体育发展,预算经费的年均增幅达到10%。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也是提升运行机制的重要手段,可以设定参与人数、设施使用率、活动频率等多个指标,进行定期评估,确保服务的动态调整。

3.2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设施建设与布局机制

设施建设是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的基础支撑,重点聚焦农村健身场地和器材,按照每千人配备1-2个多功能体育场所的标准,逐步完善区域布局。截至2022年,川南地区建设标准化健身场所120个,新增健身器材2000套,覆盖率达60%。同时,与地方高校及企业合作,因地制宜引进不同类型的健身器材,形成适合当地居民的体育设施模式。政府需明确职能,优化资源配置,保障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社会力量包括企业 and 非政府组织,也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作用,形成合力。

3.3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管理与评估机制

管理模式上,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管理框架。各乡镇制定《公共体育服务实施方案》,明确服务目标、实施步骤及责任单位。成立专项体育服务管理委员会,定期进行评估与反馈,采取动态调整措施,以提高服务质量。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项服务项目进行绩效评估,以数据化手段优化服务流程。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制定科学的管理和评价体系,确保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的高效与透明,鼓励地方政府应用激励政策,支持农村体育组织的发展,提升其自我造血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3.4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社区参与与技术支持机制

社区参与成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的核心环节,建立居民体育信息反馈机制,鼓励居民参与需求调查及活动组织。利用社区微信群、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增加活动宣传,提高居民参与率。2022年进行的调研表明,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居民达5000人,参与满意度达到85%以上。在技术手段应用方面,通过数据分析与智能管理平台,使服务过程透明化,提升居民的体验感。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监测居民健康状态,结合居民的兴趣和需求策划个性化的体育活动。目前数据管理系统已覆盖70%的用户,活动参与数据实时更新,为后续项目决策提供依据。协同治理态势也在不断形成,建立多方合作平台,包括政府、村委、社会组织及企业等,利用资源整合,形成合力推进服务质量提升;实施“小额资金,共同决策”的治理模式,鼓励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体育项目的申请与管理,形成共担共治的良好局面。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实施,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效率不断提升,逐步形成了以提升居民健康素养、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公共体育服务新机制。2022年显示,辖区内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较2019年提升了12%,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频率显著增加,村民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达200场以上,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4.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路径

4.1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构建

川南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策略依赖于多方主体的参与与资源整合。首先,政府在规划与政策引导中发挥主导作用,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分工,以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地方体育部门需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地方标准与规范,确保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具备可操作性。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参与是提升治理效果的关键,通过建立社区体育服务中心,促进居民自主参与体育活动,增强其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对于居民参与度的量化,建议实施问卷调查,统计参与人数与活动频次,以评估项目实施效果。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保障项目持续性的基础,推荐采用PPP(公私合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运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政府的配套资金与企业的投资形成合力,确保资金链的稳定性,特别是在项目初期阶段,政府可设定税收优惠政策,以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

4.2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跨部门与资源协同整合

在协同治理过程中,跨部门协作至关重要。体育、教育、卫生等部门应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共享资源与信息,形成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如每季度开展联动活动,策划赛事与健身活动,提升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效率,以形成合力促进公共体育服务的提升。推进跨部门合作机制,形成“多方联动、资源共享”的合作模式,推动体育、教育、文化等部门的协同;实施过程中通过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确保信息共享,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使不同部门在政策制定上趋同,减少了资源的重复浪费。社会力量在赛事组织及青少年体育推广等方面发挥作用,与政府、社区形成合力,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及社区之间的资源和经验,实现信息共享与互惠互利,有效解决体育资源不足问题。

4.3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信息技术协同应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亦是提升协同治理效率的重要手段。建议建设智慧体育服务平台,整合信息资源,通过数据分析提升体育服务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系统应具备实时数据采集、用户反馈处理、活动管理与资源共享等功能,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通过数据分析与智能管理平台,使服务过程透明化,提升居民的体验感;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监测居民健康状态,结合居民的兴趣和需求策划个性化的体育活动,活动参与数据实时更新,为后续项目决策提供依据。针对部分区域服务效率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人均运动参与时长低于预期值20%),提出以数据驱动的智能服务模式,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监测参与者的需求与反馈,从而不断调整服务策略。

4.4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评估与动态调整

评估机制是协同治理策略的重要环节。建议建立绩效考评体系,设置关键绩效指标(KPI)如参与率、活动满意度、设施利用率和民众健康水平等,以量化公共体育服务的成果和影响;定期开展评估报告,形成可公开的评估结果,以增强透明度与责任感。推行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反馈和评估结果,不断优化服务内容与治理策略;定期征集居民意见,确保公共体育服务符合地方实际及居民需求,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和满意度。通过海量数据的整理及挖掘,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评估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治理策略。同时,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量身定制体育服务项目,如为老人、儿童及残疾人设置专项活动;此外,在重大体育赛事期间,鼓励地方社区举办相应的配套活动,提升公众参与度的同时加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通过以人为本的协同治理策略,推动川南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全面优质发展。

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机制及协同治理研究表明,科学的制度设计及多元主体合作是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效率的关键。通过对川南地区13个县(区)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785个有效问卷数据,分析显示地方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主导角色显著提升,同时各类社会组织 and 企业的参与也在不断扩大。研究采用SWOT分析法,识别川南公共体育服务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其中优势体现在政府财政支持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劣势则包括设施落后与人才匮乏;通过德尔菲法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发现群众满意度平均为75.3%,公众对体育活动的参与率达62%,显示出一定的社会需求。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构建了“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框架;调研中,发现70%以上的村庄依赖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设施,共建的体育场地达到245个,覆盖面扩展至85%的村落;此外,通过对服务供给的投入产出分析,统计显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0.35平方米提升至0.58平方米,体育活动参与频率提升20%。综上所述,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机制在整体上展现出日益完善的趋势,但仍需借助新技术与协同创新,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研究成果为今后政策制定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公共体育建设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 [1]周丽;孙德朝.记忆、认同与更迭:川南苗族手绳的文化符号意涵阐释[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4
- [2]郭开惠.川南地区泸县雨坛彩龙的生存状态与优化策略研究[J].,2023
- [3]V Anderson. Model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pproach to Gray Wolf Management in Colorado[D].,2022
- [4]刘春丽,陆颖,廖文秀."村超联赛"发展经验对区域体育经济的启示[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4
- [5]唐洁.精准扶贫背景下川南地区农村小学校园足球帮扶路径研究[J].,2020
- [6]Han B, Wu H, Diao Y, et 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J].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24, 55(000). DOI: 10.1016/j.esr.2024.101540.
- [7]曾川南.足球赛事智能化换人系统的研发[J].,2022
- [8]TZhao, XYu, SLiu. Research on the Co-Creation Mechanism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ndustry Value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D].,2024
- [9]王光英.四川省青少年"学校、社区"篮球竞赛体系构建研究[J].,2022
- [10]唐静.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川南地区体育产业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2022
- [11]卢玲玲,赵波,李娜.成渝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川南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5
- [12]温清,朱颖茜,彭梦晴.苗族传统体育活动打手绳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J].艺术研究快报,2022
- [13]彭晓东.快乐体育在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的实施与研究[J].,2021
- [14]申向军,代伟男.川南地区中考体育测评研究[J].内江科技,2023
- [15]赵波,李永林,卢玲玲,等.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川南体育赛事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体育世界,2024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in Southern Sichuan in the Process of Hemei Rural Construction

Li Maowei¹, Yang Cheng²

(¹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²South 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of the South Sichuan reg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harmonious rural construction. It first describ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rural South Sichuan and reveals the main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t then delves into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alyzing its inherent logic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Subseque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specific strategies to optimize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enhancement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rural South Sichuan,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all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outhern Sichuan rural areas; Public sports services; Operational mechanis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后疫情时代美国医药政策的走向与效应

吴玺瀛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市 徐汇区 200030)

摘要: 本研究聚焦后疫情时代美国医药政策的系统性变革, 构建三维分析框架(资源分配、政策周期、公私合作)探讨政策转向的内在逻辑与长期效应。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发现: 资源分配呈现显著的地理与群体差异, 拉丁裔与非裔社区疫苗接种率滞后白人社区 7-8 个百分点; 政策周期存在“钟摆效应”, 无法延申以保障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与社会恢复需求; 公私合作虽推动 mRNA 疫苗技术突破, 但专利纠纷与数据产权模糊损害公共利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及治理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通过分析复合分配模型、政策生命周期机制及公私合作体系, 为分析美国公共卫生体系韧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美国; 医药政策; 公共卫生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1

引言

2021 年 1 月,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任后, 迅速推动疫苗接种工作, 并制定了更为积极的疫苗分发计划, 逐渐过渡到后疫情时代。2021 年 4 月美国政府宣布将新冠疫苗接种范围扩大至所有 16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标志着疫情危机控制阶段向长期管理和恢复阶段的过渡期转变, 即后疫情时代的开端。尽管美国政府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正式结束了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但考虑到疫情的长期社会影响, 真正的“后疫情时代”结束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疫情这个诱因之下, 美国医药政策做出了改变以适应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

尽管针对美国医药科学技术的研究十分丰盈, 但对其医药政策的走向与效应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现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的政策领域, 缺乏对美国政府在后疫情时代实施的医药政策进行系统性分析的框架。因此, 理解美国医药政策的本质、机制及其长期影响仍然存在空白。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美国后疫情时代医药政策的三大核心问题: 政策下的新分配结构、扩张与收紧, 以及未来的走向与社会效应。

新冠疫情对美国医药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冲击, 暴露了现有政策框架在资源分配、应急响应以及公私合作等方面的深层矛盾。例如, 疫情高峰期, 美国医疗物资短缺、疫苗分配效率低下、低收入社区的远程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这些现实困境促使联邦政府在疫情后期启动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然而现有研究未能深入揭示这些调整的内在逻辑与长期效应。为此, 本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和治理分析框架, 构建了一个三维分析模型, 旨在揭示后疫情时代美国医药政策的演进路径及其对公共卫生体系韧性的影响。通过实证数据与跨国比较, 本文提出构建更具公平性、适应性与创新性的政策框架, 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一、资源分配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地理与群体差异的再生产

美国医药资源分配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 这一特征在疫情时期被进一步放大。联邦政府初期采取的“人口基数分配模型”未能有效回应地理空间的异质性: 以阿拉斯加州为例, 其广阔的地域面积与稀疏的人口密度导致疫苗冷链运输成本上升, 疫苗接种率也相对更低。有充分证据表明, 美国非城市地区的 COVID-19 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城市地区, 根据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在全美国 5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DC) 接种 COVID-19 疫苗的接种情况来看, 总体而言, 非城市地区 ≥ 1 剂 COVID-19 疫苗接种覆盖率 (58.5%) 低于城市地区 (75.4%), 各年龄组和性别的情况相似^[1], 同时, 非城市地区医疗设备及医院密集度落后于城市地区, 图 1 为美国非城市地区居民按照平均住所-ICU (重症监护室) 距离划分的地图^[2], 其中蓝色区域为远距离区域, 该区域的住户平均离最近的 ICU 都在 32.4 英里 (即 52.14 公里) 以上, 该分布图显示相当大一片乡村、郊区区域面临严重医疗资源不充足、医疗设备不完善的情况。

作者简介: 吴玺瀛(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国别区域研究

通讯作者: 吴玺瀛

同时,凯泽家庭基金会(KFF)在2020年4月的调查报告中指出,非城市地区每万人平均ICU床位(1.7张床位)要远低于城市地区(2.8张床位)。此外,由于居住在非城市地区的居民很多都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且大多患有诸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是在新冠疫情到来时更加可能需要住院治疗以及应急救援的对象。而KFF基于老年人更加需要床位和照顾这点出发,重新计算了基于各年龄层次相对于新冠住院风险的人均床位数据,新数据更加证实了美国医药资源分配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新数据显示,非城市区域和城市区域的每万人ICU床位差距更加明显(1.6张床位/万人 vs 2.9张床位/万人),同时每万人病房床位也相对少了10%(21.6张床位 vs 23.9张床位)^[3]。

由于疫苗获取不足、医疗机构距离偏远以及医院床位资源紧张等多重因素,农村居民在新冠疫情期间面临严重的就医障碍,难以及时获得有效治疗。据统计,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农村地区每434人中即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而城市地区则为每513人中1人,农村地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城市地区的两倍,显示出其在医疗可及性与健康保障方面存在显著劣势^[4]。

ICU facilities harder to reach for rural (nonmetro) residents in Great Plains, Mountain W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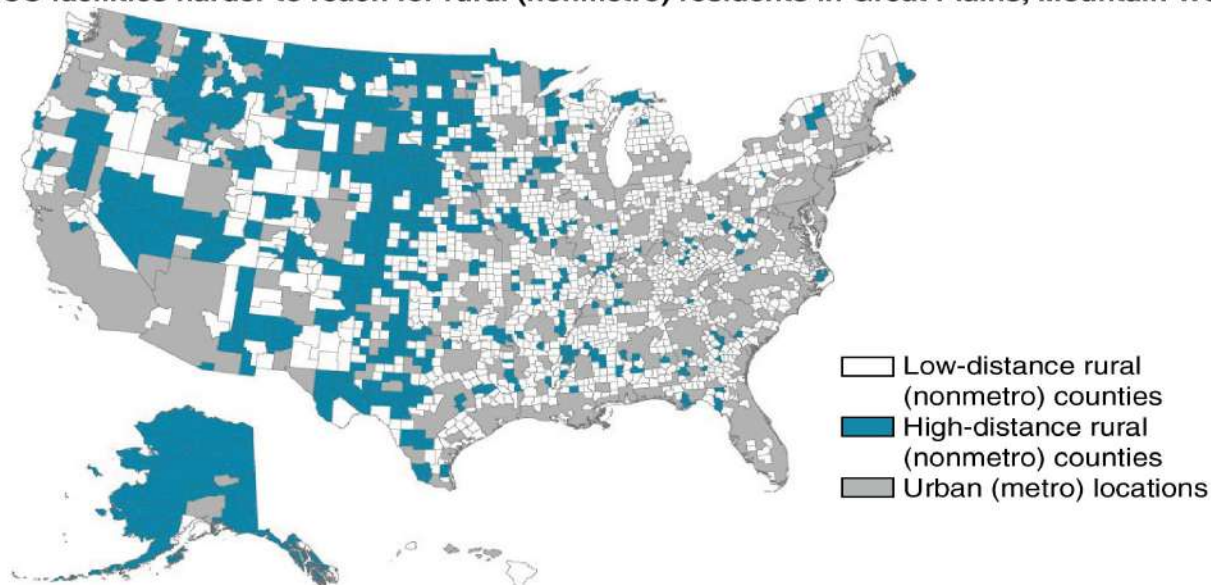


图 1

群体层面的分配不公则与结构性种族歧视形成共振:拉丁裔与非裔社区的疫苗接种率滞后于白人社区,折射出医疗基础设施的历史性投资不足与信息传播渠道的系统性断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到2023年11月4日,估计有14%的美国成年人接种了COVID-19疫苗加强针,然而接种人群分布体现了极强的种族差异,根据图2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统计得出接种加强针疫苗的黑人占黑人群体总数的8%,接种加强针疫苗的西班牙裔占西班牙裔群体的8%,而白人则占15%,几乎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的两倍^[5]。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截止到2023年,美国约有3.26亿人口,其中约57.2%为白人,占绝对多数,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美国人占19.5%,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占约11.6%^[6]。然而,新冠疫情在不同种族间的死亡率却相差甚大,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尽管非裔美国人仅占人口的30%,但其死亡人数却占到了51%。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尽管非裔美国人仅占人口的30%,但在早期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却占了70%的死亡人数,且死亡病例仍集中在超过90%居民为非裔美国人的社区^[7]。此外,黑人更可能被雇用为低薪的基本工人,在诸如公共交通和机场设施、食品生产和药店等领域工作。然而,这些在关键领域维持社会运作的工人却常常缺乏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大大增加了他们被传染的概率。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些种族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缺乏获得健康和社会福利的机会。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不仅仅是单纯的健康问题,而是与教育、住房、就业、贫困等多重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公,导致了种族群体在疫情中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而是根源于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种族不平等。因此,要想真正改善这些群体的健康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种族歧视,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医疗投资,并加强卫生信息的普及和精准传播。同时,政府应加强对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关怀,确保他们在疫情暴发时能够平等地获得医疗资源和支持,而不仅仅是在紧急情况下临时提供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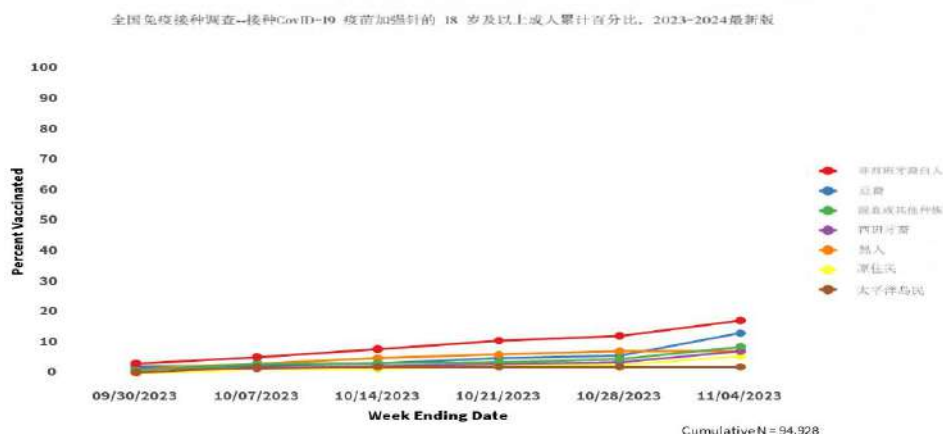


图 2

二、政策周期的阶段性悖论：应急响应与制度惯性的博弈

美国医药政策的应急响应机制呈现出典型的“钟摆效应”。随着《美国救助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ARPA) 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正式签署，这项价值 1.9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标志着美国政府针对疫情展开了巨大的扩张行动，以 Medicaid 医疗保险为例，这项涵盖了低收入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的政府医疗保险计划得到了最多 5% 增幅的资金支持，大幅提高了覆盖人数，缓解州政府的财政压力。截止到 2024 年，Medicaid 扩展计划新增登记人数达 2130 万人 (较 2020 年增长约 6.2 百万人，增长幅度约为 41%)^[8]。然而，根据图 3 截止到 2025 年 2 月，仍有包括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在内的 10 个州没有参与 Medicaid 扩展计划，而其中阿拉巴马州、堪萨斯州、田纳西州、威斯康星州和怀俄明州拥有最低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不超过十分之一的非老年人参与了医保计划，而相比之下，参保率超过了五分之一的州中，除佛罗里达州以外，其他都是参与了扩展计划的^[9]。根据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报告证实，实行医保扩张政策不仅显著地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死亡率，还改善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并减少了医院的无偿护理成本^[10]。尽管《美国救助法案》中明确提到如果这十个尚未参加医保扩展计划州同意扩展，这十个州将同样享受同其他州一样的资金支持，但这十个州依旧拒绝。州政府同联邦政府因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产生的矛盾导致了在危机时期政策无法完全有效地扩容、实施。这种矛盾延长了危机持续时间，加重了严重性，阻碍了社会生产恢复。

Status of State Medicaid Expansion Decis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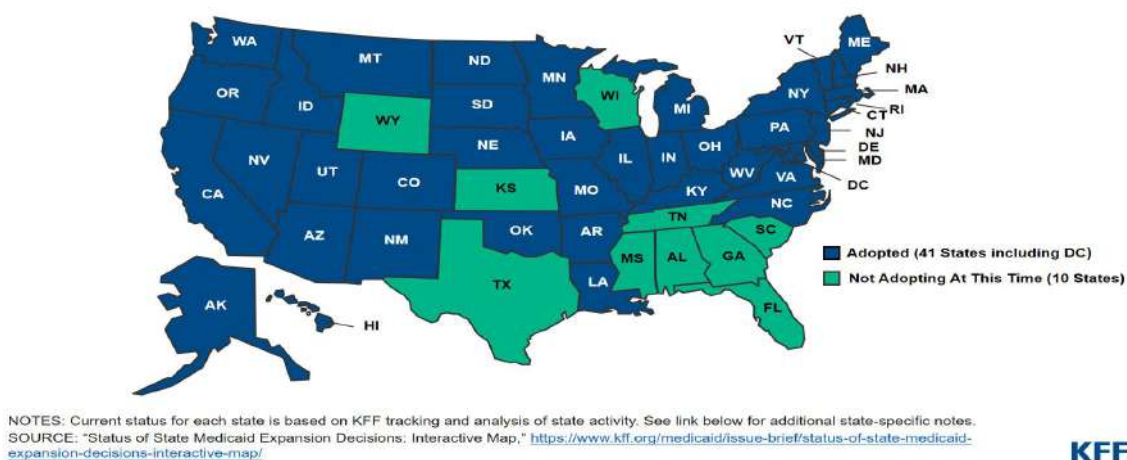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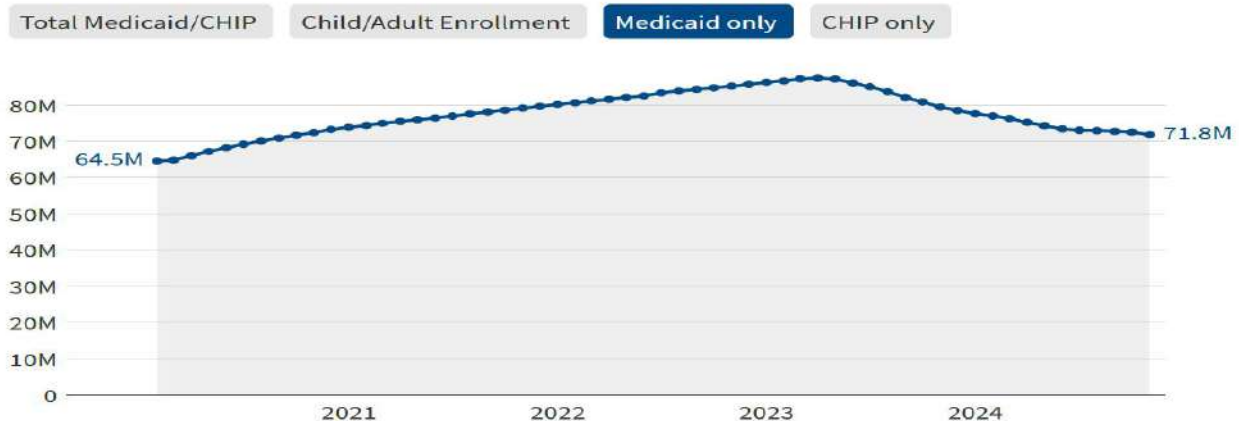


图 3

在疫情高峰期美国政府通过了《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案》（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实施了 Medicaid 的临时扩展政策，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医保覆盖率。同时强调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期间，州政府不得终止大多数受益人的 Medicaid 覆盖，除非受益人自愿终止、搬离州或去世。这项政策显著减少了低收入人群在疫情期间的医保中断现象，确保了他们的医疗保障连续性^[11]。然而，随着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这些临时措施逐步撤销，Medicaid 扩展面临常态化实施的挑战。疫情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公共卫生上，更体现在经济中，社会停摆、经济下行、收入减少，虽然疫情逐渐平息但不代表其他疾病的消失，医疗支出仍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因此才更加体现出医保持续性扩展的必要，而许多州因扩展医保带来的巨大财政支出而大量收回参保资格。图 4 中可以看出从 2023 年 4 月临时扩展政策结束后，Medicaid 参加人数开始快速下降，从最高峰时期的约 8730 万人下降到 2024 年 11 月的 7177 万人，减少了约 1533 万人^[12]。虽然这一政策调整在短期内能够缓解财政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波动性的医保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医保体系的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导致更多低收入群体、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健康保障上遭遇困境，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美国医保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过于依赖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临时应急政策，而缺乏对长期健康保障的持续关注。单靠临时的政策调整来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并不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稳定、长期的健康保障。医保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尤其是在疫情恢复期，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议题。医保中断及其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现象这一医疗结构性问题是后疫情时期社会经济恢复的重大障碍之一。

National Enrollment in Medicaid, February 2020 to November 2024

Select enrollment data for specific programs or age groups using the toggle below:



Note: M = Millions. November 2024 data are preliminary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in subsequent enrollment reports; all other months are based on updated enrollment reports.

Source: CMS, Medicaid & CHIP: Monthly Application and Eligibility Reports, last updated March 28, 2025. • Get the data • Download PNG

KFF

图 4

三、公私合作的制度性困境：技术突破与治理赤字共生

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在 mRNA 疫苗研发中实现了技术突破效率的放大，“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 OWS）是美国政府 2020 年 5 月启动的一项大规模公共卫生计划，目标是通过政府和私人企业合作，在极短时间内加速 COVID-19 疫苗、治疗方法和检测技术的研发、生产和分发。在 OWS 行动的行动框架下，新冠疫苗在不到一年就已投入使用^[13]。这次公私合作无疑是成功的，政府提前采购疫苗，资金上降低企业风险，同时行政上加快了新疫苗的临床试验审批速度，为后续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建立了一个新的快速响应合作模式。

但其制度设计缺陷亦暴露无遗。由于 OWS 行动中，政府和医药企业之间签署的是相比于传统采购合同更加灵活自由的 OT 协议（Other Transaction (OT) Agreements），其透明度较低，不受某些旨在保障纳税人权益的联邦法规约束，譬如纳税人对知识产权的访问权。同时，由于合作项目中联邦政府未明确约定专利共享条款，导致疫苗专利归属争议持续发酵。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价值十亿美元的合同更因数据产权模糊，使得政府“强制使用权”和公众权力受损^[14]。这种治理赤字可追溯至美国医药政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过度依赖企业创新活力却忽视公共利益的制度保障。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在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医

药政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政府在政策设计上仍强调以市场机制激励企业研发,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疫苗预购协议和放宽监管来刺激创新效率;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公共利益的长期保障,导致技术成果的公共可及性与价格公平性不足。例如,mRNA疫苗的快速突破固然得益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风险承担,但相关成果却集中在少数跨国药企手中,专利壁垒和定价策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美国国内在疫情缓和后出现医保名额紧张、药价负担沉重的问题,而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在疫苗获取和治疗服务上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

从治理角度来看,这种对企业创新活力的过度依赖,反而削弱了政府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主动性与制度保障能力。政策缺少对专利共享、价格管制、医保覆盖率扩展等方面的长远考量,使得技术突破在社会层面的红利分配严重不均。后疫情时代,因这种“以市场换效率”的思路而忽视制度性调节,就可能导致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在下次危机中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建立稳固的公共利益保障机制,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美国医药政策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也是为了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必须走出的制度性困境。

四、理论重构与政策框架:韧性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路径

结合数据分析与政策走向以及中国实际情况,本研究认为针对美国医药政策的分析,对中国以下两个维度更新发展医药政策有重大意义:

1. 分配正义维度:中国政府应在现有医疗体系上建立基于空间可达性(spatial accessibility)与群体脆弱性(vulnerability index)的复合分配模型,建立公平性评价框架,从地域公平、空间公平和社会公平三个维度对现有医疗体系进行评价并且不断完善^[15],中国各区域间因地理环境、人口、文化差异、交通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医疗可达性方面有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和弱势群体差异上。解决农村、山区医疗可达性问题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快速通道建设,同时开展“医生下乡”、大城市专家巡诊及线上远距离问诊等方式以缩小城乡差异,让偏远落后地区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进而弥补地域与空间上的不足。解决弱势群体(如老人、农业人口),应推动医疗资源在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体医疗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向弱势群体进行有益倾斜,针对弱势群体展开个性化供给,如开设老年护理中心、儿童专科等设施。

2. 治理创新维度:制定更严格规范的协定条款,明确公私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共享规则、数据主权边界及社会责任条款,保障自由度及灵活度的同时保护公共利益,建立独立监管机构。此外,应在保障公立医院医疗质量和规模的同时鼓励并帮助私立医院发展,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有效弥补私立医院抗风险能力差、规模较小的弱点的模式。发展改革传统医疗领域PPP模式是构建多元化、高韧性、高医疗可达性社会的必经之路。

结论

后疫情时代美国医药政策的现实情况对中国政府医疗政策的重构给予启发:需突破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二元对立思维,结合后疫情时代经济与社会需求,构建兼具公平性、适应性与创新性的制度体系。本研究通过空间政治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及治理分析框架的整合,揭示了美国政府当前政策体系的深层矛盾,并为构建具有韧性的公共卫生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 [1] Murthy B P, Sterrett N, Weller D, et al. Disparities in COVID-19 vaccination covera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unties —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4, 2020 – January 31, 2022[J].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22, 71(9): 335 – 340. DOI:10.15585/mmwr.mm7109a2.
- [2] Cromartie J. Rural residents appear to be more vulnerable to serious infection or death from coronavirus (COVID-19)[EB/OL]. Amber Waves, 2021-02.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2025-04-10].
<https://www.ers.usda.gov/amber-waves/2021/february/rural-residents-appear-to-be-more-vulnerable-to-serious-infection-or-death-from-coronavirus-covid-19>
- [3] Cox C, Amin K, Rae M, et al.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in coronavirus pandemic preparedness[EB/OL]. Peterson-KFF Health System Tracker, 2020-07-09. [2025-04-10].
<https://www.healthsystemtracker.org/brief/urban-and-rural-differences-in-coronavirus-pandemic-preparedness/>
- [4] Bendix A. Covid is killing rural Americans at twice the rate of people in urban areas[EB/OL]. NBC News, 2021-10-08. [2025-04-10].
<https://www.nbcnews.com/health/health-news/covid-killing-rural-americans-twice-rate-people-urban-areas-n1280369>

- [5]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What's New: Vaccine Equity[EB/OL]. 2024-01-10. [2025-04-12]. <https://www.cdc.gov/ncird/whats-new/vaccine-equity.html>
- [6]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n.d.). Distribution by race/ethnicity. Retrieved April 12, 2025, from <https://www.kff.org/other/state-indicator/distribution-by-raceethnicity/>
- [7] Peek, M. E., Simons, R. A., Parker, W. F., Ansell, D. A., Rogers, S. O., & Tucker Edmonds, B. (2021). COVID-19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 Action Plan for Mitigating Dispar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1(2), 286 – 292. <https://doi.org/10.2105/AJPH.2020.305990>
- [8]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 Look at ACA Coverage through the Marketplaces and Medicaid Expansion Ahead of Potential Policy Changes [EB/OL]. (2025-01-15) [2025-04-20].
- [9]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Status of State Medicaid Expansion Decisions [EB/OL]. (2025-04-17) [2025-04-20].
- [10]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20). Chart Book: The Far-Reaching Benefits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s Medicaid Expansion.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 [11]Wagner, J., & Solomon, J. (2020, May 27). Medicaid coverage protections in Families First Act: What they require and how to implement them.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https://www.cbpp.org/research/health/medicaid-coverage-protections-in-families-first-act-what-they-require-and-how-to>
- [12]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Medicaid Enrollment and Unwinding Tracker[EB/OL]. [2025-03-31]. <https://www.kff.org/medicaid/issue-brief/medicaid-enrollment-and-unwinding-tracker/>.
- [13]Lin I-L. Redesigning the vaccin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a PPP Perspective:: Operation Warp Speed[J]. *The Public Purpose Journal*, 2022, 20.
- [14] Ardizzone K. \$1.3 Billion Johnson & Johnson COVID-19 Vaccine Development Contract Contains Broad Redactions Relating to Public's Rights in Inventions[EB/OL].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2021-04-01 [2025-04-28]. Available: <https://www.keionline.org/35793>.
- [15] 李玲燕,米维夕,裴佳佳,等.考虑弱势群体的医疗资源配置公平性评价[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4,26(12):2722-2740.DOI:CNKI:SUN:DQXX.0.2024-12-006.

The Trends and Effects of U.S. Pharmaceutical Policie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Xiying W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policie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resource allocation, policy cycl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policy shifts. Through empirical data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resource allocation shows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and group disparities, with vaccination rates in Latin and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ies lagging behind white communities by 7-8 percentage points; the policy cycle exhibits a "pendulum effect," failing to extend to meet post-pandemic economic and social recovery needs; althoug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have driven breakthroughs in mRNA vaccine technology, patent disputes and ambiguous data property rights have harmed public interests. Based on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governance analysis frameworks, this paper proposes building a composite allocation model, policy life cycle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risk-sharing system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public health systems.

Keywords: Post-Pandemic Era; United States; Pharmaceutical Policy; Public Health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与养老体验研究

覃柳一格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广大中低收入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愈发旺盛,公建民营成为我国养老机构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公建民营模式下公私关系的矛盾不可忽视,不同立场下的目标存在显著差异,监管的缺失、收益风险等都会对机构的服务质量与养老体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多主体共同协作,促进政府、机构、老人等多方交流,并改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构建老龄友好社会,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关键词: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养老体验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互助养老模式在半失能老年群体中应用的局限性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4403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0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显示,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3.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0%^[1],我国人口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日益凸显。

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少子化、人口跨区域流动、城市化发展等形势凸显的背景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家庭化”政策取向开始向“去家庭化”的方式转变^[2]。机构养老作为居家养老的有效补充,通过提供全天候的专业护理服务,配备适老化设施和医疗团队,能够有效解决老人的照护需求,其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特点使其在现代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应运而生。由于其公益性的特征,为我国广大老年群体提供了实惠的养老选择,并成为解决我国养老难题的主流方案。

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路径

公办民营养老机构是指由政府出资建设或提供设施,通过委托经营、租赁、合作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运营管理的养老服务机构。其核心在于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既保障养老服务的公益属性,又引入市场化机制提升效率与服务品质^{[3][4]}。我国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起步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5],明确提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2011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规划(2011-2015年)》^[6]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公建民营”概念,推动多地开展试点,北京、上海、浙江、湖南等地率先探索,形成多种运营模式。

首先是委托经营模式,政府通过招标选定运营方,签订委托合同,明确权责^[7]。这类模式呈现出清晰的权责划分,政府仅承担资产监管、标准制定和补贴发放责任,不干预具体运营,运营方则拥有人员招聘、普惠范围内服务定价及日常管理的自主权。例如:上海市闵行区福利院,该机构由政府出资兴建后委托专业社会组织运营,798张床位在2013年实现收入2085.5万元、支出2012万元,财政补贴仅183.5万元,显著低于同规模公建公营机构^[8]。发展至今,委托经营模式已从早期的单机委托转向县域整体打包的规模化委托,朱云提及的“多机构整合委托”案例便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专业服务能力^[9]。

其次是租赁经营模式,政府将设施租赁给社会主体,收取租金,运营方自主经营。社会经营者自主运营、自负盈亏,享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同时也承担主要的市场风险。例如:南京市某社会福利院采取“一院两制”,

作者简介:覃柳一格(2004—),男,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老年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

通讯作者:覃柳一格

该福利院将部分场所和设施通过公开招募综合评审的方式租赁给两家民营养老机构进行市场化经营。公办部分主要负责“三无”、“五保”等老人的供养，民营部分则主要收住社会自费老人，形成了“公”与“私”在业务上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混合经营状态^[8]。

最后是 BOT 模式（建设-经营-移交），其是指政府与企业合作建设，企业运营一定期限后移交政府^[9]。这类模式具有鲜明的全周期合作属性，其涵盖建设、运营、移交三阶段，企业需承担前期建设投入，政府则提供土地划拨、规划审批等政策支持。发展至今，模式功能逐渐走向复合化，早期项目以住养服务为主，近年已转向“医养+社区服务”整合模式，部分项目融合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社区诊疗等功能以提升运营收益能力^[7]。

早期公办机构效率低、财政压力大^[10]，纯民营机构则面临资源获取难、公益属性弱的瓶颈^[9]，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通过“政府保公益、市场提效率”的平衡机制，成为必然选择。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与纯民营机构并非替代关系，而是能弥补后者短板，公建民营机构既通过合同约定保障兜底普惠需求^{[4][10]}，又依托政策引导推动城乡资源均衡，还以评估、标准机制引领行业质量^[9]，更能高效盘活存量资产^[3]，是养老服务体系均衡发展的关键支撑。

2017 年国家发布《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11]侧重通过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服务供给，聚焦以 PPP 模式激活社会资本投入。而公建民营机构发展至今更强调提质增效与分类发展，2024 年《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12]提出推进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发展，优化委托经营机制，支持存量设施改造与设备更新，2024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13]进一步明确养老机构分类改革方向，强化失能老人照护等专业服务。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未来将朝着智慧化转型，推进智慧型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多业态融合深化医养结合、“社区+物业+养老服务”及可持续运营方向发展，最终构建覆盖城乡的分级分类养老服务体系。

三、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困境

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有着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既为广大有需求的中低收入老年群体提供了可靠的养老服务，也调动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服务领域的积极性，达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初步平衡。然而，在公建民营模式推广的过程中，不同主体间存在的目标差异使其陷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困境中。

（一）官方视角下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要求

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采取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即政府或公建养老机构所属的事业单位拥有养老机构的所有权，社会力量经过一定程序取得养老机构的经营权，但同时养老机构的经营也受到官方的监督，要遵循官方的要求与制度。

从国务院、民政部等各部门发布的公告来看，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要为“五保三无”或困境老年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养老服务，或是在养老机构所提供的运营床位中预留一定比例的床位数为特殊群体服务，在这些预留的公益床位中，其定价往往低于市场价格，为相关群体入住提供了极大程度的优惠。同时，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以资源可及性为目标追求，强调供需双方的适配程度，在经济、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三个维度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14]。

因而，在官方的视角和定位中，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应以社会效益为首位，为弱势群体提供质量有保证的养老服务，将社会公平正义为最终目标。

（二）资本运营过程中逐利的目标导向

对资本而言，逐利是其最根本的特性，往往以获取最大利润为价值取向，在公建民营的模式下，官方承担了巨额的土地和建设费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承担的风险，吸引了大批资本加入，但在运营过程中不断消解公益性，与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机构运营过程中，存在着拒绝接收重度失能老人等偷巧行为来降低机构的运营成本和风险的行为^[15]，亦或是扩大向高收入群体、健康老人的服务规模来增加收益。在官方口径中，要求的是机构至少预留 20%至 30%的公益性床位，而机构却将其异化为只用保留 20%至 30%的公益床位，通过规则漏洞谋取利益。在收费标准上也是乱象频发，在部分地区，政府为吸引社会资本加入会默许社会资本通过管理费、咨询费等方式获取利润回报^[16]；部分机构在入住时会实行优惠政策，但当优惠期结束后会在原基础上增加额外的收费项目，子女为了让父母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往往会支付更多的费用^[17]；非基本养老服务的收费如特殊膳食费、护理费、个性化服务费等缺乏规范、统一的标准，往往会成为资本敛财的手段^[18]……

从各地所表现的结果来看，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在资本的参与下原有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被不断的分解，成为一种隐蔽的资本工具。

综上,官方期望的公益目标与资本的逐利特性在机构运营层面表现出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长期存在必然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激发公民对养老机构的抵触情绪,也必然对机构内部的服务产生不利影响,更大程度来看,不利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建设。

四、机构困境带来的服务质量与养老体验降低

(一) 专业性不足,从业者素质有待提升

对我国大部分的养老机构而言,缺乏对老人的个性化服务是目前存在的共性问题^[19]。一般而言,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大多都有孤独寂寞、悲观恐惧、焦虑抑郁、多疑自卑、烦躁敌视等不良情绪,需要护理人员进行及时的关注和疏解,避免老年人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而引发更大程度的心理问题^[20]。因此,为提高服务质量和优化老人的养老体验,应当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以解决老人在机构养老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

从行业发展角度而言,我国老龄化进程快但改革起步较晚,养老行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无法吸引人才。养老机构的从业者往往面临着薪资待遇较差、工作量大且繁琐、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养老行业往往以中高龄劳动者为主,但该群体大多未受过专业教育,使得养老服务的质量下限被不断拉低。2014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21]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应用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相互衔接;同时,各地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现状出台了相应的人才激励政策,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养老服务补贴管理办法(试行)》^[22]、《上海市养老护理员激励补贴实施办法》^[23]等。然而,从结果上看,教育体系中培养的人才似乎并未进入或留在养老行业,部分研究表明养老机构中护理员的学历仍以初中及以下为主^{[24][25]}。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公建民营模式虽然降低了前期的成本投入,但在运营阶段需要参与市场化的竞争,自负盈亏。研究和行业分析普遍指出,社会资本在参与养老服务项目时普遍面临着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周期漫长的核心挑战,因而社会资本在运营过程中极其注重成本控制^[14]。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而言,在整体利润空间被压缩的背景下,控制最大的可变成本——人力成本,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财务管理手段^[26]。在人力成本不断被压缩的情况下,从业者的薪资自然也无法得到保证,进而无法保证从业者的专业水平,最终影响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

(二) 管理结构僵化,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

资本面临的收支困难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任何的服务和管理都有成本的支出,低成本高收益的模式不一定能铺开,高成本低收益的事更难推广^[27],机构在运行过程中需要不断寻找成本和效益的平衡点。李中秋等人基于特征价格理论建立模型后认为,只有在市场价格和消费者出价相等时有交易达成,即老年人及其家属会以是否能支付得起养老机构的价格为主要选择依据^[28]。在此基础上,养老服务质量、养老环境、配备的疗养设备、陪护人员资质等和其他一些非理性因素都会影响养老机构的定价。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管理问题由来已久,至今似乎仍未找到可以妥善解决的方法,但管理问题的搁置也必然影响整个机构生态的运转。基于此会衍生出多种情况,一是机构运营方按规执行,保障机构的公益属性,但为了保障一定的利润而提供较少的养老服务,仅局限于基本的生存需求;二是在规则与市场间寻求平衡,这也是公建民营机构最初希望达到的目的,但运营方为追逐利润依然会在不触碰规则红线的情况下衍生出各种增值服务,养老服务开始有选择的供给;三是在规则底线要求下不断扩大市场化,资本的逐利特性被不断放大,入住所选择的收费标准成为养老服务供给的指向标,不同老人的养老体验出现较大差异。

无论是管理结构臃肿且决策效率低,还是管理结构单一但决策水平不足,结果导向的评价模式来看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生态无疑是乌烟瘴气的,不同的运营模式或多或少的都损害了入住老人公平享有养老服务的权利,资方成本与收益的风险被转移到老人身上,“一分钱一分货”的观点在逐渐渗透,这与公建民营的最初目标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

(三) 官方监管不足,机构运营缺乏规范

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养老行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欠发达地区的养老行业在行业人才数量、机构配置水平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相对薄弱,专业人才配套政策尚不完善,市场化与社会化协同机制有待加强。同时,政策落实层面存在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对机构服务质量的长效监督机制需进一步完善^[29]。

我国在2021年就出台了《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30],其中明确规定了相关从业者的人员数量和专业要求,但对于社会工作者、健康管理师等非医疗专业领域的相关从业者的要求则缺乏强制标准,部分机构

在面对“配置专职或兼职”的要求时往往直接理解为“有兼职工作者即可”，与此类似的擦边行为必然不止于此。

在看到机构运营方为追求利益而擦边运营的同时，也要发现官方监管的缺位。其一，我国目前暂未出台统一、规范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监管办法，执法监管工作也无法有序开展；其二，部分地区还存在运营方事先得知检查信息，有针对性的对现有问题进行掩盖，使监管流于形式，难以发现问题^[14]。其三，目前各地政府对养老机构的监管主要是有形资产、设施的监管和养老服务质量的监督，其中服务质量的监管又以满意度和投诉情况为衡量指标，而机构内的老人往往生理情况较差，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较大^[15]。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公建民营机构的监管难有成效。

五、优化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现状的策略

（一）细化行业标准，明确监管细则

无规矩不成方圆。各地对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建设和运营标准不尽相同，社会资本在进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标准的阻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并且在运营过程中由于细则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位，也让社会资本有了钻漏洞的可能性。

因此，有必要出台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明确公建民营性质的养老机构在建设、运营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底线，保障机构内养老服务的供需平衡和服务质量，提升更广泛的中低收入老年人的养老体验，维护机构的公益性。然而，底线思维仅仅是最低程度的保护，还应当出台一定的激励和优惠政策，通过评估机构内床位使用的方式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和税收减免，让机构运营方自发的承担社会责任和公平正义的使命。此外，政府和有关机构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责任，不能成为甩手掌柜。结合本地区的养老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形势，完善相应的监管法规，实现养老规划契合社会现状，顺应发展趋势，做好未来布局，为构建老龄友好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二）推动行业发展，留住专业人才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养老行业专业人才不足是制约养老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现有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还应加强人才留存的关注，构建“培养-提升-留住”的全链条人才保障机制。更广泛的说，在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养老行业也必然朝着更规范、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度也会越来越高。

一是可以依托我国的高考制度，在志愿填报上针对性的设置定向就业类型，将学生学习与毕业就业捆绑，实现“理论教育-专业实习-人才成长”的全方面培养机制。二是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加大对养老行业的政策支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行业的发展。避免发达地区越发达，落后地区越落后的现象。三是通过数字媒体平台，发动网络达人、自媒体、官方媒体等多元主体，赋予养老工作更高的价值，提高相关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吸引广大工作者加入到养老工作中。

（三）搭建沟通平台，平衡多方利益

公建民营的实质是委托关系，公与私目标、立场的不同会导致机构运营过程出现偏离初衷的情况，公私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搭建开放的信息交流平台，将政府部门、机构运营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等多方主体纳入平台主体，畅通信息的交流渠道，促进政策有效传达、意见有效反馈等。在政府责任与资本逐利间寻求平衡点，实现合作的良性发展。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而言，平台的搭建能够详细了解自身享受的权利和服务，提高机构内入住的养老体验；对机构运营方而言能够及时反馈问题，了解需求和政策内容，对服务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提升；对政府而言则可以促进信息的了解和实现灵活的监督。

（四）构建更广泛官方合作伙伴关系

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不应仅仅局限在提供场地、基础设施这一基础层面，应该发挥出政府强大的资源网络和丰富、活跃的市场资源。除了在建设和运营方面为社会资本提供优惠外，养老服务的内容亦可以通过资源链接不断完善。必须正视社会资本的逐利特性，理解成本与收益的压力下社会资本采取的服务方式。

政府部门可以发挥自身独特的资源网络，在全社会范围内寻找有能力和意愿提供服务或资源的社会组织或企业，通过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构建“2+N”的新型合作关系，即在政府部门和机构运营的社会资本外，有针对性的寻求专业服务的供给方，补充机构的养老服务内容。如此便能够实现社会关注养老行业、机构低成本发展、老人少花费、政府扩大公共服务等多方共赢的美好局面。

六、结语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作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养老资源紧张、提升服务质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智慧化转型、医养融合深化等趋势的推进,实现制度闭环与多方共治的目标,必将更精准地覆盖中低收入、失能等重点老年群体的需求,真正践行“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关于 2021 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结果的公告[EB/OL].(2022-01-28)[2025-09-18].<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5407/content.html>.
- [2]. 任亮亮,周新成.家国一体:应对城乡居民养老问题的政策演进与实践基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02):173-184.
- [3]. 闫青春.养老机构的“公办民营”与“公建民营”[J].社会福利,2011,(01):13-15.
- [4]. 朱云.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委托经营管理模式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 [5].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9号[Z/OL].(2000-02-27)[2025-09-18].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033.htm.
- [6].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办发〔2011〕60号[Z/OL].(2011-12-16)[2025-09-18].https://www.gov.cn/zwgk/2011-12/27/content_2030503.htm.
- [7]. 张颖静.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行模式探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18(22):186.
- [8]. 养老先锋号.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成功案例[EB/OL].(2022-07-05)[2025-09-18].<https://www.163.com/dy/article/HBG8EROP0538J4LT.html>
- [9]. 王雪辉.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运作模式探析[J].行政管理改革,2016,(08):38-43.DOI:10.14150/j.cnki.1674-7453.2016.08.007.
- [10]. 吴溪.“公建民营”模式在养老服务中的探索——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4,(09):28-29.
- [11]. 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财金〔2017〕86号[Z/OL].(2017-08-14)[2025-09-18].https://www.gov.cn/xinwen/2017-08/21/content_5219295.htm.
- [12]. 民政部、商务部、中央网信办等.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 民发〔2024〕52号[Z/OL].(2024-10-31)[2025-09-18].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11/content_6985707.htm.
-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Z/OL]. 2024-12-30(2025-09-18).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5.htm.
- [14]. 范世明.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公益性与政府责任[J].北京社会科学,2023,(08):113-128.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230811.
- [15]. 沙泽高,胡乃军.欠发达地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SWOT 分析——以乐山市 X 老苑老年公寓为例[J].科技和产业,2022,22(09):215-220.
- [16]. 范世明.重塑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公益性[J].中国社会保障,2024,(05):82-83.
- [17]. 黄敏,张艺睿,唐建荣,等.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21):167-169.DOI:10.13665/j.cnki.hzjjykj.2022.21.020.
- [18]. 涂艳,贾惠婷,唐建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海南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建设问题探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3,(20):31-33.
- [19]. 李孜文.老年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中的应用探究[C]//四川劳动保障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劳动保障研究会议论文集(十二).淄博市社会福利院,2021:43-44.DOI:10.26914/c.cnkihy.2021.039003.
- [20]. 鲍莹,杨旭东,高晨梦,等.养老机构老年人不良心理特征及护理对策[J].医学研究与教育,2021,38(06):69-73.
- [21]. 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教职成〔2014〕5号)[EB/OL].(2014-06-10)[2025-07-2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1406/t20140618_170939.html.

- [22].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养老服务补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民规〔2024〕4号）[EB/OL].(2024-12-25)[2025-09-18].<http://mzt.gxzf.gov.cn/xxgk/zcwj/gmg/t19511827.shtml>.
- [23].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养老护理员激励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25〕2号）[EB/OL].(2025-01-01)[2025-09-18].https://mzj.sh.gov.cn/MZ_zhuzhan2739_0-2-8-15-55/20241231/0e5bea31283d453ba106b2739a347991.html.
- [24]. 蒋丽娟,刘世晴,杨民,等.江苏省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研究[J].实用老年医学,2019,33(12):1146-1149.
- [25]. 万凯莹,苏嘉清,涂斯婧,等.广西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分析[J].广西医学,2022,44(02):198-202.
- [26]. 张思锋,张泽漓.中国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困境与智能养老选择[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06):152-163.DOI:10.15896/j.xjtuskxb.202306013.
- [27]. 陈友华.我国养老服务的定位、问题与思考[J].社会科学辑刊,2024,(06):136-148+235+241.
- [28]. 李中秋,王朝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资源市场的优化配置——基于特征价格理论的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36(10):108-115.
- [29]. 李凯,董金权.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我国主要养老模式比较、困境与进路[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09):647-653+661.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EB/OL].(2021-12-10)[2025-09-18].<https://www.mca.gov.cn/gdnps/n2445/n2575/n2580/n2582/n2590/c117044/attr/273014.pdf>

Study on Service Quality and Elderly Care Experience of Publicly-Built and Privately-Operated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Qin Liuyige

(Qin Liuyig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among a large number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elderly group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ong. The publicly-built and privately-operated mod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reform of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China. However, the contradictions in public-private relationships under this model can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oals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issues such as lack of supervision and profit risks will all exert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elderly care experience of these institu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joint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he elderly and other parties, improv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build an age-friendly society,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ensuring adequate elderly care.

Keywords: publicly-built and privately-operated;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service quality; elderly care experience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 与实践策略研究

陈阳 杨成 沈鑫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成都, 610500)

摘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 系统探究数字技术驱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提升的逻辑理路和突破路径。研究发现: 其内在逻辑主要呈现在三个层面, 技术赋能: 创新驱动服务升级、资源整合: 优化配置提升效率、产业融合: 拓展新业态激发活力; 实践策略: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筑牢服务根基;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激发创新活力; 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拓展发展空间;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和技能, 增强参与能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 内在逻辑; 价值; 实践策略

基金项目: 四川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 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川南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及协同治理研究 (SQZL2024B0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45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背景下,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作为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 其高质量发展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焦点, 但就目前来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仍普遍存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 “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的明确要求被提出, 重点将体育公共服务纳入其中^[1]。《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2024年)》则着重指出, “推动农村体育设施数字化改造”工作需要加快推进^[2]。这些政策文件为新质生产力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了政策指导。本研究旨在为新质生产力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与行动参考, 助力实现“体育强国”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

1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核心概念剖析

1.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依托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 以数据、知识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形态^[3]。其核心特征包括: 技术驱动性, 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精准识别需求、优化服务流程; 生态协同性, 推动“体育+”跨界融合, 催生文旅、科技等产业融合新形态, 例如贵州“村BA”通过直播引流激活乡村赛事经济; 普惠共享性, 以数字平台降低服务门槛, 让智能健身设备、线上课程覆盖偏远地区, 缩小城乡差距^[7]。这种生产力形态不仅是技术工具的迭代, 更是治理理念的革新, 为破解农村体育资源错配、服务低效等问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1.2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与发展现状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涵盖设施供给、活动组织、文化传承等内容。近年来,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推动场地设施快速覆盖, 2018-2021年农村体育场地面积增至6.78亿平方米, 部分地区试点智慧化改造^[4]。但发展仍有瓶颈: 供给端“重硬件轻软件”, 健身指导、赛事运营等服务短缺, 设施闲置率较高; 需求端分化明显, 老年群体依赖

作者简介: 陈阳(200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杨成(1974-), 男,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沈鑫(2000-),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通讯作者: 杨成

传统器材, 年轻群体偏好线上服务, 供需错配突出。此外, 城乡数字鸿沟制约服务效能, 例如 2023 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60.5%, 低于城镇 24.6 个百分点, 这表明农村智能平台覆盖明显不足, 偏远地区“有设施无服务”现象较为普遍^[4]。传统行政主导的供给模式也难以及时响应农村群体的多元需求, 亟需通过转型来建立精准化的服务机制。

1.3 新质生产力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在联系

新质生产力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融合的实质就是技术逻辑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 基于技术赋能实现“云端健身课堂”, 让四川农村受益于城市教练资源的实时下沉; 根据多元需求通过应用技术媒介打造“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的“云+管+端”全链路系统, 制定符合不同人群需求的“村 BA、村春晚、村溜冰”“一站一特色”的健身方案; 通过激活农村体育多维价值打造赋能村民、激活产业和撬动资源的发展生态圈, 帮助当地村民增加收入, 技术提供了农村体育从“补缺”到“发展”的技术内核、提供了高效服务的有力抓手、提供了重塑乡村体育生态和重构城乡融合发展新机制的重要杠杆^[9]。

2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在逻辑

2.1 技术赋能逻辑: 创新驱动服务升级

以创新性生产要素为第一推动因素的新质生产力, 借助数字工具和智能系统, 在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范上发挥更大效用。5G 网络让边远村落可以享受“云端健身课堂”, 利用直播技术把城市教练送到家里来, 极大破除空间障碍带来的地域鸿沟^[8]。运用物联网技术赋予了体育设施“感知能力”, 运动 APP 可以根据村民运动的过程自动收集运动数据并自动生成健康报告, 给予村民针对性的健身指导, 达到了由“粗放供给”到“精准服务”的转变, 技术的应用只是工具升级的表象, 最终依靠的是模型支撑的服务升级, 由“政府主导”变为“数据驱动”, 极大地提升了服务供给的响应速度以及匹配度。

2.2 资源整合逻辑: 优化配置提升效率

新质生产力是利用数字化平台打破资源壁垒构建共享服务的生态, 运用云计算形成的“一张网”将力量向分散的各种资源整合聚合, 运用数字孪生, 将虚拟资源和实体服务融合后用生成乡村体育场景的数字镜像, 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各种资源配置方案并观察其效果, 做出科学的决策^[6]。最后人才整合上形成“云端赋能+本地培育”的双通道模式, 从实践上看, 各地都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农村资源分散的问题, 使农村体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 服务效能也随之提升。

2.3 产业融合逻辑: 拓展业态激发活力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嫁接与模式创新, 使农村体育与产业发展融合共生, 增强农村体育融合发展的质效, 逐步开创农村体育发展的新价值增长点, “体育+数字经济”的创造性孵化乡级赛事直播业、虚拟健身产业, 贵州的“村 BA”借助短视频的爆火之势打造赛事 IP, 并通过打造周边赛事和电商平台连接优质产品, 实现了体育流量向经济价值的转化; 将体育植入“体育+文旅”充分发掘乡村生态、民俗资源打造徒步越野路线、农耕体验路线等体旅融合线路, 保护好非遗体育项目, 同时带来旅游增收点, 助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5]。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价值意蕴

3.1 社会价值: 促进社会公平与乡村和谐

新模式下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对农村体育资源开展数字信息技术与重构工作, 补齐了单一的传统行政任务在城乡二元割裂问题上的缺陷, 相比由政府“器材闲置”“需求错位”背景下推动产生的“政绩工程”^[2]。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的云上议, 直接造福于湘渝黔的村民, 湘渝黔村村民第一次可以透过手机布局自己的生活设施, 在外务工人员也可以第一次将意见通过手机反馈给村里决策层, 这种参与式改变此前农村一直存在的“政府主导”的供给惯性。相关调查显示, 由于数字赋能下群众参与度提高 35%, 矛盾纠纷减少 28% 以上, 并能形成有深度的集体认同感, 这也说明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极有可能成为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器”。

3.2 经济价值: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以“体育+数字经济”的方式来激活乡村产业生态, 实现服务反哺和经济赋能;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我国目前农村地区体育消费占消费总额比例仅为 3.2%^[1], 但云端平台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 湘渝黔古村落依托赛事预约系统, 龙舟赛游客增加 40%, 进而促进 95% 的民宿入住率。正是有了对互联网+体育的需求端破

圈式爆发才诞生出了这样一个混合型经济，贵州“村BA”就是一个典范，通过直播、媒体宣传，促进单场赛事带动的餐饮、住宿等消费达到5.1亿元以上^[6]。此外，数字技术促进了“体育+文旅”的深度融合，民俗体育成了乡村振兴的一个“经济引擎”。

3.3 健康价值：提升农民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

新模式下的新质生产力运用智能技术打造了精准化的健康服务体系，实现了由“粗放锻炼”向“科学管理”的转变。霞浦县智慧体育公园通过智能步道和体质监测等采集用户运动数据并生成健康报告，比普通健身指导提升40%的科学性；此外，还可以打破“运动-医疗”壁垒，将村民的体检数据和健身数据相打通，国家体育总局国民体质监测数据显示，在经过3年数字赋能带动下，农村体质优良率达到39.8%，比原来提升了5.7个百分点^[6]。

3.4 文化价值：传承与创新乡村体育文化

新质生产力运用数字化激活乡村体育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融会贯通，土家摆手舞、苗族龙舟等非遗体育被录制成三维数据库，并通过动作捕捉、虚拟展演、VR数字化虚拟现实设备等多种数字化技术实现翻倍的高效传习；以“体育+短视频”的业态发展助推乡村传播模式变革，在互联网思维的赋能下，如贵州台盘村“村BA”将苗族银饰、苗族芦笙融合进赛事直播中，让乡土文化得到大范围有效辐射。此外，在空间重构层面上，数字技术可促进“体育+文旅”的场景创新应用。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践策略

4.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服务根基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需要打通农村数字基建“最后一公里”卡点，补足当前农村数字基建短板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的情况，只有将数字技术引进千县万村，先从偏远地区补足5G基站缺失，运用带有太阳能供电的智能健身路径，解决电不稳定区域居民无法使用问题；再建立县域体育云平台，融合汇聚卫健、教育等数据信息，精准落实运动干预行动；最后是由于当地人口大多操乡音，若使用普通话会较少人使用方言语音交互系统及手势操作系统会加大居民使用率^[10]。

4.2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激发创新活力

新质生产力赋能要突破政府“单极驱动”的困局，破题方式应该从政府搭台向政企多方协同策转，从协同参与激发动能。政府角色要重塑，实现由单一的执行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通过制定福利政策促进各类市场主体主动走进农村，助力发现农村巨大发展空间。市场主体要激活，打通体育消费“最后一公里”，推行健身消费券使用数字人民币结算模式激活体育市场的活力。社会组织要赋能，破除专业服务缺少问题。调动邻近高校与古村落开展合作，让学生发挥特长，同时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村民自主主要管用，畅通数字平台决策链路将最终决定权赋予村民。

4.3 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发展空间

融合“体育+”破除产业孤岛，构筑价值共生体系。在产业链层面上，将村级体育设施需求实时对接制造端的数据中台，通过需求预测算法动态调整生产计划，打破“器材错配”的局面，形成从“需求感知-柔性生产-精准配送”的产业联动链条；在消费生态层面上，基于数字平台打造“运动场景+消费生态”的闭环系统，从运动场景视角洞察用户数据画像，并精准匹配农特产品或体育旅游路线的推荐等消费场景，在实现体育服务联动的同时为乡村产业发展增加新贡献点。

4.4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增强参与能力

打破数字鸿沟除了要在外在保障好设施建设之外还要建立“培训+实践”的内在驱动体系，因为我国农村的非网民中有41.9%是60岁以上的群体，主要是由于其不懂数字技能而无法享受到服务，如果想要解决数字鸿沟和技能断层两重问题的话，开发“一键式”交互系统利用语音助手给老百姓降本；另一方面也要开展场景化的技能实操，让大家可以看到其中的奥妙之处，省去较难消化的理论课；在后期维护的时候可以建设云端议事厅，增加“提案孵化”板块，采取点击“笑脸”或“哭脸”的按钮反映设施是否正常，方便问题的及时发现、维护问题。

5 结束语

随着新时代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发展，存在的供需结构失衡、资源投放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已成为乡村体育振兴的重要瓶颈，而新质生产力与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融合逻辑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此，

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按照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产业融合的技术赋能逻辑,按照从夯实数字基建到培育多元主体协同、从推动产业融合到建设多业互融多业齐兴的产业发展和打造数字素养高地的数字人力系统性推进逻辑,形成数字赋能创新驱动治理理念、三位一体治理实践、一村多品服务模式的创新与转变来满足农民对高质量体育服务的需求,其为推动新时代农村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张利,田雨普.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27(02):137-141.
- [2]胡庆山,王健.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审思与现实困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04):20-24+30.
- [3]胡庆山,吕珂,王健.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制的现实弊端及治理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09):11-17.
- [4]王静,孙晋海,蔡捷,等.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更高水平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进路[J].体育科学,2023,43(01):15-25+33.
- [5]胡庆山.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学理构成、现实弊端及治理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11):5-12+26.
- [6]张晓东,赵文姜,张亚慧.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优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3,(03):1-9.
- [7]杨前程,蔡艺,李旭,等.论数字技术驱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提升[J].体育文化导刊,2024,(02):65-74.
- [8]邹新嫔,刘雪薇.数字赋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作用机制与创新路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02):60-66.
- [9]成会君,郝怀霞.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体育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与路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04):1-7.
- [10]张嘉信,谭志刚,谭清文.数字赋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现代化研究——以湘渝黔邻际古村落为例[J/OL].体育学研究,1-21[2025-07-01].

The Intrinsic Logic,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on Capacity Enabling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s

Chen Yang, Yang Cheng, Shen Xi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logical framework and breakthrough path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logic mainly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driving service upgrades through innov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optimizing allocation to enhance efficiency; industry integration: expanding new business models to stimulate vitality; practical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ervices; cultivat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vitality;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o expand development space; enhancing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to strengthen their participation abilit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s; Internal logic; Value; Practical strategies

互联网医院扩张对线下就诊行为的影响：挤出还是互补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实践与理论分析

徐文聪 麦咏欣

(广东东软学院健康医疗科技学院, 广东佛山 528200)

摘要：由于“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不断推进和互联网医院在粤港澳大湾区迅速发展，引发了大家对线上对传统线下的挤出效应的关注。基于“挤出—互补”理论框架，结合区域政策以及平台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梳理了互联网医院扩张对于线下就医行为影响机制。在线上服务有利于降低线下就诊成本的前提下，线上与线下服务对于各类健康需求而言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线上主要表现为对轻症问诊、续方复诊的替代作用；而对于慢病管理、心理疾病与康复随访来说，则更容易发挥出补充作用。结合以往作者所在研究团队在相关领域开展调研得到的数据与发现可知，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内，中老年人也愿意接受互联网健康服务，因而可以从侧面印证线上服务具有较好的补足效果。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医院；线下医疗服务；挤出效应；互补效应；粤港澳大湾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6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医疗健康”战略的大力推进，互联网医院以互联网为载体开展诊疗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逐渐落地。尤其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先进、人口老龄化较重的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互联网医院逐渐成为补充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强有力形式。但是，就其对传统的线下医疗服务产生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和政策界存在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医院凭借价格、便捷、技术等优势，“挤出”了部分线下门诊服务，在初诊、轻症处置以及慢病照护等方面更明显；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医院能够进一步改善现有的医疗资源不平衡状况，在随访、康复指导、远程会诊等方面发挥较强的互补作用。

现有多数相关文献聚焦于用户行为特征、平台使用意愿、满意度等内容研究，已有较为充足的理论基础，但针对实证量化、区域异质性解释以及政策机制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先后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政策，在政策实践上我国亦有不小建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2021 年深圳、广州已率先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官方互联网医院平台，并能利用医保支付、线上复诊、AI 导诊等功能实现线下和线上的融合统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5 年初，作者团队在大湾区做了老年康养服务调查，共搜集到有效样本量 445 份，其中有 73% 的受访者对于智慧养老技术持认可的态度，还有近半数的受访者愿意为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而付出更多的钱，可以反映出中老年人群对于互联网健康类的服务是有一定的接纳度的。

基于此数据，本文从“挤出—互补”的双重理论视角出发，以大湾区有关互联网医院发展政策为例，以政策和调研情况为佐证，探寻互联网医院对于传统医疗利用的影响机理路径，并就未来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体系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1.1 挤出效应与互补效应理论

作者简介：徐文聪(1996—)，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健康服务与管理、健康政策与健康促进；

麦咏欣(2003—)，女，本科在读，共同一作，研究方向为健康服务与管理；

通讯作者：徐文聪

挤出效应最初来自于消费者行为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新服务代替了老服务，那么原本使用老服务的人就会使用新服务，而使得老服务的应用有所减少。在医疗领域如果互联网医院提供的各项服务已经能够很好地满足患者的部分诊疗需求——无论是首诊还是慢病复诊、一些常见疾病的诊治，或是仅仅出于咨询目的来到医院就医——或许便会“挤出”那些此前需要去线下实体医院就诊的行为。

相反，互补效应则表示线上线下的彼此互补，不是取代，而是扩展了服务边界。例如：通过互联网医院做药品续方、远程随访、慢病监测等业务，其实都是补充着线下实体的服务边界，反过来看，使就诊的患者更加依从，在此基础上，再优化医院本身的流程和环节，给后续进一步高效转诊创造条件，更能发挥出线上线下互联互通效用，因此产生了协同。

1.2 双通道医疗服务模型

近年来，有关学者提出了“双通道医疗模型”，即线上线下一条服务路径共存，线上为轻症分流、引导等，线下则是复杂疾病的诊疗和高风险行为干预，“线上线下一条”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取代或者重复，是持续开展“动态分工”、“互补演化”的过程。

基于此，在理论框架建构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综述、政策案例分析和用户问卷补充验证的方法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医院扩张路径和功能效用研究，借助多源互证方法，探索互联网医疗在线上线下服务系统作用的机理机制，既涵盖了宏观结构又包括微观行为。

1.3 区域条件与机制差异

互联网医院是否带来挤出或互补效果，还受到若干中介机制调节，主要包括：

数字基础设施：如城市网络覆盖率、线上挂号系统普及程度等；

医保支付机制：部分城市支持线上复诊纳入医保报销，提升平台吸引力；

患者数字素养^[1]：老龄人群使用 APP、视频问诊的能力直接影响替代效应；

服务模式差异：公立医院主导型与第三方平台主导型的互联网医院，其功能结构差异显著。

2 国内外研究背景

2.1 研究共识：互联网医疗具备优化服务供给的潜力

互联网医疗是数字健康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年得到了各国政策和产业资本的关注和支持，它以最直接的方式改变着医疗服务体系的格局。Dorsey 与 Topol 认为^[2]：“改变医疗体系版图的最大变量之一”，即它将会把医疗体系全面进行改变。

在中国，Liu 等人^[3]利用东部一所三级公立医院 13 万余条配对数据进行准实验研究发现，患者使用了互联网医院咨询后，每月到线下的医院来就诊的次数会平均增加 2.4%，每个月花费的门诊费用也会上升 15.5% 左右，这说明线上服务发挥了促进作用，即在线上利用健康教育或者分诊引导等功能促进了后续的就诊需求量。

针对慢病管理，JMIR 2025 的回顾性研究以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为例^[4]，证明互联网医院在处方续签、随访提醒和药费节省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推动形成线上线下闭环管理。

还可以从用户角度出发证明其有供给优化的潜能，通过对 BMC Geriatrics 2025 对 CLASS 全国数据的研究可以看出，老年群体上网会减少老年人两年内的住院率(OR=0.63)，增加门诊首诊院的选择率，提示数字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城乡利用的差异^[5]。

总体而言，已有国际与国内证据均表明：互联网医院通过远程问诊、电子处方与药品配送等手段，能够扩展服务边界、提高患者获得感，特别在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的无接触需求下更凸显制度价值。

2.2 研究分歧：挤出还是互补，结论不一

然而虽然对服务功能较为认同，不过互联网医院对线下就医的实际影响依然存在“替代—协同”的争论。比如有的文献援引于对疫情初期（2020 年 3—6 月）美国 1670 万份商业和 Medicare 索赔数据的研究结果：总体上同期线下诊疗量有所下降，不过 30.1% 的诊疗是通过线上进行，意味着其中部分线下诊疗已被线上诊疗所取代^[6]。类似的还有王伟和刘晨阳以北京某三甲医院为样本发现其开设互联网医院后部分科室的门诊量下降 4.3%，说明部分初诊与轻症服务可能被线上“挤出”^[7]。另一方面，Liu 等的中国准实验研究却观察到“线上就诊—线下就诊增加”的连锁效应，提示互联网医院可能激发新需求、形成“互补”。

进一步来看，互补效应在慢病管理与康复随访场景更为突出。JMIR 2025 的溃疡性结肠炎案例显示，选择“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患者随访次数最高、费用最低，体现出平台在长期疾病管理中的协同价值。

“挤出”效应主要产生于初次诊治和病情较轻且信息不对称程度低的环节，尤其是在医保支付未统一结算的区域。

造成差异化的原因很多，不仅包括研究的设计（宏观面板数据与微观医院数据），疫情冲击程度、医保支付政策、患者的数字素养等等调节变量也会发挥作用。今后可利用跨区域、多层面的数据进一步挖掘作用机制，明确互联网医院扩张带来的真正的结构性影响。

2.3 研究空白与本文定位

综上，当前研究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互联网医院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价值，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用户层面的接受度与行为分析，缺乏对区域层面服务结构变化的系统研究，特别是不同城市间数字基础设施、人口结构、医保制度等条件对互联网医院作用路径的影响，尚未形成清晰理论解释；

其次，多数实证分析以个体医院或平台为单位，未能结合地方政策推进与城市间差异，识别互联网医院扩张对传统线下医疗服务系统性影响的区域比较证据有限；

最后，有关“挤出—互补”机制的理论模型较粗糙，缺乏跨地区调节机制及需求异质性分析。

由于上述原因，在此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从政策层面的推行措施、服务供给需求状况以及网民调研结果等多个维度，分析互联网医院在区域医疗体系内的具体作用，基于此，初步搭建“条件—机制—效应”解释模型，补充目前缺乏关于内在机制和比较研究缺陷的研究。

3 案例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医院实践

3.1 政策引导与区域先行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战略级城市群，在全国最早布局并发展互联网医疗。早在 2019 年，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就颁布了《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提出支持实体医疗机构建设互联网分院，并且打通医保渠道^[8]，对接医保系统；之后深圳、广州、珠海等多地上线了市属互联网医院^[9]或者引进第三方平台如“南山互联网医院”“微医广东平台”等，线上开展线上问诊、慢病续方、复诊转诊、远程会诊等工作。依据《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信息可以得出结论：2023 年广东省人均门诊次数为 6.31 次/人，相比 2019 年的水平下滑 7.8%^[10]。

相比于内地其它地区来说，湾区城市有如下的先天优势：一是数字基础设施齐全，网络接入率、智能终端普及率排在全国前列；二是医保信息化水平较高，部分地区实现了“线上复诊+医保支付”闭环的流程；三是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较为严重，对线上健康管理的需求愈发高涨，线上化的应用在健康医疗上出现了大批量的应用场景。

3.2 城市发展差异与服务路径比较

尽管大湾区的推进总体上比较快，但是各个城市的互联网医院建设路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11]：深圳和广州主要是由公立医联体来做，佛山和东莞主要靠市场驱动，而肇庆、江门和中山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

由此可见，互联网医院作用发挥的差别取决于区域条件，在此情况下便得到了“挤出—互补”效应表现存在差别的证据。

3.3 问卷调查结果的补充验证

为了解老年群体对互联网健康服务的接受度，本文作者团队于 2025 年初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了 445 份老年康养服务问卷调查。核心结果见表 3-1，反映出该人群对智慧医疗服务具备一定认知和接受基础。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老年人对互联网健康服务的接受度调研结果（n=445）

调查问题	选项（部分合并）	占比（%）
是否支持智慧养老技术的普及	支持（打 4 或 5 分）	72.8
是否愿意为个性化健康管理支付更高费用	表示愿意或非常愿意	48.1
对互联网医院的最大顾虑（多选题开放结果归纳）	操作难度、隐私担忧、无法转线下等	—（归纳型）

资料来源：作者团队自设计问卷调研结果选取

调研结果显示,受数字技能代际差距影响,粤港澳大湾区老人虽有互联网健康服务的心理接受度和支付意愿,但是低于年轻人,然而仍可为互联网医院“互补性发展”提供一定需求侧支撑,同样可以提醒有关方面,在使用新技术前关注“服务易用性”“界面友好性”“线下转接能力”等潜在问题,避免出现部分缺乏数字技能的人群因使用新技术而陷入数字鸿沟造成的健康不平等。

4 影响机制探讨与比较分析

互联网医院不是一种纯粹地取代线下医院的行为,二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关系,在实践过程中会对线下医疗利用产生“挤出效应”或者“互补效应”,这将由用户群体、技术能力、支付制度、医疗资源等多方面要素共同决定。基于前期已有的相关研究及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的调研发现,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机制探讨互联网医院对线下医疗利用行为的影响过程。

4.1 用户结构与数字素养

不同年龄、职业、教育水平的人们对于线上医疗的应用行为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像年轻人、高学历者群体会运用互联网医院的“省时便捷”优势来完成自身的轻症问诊或日常保健等工作,并导致轻度的“挤出”,而老年人线上就医更多的只是将线上服务当做线下的延申和服务的补充(如线上复诊、线上康复指导、线上慢病追踪),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互补性”的特征。

正如研究所用问卷调查所示,虽然年龄大的群体缺乏技术能力,但是在辅助工具或者有家人的帮助下可以接受并且愿意付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因此可以通过优化平台设计以及服务适配,来影响影响老年人群体的态度方向。

4.2 数字基础设施与平台成熟度

互联网医院服务效率高低取决于所在区域技术、平台支撑能力情况,像深圳、广州地区宽频覆盖率高、有医保系统、有电子健康档案等,为互联网医院提供较好的服务平台,利于实现线上线下的互相补充作用;而一些数字基础设施较弱的城市,由于网络卡顿或者不稳定以及和医保信息无法对接等因素,导致互联网医院无法完全取代线下工作流程,容易产生重复就医、浪费资源的问题。

4.3 医保制度与支付激励

医保报销政策对于患者的行动选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尤其是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的群体而言,是否能将就诊服务纳进来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付费意愿,换句话说,是一种类似“价格弹性”的调节器——当互联网医院复诊服务被纳入到医保范畴之后,患者对于服务价格变动带来的敏感程度就会相应降低,使用次数也就会有所增加,出现一个较大的替代效应;而就广东的情况来看,在局部的部分城市已经把“互联网医院复诊+药品配送”纳入到了医保报销项目当中,这就使得一部分用户会选择转移到线上就医渠道,在一些尚未开展线上医保结算的城市里,用户更多的是将互联网医院视作“补充信息渠道”,还是会选择在线下进行到诊,因此医保政策的设计也会直接决定了平台的功能定位以及用户使用路径如何选择。

4.4 医疗资源分布与就诊动机

在医疗资源紧张或分布不均的城市,互联网医院常作为“初筛分流”入口,有助于缓解大医院压力;在资源丰富、患者更倾向专家面对面诊疗的区域,线上服务则可能成为“工具性替代”,具有一定挤出倾向。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展开对于互联网医院是否会“挤出”线下医疗服务的讨论,发现互联网医院在轻症问诊和常规复诊等环节具有一定替代性,具有一定的轻度“挤出效应”,在慢病管理、精神健康等场景则表现为一种补充、延伸的作用,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该种两面性状况的产生,缘于用户群、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医保支付机制以及医疗资源分布等因素共同影响所致。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有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一是要完善医保支付机制,扩大线上医保的覆盖范围,比如可以先从复诊、续方这样的场景入手做远程结算的试点,减轻患者的负担,提高患者的黏性;二是加强对用户群体,特别是一些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进行数字健康方面的教育,比如说可以让家人来教他们怎么使用这些产品,或者在产品界面上多增加一些如语音输入等更加方便用户使用的功能;三是建立互联网医院服务平台的规范化和监督机制,保证服务质量,加强信息安全,以及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相关制度建设。

本文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以及调研等方式得出结论,并未涉及用真实挂号或者医保结算数据来进行实证回归

方面的研究。未来可以结合多城市样本、宏观数据库等运用更多的因素来更加量化各条途径具体的影响,从而使后续研究更具科学性及其可推广性。

参考文献:

- [1] 张文君, 赵蕾. 数字健康鸿沟的代际差异及其对策[J]. 中国医院管理, 2023, 43(2): 28-31.
- [2] Dorsey E R, Topol E J. Telemedicine 2020 and the next decade[J]. Lancet, 2020, 395(10227): 859.
- [3] Liu Y, Jin H, Yu Z, et al. Impact of Internet Hospital Consultations on Outpatient Visits and Expenses: Quasi-Experimental Study[J]. J Med Internet Res, 2024, 26:e57609.
- [4] Liu R, Zhang H, Yu L, et al.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Hospitals in the Diseas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Retrospective Study[J]. J Med Internet Res, 2025, 27:e60019.
- [5] Jing R, Lai X, Li L, et al. Internet use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C Geriatrics, 2025, 25:150.
- [6] Patel S Y, Mehrotra A, Lin M, et al. Variation in Telemedicine Use and Outpatient Car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J]. Health Affairs, 2021, 40(2): 349-358.
- [7] 王伟, 刘晨阳. 互联网医院对三级医院门诊量影响研究[J]. 中国卫生经济, 2021, 40(5): 34-37.
- [8]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 [S]. 2019.
- [9] Chen, X., Wu, X., Zhang, Q.等. 中国互联网医院的建设与运营模式: 一项基于医院的调查研究. BMC Health Serv Res , 23, 669 (2023). <https://doi.org/10.1186/s12913-023-09675-2>
-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4) [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24.
- [11] Du, Liulin & Fan, Yujun & Wang, Peixi. (2022). Equ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hospitals' health resource alloc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21. 10.1186/s12939-022-01741-1.

The Impact of Internet Hospital Expansion on Offline Medical Treatment Behavior: Crowding Out or Complementarity—Based on Polic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China

Xu, Wencong, Mai, Yongxin

(School of Health and Medical Science,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Fosh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net Plus Healthcare” initiative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hospital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row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otential substitution effect of online services on traditional offline medical care. Based on the “substitution–complementari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expansion of internet hospitals influences offline healthcare utiliz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regional policies and platform development practices. Under the premise that online services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offline visits, the impact of online versus offline services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healthcare demand: online services primarily serve as substitutes for minor illnesses and prescription renewals, while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mental health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follow-ups, they tend to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Drawing on previous data and findings from the author’s research team, it is evident that middle-ag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re generally receptive to internet-based healthcare services, providing indirect evidence of the supplementary value of online platforms. On this basi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Keywords: Internet hospitals; offline healthcare services; substitution effect; complementarity effect; Greater Bay Area

健康素养视角下高校助力社区医养服务路径研究

钟海权 赵晓沁 赵隽鹏

(广东东软学院健康医疗科技学院, 广东佛山 528200)

摘要: 目的: 以健康素养为视角, 探讨高校助力社区医养服务的可行路径, 为优化老年人健康管理和社区医养资源整合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方法: 以佛山市顺德区 106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评估其健康素养水平 (涵盖信息获取、理解、应用三个维度) 和社区服务现状, 同时结合教育实践经验提出高校介入的优化策略。结果与分析: 健康素养整体较高, 但有 15.1% 的人群素养较低, 尤其在信息辨别和分享能力上存在不足。大多数人通过人际网络获取健康知识, 但 60.4% 的人理解有困难。社区医养服务聚焦生活方式指导 (85.8%) 和慢性病管理 (70.8%), 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不足 (13.2%), 服务人员以医务人员 (86.8%) 和社工 (62.3%) 为主, 专业性和多样性待提升。为此, 建议高校开发方言化的教育内容, 建立多方协作体系, 利用数字化课程覆盖更多用户, 并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整合慢性病和心理支持课程。结论: 高校或可通过专业化、本土化与数字化手段弥补社区医养服务的资源短板, 为健康老龄化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 医养结合; 健康素养; 老龄化; 高校介入; 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 广东东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2024DRXJ02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7

1. 引言

1.1. 健康中国背景下老年群体的健康素养现状

目前, 我国正面临老龄化挑战。数据显示, 2021 年底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2.67 亿, 占到总人口 18.9%^[1]。可见, 老年人口占社会人口的比例已处于一个高位, 老年人健康问题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而健康素养即个人获取、理解和运用健康信息与服务的能力对减少老年人健康问题有显著影响, 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或许是应对老年人健康问题的较好的措施之一。然而, 目前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普遍健康素养低, 提升也较为缓慢^[2-3]。《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提出, 到 2030 年国民健康素养水平应达到 $\geq 30\%$, 因此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显得尤为紧迫^[2]。

1.2. 国内外社区医养服务现状

目前解决社区老年人健康问题存在挑战, 需多方面参与。“医养结合”是集医疗、护理、康复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 超越传统养老服务, 将医疗与养老结合, 注重老年人医疗保健等方面。根据《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 (试行)》, “医”包括预防保健等, “养”涵盖生活照料^[4]等。这种模式是应对社区老年人健康问题的一个方向。

我国已探索形成四种医养服务体系, 包括签约合作等模式^[5]。比如广州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香港采取相关照顾服务制度, 澳门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的医养结合体系^[6-7]。

发达国家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模式较为成熟。例如, 日本社区医疗和养老服务“小而全”, 像“新宿桦园”与多机构合作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8]; 美国的全方位养老服务计划 (PACE) 模式为低收入、失能老年人^[9]提供一站式

作者简介: 钟海权(1993—),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健康服务与管理;

赵晓沁(1986—), 女, 硕士, 主治医师, 研究方向为中医养生;

赵隽鹏(1992—),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临床医学。

通讯作者: 赵晓沁

服务；新加坡的区域医疗保健系统（RHS）纵向整合医疗和养老资源，控制医疗成本^[10]并保证质量。

1.3. 高校参与社区医养服务现状

目前，高校在社区医养服务中的参与度不高^[11-12]。然而高校本身也有承担社会服务的要求。高校介入社区医养服务多是临时性项目或零星的志愿活动等，与社区的联系不密切，这让高校的专业知识储备和人才优势未能得到有效的挖掘和运用^[12]。与此同时，社区人力资源紧张，且多数社区服务提供者以社会工作者为主，缺乏医学和健康领域的专业背景，这也影响社区医养服务的提供质量^[13]。此外，当前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多面临难以开展的问题，需要探索有效的解决策略^[14]。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问卷调查部分，本研究随机选取了佛山市顺德区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所服务的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社区工作人员在问卷分发与访谈中提供协助。问卷设计参考陈伟坚研究框架，涵盖老年人基本信息、健康素养、健康教育信息获取途径及实施状况等多维度^[15]。因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题项多，可能影响数据采集，故健康素养评分参考老年人简短健康素养评估量表^[16]，以高效收集数据，该量表总分 0 - 50 分，得分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共发放问卷 114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6 份，有效回收率 93%。研究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以描述性分析方法（如频数分析等）处理分析数据，并结合教育实践经验思考。

3. 社区老年人健康素养及医养服务现状

3.1. 基本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大部分为女性（84.9%），年龄分布较均衡，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78.3%为小学及以下学历，仅 0.9%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家庭支持网络较完善（65.1%与子女同住），职业以农民（39.6%）和自由职业者（16.0%）为主，丧偶比例较高（36.8%）

3.2. 健康素养现状

健康素养调查问卷通过 10 个简单而核心的问题（A1-A10），从健康信息获取、理解、应用三个维度对顺德区老年人的健康素养进行量化评估。

3.2.1. 健康素养总分分布特征

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健康素养总分均值为 36.83 ± 7.798 ，中位数为 40 分，整体水平中等偏上，但部分个体差异显著（全距 40 分）。从分布来看，超六成（62.3%）老年人得分达到 40 分及以上，22.6%的受访者处于 30-39 分区间，而健康素养中等水平（20-29 分）和低水平（ ≤ 19 分）群体分别占 12.3%和 2.8%。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 $P < 0.001$ ）。

3.2.2. 健康素养各维度能力差异

调查群体整体得分中等偏上，但不同健康素养能力有差异。如医患沟通能力（A7）突出，86.8%老年人能清晰描述健康问题，说明表达能力普遍较好；健康信息筛选能力（A5）也较好，81.1%受访者主动选择健康信息，表明健康意识主动，也侧面说明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契合人群需求。然而，信息分享与判断能力需关注。健康信息分享能力（A8）显示约 22.6%老年人分享困难，提示社交渠道传播效能待提升；健康信息判断能力（A6）显示 25.5%老年人有辨别障碍，与问卷 B2 中 33.0%老年人无法分辨信息真伪倾向一致，表明培养健康信息鉴别能力紧迫。（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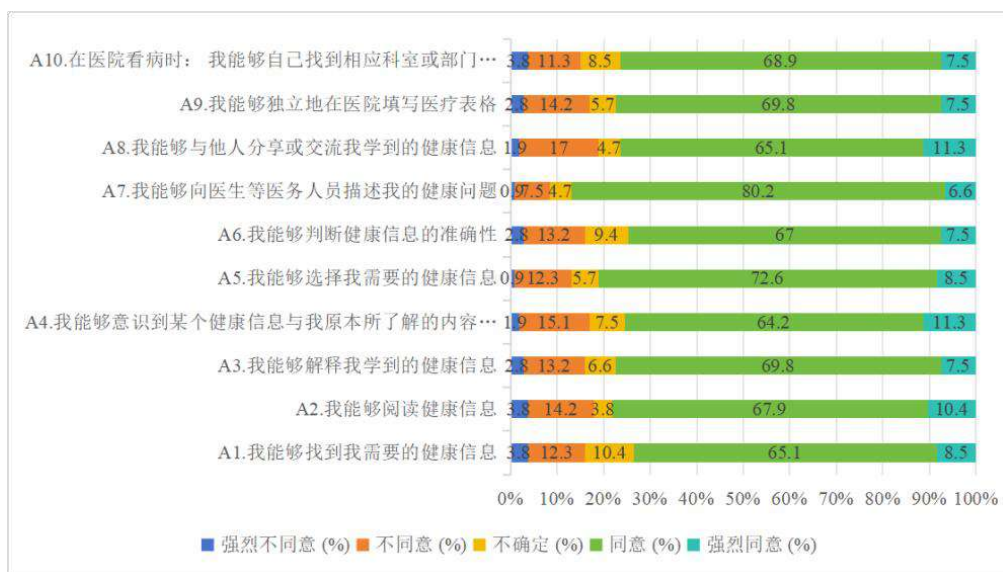


图 1 健康素养各维度能力差异 (n=106)

3.3.健康知识获取特征

老年人获取健康知识途径存在明显偏好差异。数据显示，朋友、同事或邻居是主要信息来源，占比 70.8%，家庭成员作用也较大，占 34.9%，表明老年人倾向通过亲和人际网络获取信息。此外，就诊时与医护人员一对一交谈也是主要途径，占 43.4%，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更信任医护人员提供知识的准确性。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作用相对较小，分别占 2.8%和 11.3%，可能与老年人阅读习惯变化或媒体内容契合度不高有关。值得注意的是，19.8%的老年人会通过手机获取信息，提示不能忽视线上网络传播途径（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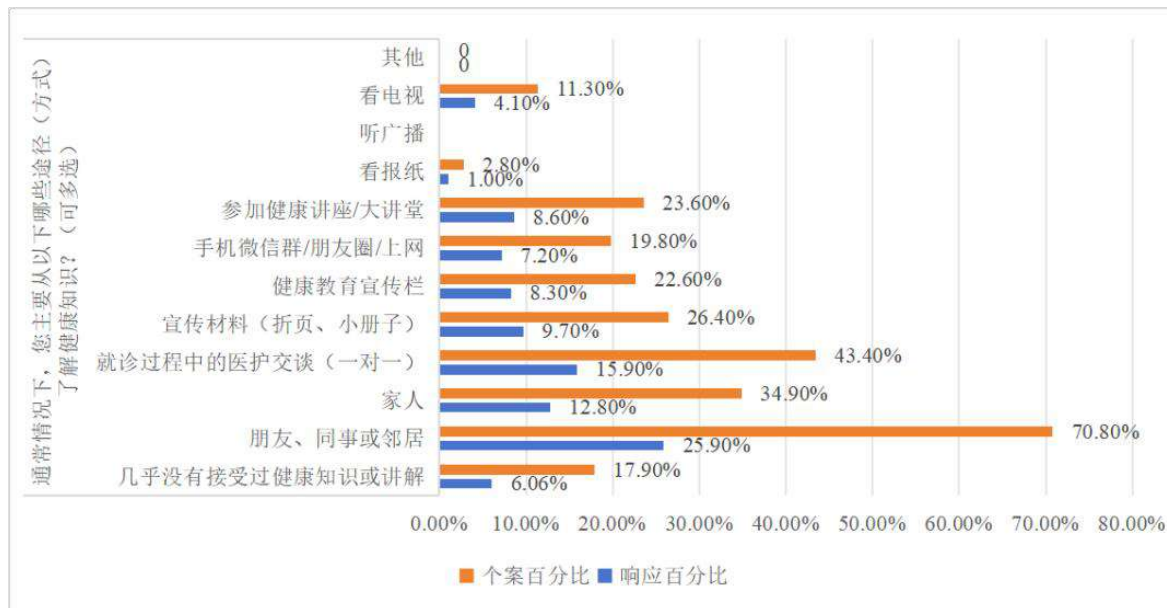


图 2 健康知识获取途径 (n=106)

通过秩和检验比较不同健康知识获取途径的健康素养水平，结果显示，通过朋友、同事、邻居或家人获取健康知识的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有显著优势 ($U=1798.00$, $P<0.01$; $U=2041.50$, $P<0.01$)，其他途径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强关系”网络的健康知识获取方式对提升健康素养影响较大。此外，就诊时与医护人员一对一交流信息准确性高，但效果不理想。

虽然老年人能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健康知识，但存在不知如何获得及处理知识的问题。调查显示，60.4%的老

年人理解健康知识材料或讲座有困难, 33.0%难以辨别信息真实性和科学性, 25.5%不清楚如何获取健康信息。这提示开展健康教育时, 要关注老年人理解能力和认知特点, 采用通俗易懂的传播方式, 获得专业指导, 进一步拓展和优化传播途径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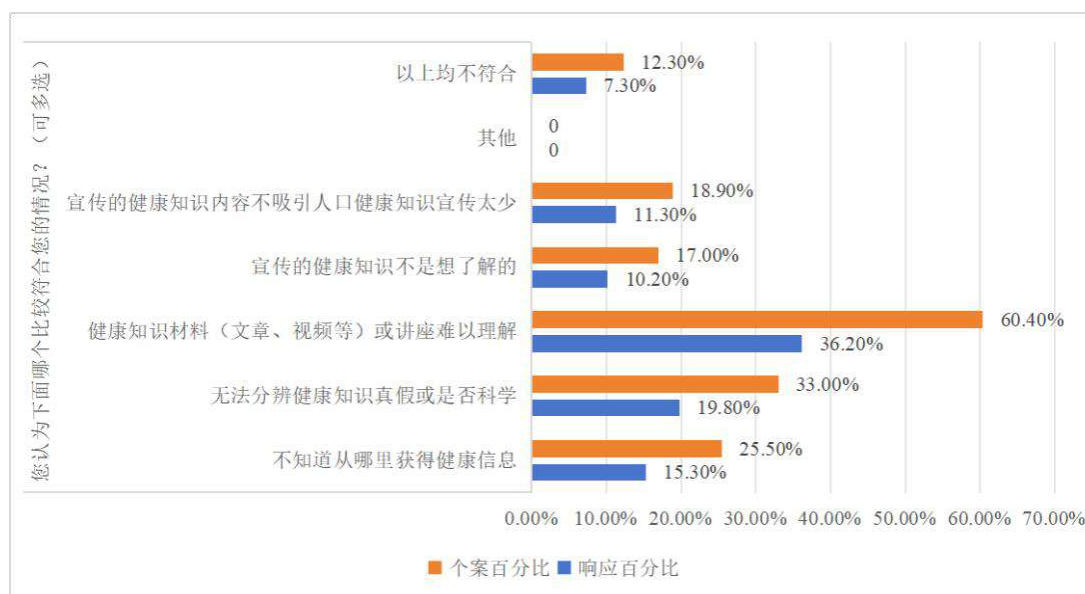


图 3 健康知识获取困难 (n=106)

针对每种情况分别进行独立的秩和检验, 结果显示, 除健康知识材料 (如文章、视频等) 或讲座难以理解这一困难外, 其他各类困难对健康素养水平平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U=1504.50$, $P<0.01$; $U=1648.00$, $P<0.01$; $U=1289.00$, $P<0.01$; $U=1205.00$, $P<0.01$)。理解困难在单独作用时影响可能较小, 而当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时, 可能才会显现出较为明显的影响。

而在倾向获取什么类型的健康教育内容方面同样也是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例如, 74.5%老年人想了解疾病知识和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此外, 慢性病自我管理的需求也较高, 占 63.2%。相对而言, 老年人对药物指导、急救知识和心理健康咨询的需求较低, 但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希望了解这些内容, 分别占 44.3%、20.8%和 7.5%, 这提示在提供健康教育内容时, 还要更多考虑到老年人的知识传播等常见领域的需求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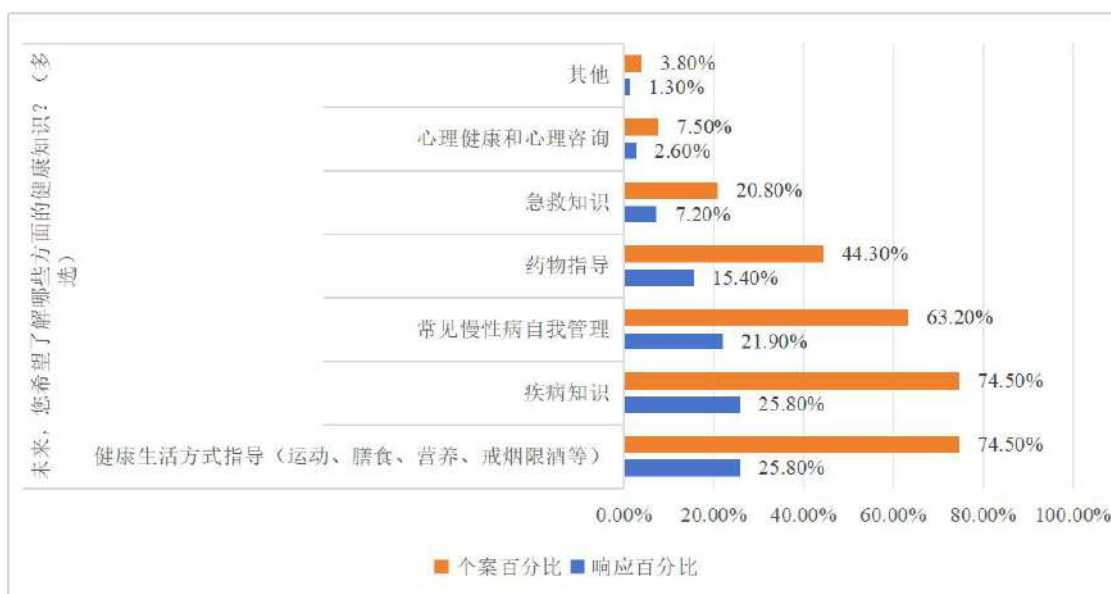


图 4 健康知识类型了解需求 (n=106)

从健康总得分水平及获取健康信息主动性 (A5) 看, 多数老年人较关注健康问题。调查数据显示, 对健康和健康知识非常关注与比较关注的人群合计占比达 89.6%, 而一般、比较不关注、非常不关注的仅占 10.4%, 这进一步表明, 老年人普遍重视健康问题且会主动寻求健康知识。

3.4. 社区医养服务现状

虽老年人主动健康意愿好, 但社区医养服务现状不足, 可能难满足其健康服务需求。调查显示, 95.3%受访者所在社区举办过健康宣讲活动, 仅 1.9%未举办, 表明社区健康教育普及率较高, 多数社区能定期开展活动。不过, 活动组织频率以“偶尔”为主, 占 50.9%, “经常”占 47.2%, “总是”仅占 1.9%, 这可能导致老年人获取健康知识机会不足。此外, 活动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指导 (85.8%) 和慢性病管理 (70.8%), 药物指导 (41.5%)、急救技能 (23.6%) 普及程度较低, 心理健康知识覆盖率仅 13.2% (图 5), 这虽然与前面提到的老年人对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倾向较为一致, 但可能还有部分有必要的需求还没有较好地挖掘出来。此外, 社区医务人员 (86.8%) 和社工 (62.3%) 是社区健康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参与者, 而心理咨询师 (8.7%) 和志愿者 (15.1%) 的参与程度明显偏低, 这一方面表明社区医务人员和社工在目前健康教育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服务人员还需多样化, 仅靠目前社区医务人员和社工可能无法满足愈发严峻的社区老年人健康问题 (图 6)。



图 5 社区健康教育宣讲活动的内容 (n=106)



图 6 社区组织老年健康教育活动的组织人员 (n=106)

4. 高校介入社区医养服务的可行路径

以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相关高校为例, 高校有专业知识技能资源, 能为社区提供优质医养服务, 提升专业性和科学性; 可开展教学实践, 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 科研能力强, 能为服务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促进模式创新; 还可整合社会资源, 多方协作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4.1. 提升健康信息传播效能

数据显示, 部分受访群体健康素养低, 老年人难辨健康信息真伪。高校可构建“专业教师-学生团队-社区骨干”协作体系, 开发模块化健康信息鉴别课程, 采用“讲-演-练”模式, 帮助群体掌握实操技巧。此外, 多数老年人依赖人际网络获取信息, 高校可培训社区老年志愿者, 通过其人际网络传播健康知识。

4.2. 优化健康教育内容与形式

针对低文化程度人群, 高校可将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本地化表达, 降低学习负担。同时, 研发图文并茂的线上课程, 覆盖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群体, 提升学习趣味性和高效性, 提供便捷学习途径。

4.3. 强化社区服务支持

社区老年人对预防性健康管理需求显著, 但心理健康咨询需求低, 可能与认知偏差有关。现有服务中, 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不足, 高校可开发复合型课程, 融入心理调适方法, 提升心理健康服务接受度。对于需求较低的领域, 可结合老年人信息获取特点, 协助社区工作者开展活动, 提升高需求服务专业性, 拓展潜在需求服务边界。此外, 高校可建课程、实践、研究合作模式, 纳社区服务入课程, 输送医养人才。增强服务连贯性, 并可收集数据评估助学生科研。

5. 讨论

本研究分析顺德区老年人健康状况, 探讨高校介入社区医养服务的方式。62.3%老年人健康素养得分较高, 15.1%较低, 薄弱环节在健康信息辨别和分享能力。89.6%的老年人对健康知识关注度高, 提升其健康素养很有必要。从个人角度, 60.4%的人难理解健康教育材料, 信息获取依赖人际网络影响传播效果。从社区医养服务看, 活动开展频率高、内容符合需求, 但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等领域易被忽视, 服务人员构成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高校可解决上述问题, 针对老年人文化程度低, 将医学知识通俗化; 培养活跃老人为“健康宣传员”; 为使用手机的老人开发在线课程或语音讲解。在服务可持续性上, 探索长期合作机制, 将社区服务纳入学生实践课程。

研究存在局限性, 如样本女性比例高、样本量少、缺乏深入统计分析方法、健康素养评估工具误差大等影响结果代表性。未来需扩大调查范围、增大数据量、用更精准评估工具、应用深入统计分析方法, 跟踪高校介入效果, 为改善社区医养服务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 [1]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 (第一号)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基本情况[Z], 2021.
- [2]杜维婧,李英华,聂雪琼,等. 我国 60~69 岁老年人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15, 31(02): 129-133.
- [3]石名菲,李英华,刘莹钰,等. 2012-2017 年 60~69 岁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19, 35(11): 963-966, 988.
- [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指南 (试行) [Z], 2023.
-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介绍医养结合工作进展成效有关情况[Z], 2021.
- [6]蔡金娜,张瑞秋,朱国栋. 国内外医养结合模式与效果评估研究进展[J]. 老年医学研究, 2024, 5(01): 68-73.
- [7]郭林. 香港养老服务的发展经验及其启示[J]. 探索, 2013, (01): 150-154.
- [8]矾山优,王丽华,周颖. 位于日本东京都心的养老设施案例研究——“新宿榉园”医养结合的实践[J]. 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 2016, (05): 49-52.
- [9]蔡毅,崔丹,毛宗福. 美国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对中国的启示[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7, 10(01): 58-63.
- [10]Day Care Centers for Seniors in Singapore: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Ahead[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2015, 16(7):630.e7-630.e11.

- [11]季钢,茹凯,周军,等. 构建高校—企业—社区“三位一体”新型社区运动健康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C]//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墙报交流 (体质与健康分会), 2022: 583-584.
- [12]唐觅,罗伟,周红梅,等. 成都市校地合作的运动与健康促进研究[C]//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专题报告 (体育社会科学分会), 2022: 122-123.
- [13]陈琳,邢洁,毛绪朋. 医养结合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困境及其成因分析[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9, 19(06): 56-63, 71.
- [14]钟海权,张兆,徐文聪. 健康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案例[J], 2024, (44): (139-141).
- [15]陈伟坚.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佛山市顺德区老年人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桂林医学院, 2023
- [16]李少杰,崔光辉,徐慧兰. 老年人简短健康素养评估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3, 48(01): 123-128

Research on University-Assisted Community Healthcare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 Path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Literacy

Zhong, Haiquan, Zhao, Xiaoqin, Zhao, Junpeng

(School of Health and Medical Science,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Foshan,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feasible pathway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community medical and care services from a health literacy perspective,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for optimising elderly health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ng community medical and care resourc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06 elderly residents i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assessing their health literacy levels (covering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mprehension, and application dimensions) and current community service access. Optimisation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intervention were proposed based on educational practice experience. Results and Analysis: Overall health literacy was relatively high, though 15.1% exhibited low literacy, particularly in information discernment and sharing capabilities. Most acquired health knowledge through interpersonal networks, yet 60.4% reported comprehension difficulties. Community healthcare services prioritised lifestyle guidance (85.8%) and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70.8%), with insuffici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13.2%). Service providers were predominantly medical staff (86.8%) and social workers (62.3%), indicating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professionalism and diversity. Consequent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universities develop dialect-specific educational content, establish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frameworks, utilise digital courses to reach broader audiences, and create sustainable partnership models integrating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programmes. Conclusi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ay address resource gaps in community healthcare services through professionalisation, localisation, and digitalisation,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for healthy ageing.

Keywords: integrated healthcare and elderly care; health literacy; ageing; university intervention; health education

全球大变局下的时代本质与人类发展方向： 基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

李佳雪

(兴安盟委党校, 内蒙古 兴安盟 137400)

摘要: 当前, 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社会面临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冲突、全球性危机频发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 回答“世界怎么了”与“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 从理论内涵、实践意义、全球挑战与应对路径等方面, 系统探讨了科学回答时代命题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策略。研究表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倡导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与共同价值, 是应对全球变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实践,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与力量。未来, 应深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变局、时代命题、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609

当前, 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社会日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 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²。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 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正经历深度衰退, 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在这一背景下, 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与深刻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科学把握时代的本质, 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 深入探讨并回答“世界怎么了”和“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³。

面对这一时代命题, 既要科学解读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现实问题, 也要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十四五”期间,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聚焦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 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决策、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一系列努力, 哲学社会科学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并为正确解读时代命题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在这一过程中,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紧密结合时代背景, 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变化、新挑战, 特别是科技革命、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领域的重大议题。同时, 应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 以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回应时代之问。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还能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其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重要指引。

一、时代本质与阶段性特征

(一)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时代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了当前时代的本质: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⁴ 这一论断表明, 尽管全球社会在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人

作者简介: 李佳雪 (1996—), 女, 法学硕士, 兴安盟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² 习近平在中缅建交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上的致辞[EB/OL]. 新华社. https://www.ceps.gov.cn/xsxxk/zyls/202001/t20200118_137579.shtml. 20200117

³ 习近平: 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时代之题[EB/OL]. http://ex.cssn.cn/jjx/jjx_tpxw/202204/t20220427_5406137.shtml. 新华社. 20220427

⁴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9 日下午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EB/OL]. 央视网.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9/29/content_16545129.htm 20170929

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强国的主导之下,面临着经济衰退、周期性危机频发以及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合理的现状。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二) 全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加剧,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逐渐衰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俄乌冲突的爆发,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更加混乱,增长动能显著不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与深刻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步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阶段⁵。

(三) 中国在时代变局中的角色

从全球视角来看,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問題日益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世界格局注入了新的动力,但也带来了新的竞争与矛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创新等一系列举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此外,科技进步既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也带来了伦理、安全、隐私等方面的挑战。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因此,正确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回答“世界怎么了”和“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前提。只有深刻把握全球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趋势,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准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二、人类发展方向的理论探索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世界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追问和哲学探索,同时也是随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展开的实践转化。面对这一时代之题,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全局,从整体性出发,提出了既符合人类共同愿望、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和行动方案。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影响力与世界话语权的重要理念⁷。总书记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打造利益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的整体上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明确指出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道路参照,同时也深刻体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融入世界文明塑造中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将“坚持胸怀天下”概括为十条历史经验之一,要求站在以整体性、全局性的视角上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探索人类社会共建共享,并为世界文明进步积极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⁸。

(三)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意义

⁵ 金民卿.科学回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J].求是,2019,01:19

⁶ 王淼,樊艳茹.历史生成、根本途径与现实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三维释读[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06):72-78.DOI:10.16433/j.cnki.cn41-1379.2024.06.004.

⁷ 陆鹏飞.深刻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J].当代教研论丛,2025,11(01):8-11.

⁸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EB/OL].https://www.baidu.com/link?url=BifgmV46EltXBeeFuVdd_tWNLbfmOf6ZMhpM3y2jW1mDUVSDuBmyFwpbsBH8_8QYX8SVeervJNMDzWq1TlnCqtbk4VAuB5g0GgywTYyry3&wd=&eqid=bace81e40002703000000003626fb346.新华社,2022-425

可以看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凝练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实践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使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需要主动承担起转折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愿景到现实,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三、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与贡献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国际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中国重大外交思想的有机融合。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⁹,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理论基础,还深刻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的价值目标、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及化解冲突的机制为核心,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¹⁰。

(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影响

自2013年首次提出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从理论倡议转化为国际共识。2017年,联合国将这一理念写入决议,标志着其从理念传播到实践推动的全过程完成。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持续深化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文明观,还展现了其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承担时代责任方面的重大价值。这一理念既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展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拓展与丰富,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要求。其核心使命在于为世界谋大同,坚持维护世界和平、引领全球繁荣、共创美好未来。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要科学回答“世界怎么了”和“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必须深刻把握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立足理论创新,加快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学术话语体系,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解构并深化这一理念,推动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升华。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次伟大“术语革命”。这一时代之题的科学回答,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愿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¹¹。”

结语: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应对全球挑战的科学路径,也是回答“世界怎么了”与“人类向何处去”时代命题的必然选择。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中国作为这一理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具体行动,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全球秩序,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与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王耀海.发挥法治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能动作用[J].学习与探索,2024,(12):11-17.
 刘志松.坚持在法治道路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J].求知,2024,(12):23-25.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意见[N].南方日报,2024-11-26(A02).DOI:10.28597/n.cnki.nnfri.2024.006964.
 石云霞,张心宇.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伟大纲领性文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⁹ 张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运用[J].大庆社会科学,2025,(01):15-20.

¹⁰ 吴荣,朱丹,生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高端论坛综述[J].社会科学动态,2018,(06)

¹¹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91.htm.新华社,2021.10.25

-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21):4-10.DOI:10.19865/j.cnki.xxdj.2024.21.001.
- 王森,樊艳茹.历史生成、根本途径与现实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三维释读[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06):72-78.DOI:10.16433/j.cnki.cn41-1379.2024.06.004.
- 陆鹏飞.深刻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J].当代教研论丛,2025,11(01):8-11.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EB/OL].https://www.baidu.com/link?url=Bifgmv46EltXBeeFuVdd_tWNLbfmOf6ZMhpM3y2jW1mDUVSDuBmyFwpbsBH8_8QYX8SVeervJNMDzWq1TlnCqtbkf4VAuB5g0GgywTYYry3&wd=&eqid=bace81e40002703000000003626fb346.新华社.2022-425
- 张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运用[J].大庆社会科学,2025,(01):15-20.
- 吴荣.朱丹.生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高端论坛综述[J].社会科学动态.2018,(06)
-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91.htm.新华社.2021.10.25

The Essence of the Era and the Direc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under Global Transformation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ased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Li Jiaxue

(Hinggan League Party School, Hinggan League,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economic recession, geopolitical conflicts, and frequent global cris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addressing the era's questions of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world?" and "Where is humanity heading?" has become a crucial task for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its core idea,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scientifically answering these era-defining qu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glob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e pathway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ffers new 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advocating for shared interests,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and shared values. It represents a scientific path for addressing global transformation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China has contributed wisdom and strength to building this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deep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to advance global governance toward a more equitable and rational direction.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Era-Defining Questions, Global Gover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s Approach

基于 CHARLS 数据的老年人糖尿病影响因素研究

王少锋 梁鸿

(广东东软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 糖尿病常引发心血管疾病、视网膜病变等多种并发症, 对个人健康和社会医疗体系造成巨大负担。为助力医疗机构与公众科学防控糖尿病, 本文基于 CHARLS (2020) 数据, 采用相关性分析与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各类因素对糖尿病患病的影响。结果表明, 吸烟和年龄增长与糖尿病风险呈正相关; 而男性、农村居住、有配偶、有工资收入及南方地区居住则具有保护作用, 可降低患病概率; 运动得分与饮酒频率影响微弱, 基本可忽略。由于类别 0 (未患病) 样本远多于类别 1 (患病), 模型倾向预测多数类, 导致准确率仅为 54%; 优化后类别 1 的评估指标有所改善; ROC AUC 接近 0.5, 提示模型区分能力有限。据此, 预防糖尿病应从戒烟限酒、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合理膳食、调节情绪等方面入手。糖尿病的干预需整合健康教育、营养管理、运动疗法、血糖监测与药物治疗, 实施综合管理。

关键词: 相关性分析; 逻辑回归; 糖尿病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611

1 研究背景和目的

糖尿病是一种影响全球范围内人群健康的慢性疾病。其特点是慢性高血糖、伴有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障碍, 导致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 造成多种器官的慢性损伤、功能障碍甚至衰竭^[1], 根据 WHO 和 IDF 分类, 糖尿病分为 1 型、2 型、其他特殊类型和妊娠期糖尿病, 其中 2 型占 90% 以上, 主要表现为“三多一少”。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20) 数据显示, 2018 年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 1.88 亿。患病率持续上升, 2010 年为 7.51%, 2018 年达 13.36%。糖尿病易引发心血管疾病、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 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深入分析其危险因素, 对预防控制、降低发病率和改善公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 CHARLS 数据, 通过相关性分析和逻辑回归模型探究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旨在为疾病预防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有助于识别关键影响因素, 指导医疗单位和个人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降低糖尿病发生风险。

2 文献综述

2.1 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

据《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7 年版)》资料^[2],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 从 1980 年的 0.67%, 增加至 2013 年的 10.9%。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020 年) 的数据显示, 我国 60 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约 7920 万, 占了 60 岁以上人口的 18.70%^[3]。

糖尿病流行病学特点以 2 型糖尿病为主要、常见类型, 占 90% 以上; 存在地区差异性, 发达地区明显高于不发达地区, 城市高于农村^[4]。

2.2 糖尿病的危险因素研究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病, 其病因是由多种引起因素的糖代谢紊乱, 因此其危险因素往往具有多样性。有学者指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以及良好休息会有效预防糖尿病和降低糖尿病发病率^[5]。也有学者认为, 空腹血糖和口服葡萄糖耐量水平与糖尿病诊断具有显著相关性, 与糖尿病患病率呈现正相关^[6]。此外, 有研究分析,

作者简介: 王少锋(1988—), 男, 硕士, 广东东软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医疗信息化, 慢病数据分析;

梁 鸿(2002—), 男, 广东东软学院 2021 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通讯作者: 王少锋

高血压、家族史、糖调节受损、超重以及年龄也是影响糖尿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7]。糖尿病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家族史、人口特征、体测指标、心脑血管状况及生化指标。性别影响尚存争议，有研究认为无关^[8]，亦有指出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9]。

2.3 逻辑回归模型在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逻辑回归模型可综合多因素分析糖尿病风险，揭示发病规律。研究表明其在准确率、敏感度及 AUC 等方面表现良好，稳定性与泛化能力强，适用于糖尿病风险预测与辅助诊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10]。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和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20 年的调查数据。

3.2 研究工具

使用 SPSS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使用 Python 中数据分析相关库建立逻辑回归模型。

3.3 数据预处理

对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所在的行进行删除。

3.4 被解释变量

以医生是否告诉自己患有糖尿病为因变量。在是否患糖尿病中，来自问卷中 DA003 列，对应的问卷题目为“是否有医生告诉自己患有糖尿病”，答案有两个选项，分别是“有”、“无”。在将分类变量由文本转换为数值时，患有糖尿病为 1，没有患糖尿病为 0。

3.5 解释变量

以运动得分、年龄、是否吸烟、饮酒频率、性别、一般居住地、有无配偶、有无工资以及所在地为南方或者北方作为自变量。

在运动得分中，将每周有无至少做高/中/低强度运动十分钟和每周做几天高/中/低强度运动至少十分钟两种类别变量，设定高强度运动 3 分/天，中强度运动 2 分/天，低强度运动 1 分/天，最后计算合计分数，即运动得分；

在一般居住地因素中，来自问卷中 BA008 列，对应的问卷题目为“一般居住地城乡类别”，答案有四个选项，分别是“城或镇中心区”、“城乡或镇乡结合区”、“农村”、“特殊区域”。在将分类变量由文本转换为数值时，城或镇中心为 1，城乡结合地区为 2，乡村为 3，特殊区域为 4；

在工资因素中，过去一年内有工资为 1，没有工资为 0；

在所在居住地为南方或者北方中，将所得到的 PSU 表格中的 communityID 列由 Python 代码转换成对应的省份信息，再将所得到的每个省份按照其地域划分转变成南方/北方。在将分类变量由文本转换为数值时，南方为 1，北方为 0。

3.6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计算相关系数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11]。本文选择皮尔逊卡方检验，因为皮尔逊卡方检验适用于线性关系的测量，并且数据呈正态分布。

3.7 逻辑回归模型

本文逻辑回归模型的构建主要步骤如下。

1. 数据集划分

训练集中有 8214 个样本，每个样本有 9 个特征；测试集中 2054 个样本，每个样本有 9 个特征。

2. 模型优化

根据训练集里类别 0 和类别 1 的样本量比例，对类别 1 进行过采样，使得类别 0 和类别 1 的最终样本量大致

相等，避免模型数据不平衡的情况。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分析结果

根据 CHARLS (2020) 调查数据，剔除其中年龄小于 45 岁以下的对象和缺失数据，本文最终纳入的例数有 10268 例，患有糖尿病的有 570 例，患病率为 5.55%。其中女性有 8352 例，占总体样本的 81.34%；男性有 1916 例，占总体样本的 18.66%。

4.2 相关性分析结果

本文的变量分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卡方检验。

4.2.1 不同年龄段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年龄分段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1。

表 4.1 是否患有糖尿病*年龄分段交叉表

	年龄段 0	年龄段 1	年龄段 2	年龄段 3	总计
未患糖尿病	5000	3777	885	36	9698
患有糖尿病	237	276	57	0	570
总计	5237	4053	942	36	10268

45–60 岁糖尿病阳性率 4.53%，61–75 岁升至 6.81%，76–90 岁为 6.05%，91–107 岁为 0%（样本仅 36 人）。卡方检验显示年龄分段与糖尿病患病率显著相关（ $\chi^2=25.318$ ， $p<0.001$ ），表明两者存在统计学关联。

4.2.2 不同运动得分分段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运动得分分段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2。

表 4.2 是否患有糖尿病*运动得分分段交叉表

	分段 0	分段 1	分段 2	分段 3	总计
未患糖尿病	3771	3638	1244	1045	9698
患有糖尿病	229	221	67	53	570
总计	4000	3859	1311	1098	10268

运动得分 0–10 分组糖尿病阳性率 5.73%，11–21 分组为 5.73%，22–32 分组为 5.11%，33–42 分组为 4.83%。卡方检验显示运动得分分段与糖尿病患病率无显著关联（ $\chi^2=2.041$ ， $df=3$ ，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两者无显著相关性。

4.2.3 不同性别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3。

表 4.3 是否患有糖尿病*性别交叉表

	性别女 0	性别男 1	总计
未患糖尿病	7887	1811	9698
患有糖尿病	465	105	570
总计	8352	1916	10268

女性糖尿病阳性率 5.6%，男性为 5.5%。卡方检验显示性别与糖尿病患病率无显著关联（ $\chi^2=0.023$ ， $p=0.8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两者独立，性别可能不影响患病风险。但现有研究提示女性或具代谢保护作用^[6]，需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分析。

4.2.4 是否吸烟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吸烟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4。

表 4.4 是否患有糖尿病*是否吸烟交叉表

	不吸烟 0	吸烟 1	总计
--	-------	------	----

未患糖尿病	9344	354	9698
患有糖尿病	536	34	570
总计	9880	388	10268

不吸烟者糖尿病阳性率 5.4%，吸烟者为 8.8%。卡方检验显示吸烟与糖尿病患病率显著相关 ($\chi^2=7.933$, $p=0.005<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拒绝原假设，表明吸烟与糖尿病呈正相关，是其危险因素之一。

4.2.5 饮酒频率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饮酒频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5。

表 4.5 是否患有糖尿病*饮酒频率交叉表

	从来不饮酒	一个月<1次	一个月>1次	总计
未患糖尿病	7411	883	1404	9698
患有糖尿病	446	45	79	570
总计	7857	928	1483	10268

从不饮酒者糖尿病阳性率 5.7%，每月饮酒少于一次为 4.8%，多于一次为 5.3%。卡方检验显示饮酒频率与糖尿病无显著关联 ($\chi^2=1.250$, $p=0.535>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两者独立。尽管饮酒可能影响患者生活质量^[9]，但本数据中未发现其与患病率显著相关，需结合其他研究进一步分析。

4.2.6 有无配偶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有无配偶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6。

表 4.6 是否患有糖尿病*有无配偶交叉表

	无配偶 0	有配偶 1	总计
未患糖尿病	1725	7973	9698
患有糖尿病	119	451	570
总计	1844	8424	10268

无配偶者糖尿病阳性率 6.4%，有配偶者为 5.3%。卡方检验显示两者无显著关联 ($\chi^2=3.489$, $p=0.062>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有无配偶与糖尿病患病率无显著相关性，在本数据中未发现其对患病风险有显著影响。

4.2.7 有无工资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有无工资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17。

表 4.7 是否患有糖尿病*有无工资交叉表

	无工资 0	有工资 1	总计
未患糖尿病	7511	2187	9698
患有糖尿病	476	94	570
总计	7987	2281	10268

无工资收入者糖尿病阳性率 6.0%，有工资收入者为 4.1%。卡方检验显示两者显著相关 ($\chi^2=11.441$, $df=1$, $p=0.001<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是否有工资收入与糖尿病患病率存在显著关联，有收入者患病风险较低。

4.2.8 居住地类别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居住地类别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8。

表 4.8 是否患有糖尿病*居住地类别交叉表

	市中心 1	城乡结合 2	乡村 3	特殊区域 4	总计
未患糖尿病	2419	1161	6111	7	9698
患有糖尿病	154	77	339	0	570
总计	2573	1238	6450	7	10268

市中心居民糖尿病阳性率 6.0%，城乡结合部为 6.2%，乡村为 5.3%，特殊区域为 0%。卡方检验显示居住地与糖尿病无显著关联 ($\chi^2=3.465$, $p=0.325>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两者独立。尽管部分研究提示居住地可能影响患病风险^[5,10]，但本数据未发现显著相关性。

4.2.9 南北方对患糖尿病影响情况

糖尿病与南北方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9。

表 4.9 是否患有糖尿病*南北方交叉表

	北方 0	南方 1	总计
未患糖尿病	4397	5301	9698
患有糖尿病	287	283	570
总计	4684	5584	10268

北方居民糖尿病阳性率 6.1%，南方为 5.1%。卡方检验显示地区与糖尿病患病率显著相关 ($\chi^2=5.451$, $p=0.020<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所在省份与糖尿病风险存在显著关联，北方地区患病率更高。

4.3 逻辑回归分析

4.3.1 解释变量影响情况

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在模型构建阶段有调整不同类别权重和采取过采样的方法。逻辑回归模型系数和优势比见表 4.19。

表 4.10 逻辑回归模型系数表

特征变量	系数	优势比 (OR)	OR 排序
是否吸烟	0.6328	1.8829	1
运动得分	0.0048	1.0048	3
饮酒频率	-0.1019	0.9031	6
年龄	0.0153	1.0154	2
性别	-0.0528	0.9486	5
居住地类别	-0.1248	0.8827	7
有无配偶	-0.0286	0.9718	4
有无工资	-0.3041	0.7378	9
南北方	-0.2438	0.7837	8

逻辑回归显示：吸烟 (OR=1.8829) 与糖尿病风险正相关；有工资收入 (OR=0.7378)、南方居住 (OR=0.7837)、有配偶 (OR=0.9718) 为保护因素，降低患病风险。运动得分 (OR=1.0048)、饮酒频率 (OR=0.9031)、年龄 (OR=1.0154)、性别 (OR=0.9486) 和居住地城乡类别 (OR=0.8827) 影响微弱，接近 1，提示相关性较弱或不显著，需结合其他研究进一步验证。

4.3.2 模型性能分析

逻辑回归模型优化前后性能对比如下：优化前，模型准确率达 94%，但类别 1 召回率为 0，所有样本均被预测为类别 0，存在严重偏向。优化后，准确率降至 54%，但类别 1 召回率提升至 45%，精确率升至 6%，表明模型开始识别患病样本，F1 分数有所改善。宏平均和加权平均指标显示整体表现略有提升。然而，类别 0 召回率从 1.00 降至 0.55，假阳性显著增加。ROC AUC 值保持 0.53，接近随机水平，说明模型区分能力仍差。OR 值未变，提示特征权重未调整。结果表明，尽管过采样缓解了数据不平衡问题，模型对少数类识别能力有所提高，但整体性能仍不理想，需进一步优化特征选择与阈值设定。

5 讨论与建议

5.1 糖尿病危险因素的分析讨论

在本文中，按照逻辑回归模型系数表，是否吸烟和年龄是影响糖尿病患病率最重要的特征，其 OR 值大于 1，表明吸烟和年龄增加会增加糖尿病患病的可能性；男性、农村居住、有领工资、有配偶和南方居住会减少糖尿病患病的可能性；饮酒频率和运动得分对糖尿病患病率的影响非常小。

5.2 与既有研究的对比

5.2.1 逻辑回归模型性能对比

在本实验中,该模型效果在预测类别 0 时的表现上比类别 1 的好,并且该模型的 AUC 值只有 53%,而李婷等人的实验研究的逻辑回归模型的 AUC 值达到了 82%^[10],马文彬等人研究的逻辑回归模型的 AUC 值达到了 90.3%^[12]、郑家浩等人研究的逻辑回归模型的 AUC 值也达到了 90.4%^[13]。可能是因为本文的类别 0 的样本数量比类别 1 太多,导致数据不平衡,已经在模型构建阶段有调整不同类别权重和采取过采样的方法,但仍旧不理想。

5.2.2 危险因素的对比

主要提取几个常见的因素进行对比。

在吸烟方面,本文提示吸烟量的增加会使糖尿病患病的可能性增加,而王金虹^[5]、郝家乐^[14]、苏银霞^[15]的研究也表明戒烟对维护健康和降低糖尿病发病率至关重要;

在年龄方面,本文提示年龄与糖尿病患病率呈正比,苏银霞^[15]、ZHE L^[9]、Asadi^[8]、彭若萱^[16]的研究也表明年龄的增长会导致糖尿病患病率的增长;

在饮酒频率方面,本文提示与糖尿病患病率呈弱负相关,而王金虹^[5]、郝家乐^[14]、苏银霞^[15]的研究以及医学常识表明饮酒会提高糖尿病患病率,因此有可能是本文患有糖尿病的样本数与没有患糖尿病的样本数严重不平衡导致的;

在运动方面,本文提示运动对糖尿病患病率的影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王金虹^[5]、王旭^[7]的研究表明运动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有可能是本研究样本量不足造成的,或者可能是运动得分的计算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

在性别方面,本文的相关性分析提示,女性患糖尿病的几率 (0.055%) 比男性 (0.054%) 大 0.001%,而 ZHE L^[9]的研究表明女性身份是糖尿病患病的保护因素,而 Asadi^[8]、王海霞^[17]的研究提示性别与糖尿病患病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可能是女性样本量比男性多,女性样本量占总体样本的 81.34%;

在居住地方面,本文认为在农村居住的糖尿病患病的可能性会低于在城市居住,而有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城市地区的糖尿病患病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可能是农村体力活动比城市更多;

在所在地为南方或者北方方面,本文的相关性分析提示,所在地为南方或者北方与糖尿病患病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结合逻辑回归分析和交叉表,发现居住在南方的人与糖尿病患病率呈负相关,表明南方人的糖尿病患病率比北方人低,可能是因为北方口味较重,南方口味较淡,并且南方饮食习惯更多以水稻为主食,北方更多以小麦为主食。

5.3 预防与干预措施的建议

基于研究结果,建议从生活方式入手预防糖尿病:戒烟限酒,因吸烟显著增加患病风险;注意地域差异,南方居住者风险较低,可能与以大米为主食和较北方清淡的饮食习惯有关;有配偶者风险较低,提示家庭支持的重要性。糖尿病的干预应遵循早期发现、长期管理的原则,综合实施教育、营养、运动、监测和药物治疗。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结合相关性分析与逻辑回归模型探讨老年人糖尿病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吸烟和年龄增长显著增加患病风险,而男性、南方居住、有工资收入等具有保护作用;运动与配偶状况影响微弱,饮酒呈弱负相关,与部分既有研究存在差异,可能源于数据不平衡或样本偏差。尽管过采样优化提升了少数类识别能力,但模型整体区分度仍较低 (AUC=0.53),提示需进一步优化特征选择与建模方法。研究创新在于引入南北方地域差异分析,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然而,受限于数据不平衡及变量广度,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可构建更全面问卷,纳入更多临床与行为变量,并尝试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模型进行比较,以提升预测性能。本研究为糖尿病风险因素识别提供了实证参考,也为个性化健康管理策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曾刚. 糖尿病一体化管理模式的需求评估研究[D].四川大学, 2005.
王富军, 丁海霞. 《中国老年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诊疗专家共识(2022 版)》解读[J].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2024, 45(11): 1241-1246.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 年版)[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8, 38(04): 292-344.
杨敏, 柳洁. 中国糖尿病防治现状[J].中国医学创新, 2014, 11(07): 149-151.

- 王金虹, 张晓薇, 马斌. 逻辑回归与关联分析膳食习惯对慢性代谢疾病的影响[J].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2021(20): 175-178.
- 王朝霞, 杨慧平, 苏伟, 等. 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研究[J/OL].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 2019, 4(8): 103-105.
- 王旭. 面向糖尿病就诊与随访信息的数据挖掘与分析[D].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2022.
- Asadi F, Fallahzadeh H, Rahmanian M. Determining the factors related to diabetes type II with mixed logistic regression[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ic research, 2016.
- ZHE L.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abnormal glucose metabolism with cumulative odds logistic regression[J/OL].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0.
- 李婷, 孙媛媛, 李雪玲, 等. 基于机器学习分类算法的糖尿病辅助诊断研究[J/OL].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4, 20(10): 27-29.
- 徐昌成. 成员合作关系的多样性与网络结构对知识创造的影响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 马文彬, 王克, 于滨, 等. 基于体检数据的糖尿病风险预测模型对比研究[J/OL]. 现代信息科技, 2020, 4(23): 72-75.
- 郑家浩, 王爱民, 于滨, 冯超南, 纪俊. 基于体检数据机器学习分析的糖尿病风险预测模型[J]. 青岛大学学报(工程技版), 2021, 36(02): 36-41.
- 郝家乐. 我国老年人糖尿病患病情况影响因素分析及危险等级评估[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22.
- 苏银霞, 王燕, 王婷婷, 马琦, 马艳, 王志强, 姚华. 新疆维吾尔族 2 型糖尿病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4, 37(10): 1253-1256+1260.
- 彭若萱. 延边地区不同民族教师糖代谢异常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吉林大学, 2019.
- 王海霞. 氯氮平所致精神分裂症患者血糖异常与 miRNAs 的表达变化研究[D]. 昆明医科大学, 202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abetes in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CHARLS 2020

Shaofeng Wang, Hong Liang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 Diabetes often leads to various complications such a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retinopathy, imposing a significant burden on individual health and the healthcare system. To support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public in the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abet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abetes based on CHARLS (2020) data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moking and increasing age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diabetes, while being male, residing in rural areas, having a spouse, receiving wages, and living in southern China have protective effects and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developing diabetes. Physical activity score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frequency show minimal impact and are nearly negligible. Due to the substantial imbalance between non-diabetic (class 0) and diabetic (class 1) samples, the model tends to predict the majority class, resulting in an accuracy of only 54%. After optimization, evaluation metrics for class 1 show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ROC AUC remains close to 0.5, indicating limited discriminative ability. Therefore, diabetes prevention should focus on smoking cessation, moderate alcohol consumption,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weight control, balanced diet,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Effective diabetes management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ntegrating health education,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exercise intervention,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and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Keywords: Correlation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 Diabetes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宋 怡¹ 黄巧婷¹ 许 杰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已成为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聚焦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路径, 从理论框架到实践路径展开系统研究。解析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逻辑框架, 构建“新要素-新技术-新业态”三大系统互动驱动模型, 提出体育旅游供应链集约化、管理链数字化、价值链绿色化、配置链高效化等高质量发展思路, 并系统探讨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政策支持不足、技术应用滞后、人才短缺、数据利用率低等核心挑战。结合实际, 针对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 提出完善政策保障体系、优化技术创新环境、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构建数据驱动平台等措施, 为体育旅游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体育旅游产业; 数字化转型; 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 四川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项目编号: XXTYCY2024A13); 成都大学校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2024XJJ0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60

1 引言

体育旅游产业作为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的产业形态, 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 体育旅游产业正经历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既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石, 亦能助力国民经济提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释放战略潜力。现今, 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协同驱动必然伴随重大技术迭代和新业态的演进, 体育产业继续依赖传统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和战略需求, 不足以支撑体育强国建设, 亟需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生产力质态。因此, 具有变革性、创新性、融合性、高效性的新质生产力成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鉴于此, 本研究以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解析和科学内涵解读为基础, 剖析其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价值、运行机理, 据此提出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2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2.1 供应链集约化, 促进体育旅游多业态融合与协同发展

当前, 体育旅游涉及多个行业领域, 包括旅游、体育、健康、文化等, 产业链条长且资源分布零散, 传统供应链模式已难以支撑产业高效运行。新质生产力为供应链集约化提供了科技和管理创新的动力^[1]。一方面, 依托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 可实现体育旅游资源的动态整合与精准匹配。通过构建智能化资源分配平台, 可以打破产业边界, 实现酒店、赛事场馆、交通、娱乐设施等资源的高度协同。另一方面, 基于供应链集约化可优化资源分配效率和成本, 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协同网络。通过供应链集约化的推广, 进一步强化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业务联动能力, 推动体育赛事与周边旅游、健康服务等领域的深度融合。联合区域赛事活动和特色旅游资源, 推出“体育+旅游+健康”的定制化产品,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提升服务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2.2 管理链数字化, 推动体育旅游智慧化转型与升级

传统体育旅游产业管理模式主要依赖人工决策与分散式管理, 难以适应现代消费者对高效、便捷、智能化服

作者简介: 宋 怡(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与健康;

黄巧婷(1986—),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

许 杰(1986—),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

通讯作者: 黄巧婷

务的需求。在数字化转型中,新质生产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赋能,显著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2]。一方面,基于大数据技术,体育旅游产业可实现实时监测与精准决策。利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动态监测游客流量、赛事活动热度以及景区资源承载力,实时优化资源配置与服务安排。另一方面,引入区块链技术,确保体育旅游产业链各环节信息的透明度与可信性,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与参与意愿。管理链数字化还可以通过智慧化终端设备提升用户体验,“数字导游”“智慧赛事助手”等创新应用,提供定制化的赛事观赛体验与旅游服务。这种以数字化管理为核心的创新模式,将有效推动体育旅游产业从传统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升级。

2.3 价值链绿色化,实现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绿色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为核心,为体育旅游产业价值链的绿色化转型注入了全新活力。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可显著降低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在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可采用可再生能源、绿色材料以及节能技术,降低碳足迹与能源损耗。针对旅游环节,推动绿色出行、无纸化票务和环保型住宿的普及,进一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绿色化价值链强调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将赛事设施、场馆、交通工具等资源在不同活动间实现循环使用,最大化资源利用率。绿色化价值链的构建还需通过政策引导与消费者教育提升社会认同感,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的绿色发展共识^[3]。

2.4 配置链高效化,催生体育旅游创新突破与竞争力提升

当前,体育旅游产业资源配置存在分散性与低效性问题,制约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依托云计算技术构建体育旅游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流动。在赛事期间,通过数字化配置平台协调场馆资源、交通运输和住宿接待,满足大规模人流的需求。二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消费者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精准匹配。利用AI分析用户行为与偏好,为其推荐个性化赛事与旅游产品,提升用户体验与消费黏性。三是通过加强区域协同,打破资源配置的行政区划限制,建立统一协调的体育旅游发展格局。配置链高效化还需整合社会资本与技术资源,通过创新性融资模式推动体育旅游的数字化设施建设与服务升级,从而激发全行业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4]。

3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挑战

3.1 政策支持体系不足,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推动力量

体育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亟需政策支持体系的保障,但当前政策支持存在多方面不足。政策碎片化问题严重,未能形成统一协调的产业发展框架。体育与旅游部门在政策制定上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导致相关政策执行中出现目标不明确、资源分散等问题。政策的执行力不足,部分地区的体育旅游数字化政策停留在规划层面,缺乏实质性的执行措施。政策支持的持续性不足,部分扶持政策周期较短,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产业支持环境。针对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导致其在数字化转型中缺乏资金与资源保障。这些问题制约了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整体推进速度。

3.2 技术创新应用滞后,新技术驱动不足的瓶颈问题

技术创新是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柱,但当前技术创新应用滞后已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之一。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足,尤其在体育旅游场景下,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实际应用广度和深度仍然有限。在智慧场馆、智慧赛事和智慧旅游等核心领域,技术落地率低,导致服务模式和消费者体验未能实现有效升级。技术的转化机制存在障碍。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较低,技术转化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企业在技术应用中的风险容忍度不足,导致新技术的市场化应用面临困境。体育旅游产业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包括数字化网络、智能硬件设施和平台生态系统等方面的短板明显,限制了整体数字化能力的提升。总体来看,技术创新的滞后和驱动不足不仅影响了体育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还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3 人才资源短缺,产业转型所需专业人才的培养困境

体育旅游领域的数字化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5]。产业的多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其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但当前教育与培训体系未能适应这一需求,导致产业数字化所需的技术型、管理型和创新型人才严重短缺。现有从业人员的技能升级难度较大。许多从业者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较低,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对新技能的要求。产业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有限。由于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体育旅游领域难以吸引和留住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端数字化人才。更为严重的是,体育旅游行业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导致人才资源分布不均、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长期存在。人才困境不仅限制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速度,也对长期创新能力的提升构成威胁。

3.4 数据资源挖掘与利用不充分,数据驱动发展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数据资源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旅游产业中的挖掘与利用程度仍显不足,这极大限制了数

据驱动的潜力释放。数据采集与整合能力不足。体育旅游涉及多种业态和场景,但目前数据资源的采集呈现碎片化状态,不同环节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性差,导致数据难以形成完整链条。数据分析与挖掘的深度不够。大多数企业仅停留在浅层的数据统计与分析阶段,未能利用高级数据挖掘工具进行消费者行为预测、市场需求分析等高附加值应用。与此同时,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的隐患较大。在缺乏明确法规和技术保障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对数据的使用谨慎,进一步限制了数据资源的有效流通与利用。数据驱动能力的不均衡发展也显著影响了产业整体的数字化进程。中小企业在数据采集与利用中的技术与资源劣势,使得其难以与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抗衡,导致产业生态中的不平衡状态持续存在。

4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

4.1 完善政策体系与制度保障,提升赋能效能与稳定性

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整合体育、旅游、科技等领域的政策资源,形成统一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框架。通过设立跨部门协调机构,制定覆盖体育旅游全产业链的政策指导文件,明确产业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应优化扶持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其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与风险。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体育旅游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使用、隐私保护和市场准入规则,确保产业发展环境的稳定性与透明性。可建立长期政策评估机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动态评估与优化,确保政策的持续性与实效性。通过政策的系统化、长效化设计,为体育旅游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4.2 优化技术创新环境,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效性

应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建立“产业联盟+科研平台”的合作模式,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应用。鼓励高校设立体育旅游领域的数字化研究中心,与企业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完善技术支持体系,搭建共享技术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技术解决方案与技术咨询服务。可通过设立技术孵化基金与创新激励机制,加速数字化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针对技术基础设施的短板,应加大投入建设智能场馆、5G网络和云平台等关键设施,为技术创新应用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通过优化技术创新环境,提升体育旅游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实效,助力产业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4.3 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确保赋能的持续发展动力

人才作为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是技术应用和管理创新的关键载体,更是推动产业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体育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对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此,应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全面提升产业转型的智力支撑能力。需要构建“高校—企业—研究机构”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生态链。高校可通过设置体育旅游数字化专业与学科交叉型课程,如“智能体育管理”“智慧旅游运营”“数字经济驱动下的体育产业发展”等特色方向,培养既掌握体育和旅游产业知识又精通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应引入校企联合模式,通过定向培养、实践基地共建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产业环境中锻炼技术应用与管理能力。研究机构则可与企业共同构建人才科研孵化平台,推动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人才输出。应设立“数字化赋能教育基金”,鼓励在职从业人员参与技能提升计划,例如推出“智慧化赛事运营经理人”或“数据驱动的体育旅游产品经理”认证课程,为行业输送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职业化人才。

应实施精准化的人才引进计划,确保产业发展所需核心技术领域的人才储备。针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应用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型人才,可制定专项引进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提供优渥的薪资待遇、科研经费支持和家庭配套服务,例如“智能体育领域高端人才支持计划”,为引进的人才提供安家补贴、子女教育保障以及职业发展机会。同时,还可通过“全球数字化精英引进计划”,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加入体育旅游产业,为产业国际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为激发人才的长期创新动力,应优化行业内的激励机制,推行“技能优先晋升制度”“创新成果分红计划”等政策,建立从业者职业发展的多元通道。可根据员工在智慧场馆、赛事运营中的数据优化能力、技术开发成效等指标实施动态奖励,提升人才的职业成就感与归属感。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体育旅游产业将实现从“人才短缺”到“人才富集”的根本性转变,为数字化转型持续注入发展动力。

4.4 构建数据驱动平台,提升赋能精准度与决策效率

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数据已成为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构建数据驱动平台是实现精准赋能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协同发展的基础保障。应建立“全链条化产业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体育旅游全链条、跨行业的数据汇聚与互联互通。该平台需整合体育赛事数据、旅游景区运营数据、消费者行为数据以及交通物流等多维度信息,通过搭建开放性数据接口,确保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资源共享。可推出“智能赛事与旅游数据大脑”项目,为企业提供实时的数据洞察服务,包括赛事观众流量预测、景区承载力监测、游客消费偏好分析等,提升产业链各环节的运营效率。平台还需建立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与数据采集标准,例如利用物联网传感器、边缘计算等技术采集赛事现场与旅游体验中的实时数据,确保数据流通中的完整性。

和一致性。

应重点推进数据智能化分析工具的开发与应用,推动体育旅游产业从传统统计分析向深度智能挖掘升级。一方面,可通过引入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挖掘与预测模型,为企业提供高附加值的精准决策支持。基于消费者行为数据构建的“动态用户画像模型”可实时调整体育旅游产品设计与推广策略,提升用户体验满意度;另一方面,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交易与共享过程中的透明性与安全性。通过“区块链体育旅游数据生态网络”,保障企业之间数据共享的隐私安全,同时激活数据的市场交易价值。为了确保数据驱动效能的持续释放,应推进行业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制定涵盖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应用全过程的安全规范,尤其是针对用户隐私保护提出严格的加密与权限管理要求。

在推动数据共享与安全的基础上,还需为中小企业构建低成本、高效能的数据服务体系。政府可以主导开发“体育旅游公共数据赋能平台”,通过云计算技术将数据处理能力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给中小企业,帮助其解决数据采集成本高、分析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可探索引入“数据即服务”(Data as a Service, DaaS)模式,让企业按需购买所需的数据分析工具与服务,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通过建设数据驱动平台,体育旅游产业将实现精准赋能与智能决策的有机结合,从而全面提升产业的数字化能力与整体竞争力。

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体育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动力。本文从理论框架到实践路径,系统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在驱动体育旅游产业转型中的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供应链集约化、管理链数字化、价值链绿色化、配置链高效化四大维度推动体育旅游产业实现深度变革。然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政策支持不足、技术滞后、人才短缺、数据利用率低等多重挑战。为此,提出完善政策体系、优化技术环境、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构建数据驱动平台等具体措施,以期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在未来发展中,体育旅游产业应持续加强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张军,辛园林.新质生产力赋能新疆冰雪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西部学刊,2024,(21):5-9.
- [2]张欣,岳辉.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路径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4,38(05):96-106.
- [3]余思均,赵敏,熊禄全.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逻辑理路、关键障碍与实践路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05):117-123.
- [4]徐珍,廖粤生,陈强.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概念内涵、作用机制与推进路径[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4,32(06):99-102.
- [5]白雪,王常安,李兵.双碳目标驱动冰雪体育旅游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意蕴、现实瓶颈及跃迁路径[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4,23(05):29-36.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ng Yi¹, Huang Qiaoting¹, Xu Jie¹

¹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ity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become a new driver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dr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ducting systematic research from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 practical paths. It analyz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logical framework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structs an interactive driving model of three major systems—"New Elements-New Technologies-New Business Forms", and propos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sports tourism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chain, greening of the value chain, and efficiency of the allocation chain. The paper also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core challenges faced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lagg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alent shortages, and low data utilization rates. Based o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t proposes measur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such as improving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optimiz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and building data-driven platforms. Thi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荔枝品类评价

周一辰¹ 李珈言²

(1.南头中学, 深圳 广东 518052, 2.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 杭州, 浙江 311261)

摘要: 本文以市面流行的若干品种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品质进行综合评价, 旨在构建一套科学、系统、可操作的基于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的荔枝品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为荔枝的品质评价、消费者的选择等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查阅数据, 利用层次分析法, 从甜度、价格、口感、褐变率等方面对妃子笑、桂味、糯米糍进行综合比较与排序, 为消费者以及果商的选购提供科学依据。根据综合得分, 妃子笑最适于选择, 其次是桂味, 最后是糯米糍。

关键词: 荔枝; 综合评价; 层次分析法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74

1、背景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Sonn.) 产于亚热带地区, 为栽培果树, 分布于福建、台湾地区、浙江、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庆等地。荔枝在历史上有“百果之王”等美称, 是中国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果品之一。作为我国南方特色热带水果, 荔枝爽甜多汁、清甜而不腻,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但是荔枝品种众多, 不同荔枝品种特性差异显著, 在风味特性、市场定位及储运适应性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直接影响消费选择与产业效益。目前, 关于荔枝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尚未形成兼顾全产业链需求的量化评价标准,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农艺性状分析, 优质商品果的经济价值需通过消费端接受度 (风味/外观)、生产端效益 (价格/产量)、供应链适应性 (贮运损耗) 等多维度集成体现。消费者面对不同品种的荔枝时, 常常难以抉择。

本研究以妃子笑、桂味、糯米糍三大主栽品种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品质进行综合评价, 旨在构建一套科学、系统、可操作的基于 AHP 的荔枝品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为荔枝的品质评价、消费者的选择等提供科学依据。

2、研究准备

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农艺性状分析。朱永聪等^[1]研究了优新荔枝品种果实品质风味特征比较; 王银红等^[2]对四个荔枝品种采后低温贮藏品质指标差异分析及评价进行研究; 董晨等^[3]六个荔枝品种的挥发性香气成分比较分析等都对荔枝的单一性状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可以科学准确地表现出各个方面对荔枝品质的影响, 但不够全面。

指标体系。 本次研究主要从四个直接影响人们对荔枝品类选择的因素来进行分析。

(1) 甜度。甜度是荔枝最核心的食用价值。荔枝的糖度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直接影响其风味吸引力, 也是品种差异的关键标志, 不同荔枝间的甜度可以根据总糖含量来进行比较。(2) 价格。价格是影响消费者和果商选购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荔枝不同品种之间价格差异巨大, 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果商的购买决策。(3) 口感。口感是消费者主要考虑的因素, 是物理性触觉体验, 是质地、结构、汁水、果核形态等的综合反馈, 直接影响到购买决策。(4) 褐变率。褐变率是生物体内褐变反应的程度, 在生物体中对衰老过程、环境适应和食物储存和加工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荔枝是极不耐储的水果, 褐变率能直接反应荔枝的耐贮性。

研究方法。 常用的评价模型有层次分析法、Topsis 法、熵权法等。

熵权法在追求纯客观权重且数据本身能有效区分方案时是首选。但是存在对数据标准化要求高、无法处理不

作者简介: 周一辰 (2008—), 女, 高中, 南头中学;

李珈言 (2008—), 女, 高中, 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

通讯作者: 周一辰

确定性,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将各属性视为独立指标,可能忽略重要信息等问题。

TOPSIS 法在权重已明确(无论来源是主观还是客观)且主要基于客观数据进行方案排序时非常有效且直观。但缺点是忽略指标间相互影响且对样本依赖性强。

层次分析法(Ant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可用于对无结构特性的系统评价以及多目标、多准则、多时期等的系统评价^[4]。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复杂的系统分解,能将人们的思维过程数学化、系统化,便于人们接受,且能把多目标、多准则又难以全部量化处理的决策问题化为多层次单目标问题,容易为决策者了解和掌握^[5]。当决策的核心价值在于整合人类智慧、处理复杂性和软性因素时,AHP 往往是更优的选择,故本文选取层次分析法进行研究与分析比较。

层次分析法步骤

步骤一、构建层次结构模型^[6]。该体系分为 3 层,分别为目标层(O)、准则层(B)和方案层(C)。

步骤二、构造判断(成对比较打分)矩阵。本次研究利用构建判断矩阵的方法,将各评价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量化对比。设某层有 n 个因素, $X=\{x_1, x_2, \dots, x_n\}$, 要比较它们对上一层某一准则(或目标)的影响程度,确定在该层中相对于某一准则所占的比重^[7]。(即把 n 个因素对上层某一目标的影响程度排序)

上述比较是两两因素之间进行的比较,具体地,采用普遍使用的 1-9 标度法(表 1)评估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用 a_{ij} 表示第 i 个因素相对于第 j 个因素的比较结果,并据此构建出比较判断矩阵。

表 1 1-9 标度法

尺度	含义
1	第 i 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相同
3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稍强
5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强
7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明显强
9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绝对地强

2,4,6,8 表示第 i 个因素相对于第 j 个因素的影响介于上述两个相邻等级之间。根据 $a_{ij} = \frac{1}{a_{ji}}$, 不难定义以上各标度倒数的含义。由上述元素构成的矩阵

$$A = (a_{ij})_{n \times n} = \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cdots & a_{1n} \\ a_{21} & a_{22} & \cdots & a_{2n}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a_{n1} & a_{n2} & \cdots & a_{nn} \end{bmatrix}$$

被称为成对比较矩阵。

步骤三、计算某一层下的排序结果及其一致性检验。

通过按行求和归一化法,得到每个因素的相对权重。为确保各指标权重值的科学可靠,必须对每个判断矩阵执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反映的是逻辑思维的连贯性,即判断应具备传递性,例如,若甲远重要于乙,而乙仅略重要于丙,则甲必然重要于丙。否则,判断结果将自相矛盾,需重新评估。在一层中比较因素(即单一层),也必须进行一致性检验,可以判断这些“主观分”有没有自相矛盾。一致性指标 CI 的计算公式为:

$$CI = \frac{(\lambda_{\max} - n)}{(n - 1)} \quad (1)$$

其中 $\lambda_{\max}$ 代表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n 是其阶数。当随机一致性比率 $CR = \frac{CI}{RI}$ 小于 0.1 时(RI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表明该判断矩阵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若 $CR > 0.1$,则必须修正判断值,直到检验通过为止。

步骤四、计算总得分(层次总排序)。确定某层所有因素对于总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过程,称为层次总排序,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逐层进行。

层次总排序的目标是确定某一层所有元素相对于最高层(目标层)的权重顺序。在获得准则层 B 层各元素的权重后,需将这些权重与该准则层 B 层自身对目标层 O 层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从而得出方案层 C 层中所有元素对目标层 O 层的整体重要性排序。

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方案层对准则层的权重、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进行综合,使用加权平均公式,计算方案层 C 层的层次总排序,并最终确定方案层对目标层的权重,从而确定各方案的优劣。

设:准则层 B 层 m 个因素 $B_1, B_2, \dots, B_m$, 对总目标 O 层的排序为: $b_1, b_2, \dots, b_m$, 方案层 C 层 n 个因素对上层 B 层中因素为 B_j 的层次单排序为 $c_{1j}, c_{2j}, \dots, c_{nj} (j=1, 2, \dots, m)$, 可得方案层 C 层的层次总排序为

$$\begin{aligned} C_1: & b_1 c_{11} + b_2 c_{12} + \dots + b_m c_{1m} \\ C_2: & b_1 c_{21} + b_2 c_{22} + \dots + b_m c_{2m} \\ & \dots \\ C_n: & b_1 c_{n1} + b_2 c_{n2} + \dots + b_m c_{nm} \end{aligned}$$

即 C 层的第 n 个元素对总目标的权值为

$$\sum_{j=1}^m b_j c_{nj} \quad (2)$$

步骤五、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为保证最终综合权重的科学合理,层次总排序结果同样需要接受一致性检验。设 C 层 $C_1, C_2, \dots, C_n$ 对上层(B 层)中因素 $B_j (j=1, 2, \dots, m)$ 的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指标为 CI_j , 随机一致性指为 RI_j , 则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比率为:

$$CR = \frac{b_1 CI_1 + b_2 CI_2 + \dots + b_m CI_m}{b_1 RI_1 + b_2 RI_2 + \dots + b_m RI_m} \quad (3)$$

当 $CR < 0.1$ 时,表明该总排序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所获得的指标权重是有效的。

3、模型与求解

本研究的层次分析法模型(图 1)。准则层分别为甜度(B_1)、价格(B_2)、口感(B_3)和褐变率(B_4)。方案层分别为妃子笑(C_1)、桂味(C_2)、糯米糍(C_3)。妃子笑、桂味、糯米糍这三个荔枝品种是三大主栽品种,也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品种,本次研究选取这三个品种进行比较与分析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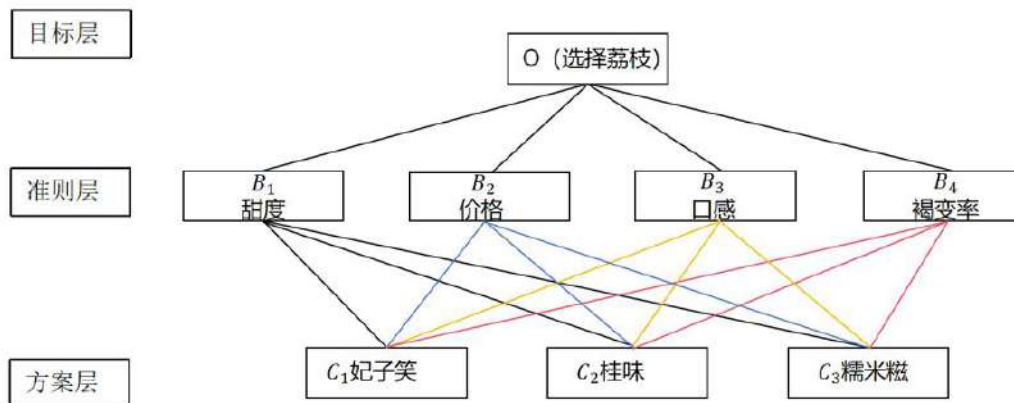


图 1 结构模型

通过甜度、价格、口感、褐变率间的重要程度比较获取比较判断矩阵(见表 2)

计算得 $\lambda_{\max} = 4.0818$, $CI = 0.0273$, 由于判断矩阵阶数为 4, 通过查表可得 $RI = 0.9$, 则 $CR = \frac{CI}{RI} = 0.0303 < 0.1$, 符合一致性检验要求。根据判断矩阵计算求解, 可获取判断荔枝权向量 $\omega = (0.30, 0.46, 0.15, 0.09)^T$ 。根据分级因素权重向量, 比较各因素权重高低, 可得排序为价格 > 甜度 > 口感 > 褐变率。

表2 荔枝比较判断矩阵

指标	甜度	价格	口感	褐变率
甜度	1	1/2	3	3
价格	2	1	3	4
口感	1/3	1/3	1	2
褐变率	1/3	1/4	1/2	1

同理,对于妃子笑、桂味、糯米糍三个品种分别就他们的甜度、价格、口感、褐变率进行比较,其中,从甜度来看,总糖含量以桂味(168.39.3) g/kg 最高,糯米糍(154.5±6.3) g/kg 次之,妃子笑(152.2±7.3) g/kg 最低^[1]。在价格上,据网络平台,妃子笑 3.5 至 6.5 元一斤,桂味 15 至 25 元一斤,糯米糍 8 至 15 元一斤。妃子笑果肉脆嫩多汁,核中等大小,桂味果肉爽脆清甜带桂花香,核较小,糯米糍果肉软糯如糍粑,汁水丰盈,核极小。从褐变率来看,妃子笑的褐变指数为 2.250,桂味的褐变指数为 2.417,糯米糍的褐变指数为 4.267^[2]。所以妃子笑更耐储存。比较后得到两两比较矩阵:

$$\text{甜度}BB_1=\begin{bmatrix} 1 & \frac{1}{3} & 3 \\ 3 & 1 & 5 \\ \frac{1}{3} & \frac{1}{5} & 1 \end{bmatrix}, \text{价格}BB_2=\begin{bmatrix} 1 & 9 & 5 \\ \frac{1}{9} & 1 & \frac{1}{3} \\ \frac{1}{5} & 3 & 1 \end{bmatrix}, \text{口感}BB_3=\begin{bmatrix} 1 & \frac{1}{3} & \frac{1}{3} \\ 3 & 1 & 1 \\ 3 & 1 & 1 \end{bmatrix}, \text{褐变率}BB_4=\begin{bmatrix} 1 & 3 & 9 \\ \frac{1}{3} & 1 & 7 \\ \frac{1}{9} & \frac{1}{7} & 1 \end{bmatrix}$$

对成对比较矩阵 BB_1 、 BB_2 、 BB_3 、 BB_4 可以求层次单排序以及层次总排序的权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如下:

表3 计算层次单排序以及层次总排序的权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表

k	1	2	3	4
ω_{k1}	0.26	0.75	0.142	0.65
ω_{k2}	0.63	0.07	0.429	0.30
ω_{k3}	0.11	0.18	0.429	0.05
λ_k	3.002	3.001	3	3.081
CI_k	0.001	0.0005	0	0.040
RI_k	0.58	0.58	0.58	0.58
CR_k	0.0017	0.0009	0	0.0698

由表3可得,各判断矩阵的CR值均小于0.1,通过一致性检验,说明上述指标的单排序权重结果是可以被接受的。

计算层次总排序权值可得,妃子笑的综合得分为0.5028,桂味的综合得分为0.31255,糯米糍的综合得分为0.18465。对层次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得 $CR \approx 0.064 < 0.1$,故层次总排序通过一致性检验。比较得分做出决策,妃子笑是第一选择,其次是桂味,最后是糯米糍。排序为妃子笑>桂味>糯米糍。妃子笑胜在成本低且易储存;桂味强于它独特的风味,甜度与口感的得分都很高,但败于高流通成本;糯米糍受制于供应链脆弱性,它褐变率远高于其他两个品种。

4、结论

本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涵盖甜度、价格、口感、褐变率四大指标的荔枝品种综合评价体系,由数据可知,妃子笑价格最实惠且易储存,是供应链的最优解,桂味和糯米糍风味佳却存在价格高昂和不易储存的弊端,对妃子笑、桂味、糯米糍进行量化对比,实现了对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的综合评价,发现妃子笑的综合得分最高,其次是桂味,最后是糯米糍。此方法有助于消费者进行决策和对荔枝的品质评价,推动消费者与果商进行更理智的采买。

本研究未引入大众评价维度,使得研究结论的评价结果存在一定主观性;此外,模型未覆盖部分典型应用场景,有待进一步完善。后续研究可在本研究基础上,整合模糊综合评价法^[8]、多准则决策分析^[9]、聚类分析^[10]等综合评价方法对模型进行升级,进而为供应链创新与育种导向优化提供理论支撑,最终实现荔枝风味品质与产业经济效益的协同提升。

参考文献:

- [1] 朱永聪,崔子霄,徐晗,等. 优新荔枝品种果实品质风味特征比较[J]. 中国食品学报,2023,23(06):327-338.DOI:10.16429/j.1009-7848.2023.06.033.
- [2] 王银红,张珮,江靖,等.四个荔枝品种采后低温贮藏品质指标差异分析及评价[J].食品工业科技,2019,40(22):288-293+299.DOI:10.13386/j.issn1002-0306.2019.22.050.
- [3] 董晨,李金枝,王弋,等.六个荔枝品种的挥发性香气成分比较分析[J].南方农业,2024,18(05):8-12.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4.05.002.
- [4] 刘舒,马正兵,于晓丽.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不同种源桃金娘观赏价值综合评价[J/OL].热带农业科学,1-6[2025-07-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6.1038.s.20250709.0910.004.html>.
- [5] 黄彬惠.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风力发电场安全综合评价方法研究[J].电气技术与经济,2025,(06):288-290+294.
- [6] 吴汪友,刘伟,姚钟华.一种层次混合量化苹果品质分级的研究[J].中国南方果树,2023,52(01):152-156.DOI:10.13938/j.issn.1007-1431.20220434.
- [7] 荆海峰,丁俊杰.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水利测雨雷达选址研究[J/OL].水利水电快报,1-10[2025-07-2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142.TV.20250725.1449.004.html>.
- [8] Kumar L ,Sleiti K A.An integrated SWOT-fuzzy AHP-fuzzy TOPSIS analysis of various hydrogen energy storage op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2025,155150344-150344.
- [9] Marhavilas K P,Delianidis N,Koulinas G, et al.SAFETY ASSESSMENT BY AMALGAMATING MCDM/AHP, HAZOP, DECISION RISK-MATRICES' ANALYSIS, AND FTA, THROUGH A SAFETY'S COLOR-MAPPING VISUALIZATION – APPLICATION TO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J].Safety Science,2025,191106941-106941.
- [10] Luo H,Tang J,Zeng Z, et al.Metabolic dynamics of litchi pericarp and pulp during browning: Unraveling differential profiles through temporal clustering and untargeted metabolomics[J].Food Chemistry: Molecular Sciences,2025,11100277-100277.

Litchi category evaluation based on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Zhou Yichen¹, Li Jiayan²

¹ Nantou High School, Shenzhen, Guangdong; ²Xiaoshan 6th High School, Hangzhou, Zhej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s several popular varieties in the marke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utiliz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ir qualities, aiming at constructing a set of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operabl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itchi varieties based o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hich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of litchi's quality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consumers. By reviewing the data and utilizing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we made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and ranking of Feizixiao, Guiwei, and Nuomizhi in terms of sweetness, price, taste, and browning rate,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sumers as well as fruit merchants to choose and buy.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Feizixiao is the most suitable choice, followed by Guiwei, and finally, Nuomizhi.

Keywords: litchi;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合肥市产业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的成效及路径探索 ——以建行设立 AIC 试点基金新业务为例

郑敏¹, 楼方舟²

(1.安徽职业技术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11; 2.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 安徽 合肥 230002)

摘要: 本文从合肥市产业情况出发, 分析近年来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的现状, 再通过 2024 年 9 月国家出台新政为契机, 以建行首个落实新政, 设立 AIC 试点基金新业务为案例, 关注这一新业务背后的内在逻辑、实现的直接成效和模式创新, 探讨商业银行在合肥市产业环境下, 该如何去进一步发展投行及商投行一体化业务, 提出深入做好商行业务的意见建议, 最终在实现银企共赢的基础上, 赋能合肥市科技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关键词: 合肥市产业; 科技创新; 商业银行; AIC 公司; 试点基金

基金项目: 安徽 2023 年省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 基于合肥市先进制造产业链发展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资管投行业务发展成效研究 (2023AH051413); 安徽 2023 年省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 多层次资本市场背景下合肥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效应探究 (2023AH051417); 安徽 2024 年省高校科学研究项目 - “融合应用“科技+绿色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2024AH05267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87

1. 合肥市产业情况

合肥市是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现代制造业基地。近年来, 合肥市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形成了“芯屏汽合”的产业新格局。2024 年, 合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 60%,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28.5%, 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入研究合肥市产业情况, 对于研究商业银行如何发展投行业务, 2 做好对科技企业的商投行一体化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合肥市产业发展格局特点, 一是产业结构特征演进变化明显, 历了从传统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的显著变化。“十二五”以来, 合肥市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工业向中高端迈进的特征, 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 形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良好态势。二是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合肥市构建了“一核两翼多园”的产业空间布局体系。有效促进了产业协同和集群发展。三是产业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合肥市依托中科大、合工大及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大院大所, 构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为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合肥市重点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以集成电路为例, 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已形成涵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包括长鑫存储 (DRAM 存储器)、晶合集成 (晶圆代工)、通富微电 (封装测试) 等。2024 年, 合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 800 亿元, 其中长鑫科技已成为国内 DRAM 存储器领域的领军企业。产业集聚方面, 合肥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园已入驻产业链企业 200 余家, 形成了从材料设备到芯片设计的产业生态。

综上所述, 合肥市产业结构以科技新兴产业为主, 不仅有如长鑫科技、科大讯飞等产业龙头企业, 还有依托中科大等科研院所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带动、各类私募基金所挖掘、投资、培育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形成的极富生命力的科技新兴产业集群。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 如何做好对科技企业的商投行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就是主要的课题之一。

2. 国有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发展情况

作者简介: 郑 敏 (1989-),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楼方舟 (199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银行科技企业股权投资。

合肥市产业环境带来的客群主要是科技类企业，包括规模较大的产业链链龙头企业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科技企业金融需求较为多元化，除普通开户、结算、信贷以外，还包括其他特定的需求，如股权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债转股业务降低负债率、融资租赁盘活固定资产、债券发行从银行间市场获得低成本灵活资金等。这些都是银行传统信贷业务无法解决的，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发展投行业务，不仅能帮助企业解决直接痛点，加强银企关系，提升自身综合收益，擦亮银行金融服务品牌，从助力合肥市政府扩大科技企业招引、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科技竞争力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工农中建等国有银行主动融入合肥市科技产业发展，向着综合化、集团化发展，纷纷成立了理财、租赁、信托、保险、基金、股权等各类子公司，在各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以建行为例，建行旗下主要专业化投行子公司情况如下表：

表 1 建行专业投行类子公司基本情况

建行主要子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所在地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债转股	270 亿元	北京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产品	105 亿元	合肥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港股 IPO 上市保荐	5000 万美元	香港
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战兴基金运营管理	10000 万美元	北京
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110 亿元	北京
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产品发行，债券投资	150 亿元	深圳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募基金发行与管理	2 亿元	北京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债转股	270 亿元	北京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产品	105 亿元	合肥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港股 IPO 上市保荐	5000 万美元	香港
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战兴基金运营管理	10000 万美元	北京

商业银行发挥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通过母子协同、商投行一体化等方式深耕链主龙头企业，批量化赋能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构建全面高效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龙头企业提供综合化、接力式、全周期的金融支持，打造金融服务样板，带动做好产业链全链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不断提升综合效益。以建行为例，近年来，建行在合肥市落地了领投长鑫科技总规模 100 亿元 C 轮股权融资、对蔚来汽车发放并购融资 6.4 亿元、为中铁四局承销科技创新资产证券化（ABS）、介入合肥本源量子 A 轮股权引入战略投资 2000 万元等典型投行案例。

3.典型痛点和新政发布机遇

3.1 典型痛点

在合肥市产业环境下，商业银行在发展投行业务过程中仍面临较多痛点。主要表现为合肥市众多科技企业对获得耐心资本不足。科技型企业因其研发周期、技术迭代周期较长，造成企业早期营收和净利润较低，且抵押担保设施较少，银行传统信贷无法介入，股权融资更加匹配科技企业的长线资金需求。然而，多数市场化投资机构出资能力和规模较小以及考核机制短期化的问题，不具备成为合格耐心资本的实力，而以银行系统中耐心资本代表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即 AIC 公司对科技企业涉足也不深。例如建行旗下 AIC 公司为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70 亿元，资金雄厚。其成立初衷是为参与国企债转股、降低国企负债率、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其投资资金企业必须用于还债。被投资企业多为能源、建筑、交通、化工等传统行业的央、国企，对“投早、投科技”存在先天性政策不足和投资经验的欠缺。例如，对建信投资而言，目前其所参与股权项目中，超过 70%为投向建筑、能源、化工等传统国企，对于芯片、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支持力度仍然不足。

3.2 新政机遇

(1) 政策背景

2024 年 9 月，国家发布《关于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的通知》，明确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以下简称 AIC 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由上海扩大至包括合肥在内的 18 个城市。同时，适当放宽股权投资金额、比例和用途限制，将表内投资占比由原来的 4%提高到 10%，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占比由原来的 20%提高到 30%。2025 年 3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知》，将 AIC 公司股权投资范围扩大至试点城市所在省份。

(2) 政策解读

本次新政发布，对 AIC 公司参与股权投资的资金用途进行了放开，只要满足一定条件，AIC 公司可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直接股权投资，且区域从上海扩展到了 18 个城市及所在省份。前提条件是：在试点区域通过设立私募基金的形式开展股权投资，AIC 公司出资比例不得超过 30%，且 AIC 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必须担任基金管理人或 GP，加强对基金的主动管理。只要满足上述条件，AIC 公司股权资金即可突破还债的限制，更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功能优势，以更丰富和更灵活的手段，助力科技创新企业发展。

合肥纳入试点城市范围,意味着以后 AIC 公司可以在合肥设立 AIC 试点基金来开展股权投资,用途可拓展至企业的生产经营、科研投入等。对合肥市而言,主要受益对象就是对耐心资本需求迫切的科技企业。同时,通过基金的资金放大作用,有利于 AIC 公司为合肥引入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根据政策测算,5 家国有银行的 AIC 公司能出资的股权资金达 587 亿元,能撬动社会耐心资本近 3000 亿元。为银行解决科技企业募集耐心资本痛点问题提供机遇。

4. 建行做法与创新模式分析

4.1 建行案例

据公开市场信息,2024 年 11 月,建行安徽省分行联动其 AIC 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了建源新鑫(安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基金总规模 10000 万元,专项投资于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首先分析该基金的架构。其中建信投资认缴 30%即 3000 万元,鑫城控股集团出资 70%即 7000 万元,由建信投资子公司建信金投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的 GP 和基金管理人,建行安徽省分行担任该基金的财务顾问和托管银行。该基金架构符合前述 AIC 公司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基本条件。

再看投资标的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具备光学切片、光学薄膜和光学功能膜全产业链业务布局的企业,属于新材料行业龙头。本次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增资挂牌总投资 11.6 亿元,AIC 基金的股权投资落地,资金用于项目扩产和研发中心建设,实现聚脂薄膜等产品产能 5.6 万吨/年,预计年产值超 15 亿元,其下游产品多应用于面板显示屏、太阳能光伏背板等领域,与合肥市重点布局的新型显示、新能源等战新产业形成较强的产业协同效应。

根据市场反馈,该基金也是 2024 年 9 月新政以来,全国范围内新增加试点城市中第一只完成基金注册、备案和项目投资落地的 AIC 试点基金创新业务,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

4.2 创新模式分析

本次建行组建 AIC 试点基金投资于科技企业为切入口,通过针对基金精心寻找出资方、设置出资比例、投资期限及基金管理人等各项参数及架构,使其满足 AIC 非债转股股权投资的要求,创新了国有银行服务科技企业的服务范式架构:AIC 公司+A 类客户+B 类客户+C 类客户+银行托管,其中 AIC 公司、A、B、C 类客户出资比例分别为 a%、b%、c%、d%,A 为政府平台,B 为产业类客户,C 为同业、证券、保险类客户,形成一只 AIC 试点基金中,存在银行耐心资本、政府资金、产业方资金及同业资金的最优架构:其中,银行耐心资本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经验丰富,政府资金的存在,有助于与合肥市产业链强链补链相融合,产业方资金能够助力被投资企业获取必要的产业资源,同业资金出资能力强,能够有效补足基金缺口。出资比例方面, $a \leq 30, b+c+d \geq 70$,当 a 越小时,能够撬动的外部资金越大,当 a 越大时,引入的 AIC 直接投资耐心资本较多。一般基金投资时间长达 8 年以上,有效贯穿科技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

上述架构是商业银行服务科技企业实践中的创新,打破了过往 AIC 公司股权资金只能用于偿还债务的用途限制,服务客群也从传统行业拓展至过去甚少涉足的科技创新领域,在引入了 AIC 耐心资本新的活水的同时撬动行外资金共同投资,吸纳更多耐心资本来源,打开了商业银行投行服务合肥市科技企业的新渠道,以更丰富和更灵活的手段,助力合肥市科技产业发展壮大。

5. 意见建议

此次建行联合建信投资设立专项投向合肥乐凯基金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对商业银行创新投行服务合肥市科技产业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5.1. 银行 AIC 公司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经验仍然不足

银行 AIC 公司受制于成立初衷和自身风控标准,一般介入的都是各省市建筑施工、能源等大型传统行业企业,而合肥市“芯屏汽合”为主的科技产业布局,大量科技企业前期研发资金投入大,对耐心资本需求具有持续性,发展风险较大,股权退出不确定性强。相比于传统投资机构,银行 AIC 公司在科技股权投资领域经验不足,投资标的转向科技创新企业仍具有一个转型的过程。

5.2. AIC 试点基金的形式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次建行投资合肥乐凯的 AIC 基金,架构较为简单,仅有银行资本和政府方资本,且资金规模较小,仅有一亿元,投资标的也仅限于合肥乐凯一个企业。因此,该基金是一个专项投资某个项目的项目基金,本质上是现有项目再有基金,基金更多的是一种资金的出资形式。若要真正赋能合肥市科技产业,需要设立规模更大的 AIC 试点基金,同时尽可能加入产业方及其他社会资本方,撬动更多的资金、人才、产业方面的资源。

对于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服务合肥科技企业的路径建议如下:

(1) 进一步加强母子协同,打造一批商投行典型案例

科技企业融资较为多元化,商业银行在基于多金融牌照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银行集团内母子协同,充分做好“股、债、贷、报、租”等商投行一体化综合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接力式金融服务,满足合肥市

科技企业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探索商业银行子公司向合肥市派驻专业化团队，与商业银行在客户营销、业务申报、投研合作等方面全方位融合，不断加强商业银行综合化服务科技企业的能力，锻造一支懂投行、懂商行、懂产业、懂服务的人才队伍。围绕合肥市重点布局产业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龙头，落地一批典型案例，擦亮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品牌。

(2) 商业银行积极探索设立大规模 AIC 试点盲池基金

建行已率先实现 AIC 试点基金新业务的落地，根据公开市场信息，工、农、中等大行也纷纷联动各自 AIC 公司与合肥市政府平台、投资机构、产业龙头达成设立基金的合作意向。建议商业银行锚定某个特定的科技产业赛道，积极联动政府、产业方、同业机构设立大规模 AIC 试点盲池基金，积极拓展项目来源。该类基金融合各方诉求，如政府方返投、产业方对特定上下游投资要求等，能督促银行和 AIC 公司运作好基金，积极挖掘优质项目，促进投资落地。

(3) 加强行业研究，增强客户识别和风险抵御能力

在合肥市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环境下，要做好投行及商行一体化服务，银行必须加强行业研究，加深对潜在客群的了解，否则无论是投行还是商行业务，从一开始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造成风险合规方面的隐患。因此，转型到科技企业，商业银行应建立自身的投研团队，加深对行业和企业认知，在提高挖掘优质项目能力的同时，合理评估企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降低自身发展投行业务所可能承受的风险。

参考文献：

- [1]冯柏.市场化债转股:基本逻辑、实施挑战与应对策略[J].金融监管研究,2018 (5) :87-96.
- [2]刘国辉.债转股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金融纵横,2016 (8) : 53-59.
- [3].践行.发挥市场化债转股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J].金融监管研究,2020 (11) :63-73.
- [4]秦玉芳,建信投资加速布局科技金融,银行系 AIC 赋能科创成效显著[N],中国经营报,2025.
- [5]孟宝,银行 AIC 基金:科技创新赋能路径与市场化转型挑战[J],现代商业银行,2025 (13).
- [6]居敏.新形势下国有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探究[J].中国电子商情,2025(14).
- [7]陈湘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研究[J].中国科技投资,2021(09).
- [8]管宇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情况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8(23).
- [9]郭咏、踪卫华,以“投行思维”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陕西地市创投的实践与探索[J],高科技与产业化.2025(08).
- [10]翟羽涵、吕拉昌,科技金融推动城市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机制——以合肥市为例[J],生产力研究.2025(07).
- [11] Li Shujuan;Xi Min;Li Dongmei.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ci-Tech Finance on Industrial TFP[J].The Chinese Economy.2024.

The Effectivenes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vestment Banking Business by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of Hefei 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IC Pilot Fund by the Construction Bank

Zheng Min¹, Lou Fangzhou²

¹ Anhui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Hefei, Anhui

²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hui Branch, Hefei, Anhui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ndustrial situation of Hefei 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vestment banking business by commercial banks in recent years. Then, taking the new policy issued by the state in September 2024 as an opportunity, and u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IC pilot fund by the Construction Bank as a case, it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logic, direct achievements, and model innovation behind this new business. It explores how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further develop investment banking and integrated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banking business in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of Hefei Cit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doing a good job in commercial banking business. Ultimately, it aim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anks and enterprises and empowe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Hefe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erging industries.

Keywords: Hefei City's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mercial Banks; AIC Company; Pilot Fund

基于 SEM 模型的吴江区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张惠媛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 为破解长三角核心区域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融合的现实难题, 本文以吴江区为研究对象,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SEM), 构建“文化资源吸引力 - 康养服务品质 - 适老化设施水平 - 智慧技术应用 - 老年游客满意度 - 融合发展程度”理论框架, 结合 352 份有效问卷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文化活化、产品创新、适老化改造、政策协同及区域合作五大路径, 为长三角县域打造“银发经济旅游示范区”提供参考。

关键词: 银发经济; 文旅康养; 长三角融合发展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91

1. 研究背景及目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银发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 年年末,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31031 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22.0%,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22023 万人, 占比 15.6%, 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老年人口规模接近美国总人口, 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1]。党的二十大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确立为重要战略方向, 明确提出应推动银发经济与养老、文旅、健康等产业深度协同, 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处于长三角“苏浙沪”金三角核心位置的吴江区, 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极为严重。截止到 2024 年年底, 该区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人有 28.7 万之众, 占总人口比例远超全国水平、达到 28.5%。这充分表明老龄群体人数基数大, 并且增长速率在不断上升[2]。虽有同里古镇、退思园这样的文化资源以及环长漾湿地、东太湖生态岸线的生态优势, 盛泽康养社区、七都医疗产业园等产业根基存在, 但融合发展情况依旧有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之处。

当下吴江的适老化设施建造迟缓, 古镇范围内的台阶与坡道改造未达彻底状态, 缺乏专门针对老年人群使用的智慧导览系统, 公共厕所无障碍化程度也并不充分。产品类别相对单调, 类似中医理疗、候鸟式旅居之类的创新类型罕见出现, 在现有的旅游线路安排重复率较高, 康养服务内容与文化旅游感受不能很好地相互结合起来, 而且在产业协同层面缺少完善性措施, 文旅业同养老行业还有医疗部门之间沟通不畅的现象时有发生[3]。

在《苏州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打造长三角康养旅游目的地”, 吴江区“十四五”规划中强调“推进银发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当下, 本研究对促进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本文通过“资源-需求-供给”的分析方式, 试图从数量上探究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融合的内在机制, 以克服传统定性研究客观不足的问题, 并为长三角县域相关问题研究提供相应的变量设计及建模思考。同时引导企业打造集文化体验、康养服务以及智慧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产品, 在此过程中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下养老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作出努力, 给国家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地方实施过程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助推长三角养老服务一体化协同发展进程[3]。

为达成上述目标, 本研究构建了吴江区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融合的结构方程模型 (SEM), 从而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中作用机制和路径, 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作为区域融合实践的支持。本课题在方法上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以及 SEM 模型。首先对已有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整理梳理, 在明确其概念框架及理论基础的同时, 基于这些了解展开设计调研工作, 并针对吴江区内 60 岁及以上老年游客制定问卷, 内容涉及受访者的基本情况、文化偏好选择、康养项目需求及其满意程度等方面问题。在线下同里古镇景区和震泽景区等多个代表性景点开展了实地访问活动, 线上线下共计发放有效问卷 352 份, 回收率达到了 88%。并使用 SPSS26.0 软件进行信效度检验和 AMOS 24.0 对结构方程建模进行验证考察。

整体上研究的逻辑主线为“理论建构—实证检验—路径优化”, 其中第一阶段是根据文献回顾提出初步假设 (文化资源吸引度、康养服务品质等要素对老年游客满意度及融合发展程度的影响)。第二阶段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搜集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 模型拟合度分析以及验证理论假设是否合理的过程。第三阶段基于实证后的相关结果, 结合吴江当地的资源优势与客观实际状况, 给出五个促进融合发展的具体途径。

作者简介: 张惠媛(1997-),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银发旅游、旅游新媒体营销、旅游危险感知;

通讯作者: 张惠媛

2. 理论性背景

国外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融合研究较早且理论成熟,国内则起步晚但发展迅猛,当前主要聚焦在分析银发旅游市场特征,发现老年游客重在行程节奏和医疗保障,当前银发旅游市场约8成青睐“慢游+轻康养”类型[5]。其次是探索适老化改造路径,“无障碍设施+适老服务”双管齐下改进建和关注产业融合机制,多运用定性方法剖析“文旅+康养”,研究发现当下银发旅游市场在跨领域科技、医疗协作上仍有欠缺。

结构方程模型(SEM)作为能够同时处理潜在变量与复杂因果关系的多元统计方法,在旅游研究领域常用于游客行为与满意度分析。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运用到康养旅游研究中来。国内SEM模型应用研究尚处探索阶段,黄昕(2025)在基于SEM的游客康养旅游需求对其体验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中,以保亭县为例,发现康养需求的“健康管理维度”对体验质量影响最大($\beta=0.38$) [11]。聂军瑶等(2024)基于MOA发现游客专业度对目的地感知价值与能力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0.29$),从而促进其行为意向[6]。另一篇以七里峪为例的研究结果显示气候舒适性($\beta=0.35$)、森林覆盖率($\beta=0.28$)对康养适宜性的影响显著[7]。但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潜在变量筛选方面过于依赖个人判断,“智慧技术应用”这种新因素未充分纳入考量范围之内。另外有些模型拟合程度较低,RMSEA大于0.08等表明该模式和数据吻合度较差等等。Oliver(1980)提出的顾客满意度理论也曾指出,顾客对产品的“期望”与“感知绩效”差异决定满意度,进而影响行为意向[8]。本研究中,老年游客满意度是“文化、康养等供给”与“老年需求”的中介变量,直接影响融合发展程度。

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在县域层面的“文化资源-康养需求-产业融合”系统量化分析相对匮乏,无法准确把握关键影响路径,并且缺少对银发群体的相关考虑。因此,本研究将结合吴江实际,在SEM变量设定和模型拟合时进一步完善,更充分地挖掘出当地的文旅康养融合机理。

3. 吴江区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发展现状

3.1 发展现状

吴江在资源方面存在“文化、生态和产业”三位一体的综合特征,这给银发经济及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形成良好根基。在文化遗产层面上,它包含5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如同里古镇,退思园,“江南水乡·斗米尺布”的文物主题游径被列在全国十佳之内,可见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且丝绸和水乡文化得到较为完整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建立起了4个文化资源专门库并为智慧文旅赋予了数据基础,就生态环境层面,吴江坐落着同里国家湿地公园以及东太湖生态岸线这样的优良自然区域,并且区内全部森林占地率达到百分之十八二,负氧离子含量平均水平达两千二百每个立方厘米,非常适合展开森林疗养等活动。产业布局方面,同里湖度假村等机构推出了“旅居+健康管理”的一体化服务方案,恒力度假酒店则配备了中医理疗中心来丰富康养服务体系,在2024年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成功举办之后,“体育+康养”这种业态组合的协同效应得到显现。

在政策上,吴江区继续推进“8050”文化强区工程,重点支持了亨通·苏州湾太湖洲际度假酒店等项目建设;连续五年保持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的排名。2024年召开老干部工作会议,优化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从市场上看,在市场方面:2025年前四个月共接待游客634.62万人次,其中国外近4万人,其中仅同里古镇就吸引了国外1.3万客人,增长高达105%,由于沪苏湖高铁通车而带来的新计划是推出“票根增值”,旅客用高铁车票可以享受到景区联票、住宿折扣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并且促进了银发客群人数的增长。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湿地公园”的三区叠加的典范,同里在发展康养+文旅方面已经授牌了十家银发友好场馆。而融媒体中心开发的“891梦想旅行团”,则为乡村老年人量身打造出了太湖慢游、丝绸文化体验等专属行程[2]。虽然有一定推进,但仍存在着不足:新型的产品供给还比较稀缺:中医理疗、候鸟式旅居这些新产品仅占比15%,现有旅游线路重复率高达60%,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3]。

3.2 融合发展的挑战

吴江区文旅、民政、卫健部门政策各有侧重,但缺乏协同。文旅部门侧重景区开发,民政部门聚焦居家养老,卫健部门关注医疗服务,未形成“融合政策包”。当前财政投入结构仍明显偏向观光旅游领域,而在康养设施方面的资金配置比例尚低于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现有康养产品所包含的医疗配套服务,难以充分契合老年群体对“医疗+康养+文旅”一体化产品的实际需求。此外,仅有少数景区部署了融合智慧导览与一键呼救功能的适老化智能设备,整体覆盖程度仍然有限。解瑞金等(2025)提出这种供需失衡会降低游客满意度,进而抑制融合发展[9]。

4. 基于SEM模型的融合路径实证分析

4.1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基于文献综述与吴江实际,构建包含6个潜在变量、18个观察变量的SEM模型(表2)。外生潜在变量:文化资源吸引力(X1)、康养服务品质(X2)、适老化设施水平(X3)、智慧技术应用(X4);内生潜在变量:老年游客满意度(Y1)、融合发展程度(Y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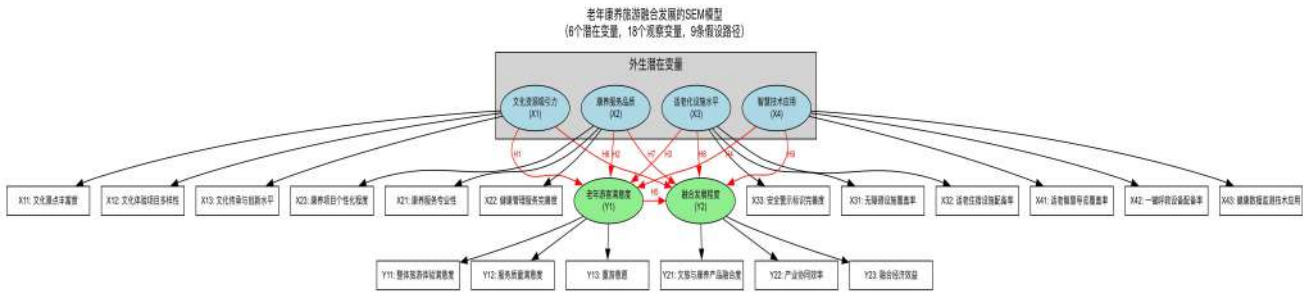


图 1 模型与假设提出

4.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问卷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 (1 = 非常不满意, 5 = 非常满意), 2025 年 6-8 月线上线下共发放 4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52 份, 有效率 88%。样本性别均衡 (男 48.3%、女 51.7%) ; 年龄以 60-69 岁为主 (52.8%) , 70-79 岁占 35.2%, 80 岁及以上占 12.0%; 月收入 3001-5000 元占 42.3%, 5001-7000 元占 25.6%; 学历高中 / 中专占 38.7%, 大专及以上占 28.9%, 样本具有代表性。

4.3 信效度检验

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与组合信度 (CR) 检验。结果显示, 所有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 $>.7$ ($X1=.82$ 、 $X2=.85$ 、 $X3=.81$ 、 $X4=.79$ 、 $Y1=.86$ 、 $Y2=.83$) , CR 值 $>.8$, 表明信度良好。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 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检验结构效度。EFA 结果显示, $KMO=.821$, Bartlett 球形检验 $p<.001$, 适合因子分析; 各观察变量因子载荷 $>.6$, 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5$, 表明效度良好。

4.4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模型拟合指标 (表 3) 显示, $\chi^2/df=2.36$ (<3) , $GFI=.91$ ($>.9$) , $AGFI=.89$ (接近 $.9$) , $NFI=.92$ ($>.9$) , $CFI=.95$ ($>.9$) , $RMSEA=.062$ ($<.08$) , 拟合度良好, 可进行假设检验。

表 1 模型拟合度指标

指标	χ^2/df	GFI	AGFI	NFI	CFI	RMSEA
标准值	<3	$>.9$	$>.85$	$>.9$	$>.9$	$<.08$
研究值	2.36	.91	.89	.92	.95	.062

路径分析显示 (表 4) , 7 条假设得到支持, 2 条未支持:
外生变量对老年游客满意度的影响: 康养服务品质 ($\beta=.35$, $p<.001$) $>$ 适老化设施水平 ($\beta=.32$, $p<.001$) $>$ 文化资源吸引力 ($\beta=.28$, $p<.001$) $>$ 智慧技术应用 ($\beta=.19$, $p<.01$) , 支持 H1-H4;
内生变量间及外生变量对融合发展的影响: 老年游客满意度 ($\beta=.41$, $p<.001$)、康养服务品质 ($\beta=.24$, $p<.01$)、适老化设施水平 ($\beta=.22$, $p<.01$) 显著正向影响融合发展, 支持 H5、H7、H8; 文化资源吸引力 ($\beta=.11$, $p>.05$)、智慧技术应用 ($\beta=.08$, $p>.05$) 影响不显著, 不支持 H6、H9。

表 2 SEM 模型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 (注: ***表示 $p<.001$)

研究假设	路径关系	标准化估计值	p 值	检验结果
H1	$X1 \rightarrow Y1$	.28	***	支持
H2	$X2 \rightarrow Y1$	.35	***	支持
H3	$X3 \rightarrow Y1$	.32	***	支持
H4	$X4 \rightarrow Y1$	.19	.007	支持
H5	$Y1 \rightarrow Y2$	.41	***	支持
H6	$X1 \rightarrow Y2$	.11	.132	不支持
H7	$X2 \rightarrow Y2$	.24	.005	支持
H8	$X3 \rightarrow Y2$	.22	.008	支持
H9	$X4 \rightarrow Y2$	.08	.215	不支持

4.5 结果分析

通过研究结果不难发现老年游客满意度是融合核心中介,文化资源、智慧技术需通过提升满意度间接推动融合,这表明“以老年游客需求为中心”是融合关键。康养服务与适老化设施是直接驱动力,两者直接影响融合发展,原因在于吴江老年游客更关注“健康保障”与“安全便利”。这与韩承飞等(2025)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体育康养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创新研究的结论一致[10]。文化资源与智慧技术需深化应用,文化资源未直接推动融合,因现有文化产品未与康养深度结合。智慧技术影响弱,因适老技术覆盖率低,未解决“数字鸿沟”。

5 吴江区银发经济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路径

5.1 文化价值转化与品牌塑造

深入挖掘丝绸、水乡等地域文化的康养价值,将“江南意象”转化为如“蚕沙药浴”、“摇橹推拿”等可体验、老年适配的健康产品。配套打造“古镇养生”、“太湖怡情”等主题线路,建立“银发友好”服务标准并纳入景区管理,实现扫码可查,推动文化品牌与老年健康需求精准对接。

5.2 产品体系迭代与业态融合

对存量项目实施“适老化手术”,如在餐饮中推行减盐计划、在浴室加装安全扶手;增量开发则按停留时长分层,涵盖短期疗养、中期研学与长期旅居。积极培育“民宿+康养”、“农业+康养”等融合业态,构建集“预防-康复-休闲”于一体的服务闭环,实现医康养服务的无缝场景切换。

5.3 适老环境营造与智慧赋能

推进城市空间的“慢速”重构,将无障碍改造延伸至微尺度细节,如调整公交踏板高度、信号灯时长。行程中默认设置午休,并培训掌握老年心理知识的导游队伍。同步深化智慧应用,开发VR/AR文化体验项目,普及一键呼救与健康监测设备,打造集成行程规划、安全监护与健康管理的智慧平台,实现“慢游”与“快响”的统一。

5.4 政策机制协同与要素保障

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将关键发展指标纳入年度考核。实施“建设+运营”双补贴政策,提供水电优惠与长期低息贷款。保障康养产业用地需求,推动校企合作定向培养“银发管家”等专业人才,形成可持续的资金与人才支撑体系。

5.5 区域协同发展与市场开拓

依托沪苏湖高铁推出“长三角银发一卡通”,实现票根优惠跨区域通用。共建“老年数据港”推动健康档案与消费偏好共享,联合举办产品设计大赛并推动优秀方案落地。同步开拓国际市场,完善外卡支付,开发多语种康养产品,并与国际养老机构合作客源互换,将“江南”品牌推向境外银发群体。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关键影响因素明确,文化资源吸引力,康养服务品质、适老化设施水平以及智慧技术应用都显著正向影响老年游客满意度,在这些变量中,康养服务品质的影响($\beta=0.35$)最高。而老年游客满意度($\beta=0.41$),康养服务品质($\beta=0.24$),适老化设施水平($\beta=0.22$)则促使融合发展,其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文化资源与智慧技术。融合短板显著,在吴江地区的当下,阻碍银发经济和文旅康养深度融合的瓶颈主要集中在当前适老化的基础设施改造迟缓不前,康养产品的供给种类较为单一,跨部门联动机制欠佳,跨区域流动困难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四重阻力。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文化康养资源—>老年需求适配—>满意度提升—>产业融合度”四阶传导链条,将原本零星的痛点汇聚成可供量化的系数关系,给精准干预供给实证依据。

据此反向推导五条对策具备落地条件。一是文化基因康养转译,丝绸水乡符号打造可体验的健康场域。二是产品梯次更新,以短—中—长周期组合补上现有缺口。三是微尺度适老改造,由无障碍节点网络激活存量空间。四是政策工具时间错配,用财政土地金融杠杆跨期安排投入。五是高铁票根区域通用,让交通凭证成为长三角“银发护照”。这些路径与吴江资源禀赋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制度红利匹配度高,在模型系数里已经得到验证逻辑,可供相似区域直接复制成可推广模板。

6.2 政策建议

为提升康养服务质量,可考虑设立专项扶持基金,重点投向康养机构建设与景区适老化改造,争取在4A级以上景区全面普及无障碍设施,并推动二级以上医院普遍设立老年医学科。在促进产业协同方面,应推动文旅、民政与卫健部门构建数据共享机制,打通信息壁垒。配合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企业积极开发集文化、康养与医疗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产品。从区域协作角度看,有必要主动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格局,参与共建“长三角康养旅游联盟”,探索推出“高铁+银发旅游”跨区域专线,以增强对周边城市老年游客的吸引力。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依托高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聚焦“银发文旅康养”领域,配套学费补助与项目扶持政策。对养老护理员、康养导游等关键岗位可以考虑提供专项补贴,从而提升专业人才的职业稳定性与留存率。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受样本所限,研究对象仅集中于吴江区,其结论是否适用于长三角其他县域尚待进一步检验。其次采用横截面数据也使得难以捕捉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此外,模型未引入如“社会支持”“健康状况”等潜在变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解释力度。展望未来,可在以下方面深化研究:将样本范围扩展至长三角更多县域,以检验当前结论的普适性。引入长期追踪方法,系统分析融合发展的演变路径。甚至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型,纳入社会支持与健康状况等变量,增强模型的全局性与解释力。在此基础上,可逐步开展融合发展成效的评估工作,为相关政策的持续优化提供实证依据。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5-02-28)[2025-02-28].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 [2] 苏州市吴江区统计局. 2024 年吴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5-06-04)[2025-06-04]. <https://www.wujiang.gov.cn/zgwj/tjsjjd/202506/559348a8b3f6405a8be16e5ce7d9c5a4.shtml>.
- [3] 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十四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 苏州: 苏州市政府, 2021.
- [4] 国务院.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 [EB/OL]. (2025-03-12)[2025-03-1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3163.htm.
- [5] 中国旅游报. 老年旅游服务优化策略探析. (2025-06-16)[2025-06-16]. https://www.ctnews.com.cn/guandian/content/2025-06/16/content_175117.html.
- [6] 聂军瑶,徐芸鑫,李英吉,祁苑红.基于 MOA 理论的游客专业度对医康养旅游支持行为意向影响研究[J].旅游纵览,2024(12):128-130
- [7] 刘瑞莲,李阔,李艳,卓钰皓.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协同优化——以七里峪康养乡村为例[J].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2 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二),2022,8.10
- [8] OLIVER R L.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0, 17 (4): 460-469.
- [9] 解瑞金,赵佳强,王宝丽.康养旅游消费者行为特征与市场优化策略研究——以运城盐湖景区为例 [C]// 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2025 年度论文集.北京:中国商业统计学会,2025: 345-358.
- [10] 韩承飞,朱冰冰.“双循环”新格局下体育康养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创新研究 [J]. 绥化学院学报, 2025, 45 (6): 45-50.
- [11]黄昕,菊春燕.基于 SEM 的游客康养旅游需求对其体验质量的影响[J].现代园艺,2025,48(7):54-57
- [12] 尚文周,王启月,姜俊如.“银发经济”下乡村康养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J].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2025, 14 (2): 108-120.
- [13]林芊妍,苏裕盛.银发经济视角下中医药康养旅游的 SWOT 分析[J].服务科学和管理,2025,14(1): 153-160.
- [14]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 2025 年吴江区银发文旅需求调查报告 [R]. 苏州: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 2025.

A Study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ilver Economy and Cultural Tourism & Health Care in Wujiang District Based on the SEM Model

Zhang Huiyuan

(Suzhou Informat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angsu)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the silver economy with cultural, tourism, and health care sectors in the cor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study takes Wujiang District as its research focus. Utiliz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ultural resource attractiveness, healthcare service quality, elderly-friendly facility standards, smar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lderly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the degre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then conducted using data from 352 valid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five strategic pathways are propose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roduct innovation, elderly-friendly renovations,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Keywords: Silver economy; Culture tourism & health car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英国仲裁法 2025：仲裁员视角下的重要变革 ——保密义务的法典化及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引入

饶康

(斯旺西大学法学院, 英国 斯旺西 SA2 8PP)

摘要：2025 年英国《仲裁法》的修订，是自 1996 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调整，其目的在于回应实践中的不足并巩固伦敦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本文围绕仲裁员这一核心主体展开评析：其一，探讨仲裁员在持续披露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其二，分析确立的紧急仲裁员制度之潜在影响及改进路径。通过结合典型判例与国际规则，本文考察这些改革在提升仲裁透明度、效率和可预测性方面的作用，并提出思考以及改革意见。

关键词：仲裁法；披露义务；保密义务；紧急仲裁员；国际仲裁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89

1. 披露义务与保密义务

1.1 背景

在英国仲裁法中，仲裁员的持续披露义务与保密义务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尽管二者在实践中的平衡甚至关系到仲裁的公平性和可信度。但是 1996 年《仲裁法》并未对这两项义务进行明确规定，而是通过法律实践中的判例逐步建立起了相关制度和标准。因此，对此领域的界限始解释终存在空间。

在 *Ali Shipping v Shipyard Trogir* [1999] 一案中，上诉法院确认在英国管辖下的仲裁应当推定存在一般性的保密义务。^[2] 然而，这一原则并未纳入成文法，其适用范围与例外情况仍由法院在个案中自由裁量。在 *Halliburton v Chubb* [2020] 一案中，最高法院确认仲裁员确有披露义务，即必须披露任何可能合理引发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3] 但判决同时也显示了适用标准的模糊性，尤其是在仲裁员多重或交叉任命的情况下，即便法院强调披露对于维护仲裁公正性的必要性，但对于法定中的“重要情形”（material circumstance）的界定依然不够明确。

综上所述，过度依赖司法推理而缺乏立法明确性在是 1996 年《仲裁法》中一项很明显的不足，这会导致当事人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同时，在实践中，当事人必须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相关问题，而非依赖立法预先设定规则，这也极大地增加了纠纷解决成本，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伦敦的国际仲裁地位。^[4] 这一弊端在后来的改革中，也就是在 2025 年修订的仲裁法中，改革委员会试图通过法典化披露与保密义务的措施，以期确保程序和结果的公正，并使英国仲裁实践更加贴近国际标准。^[5]

1.2 仲裁员的持续披露义务

1996 年《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并未明文规定，该领域主要依赖判例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Halliburton v Chubb* [2020] 一案。在本案中，英国最高法院指出，仲裁员若未披露多重或交叉任命，可能造成偏袒的外观，即便并无实际偏见。^[6] 该判决凸显了披露对于维护仲裁信任度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揭示了标准上的不确

作者简介：饶康(2002—)，男，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法、海商法、国际商事仲裁；

通讯作者：饶康

^[2] *Ali Shipping v Shipyard Trogir* [1999] 1 WLR 314 (CA).

^[3] *Halliburton Co. v Chubb Bermuda Insurance Ltd* [2020] UKSC 48, [2021] A.C. 1098, 参见第[132]段。

^[4] 《Arbitration Act 2025》(UK), 第 23A 条。

^[5]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20), General Standards 3 – 4.

^[6] *Halliburton Co. v Chubb Bermuda Insurance Ltd* [2020] UKSC 48, [2021] A.C. 1098.

定性。法院虽指出仲裁员应当披露“合理可能引发对其公正性怀疑的情形”，但何为“重要情形”（material circumstance）并未得到清晰界定。^[7]这使得披露义务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依旧模糊，特别是在重复任命和案件交叉的情况极为常见的跨境仲裁中。

在随后的改革中，即2025年的《仲裁法》首次在立法层面引入明确的披露义务，根据该法第23A条，仲裁员自受任之日起即负有持续性的法定义务，即仲裁员应当在仲裁过程中随时披露任何可能引发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并且该项义务贯穿仲裁过程的始终。^[8]该制度对于保障仲裁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至关重要，因为在实践中，仲裁结果的合法性和公平公正依赖于仲裁员自身的中立性，并且当事人对于委任仲裁员的信任度也会影响到裁决的可执行性。因此，2025年的改革中一项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程序的可预见性与公正性。^[9]仲裁员与当事人由此可以获得更清晰的法律指引，从而减少因理解分歧而引发的仲裁挑战。同时，新制度也使英国仲裁实践与国际标准更加接轨。尤其参照了2020年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对披露义务所做出的详细规定。^[10]2025年改革借鉴了此类国际标准，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明确，从而增强维护伦敦作为仲裁地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这一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披露义务的模糊性。尽管新法确立了“持续披露义务”，但对于何种情形属于“可披露事项”仍未给出明确界定。结果可能是，仲裁员出于谨慎心理而选择“过度披露”，从而增加程序不必要的复杂性；也可能因判断不足而“低度披露”，进而削弱当事人对仲裁公正性的信赖。由此可见，制度的不确定性不仅可能诱发新的司法争议，也意味着未来司法解释仍将在细化披露义务的边界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11]总体而言，2025年的改革在制度层面相较1996年法确实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是通过将仲裁员披露义务法典化，增强了程序的确信性与透明度。然而，Halliburton一案所揭示的核心难题——即披露边界仍不明晰——并未因立法而彻底解决。这一制度性困境未来仍需通过司法判例的不断积累与解释来逐步化解。

1.3 保密义务的法典化

2025年《仲裁法》首次确立了“以保密为原则、例外为补充”的制度格局，将仲裁的保密性明确提升为法定规则。在这一框架下，仲裁程序原则上应保持不公开，但在符合法律规定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予以披露。此种制度安排一方面回应了当事人对于隐私及商业秘密保护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承认在特定情形下适度开放的必要性，从而在“保密”与“透明”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制度创新并非凭空设立，而是出于对判例法路径长期不确定性的回应。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规则来源分散。在Ali Shipping v Shipyard Trogir一案中，法院虽推定仲裁保密义务，并在“维护司法公正”等情形下允许例外，但由于仅属法官造法，适用边界随案而变，当事人难以形成稳定预期。^[12]其二，例外标准游移。Emmott v Michael Wilson & Partners Ltd再次承认可在必要时突破保密，但并未给出类型化、可操作的判断标准，致使不同法官对“必要性”的理解存在差异。^[13]其三，跨境适用成本高。对不熟悉英国判例传统的国际当事人而言，仅靠检索判例难以把握义务范围与例外触发条件，从而抬高合规与争议成本。

正因为上述缺陷会直接带来合同起草与证据交换的过度保守、围绕保密异议的程序拖延以及对法院救济的过度依赖等负面后果，2025年改革选择以法典化方式加以回应：一方面，明确“以保密为原则、例外为补充”的结构，并将例外统一置于法定事由之下（如法律要求、公共利益或经当事人同意），以实现从事后裁判转向事前规范、从自由裁量转向可预期规则；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规则可读性与可迁移性，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并稳定当事人预期，从而强化伦敦作为仲裁地的制度吸引力。

通过立法将仲裁保密义务加以确认，实际上弥补了1996年制度仅依赖判例所带来的不足，也使规则的适用更具确定性。原因在于，判例法的逻辑往往分散且依赖个案裁量，难以形成统一标准，而成文法的规定则能为当事人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对于习惯选择伦敦作为仲裁地的国际当事人而言，这种制度上的明确性尤为关键。过去，他们往往需要依赖本地律师去搜集并解读判例，方能把握保密义务的适用范围；改革后，直接援引条文大大

^[7] 同上，尤其参见 Lord Hodge 第[132]段意见。

^[8] 《Arbitration Act 2025》（UK），第23A条（规定仲裁员负有持续的披露义务）。

^[9] 《Arbitration Act 2025》（UK），第23A条。

^[10]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20), General Standards 3 – 4.

^[11] Cf. Halliburton Co. v Chubb Bermuda Insurance Ltd [2020] UKSC 48, [2021] A.C. 1098（揭示“重要情形”范围的模糊性）。

^[12] Ali Shipping v Shipyard Trogir [1999] 1 WLR 314 (CA).

^[13] Emmott v Michael Wilson & Partners Ltd [2008] EWCA Civ 184.

降低了理解成本，也减少了潜在的争议风险。正因如此，伦敦得以在与同样具备保密立法的新加坡、香港等仲裁中心的竞争中维持甚至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14]

不过，该项改革亦并非没有局限。其一，由于缺乏有效的跨境执行机制，一旦涉密材料在境外司法程序中被披露，英国法律实际上难以控制其进一步流转，同时还会使得保密义务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其二，在投资者国家仲裁领域，保密与透明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与私人商事仲裁强调的隐私保护不同，投资争端往往涉及公共利益，因此该领域的仲裁更加强调程序的公开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仲裁透明度的呼声不断增强，2014年《UNCITRAL 条约仲裁透明规则》的出台，正体现了对这一趋势的满足。^[15]但2025年《仲裁法》对此保持沉默，可能导致英国仲裁在相关领域逐渐落后于国际标准。

2. 紧急仲裁员制度：从法院依赖到仲裁庭自主（第41A条）

2.1 背景

英国1996年的《仲裁法》没有对“紧急仲裁员”（Emergency Arbitrator, EA）制度做出有关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倘若发生紧急救济的需求，而此时当事人并未仲裁庭，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其一，直接依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例如，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和国际商会（ICC）自上世纪末陆续引入紧急仲裁员条款，但是这些规定仅具合同效力，在英国国内并无强制力，即能否适用“紧急仲裁员”还是要依据当事人的意愿，而非强制措施；其二，根据《仲裁法》第44条申请临时措施，当事人直接请求法院援助，然而这一途径往往程序繁琐、成本较高，且易损及仲裁的保密性与自治性，相关案例也印证了这一困境。例如在 *Gerald Metals SA v Timis* [2016] 一案中，高等法院虽强调仲裁应作为临时救济的“主要场所”，但同时承认，在仲裁庭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得不依赖法院介入。^[16]这很显然违背了当事人选择仲裁所追求的高效与灵活。

与之相比，其他主要仲裁地早已在立法上对紧急仲裁员制度加以确立与细化。以新加坡为例，其在2012年修《国际仲裁法》时，正式赋予紧急仲裁员裁令以法律效力；香港亦紧随其后，于2013年在《仲裁条例》中增设条款，规定此类命令可以通过法院执行；^[17]而法国《民事诉讼法》更是明确承认仲裁庭，包括紧急仲裁员所发布的临时措施的效力。^[18]这些制度性进展不仅有效提升了仲裁程序的效率与自主性，也极大提高了上述地区在国际仲裁市场中的竞争力。

因此，英国在2025年修订《仲裁法》时增设第41A条，确立紧急仲裁员制度，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制度缺陷所导致的缺陷。通过减少当事人对法院的过度依赖，该改革意在进一步强化仲裁的独立性与高效性，从而保持伦敦在全球仲裁中作为首选仲裁地的吸引力。^[19]

2.2 1996年与2025年之相关法律比较

（1）1996年的EA框架

在1996年《仲裁法》的框架下，临时措施被预设为应当由仲裁庭在成立之后作出。因而，在仲裁庭尚未组成的阶段，如当事人急需救济，实际上只能诉诸仲裁机构规则（如LCIA或ICC规则）。然而，这些规则虽可提供一定的程序安排，却仅具合同效力，缺乏国内法的直接保障，也难以获得法院的强制执行。^[20]另一途径则是根据第44条诉诸法院。^[21]然而，对法院的过度依赖不仅导致紧急措施往往难以及时落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仲裁本应具备的保密性与自治性。正如 *Gerald Metals SA v Timis* 一案所揭示的，在仲裁庭尚未组成的阶段，法院事实上成为当事人唯一能够依赖的救济途径。^[22]

^[14]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 609), 2013年修正, 附表2第3部分;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Cap. 143A), 2012年修正, 第12条第(6)–(7)款。

^[15] UNCITRAL, Rules on Transparency in Treaty-based Investor – State Arbitration (2014)。

^[16] *Gerald Metals SA v Timis* [2016] EWHC 2327 (Ch)。

^[17]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Cap. 143A), 2012年修正, 第12条第(6)–(7)款;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 609), 2013年修正, 附表2第3部分。

^[18] French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第1468条。

^[19] Law Commission, Review of the Arbitration Act 1996: Final Report (Law Com No 423, 2023), 第7.31段。

^[20] LCIA Arbitration Rules 1998; ICC Arbitration Rules 2012, Art. 29 and Appendix V。

^[21] Arbitration Act 1996, s. 44。

^[22] *Gerald Metals SA v Timis* [2016] EWHC 2327 (Ch)。

(2) 2025 年的制度变革：第 41A 条

2025 年修订的第 41A 条，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紧急仲裁员 (EA) 制度。其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仲裁庭尚未成立的紧急情形下，EA 有权作出具备拘束力并可执行的裁令；其次，在特定条件下，该类裁令不仅可以由法院加以执行，还能够延伸适用于非仲裁当事人；最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亦可提供必要协助，例如针对涉案第三方银行账户发布冻结措施。^[23]由此可见，紧急救济的中心已由法院移回仲裁程序之内，从而在制度逻辑上对 1996 年《仲裁法》所确立的模式形成了根本性的修正。

(3) 国际制度比较

比较法视角下可以发现，主要国际仲裁机构早已普遍引入紧急仲裁员机制。例如，国际商会 (ICC) 在《仲裁规则》第 29 条及附录五中确立紧急仲裁员程序；^[24]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 亦分别在 2016 年与 2018 年的规则中增设相关条款。^[25]可见，在当代仲裁制度中，紧急仲裁员机制已成为衡量制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不仅如此，部分主要仲裁地更通过立法赋予该机制强制效力。新加坡在 2012 年修订《国际仲裁法》，明确承认并执行紧急仲裁员的裁令；香港在 2013 年修订《仲裁条例》，同样为裁令的执行提供了法律路径；^[26]法国《民事诉讼法》第 1468 条则直接规定，仲裁庭（包括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措施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国际仲裁的竞争焦点已从单纯的程序便利或声誉优势，转向能否提供高效且可执行的紧急救济。

与这些发展形成对照的是，英国在 1996 年《仲裁法》下始终缺乏 EA 制度，被学界和实务界视为“制度短板”。虽然当事人可依赖 ICC 或 LCIA 等机构规则，但由于缺乏法律承认，紧急仲裁员裁令在英国境内难以获得保障，当事人不得不转而诉诸法院。这不仅延缓了救济速度，也削弱了仲裁应有的自治与保密，使伦敦在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竞争中相对滞后。

因此，2025 年的改革意义重大。一方面，第 41A 条在制度层面补齐了英国仲裁的缺陷；另一方面，在国际比较维度上，也缩小了与新加坡、香港等领先仲裁地的差距。更为关键的是，随着 EA 命令获得立法承认，并辅以法院的执行机制，国际当事人对伦敦仲裁的紧急救济效力与可执行性更具信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伦敦作为全球仲裁首选地的地位。

2.3 改革的价值

2025 年《仲裁法》引入第 41A 条，无疑在效率、自治和国际竞争力三个层面均展现出重要价值。首先，在紧急案件中，旧法下当事人只能依赖法院第 44 条申请临时救济，程序迟缓且增加成本，不利于保护紧急权益。新法通过赋权紧急仲裁员 (EA)，使当事人得以在仲裁框架内直接获得救济，既缩短了时间，也回应了 *Gerald Metals* 案中“临时措施以仲裁为主”的司法立场，从而强化了仲裁的自治性。其次，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伦敦长期在 EA 制度上落后于新加坡、香港等仲裁地，使其在全球仲裁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第 41A 条的确立，与 ICC、SIAC、HKIAC 等主流仲裁规则保持一致，缩小了与领先仲裁地的差距，提升了制度吸引力。最后，该条还允许法院在必要时协助执行 EA 命令，甚至对第三人采取措施，构建了“仲裁裁令+司法强制”的双层机制。此种安排既保持了仲裁的独立性，又确保了命令的实际可操作性，尤其在跨境争议中更显意义。由此可见，第 41A 条的设立不仅弥补了制度短板，更在效率提升与国际接轨之间实现了平衡，为伦敦巩固其国际仲裁中心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

2.4 批判思考

2025 年《仲裁法》第 41A 条首次确立了紧急仲裁员制度，填补了 1996 年法下长期存在的空白。^[27]在旧制下，当事人若在仲裁庭成立前需要临时救济，只能依赖机构规则或诉诸法院第 44 条，这不仅延缓了救济效率，也削弱了仲裁的保密与自治。*Gerald Metals* 一案就指出，在仲裁庭未组成时，法院事实上成为唯一可行的救济途径。^[28]新法通过赋权紧急仲裁员，使其得以在紧急情况下作出具有拘束力并可执行的命令，并由法院在必要时

^[23] David Foxto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ivil Appeals in England and Wales* (OUP 2021), 304.

^[24] ICC Arbitration Rules 2021, Art. 29 and App. V;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Sch. 1; HKIAC Administered Arbitration Rules 2018, Sch. 4.

^[25]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Cap. 143A), s. 12(6) – (7) (2012 amendments).

^[26]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 609), Sch. 2, Pt. 3 (2013 amendments).

^[27] Arbitration Act 2025, s. 41A(3) (UK).

^[28] *Gerald Metals SA v Timis* [2016] EWHC 2327 (Ch).

提供协助,包括针对第三人的措施。由此,紧急救济的重心重新回归仲裁体系,实现了制度上的实质性修正。比较法经验显示,ICC、SIAC、HKIAC等规则早已普遍设立EA程序,新加坡、香港更在立法层面明确其效力,法国亦通过《民事诉讼法》承认仲裁庭临时措施的效力。英国改革在缩小差距的同时,也提升了国际当事人对伦敦仲裁的信心。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提高了紧急案件中的处理效率,避免了“绕行法院”的程序负担;其二,强化了当事人自治,使救济真正纳入仲裁体系;其三,弥补了制度短板,使伦敦与新加坡、香港等地接轨,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其四,结合法院的协助执行机制,提升了EA命令在跨境争议中的现实操作价值。然而,该制度仍存在难题:^[29]EA命令能否纳入《纽约公约》框架下的“裁决”尚不确定;^[30]其执行与延展在实践中仍可能增加法院负担;国际上对EA命令的承认尚不统一,跨境效力存疑;同时,如何在仲裁自治与司法监督之间保持平衡,仍需依赖未来判例进一步厘清。

3. 结论

2025年《仲裁法》的修订,针对仲裁员披露义务、保密义务与紧急仲裁员制度三方面作出回应,弥补了1996年法律长期存在的空缺。通过制度化与法典化设计,新法不仅在形式上提升了规则的透明性与可预期性,而且在实质上强化了当事人自治、提高了紧急救济的效率,从而在整体效果上有助于巩固伦敦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

然而,立法的进步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披露义务中“重大情形”的界限依然模糊,既可能诱发仲裁员的过度披露,也可能导致低度披露,从而引发新的争议;保密义务与透明化需求之间的张力,尤其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投资仲裁中仍难化解;至于紧急仲裁员命令在《纽约公约》框架下能否获得域外承认和执行,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表明,新制度的运行仍高度依赖未来的司法解释与实践发展。

因此,未来的改进方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吸收国际“软法”经验,如IBA准则、UNCITRAL透明规则,与英国国内判例相互衔接,从而在披露与保密的适用中建立更为稳定的边界;二是推动在《纽约公约》框架下就紧急仲裁员命令的性质和效力达成更广泛共识,以消解跨境执行的不确定性。唯有如此,才能使2025年改革真正发挥制度价值,并为国际仲裁秩序的协调发展提供示范。

Arbitration Act Reform 2025: Codification of Disclosure and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mergency Arbitrator Mechanism

Kang Rao

(Swanse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Swansea, SA2 8PP, UK)

Abstract: The 2025 reform of the UK Arbitration Act represents the most significant revision since 1996, aiming to address long-standing deficiencies in practice and reinforce London's position as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ub. This paper centers on arbitrators as the key actors within the arbitral framework. First, it examines how arbitrators are expect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ir continuing duty of disclosure and the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Second, it analyzes the potential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newly introduced emergency arbitrator mechanism. By drawing on representative case law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reforms enhance transparency, efficiency, and predictability in arbitration.

Keywords: Arbitration Act; Disclosure obligation;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Emergency arbitrat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9] Law Commission, Review of the Arbitration Act 1996: Final Report (Law Com No 423, 2023), para 7.35.

^[30]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1958), Art. I(1).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成都大运体育赛事遗产的利用与传承研究

刘浩宇 韩晨 黄蕾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逻辑演绎法, 对后大运时代体育赛事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梳理和分析。目的在于为后大运时代体育赛事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基于现实困境, 提出了 (1) 放宽市场准入, 建立高效系统场馆体系; (2) 构建文体旅商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3) 明确赛事遗产管理职责, 有效开发赛事遗产; (4) 加大政策保障, 以法保障体育赛事遗产管理等策略, 为体育赛事遗产的利用和传承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向。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成都大运会; 体育赛事遗产;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2

1 前言

自北京大运会和深圳大运会在中国承办以来, 成都大运会已是中国内地举办的第3届大运会, 也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的第一场综合性的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 同时也是中国西部地区首次承办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根据《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纲要》的文件可以了解到, 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关键, 到2025年, 成都要每年举办国内外高规格等级赛事50项以上, 让体育赛事成为成都发展“新名片”。成都大运会在筹备期间, 新建和改建近50个体育场馆, 在大运会之后, 这些场馆也会成为体育赛事遗产, 因此如何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有效再利用这些体育赛事遗产是成都建设赛事名城的重要一环。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2.1 研究目的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一直存在着投资规模大, 赛后出现资源浪费、二次破坏环境等一系列运营难题, 本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理论角度出发, 对大运体育赛事场馆遗产的传承利用进行可行性分析, 旨在为后大运时代的体育赛事场馆遗产更高质量的持续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2.2 研究意义

2.2.1 理论意义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与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属于世界性综合性运动会, 但目前对大运会的研究比之对奥运会的研究较少, 同时对后大运时代的赛事遗产利用研究相对不足,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 探究后大运时代的赛事场馆遗产的传承与利用, 能够为后续体育赛事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也能够为大型体育赛事的遗产管理提供“中国经验”。

2.2.2 实践意义

体育赛事遗产的可持续利用, 对中国来说, 能够给各大城市举办体育赛事后, 场馆何去何从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对成都来说, 能够进一步提升其城市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对居民来说, 能够满足其日常锻炼需求, 激发全民参与体育的热情, 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战略的实现。

3 相关概念界定

作者简介: 刘浩宇(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可持续发展;

韩晨(1988—),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

黄蕾(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通讯作者: 韩晨

3.1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界定

可持续发展概念在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台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报告中做了系统的定义,成为众多定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其是指在能满足当代社会需求的同时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造成危害的发展^[1]。可持续发展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需要的含义,即以人为本,在满足人们生理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并应将此放在优先的地位来考虑。第二是局限性的概念,由于科技和社会各方面组织的飞速发展,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受到了制约^[2]。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去进行人类活动,实现满足社会目的和社会需求的同时,又保护好人类生存所需的各类有形和无形的资源,以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与统一。

3.2 体育赛事遗产概念界定

体育赛事遗产从字面含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因大型体育赛事活动而产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的遗产在体育领域指体育场馆、体育文化艺术作品、设备器材等有形之物,后加入了诸如精神文化意识等层面的无形资产^[3]。因此体育赛事遗产可以简单理解为国家或城市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之后,为民众、城市地区甚至本国家所创造或加速带来的有形或无形收益。

4 成都大运会体育赛事遗产面临的现实困境

4.1 体育赛事遗产再开发与利用程度有待加强

在体育赛事遗产方面,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体育场馆与其所配套的基础设施。何文义^[4]指出,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及配套设施的赛后利用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类场馆设施及所配套的服务的规划、设计、运行与赛事的等级规模相匹配,对于小型赛事或市民日常健身锻炼活动却是不相适应。因此,这类场馆设施建设初期,就要考虑后期能否可持续性的举办同等规模的赛事。在筹备过程期间,成都不仅新建改建 49 个场馆,更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带动了文化馆、美术馆等一系列文化设施的建设,大大提升了城市形象。而在大运会浪潮之后,如何将这一些体育赛事遗产再次有效利用成为了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些国家或城市在举办完大型体育赛事后,部分场馆存在着体量大、利用率低的问题,这样的现象称为“白象”(White elephants 意为“累赘、无用的商品”)。例如,第二十二届索契冬奥会在俄罗斯举办,在体育场馆选址、布局和建筑设计等方面均是国家整体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高的特点,最终成本超过预算近 4.5 倍,被称为“用金砖打造的冬季奥运会”,且在赛事举办之后,由于前期投资成本和后期运营费用过高等原因,使得出现了场地设施等闲置浪费、利用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与之相比,成都大运会也不乏如东安湖体育公园、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原凤凰山体育公园)等大型体育赛事场馆,这些场馆同样存在着规模体量大的特点,因此应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提升这些场馆在后大运时代的有效利用率。

4.2 体育赛事遗产社会经济效益转化有待提升

一个国家、城市自申办成功体育赛事后,不仅需要与赛事等级相匹配的大型体育场馆,同时也要有高度发展的交通、通信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之中将会有力地增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带动就业、卫生、教育等的迅速发展,进而带来非常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城市在举办赛事之后,对于这些体育赛事遗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持续性发展没有合理规划,例如,里约奥运会所修建的比赛场馆,巴西人希望通过奥运会来重塑这座城市,并希望以此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被废弃的场馆人迹罕至,锈迹斑斑的钢架,随处可见的奥运五环呈现着这些场馆的衰落。王美^[5]从体育场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指出体育场馆设施既是推动地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提升城市之间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城市的发展时期,要充分挖掘其本身和附加的资源,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城市形象,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这其中也不乏成功案例,如巴塞罗那奥运会修建翻新的体育场,在赛前就成立了公司统一管理利用,所有的体育场馆都依靠企业自身维持运营,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成都大运会作为世界性的综合运动会,更应该在“大运热度”之后,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充分利用现有的体育赛事遗产,进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3 体育赛事遗产管理与运营计划有待明确

2018 年,在第九届国际体育产业论坛上,国际奥委会(IOC)公布了奥运遗产战略方针,方针指出:尽早设立一个可以与政府机构协同工作的赛事遗产管理机构,整体促进奥运赛事遗产的开发与利用工作^[6]。赛事遗产管理工作是所有举办地筹办工作的重要内容,如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在申办初期就设立了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 2010 Legacies Now,主要负责冬奥会遗产开发和管理工作,在奥运遗产管理的发展、筹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型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给运动选手和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为城市乃至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将这些赛事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这就要求有专门的机构和人才来

进行开发与利用。在 2021 年初成都就为此次大运会专门设立了赛事遗产管理处这一职能部门,但由于疫情原因使得赛事多次延期,因此在成功举办这次赛事之后,更加需要管理处履行好自身职能,专职专责做好成都大运会赛事遗产管理工作。

4.4 体育赛事遗产利用相关政策法规有待完善

在体育赛事遗产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政府作为主体,承担着规范公众群体、学术机构、新闻媒介等对赛事遗产保护、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利和义务^[7]。因此,对体育赛事遗产的开发利用就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保护。2019 年 3 月,成都市在俄罗斯召开的国际大体联执裁会会议上正式签订了 2021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举办合同,后续也出台了《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赛事遗产规划》政策文件,对大运会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赛事遗产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如果不能持续给予其政策支持或建立相应的法规进行保护,就会出现赛事遗产的自主发展、规划和管理可操作性不强,后续运营管理无法正常开展等难题。

5 成都大运会体育赛事遗产的发展路径

5.1 放宽市场准入,建立高效系统场馆体系

2021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了《赛事名城建设纲要》,提出到 2025 年体育赛事将成为成都发展的“新名片”。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索契冬奥会的尴尬处境(出现场馆资源浪费、利用率低),做到体育赛事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关注的应该是比赛后场馆的经营机制问题。在筹备期间,体育场馆及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多由政府主导出资修建,而在比赛后再由政府运营就会出现利用率低、盈利困难、维护成本增高、加大财政负担等问题,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有市场经验的经营主体入驻场馆,例如美国的斯台普斯中心由专业的洛杉矶体育公司与安舒茨娱乐集团运营,其每年会举办超过 250 场的活动,吸引上百万的游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曹庆贺、陈元欣等^[8]认为“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的先决条件是体育场馆的自身条件对该场馆在非工作时间内所能举办的体育赛事及其他活动的种类与规模。因此,要做到二次的有效利用,就应该根据每个场馆的体量、特点和区位特征,(如位于成都南的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以满足各类体育赛事需求为主;再如各大高校扩建或新建的体育场馆,赛后主要用于完成体育教学、体育训练与竞赛等)坚持“一场一策”、“一馆一策”,做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运营管理模式。

5.2 构建文体旅商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纵观国内外体育发展史,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在赛事举办后的利用方面一直存在着维护成本高、运营持续性差等痛点堵点问题。破解这一难题,就需要借鉴有益经验和自行探索。例如,北京奥运会后,鸟巢、水立方不仅成为了北京新的景点“打卡地”,更成为了居民休憩娱乐的好去处。除此之外,在 2022 年冬奥会期间两者还完成了“华丽变身”,水立方变为了冰立方,鸟巢上演“一片雪花”的故事。这两者 2 成功的案例,不仅成为了北京“双奥之城”的生动标识,也为其他赛事遗产的再利用提供了绝佳范本。因此成都可依托三城三都的城市发展战略,构建文体旅商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第一,可依托成都“天府文化”“大熊猫”等,挖掘本土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独有特色品牌。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成都平原,有着“武侯祠”“金沙遗址”“三星堆”等历史文化遗产,蕴涵着灿烂的“巴蜀文化”,因此可以打造“体育+文创”的新模式,将历史特征和体育内涵相融合;第二,近年来,成都已培育出“天府绿道”、“一带一路”、“熊猫杯”、“天府龙泉山”四大本土赛事 IP,并且拥有四川专属校园体育赛事——贡嘎杯和职业足球俱乐部——成都蓉城,同时也在举办大运前后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爱成都·迎大运等一系列文体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赛事氛围,激发了市民参与体育赛事的热情,刺激了体育消费。在“后大运时代”应该做好宣传工作,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同时通过免费或低费开放体育场馆等惠民政策,促进场馆的可持续利用,满足市民就近健身需求,提高市民继续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进而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第三,成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可将四川地区的独特美食和民俗文化等融入到体育场馆游客餐厅或商店中,在保证特色美食口感的前提下,注重树立场馆品牌形象;另外四川地区的“川剧”“皮影戏”“锅庄舞”以及相关少数民族的等具有民俗特色文化的活动,可以在不破坏原有场地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的民俗活动,让游客感受地域的特色魅力,从而建立“运动+美食+民俗”的新型旅游形态;第四,大运会后,为了避免场馆闲置浪费,尽可能使场馆利用率达到最大化,除承办体育赛事之外,还可承接非体育类的大型综合活动;另外也可借鉴“五棵松”体育馆冠名成功的范例,与本土的商业集团相合作,充分发挥体育场馆的盈利能力,但也兼顾好其社会效益,其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其社会利益为目标,以此进一步提升场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成都的后大运体育赛事遗产应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利用好自身完备的设施配置,通过构建“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为一体的发展模式,提高场馆利用率,持续性的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减少政府负担,实现“后大运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5.3 明确赛事遗产管理职责,有效开发赛事遗产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不仅应满足获得有形、实质的经济效益,还应该获得更多的文化和社会效益等,包括社

区振兴、教育体系、环保体系、医疗卫生部门等的改进,以此来持续提升举办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同时还应将体育赛事纳入整个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这一更高层面之中^[9]。作为第一次全面规划大运遗产管理的成都大运会,更应该在“后大运时代”将体育赛事遗产工作有序、持续的开展下去。首先,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赛事遗产管理处应该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分工,从开发、利用、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职责划分出发,专职专责做好大运赛事遗产管理工作。其次,应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赛事遗产规划》文件的基础上,拟订好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保证赛事遗产规划的连续性。因此,成都大运赛事遗产管理处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好工作计划,将赛事遗产工作分解成阶段性目标和项目体系,使赛事遗产工作有明确的方向和指引。

5.4 加大政策保障,以法保障体育赛事遗产管理

良好的政策保障是体育场馆发展的先决条件。从政府的角度来制定政策法规,进而成为体育场馆发展的推动器,同时也为场馆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10]。因此为了能够给予大运赛事遗产管理足够的支持,推进赛事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成都大运会遗产政策法规,为后续管理和利用提供政策依据,同时还可以鼓励社会参与,调动社会力量或体育社会组织来参与赛事遗产管理的监督工作,提高管理和利用效率。

6 结论

成都大运会虽已结束两年有余,但遗留下来的体育赛事遗产的“何去何从”问题仍旧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保证大运赛事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大运赛事遗产可通过:(1)放宽市场准入,建立高效系统场馆体系(2)构建文体旅商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3)明确赛事遗产管理职责,有效开发赛事遗产(4)加大政策保障,以法保障体育赛事遗产管理。另外还可依照当前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城市发展战略,利用好成都大运赛事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更好的让群众受益,更好的去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另外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也为赛事遗产的利用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案。成都可以将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后的场地、场馆和附属设施转变成体育公园,并将其融入到城市公园的建设、管理和维护体系中,满足各种比赛、训练和市民的日常休闲健身和体育活动的需要,同时还具备竞赛、训练、休闲健身、旅游等多种用途,进而进一步提高了这些赛事遗产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 [1] 宋俊华.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J].文化遗产,2023,(03):1-8.
- [2] 曹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老港口更新改造设计研究[D].厦门大学,2014.
- [3] 王兴一.我国大型体育赛事遗产“活化”策略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2):119-124.
- [4] 邢灿.后大运会时代,成都何去何从[N].中国城市报,2023-08-07(004).
- [5] 王美.体育场馆设施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分析[D].华中师范大学,2008.
- [6] 胡孝乾,陈姝姝,Jamie Kenyon,等.国际奥委会《遗产战略方针》框架下的奥运遗产愿景与治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01):36-42.
- [7] 刘鹏.2008北京奥运会遗产保护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0.
- [8] 邓尚凤.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赛事遗产利用研究[D].成都体育学院,2022.
- [9] 曾庆贺,陈元欣,王健.大型赛事场馆赛后利用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03):16-1
- [10] 李少鹏.后冬奥时代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场馆可持续发展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22.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Chengdu Universiade Sports Event Legacy under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u Haoyu, Han Chen, Huang Le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 heritage in the post-Universiade era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deduc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ports event heritage in the post-Universiade era. Based on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t proposes: (1) loosening market access and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and systematic venue network; (2)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sports, tourism, and business industries; (3) clarifying th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of event heritage and effectively developing sports event heritage; (4)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and legally ensuring the management of sports event heritage.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proper guidance for the uti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ports event heritage.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engdu Universiade; sports event legacy;

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非版权性与侵权责任分配

赵嘉雯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1600)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诸多著作权问题, 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其生成物的可版权性、权利归属及侵权责任认定均未达成共识。从理论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符合著作权法对“作者”的要求, 其生成的内容也不具备独创性, 故不具有可版权性; 在侵权责任方面, 用户一般是直接侵权责任人,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需依技术中立、合理使用等原则判定。通过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的著作权属性、权利归属和侵权责任分配, 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在法律规范下安全发展。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著作权; 独创性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3

一、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作为21世纪最突出的一门新兴技术, 最早是由 John McCarthy 等人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的。人工智能至今尚无统一定义, 一般认为它描述了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思考、推理、规划等)的过程。^[1]近年来,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为各行业赋能的同时, 诸多风险与挑战也应运而生, 体现在著作权领域, 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过程中的产物属性认定不明, 这不仅在理论界产生诸多争议, 在实务界也由此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等现象。例如, 在广受关注的全球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平台版权纠纷案件中, 广州互联网法院开创性地通过司法裁决, 就生成式AI技术引发的著作权法律争议给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②, 法院最终判决AIGC生成内容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构成“作品”, 只要其满足独创性和智力创作的要求。而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丰某诉东山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③中, 法院则否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性, 认为虽然使用者输入了提示词, 但人工智能在生成过程中仍起到重要作用, 不能体现使用者对最终结果的充分独创性。

放眼全球,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著作权问题上也未达成共识。例如美国在生成阶段侵权问题上亦产生过激烈讨论。在《纽约时报》对OpenAI提起的司法诉讼中, 原告方提出双重侵权指控: 其一, 被告未经许可将原告享有版权的作品纳入ChatGPT训练数据库, 导致生成内容直接呈现原告作品内容, 该行为已满足著作权直接侵权的法定构成要件; 其二, 当用户利用该平台进行二次创作构成直接侵权时, 平台运营方通过提供侵权内容生成工具、优化侵权传播算法等技术手段, 客观上为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便利条件, 符合间接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2]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2年出台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 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 并将完善数据治理体系, 保障数字经济产业安全发展作为工作原则。这就要求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问题研究和规制要伴随技术的发展同步成长。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的著作权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本文将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现状与法律问题、侵权责任认定与法律适用就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问题展开分析。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现状与法律问题

作者简介: 赵嘉雯(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著作权法。

通讯作者: 赵嘉雯

^② 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粤019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

^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苏05民终4840号民事裁定书。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现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生成的内容在艺术、新闻、文学等领域广泛应用，但由此引发的著作权问题也日益凸显。传统著作权法以“人类创作”为核心——《著作权法》第3条对“作品”所下的定义是：“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作品”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无论是长江三峡上的神女峰、还是猕猴自拍照^④，虽然都具备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但从著作权法第1条所指明的公共政策角度考虑，只有人的行为才可以被著作权法保护，因此均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3]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物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人类所创作的作品相区分（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在日本“星新一奖”比赛中通过了初审^[4]），并且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过程往往涉及算法与人类的交互，导致其作品属性、权利归属及侵权认定等问题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仍未明确。有学者认为，为非自然人和法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首次成为内容来源后，如果将该内容认定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将冲击传统著作权的客体认定标准和权利归属原则，引发权利变动和侵权认定规则的全面混乱。^[5]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在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的可版权性时存在障碍，但司法上的利益衡量已然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承载的合法权益，立法上的利益衡量进一步表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著作权法调整的正当性基础。^[6]

司法实务中，对应学界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判决结论，如“菲林诉百度案”和“腾讯诉盈讯案”，在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前提下，法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是否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作出了不同的判决。“菲林诉百度案”中，对于涉案文章图形部分，法院认为图形构成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图形形状的差异若仅由数据和软件选择导致，则不满足独创性要求，虽然本案中原告声称对图形进行了人工美化（如调整线条、颜色），但因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美化行为体现了独创性，故该主张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涉案文章的图形部分不构成作品。对于涉案文章文字部分，法院认为涉案文章的文字内容与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的报告在表达上完全不同，是原告独立筛选、判断和分析的结果，而非软件自动生成，因此具有独创性。“菲林诉百度案”中法院认为作品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这是构成作品的必要条件，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内容没有经过人的二次加工，就可以直接否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的作品属性。^⑤而在“腾讯诉盈讯案”中，法院认为涉案文章本身体现出了对股市信息、数据的选择、分析和判断，文章结构合理、表达清晰，具备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满足独创性的要求，肯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的作品属性，并提出人类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时，其智力投入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不应固守传统创作方式，且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实际使用者（用户）。^⑥

综上，目前理论学界和实务界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仍存在较大争议，并且即使在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物可以视为作品的基础上，对于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何人、抑或者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单纯被看作是一种创作的工具也并未达成共识。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物相关著作权法律问题探析

1.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物的非版权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是否具备可版权性，是研究生成物的著作权领域的首要难题。笔者认为答案为否，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具备独创性、以及生成主体非“人”。

（1）就独创性而言，独创性具有“独立创作”和“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两层含义，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机制难以满足该要求。就独立创作而言，基于算法的自动创作不等于独立创作，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内容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本质上是训练数据的衍生产物，而非脱离训练数据的独立产出。就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而言，创造性是指源自人类作者的智力选择与思想感情的外在表达，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是算法自动运作的产物，虽然其数据素材储备丰富，但生成结果既因其不可预测性不能由人类自主选择，也不包含人类的思想感情，因此不具备创造性。既不满足独立创作，又不符合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不具备独创性是合乎逻辑的结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人类的创作同样是对已有元素（如文字、音符、色彩）的排列组合，但法律保护的是其中蕴含的“人的创造性选择与安排”。例如，诗人选择特定的词语组合来表达独特的情感，画家选择特定的色彩和构图来展现个人的美学理念。这些“选择”体现了人的智力活动。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过程中，关键的“创造性选择”（如风格、结构的确定）是由算法在训练阶段从数据中学习并固化的，用户输入的提示词只是触发和引导，而非替代算法进行真正的“创作”，因此不能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是已有素材

^④ See *Naruto v. Slater*, 888 F.3d 418 (9th cir, 2018).

^⑤ 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491民初239号。

^⑥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

的排列组合,人类的创作同样是对已有元素(如文字、音符、色彩)的排列组合”为由,将二者在独创性的认定上等同视之。

(2)就生成主体而言,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著作权法中作者必须是“人”,但如果把非人的主体作为著作权法中作者进行保护,将会违背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和精神,而无视立法目的和精神的制度设计无异于空中楼阁。立法者之所以设置“作者”的概念并通过著作权法加以保护,是为了使作者在他人对作品的利用中获酬,从而激励作者进行更多更高质量的创作。因此著作权法上的作者必须能够理解著作权法条文的意义并实际利用上述激励机制,即作者必须是“人”。

2.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非工具性和拟制作者说的否定

(1)对“工具”属性的分层解读

在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属于工具前,首先需要对“工具”一词进行词义划分。从物理意义上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无疑是人类创作的用以提高工作效率的技术系统,属于广义上的工具。但从著作权法的意义上讲,“工具”一般指创作工具,是指完全由作者的自由意志支配、仅执行指令而不贡献任何独创性表达的辅助手段,如画笔、键盘。而此处所论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非工具性,是从著作权法的意义出发,而非单纯的物理划分。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创作是基于自由意志直接决定表达性要素的行为,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的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作行为突破了传统创作工具的辅助性定位,其生成的内容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与照相机仅机械记录物理影像、图像处理软件仅执行用户精确指令的工具属性形成根本性区别。^[7]创作工具是指当借助人以外的力量创作作品时,该作品内容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此人以外的因素并未实质性地决定作品的表达性要素。纸、笔、电脑等都是常见的人用来创作的工具,简而言之它们方便了或辅助了作者创作作品的过程,特殊情况下人也可以成为他人创作的工具,比如让他人代笔。但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最终决定作品内容的还是作者本人,创作工具对表达性要素均无实质性影响。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界定为用户借助算法工具实现的创作产物。该生成内容本质上是人类创作意图通过技术中介的物化形式,其创作过程虽引入算法辅助,但仍由人类创作者主导,因此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智力成果”的认定标准。^[8]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在混淆著作权法上的创作行为的概念。著作权法上的创作行为并不等同于由人发起的行为。例如在美国的猕猴自拍案中,摄影师教猴子听到指令后按下快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果没有人的指示和发起,猴子不能独立完成拍摄行为”的映射,但由猴子随意拍下的照片绝不能认定为是摄影师的作品。同样的,十字路口由人提前设定好的违法抓拍摄像头,也不能由于其根据某人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工作,就认定自动抓拍的照片是设定人拍摄的作品。

归根到底,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创作“工具”,要看它是否参与决定了创作内容。再以上述抓拍摄像头举例,虽然设定者预先设定了参数和拍摄角度,但其对于拍摄的时机、抓拍的对象等照片内容并不是提前预知的,与摄影师手动拍摄的照片“所见即所得”不同,设定者事先对于可能的“所得”一无所知,对拍摄的内容没有预见,更不用说直接决定创作内容。

回归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讨论,无论用户输入了多么详细的提示词,最终都无法预见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也即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受到人的影响,但生成内容的表达性要素仍然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所设置的算法和训练所决定,此时用户的输入只能是“思想”而非受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表达”,用户并非是生成内容的作者。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或其背后的人工智能提供者能否被认为是作者呢?

(2)对拟制作者说的否定

有学者虽然承认只有人的成果才能作为作品受到保护,但其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拟制为作者,“不可能因为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人工智能可以作为著作权主体而存在,就否认其具备成为著作权主体的资格与可能性”^[9],或者把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提供者拟制为作者^[10]。对于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拟制为作者,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著作权法规定的专有权利和保护机制达到激励创作的效果,将“人”以外的动物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作者,不仅不会产生鼓励创作的激励效果,而且会导致极其荒谬的结论。同样以美国猕猴自拍案为例,如果按照这种理论猕猴被拟制为了摄影作品的作者,著作权法中对应的专有权利将归属于这只猕猴,那么猕猴又如何去行使作为著作权人的各项权利呢?

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拟制为作者,就是强行认为有作者才会有结果产出,这颠倒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逻辑关系。^[11]先有作品,其次才有作者。而不是先根据某内容拟定一个作者,再认定该内容为作品。作者以存在著作权法上意义的作品为前提,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具有可版权性,不属于作品,因此也就没有强行拟制一个作者的必要。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认定与法律适用

(一) 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用户作为直接行为责任人

用户是侵权意图的发起者和行为责任人，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产生侵权表达的技术执行者，概言之，前者决定思想而后者产生表达，二者并不冲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流程为“用户输入提示词，算法自主执行”，这一过程中用户输入提示词的是触发后续生成过程的根源，对是否生成侵权内容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用户以生成侵权内容为目的，输入恶意引导性的指令时（这一行为本身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算法会依据其复杂的机制输出不可预测的表达各异的结果，但这仅意味着侵权结果在表达形式上存在多种可能性，而无法改变用户行为在“法律性质”上的侵权本质。

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承担责任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生成式人工智能尽管在创作功能上超越了被动工具，但其物理和法律本质上仍是由民事主体设计、编程和控制的技术系统，即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了侵权内容，但由于其本身并不具备法律人格，因此不能作为责任主体承担法律后果。

因此，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侵犯他人著作权时，必须从使用该技术的民事主体中找到责任承担者，方能对著作权人实现权利救济。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无法决定和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产出的最终内容，要求其在海量用户同时使用的情况下精准监控侵权行为既有失公平，也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故排除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提供者后，即使生成内容不具备版权性，用户仍是生成侵权内容的发起者和受益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机制体现为“用户驱动”，用户通过输入提示词这一关键环节获得想要生成的内容，无论该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上如何评价，单论用户的提示行为就涉及到“复制”（如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某一世界名画）或者“改编”（如要求以某著名作家的风格生成短文），用户基于主观过错发起侵权指令侵犯著作权人专有权利，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则要求其承担责任。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大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协议均规定了较强的用户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因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但也反映了用户应当承担侵权风险的倾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提供者对侵权内容完全免责，其是否为间接侵权责任人仍需进一步考量。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分析

在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时，首先要根据技术中立原则，排除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用于侵权用途，就直接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在此侵权事件中构成间接侵权的情形。其次，根据用户对于侵权生成内容的利用行为的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是否需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也不同。简而言之，如果用户对侵权生成内容仅作“个人学习、研究和欣赏”，那么用户的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在用户不直接侵权的情况下则没有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间接侵权的必要性；如果用户发行和传播侵权生成内容的情况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运营活动中，仅当其未能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时，方需对间接侵权损害承担法律责任。

1. 技术中立原则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问题上的适用。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是中立的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参与前端训练过程，后续操作均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其机理自主完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既没有人为控制生成内容，也无法中途停止生成侵权作品。^[12]故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并未实际参与侵权内容的生成过程，仅仅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中立技术的提供者，按照索尼案^⑦中所提到的“实质性非侵权标准”，若技术产品存在可合理预期的合法使用场景，则不能仅因第三方利用该产品实施侵权行为，即当然推导出技术提供者具有辅助侵权的主观故意，进而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该标准强调，技术中立原则下，产品流通的正当性不应因个别用户的非法使用行为而被直接否定，除非存在提供者明知或应知侵权用途却未采取合理制止措施的特殊情形。^[13]该标准旨在构建技术研发主体的侵权责任豁免机制，通过免除创新主体对技术可能被滥用之潜在风险的过度忧虑，为其营造专注于技术革新本身的制度环境，确保技术进步不因偶发性侵权风险而受阻。因此在用户指令生成式人工智能按照提供者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和算法生成侵权内容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不因这一次的“侵权用途”而获责。

2. 合理使用原则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问题上的适用。合理使用原则是各国著作权法中限制著作权的一项重要原则。著作权法律体系呈现出双重价值导向：其首要功能在于构建作者权益保障机制，通过赋予创作者对其智力成果的排他性控制权，确保文化创新动力得以维系；而制度设计的另一维度则聚焦于知识传播效率的最大化，通过构建权益保护与公共利用的动态平衡机制，推动社会整体知识存量的增长与科学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4]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据用户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内容，按照《用户使用须知》的要求，用户只能为自己学习、研究和欣赏的目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由此输出的成果即使与在先作品实质性相似，用户的行为也因合理使用而免责，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不必因此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⑦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 Inc., 464 U.S. 417(1984)

3.避风港规则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问题上的适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理呈现为用户指令驱动型模式,其核心环节在于用户通过输入提示信息激活系统预设的程序逻辑与算法框架,进而启动内容生成流程,用户的指令决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相关表达,因此相比于网络内容提供者直接产出内容、对内容具有绝对控制力的特征,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23条第1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倾向于仅提供技术服务的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近似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种。从技术实现维度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瞬时生成超大规模合成内容的能力,客观上形成了信息洪流,导致实时监管存在技术瓶颈。在此技术特性约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既无法对海量输出进行逐项人工核验,亦难以通过现有技术手段实现全维度内容筛查,这种技术架构的固有局限性显著弱化了技术提供者与内容产出之间的直接关联,客观上重构了传统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认定标准。在主观认知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遵循用户指令生成内容,对侵权性内容产出缺乏预见可能性。^[15]作为一种特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大大降低,唯有在技术提供者未履行法定注意义务且未采取合理预防措施的情形下,方可能触发过错推定责任机制,对算法生成的实质性相似侵权内容承担间接法律责任。这种责任认定边界的限定,本质上是技术中立原则与算法黑箱效应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平衡产物。

如上所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非网络内容提供者,仅需遵循“红旗规则”和“避风港规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15条明确:“对于运行中发现、用户举报的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生成内容,除采取内容过滤等措施外,应在3个月内通过模型优化训练等方式防止再次生成。”有学者曾指出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否有义务遵循“通知+删除”规则,主要考量以下因素:(1)具体的生成内容场景;(2)服务提供者是否作出相关承诺;(3)行业的通常技术水平。^[16]总结来说,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很难要求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提供者移除侵权内容,但如果服务提供者曾作出相关承诺,权利人有权要求服务提供者移除相关内容,同时随着算法迭代能力与内容筛查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违法信息移除义务将呈现动态强化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在2006年正式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首次规定“避风港规则”,该条规则最先起源于美国,是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提出的一个概念,实质上是通过技术可行性标准对版权绝对保护原则进行必要修正,在创作即享版权的权利配置基础上,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创设法定免责空间,形成权责对等的制度性妥协。这种立法安排既体现了对技术中立原则的尊重,也反映了数字时代版权保护与技术发展间的动态平衡需求。^[17]该条款表面上属于需要先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构成侵权之后的免责条款,但美国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国家,在司法实务中为了便利往往将“避风港原则”作为判断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即只要进入了避风港的行为,都不是侵权行为。于我国而言,由于目前对于避风港原则的司法适用较为混乱,因此笔者认为仿照美国对于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方式,将其作为判定侵权的必要条件是合理且高效的。即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其生成内容存在侵权内容,就无需对侵权内容承担间接责任。

四、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创新的同时,诸多困境在司法实践中也应运而生。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侵权情形日益复杂多样,而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相对滞后,导致不同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差异,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为解决这些问题,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物的著作权属性和权利归属、落实侵权责任分配是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如本文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既不具可版权性,也缺乏独创性,生成主体同样不符合著作权法对“作者”的要求,并且它与著作权法意义下传统的创作工具存在本质区别。在侵权责任判定上,用户往往是直接侵权责任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提供者不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则需依据技术中立原则、合理使用原则以及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等情况来判定。

参考文献:

- [1]李文瑶.为什么人工智能(AI)如此难以预测?[N/OL].环球网,2014-12-29(2014-12-29)[2025-3-29].<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mJGgTo>.
- [2]姚志伟.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及其防范——以全球首例生成式AI服务侵权判决为中心[J].地方立法研究,2024,9(03):1-17.
- [3]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54-55.
- [4]黄汇,黄杰.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视为作品保护的合理性[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02):33-42+254.
- [5]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知识产权,2017,(03):3-8.
- [6]陈凤鸣.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进路[J].出版发行研究,2023,(06):20-28.

- [7]王迁.三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J].法商研究,2024,41(03):182-200.
- [8]龙文懋,龙明明.浅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路径[N].中国知识产权报,2021-1-15(11).
- [9]朱梦云.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124-125.
- [10]李伟民.职务作品制度重构与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归属路径选择[J].法学评论,2020,38(03):108-124.
- [11]王迁.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政法论坛,2023,41(04):16-33.
- [12]王立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法律认定[N/OL].知产财经网,2024-07-19(2024-07-19)[2025-3-29].<https://www.ipeconomy.cn/yuanchuang/8583.html>.
- [13]周辉.著作权视域下网盘服务提供者的平台责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07):14-29.
- [14]冯晓青.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研究[J].现代法学,2009,31(04):29-41.
- [15]冯晓青,沈韵.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J].法治研究,2025,(01):46-58.
- [16]徐伟.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其责任——以 ChatGPT 为例[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41(04):69-80.
- [17]郭爽.中国数字音乐“非法”传播现象的问卷调查——以 150 名高校学生为指定对象[J].音乐探索,2011,(04):101-104.

the Non-copyrightabilit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hievemen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Infringement Liability

Zhao Jiawen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about numerous copyright issues. Currently, neither the academic nor the practical communitie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copyrightability of its generated works, the ownership of rights, or the determination of infringement liability.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pyright law for "authorship", and the content it generates lacks originality, thus it is not copyrightable. Regarding infringement liability, users are generally the direct infringers, while the indirect liabilit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rs should be determined based on principl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and fair use. By clarifying the copyright attributes, rights ownership, and liability distribu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hievements, the saf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under legal norms can be promoted.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Originality

大模型技术驱动的品牌营销变革

崔海强¹

(1.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摘要: 大模型技术通过分析大量数字化材料, 能够产生优质的文本、图像、音乐和软件, 对品牌营销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首先基于对大模型赋能营销的价值路径分析何以能帮助品牌营销, 运用 SWOT 方法探讨人工智能在品牌营销应用中的内外和优劣, 构建了品牌营销战略分析矩阵, 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品牌营销战略。

关键词: 大模型技术; 品牌营销; SWOT 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1

引言

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 标志着数字经济时代内容生产力的重大突破。大模型技术通过多模态创意素材的输出和人机协同创作, 重构了内容生产范式, 推动了传统营销模式向数智营销跨越。然而, 当前学术界对大模型技术在品牌营销应用中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 现有文献多聚焦技术演进或应用价值, 对品牌营销的战略机遇与风险应对缺乏整合性分析。本文从 SWOT 分析视角解析大模型对品牌营销的重塑机制, 构建大模型营销战略决策框架为数字品牌在营销应用中的创新风险平衡提供了对策。

一、大模型技术赋能品牌营销的机理研究

(一) 技术架构的特征演化

大模型技术作为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突破, 其技术架构特征呈现出显著的演化趋势。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大模型, 通过预训练—微调的范式, 形成了三大核心能力体系。首先, 在感知能力方面, 大模型可以有效捕捉用户行为序列中的潜在关联, 实现了对复杂语义关系的深度理解。其次, 在多任务泛化能力维度, 大模型能够灵活适配多样化的营销场景需求, 展现出强大的跨领域迁移能力。最后, 在持续进化能力层面, 大模型采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机制, 实现了营销策略的动态优化与迭代升级。这些能力为品牌营销领域的创新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 营销价值的创造路径

大模型技术在营销领域的价值创造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 在消费者认知重构方面, 大模型通过处理海量非结构化数据, 构建了动态的消费者心智图谱。这一技术不仅推动了新产品开发周期的显著缩短, 更为品牌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提供了数据支撑。

其次, 在营销策略生成层面, 大模型展现出卓越的创意生成与优化能力。在内容生产端, AI 生成模型能够同步输出多达百种广告创意方案, 极大提升了营销内容的多样性与创新性。在策略优化端, 基于强化学习的预算分配模型可以使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提升, 验证了大模型在营销决策中的实用价值。

最后, 价值链的全渠道交互升级, 大模型通过整合客户关系管理、数据管理平台等系统数据, 构建了“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体系, 为品牌构建智能化营销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大模型技术应用的战略环境分析

(一) 内生优势

1. 数字化内容生产的范式革新

作者简介: 崔海强 (1999—),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营销与危机治理;

通讯作者: 崔海强

企业的品牌营销团队面对大量重复性的工作，可利用大模型快速生产出高质量内容。大模型技术正在打破内容生产的不可能三角——“速度-质量-成本”。用户只需要提供要求，便能自动输出各种类型的作品，提升了生产效率。通过对大模型技术赋能虚拟现实媒体生产机制的研究，它可以实现对技术增值和内容增值的双功能，并完成从内容制作、内容包装和市场创建的全过程。

2. 个性化服务增加用户黏性

动态推荐系统正在突破传统用户分群之局限性。阿里巴巴的智能营销系统通过时序图神经网络，建模消费者动态兴趣特征，捕捉兴趣迁移轨迹，以提升内容推荐效果。基于技术本质层面观察，模型协同用户画像出现，视觉内容生产成本因而降低。在数字经济深度发展阶段，大模型技术构建的“用户数字孪生体”可以实现用户需求的精准映射，建立偏好预测模型。此外，意图建模技术可以支持实时服务调整。

3. 重构市场决策

大模型技术正驱动品牌营销从经验依赖型向算法驱动型范式跃迁，促使了市场决策的重新构建。AI 的精准营销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完成 STP 战略决策，其对于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市场定位的分析较为丰富和专业。AI 通过集成强化学习与博弈论模型，构建出动态市场竞争关系。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实现多维度的竞争态势模拟，为价格策略优化与渠道组合配置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4. 提升营销工作创造力水平

AI 大模型正在重塑营销创意的生产范式。ChatGPT 在渐进式创新场景（如广告语优化、视觉元素重组）表现突出，它能够将相关的遥远概念结合起来形成有凝聚力的形式，更清晰地表达想法。在电话销售工作中，AI 协助可以提升员工在后续销售说服中回答客户问题的创造力，进而增加销售额，并发现 AI 协助改变了工作设计，使高技能员工能够产生创新性的脚本，并产生积极情绪，有助于创造力的提升。AI 作为智能代理以不同于人类领导者的方式为员工提供负反馈，更有效地提升工作绩效。

（二）外部劣势

1. 内容质量受到制约

当前大模型技术仍面临算法成熟度与数据质量的制约。一是在技术层面，输出结果常常带有同质化的倾向，缺乏品牌战略中所需要的差异表达。二是数据层面，若数据存在噪声或偏差，易导致内容失真甚至价值观偏离。

2. 知识产权归属模糊

大模型所引发的版权风险已从学术理论探讨延伸至司法实践层面。关于侵权风险方面，对 AI 进行既有作品的“数据投喂”模式存在法律灰色地带，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此外，大模型技术可能被用于生成虚假营销内容或伪造用户评价等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新型的违法行为。各地区暂行的法律法规虽明确要求标注大模型技术内容提醒，但技术溯源与责任认定仍然面临实操难题。

3. 用户接受度与伦理信任危机

企业在使用大模型技术进行营销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明显的信息技术特征和消费观念的引导态度，导致消费者可能对 AI 生成的内容产生抵触情绪，影响营销效果。消费者在评判人工智能产品时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价倾向，排斥那些可能让他们感到自我认知和身份被挑战的算法和人工智能产品。所以，在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中也应当尽量采用拟人化的手段。

（三）发展机会

1. 技术迭代与场景延伸

首先，大模型技术在多领域的融合创新使得内容生成在逼真度与多样性层面取得巨大提升，满足不同场景下的营销需要。其次，大模型技术与 AR/VR、区块链等技术相结合可以创造新的营销场景，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交互感、沉浸感，使线上、线下的营销体验趋于一致，拉近了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

2. 品牌营销的流程再造

营销“流程再造”是指通过对大模型技术的应用使组织的营销业务流程实现根本性地再设计和彻底性地再创造。大模型可以有效的赋能营销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这种营销流程再造并非在于单一领域创新的叠加效应，而是通过 AI 大模型将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和开发、营销推广等各个环节创新进行有机串联，从而实现整体品牌价值链的整体创新力量。

（四）潜在威胁

1. 技术迭代的经济成本困境

大模型技术的持续创新受制于绿色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双重限制。AI 的训练和使用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资源，在算力供给层面，迫使企业不断追加绿色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2023 年大模型技术核心企业技术投入产出比仅为 1:1.8，尚未实现技术的规模产出进步，这对独角兽企业和中小型创业者的财力构成严峻考验。

2. 数据安全风险的审核

对于大模型技术而言，输出结果存在有输出反人类、输出侵权信息、输入违反商业道德、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此外，关于数据的使用标准问题，大模型技术的消费者并没有被告知其自身使用数据在什么程度上被收集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被使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消费者的隐忧。如果企业采用违规数据训练模型，不仅面临处罚，而且面临造成品牌资产折价的隐性损失。

3. 内容输出的同质化陷阱

AI 应用的普及化正引发市场同质化竞争以及营销创意同质化。首先，大模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容易出现语义错误；其次，算法很难突破品牌设计师的创意价值阈限。品牌过度依赖模块化输出会导致品牌形象弱化，使消费者情感共鸣度下降。

4. 算法偏见的扩散效应

数字营销场景中的算法歧视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首先，在数据收集和训练过程中，数据本身隐含的偏见。其次，品牌基于品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会导致在参数优化过程中实施自然选择性的歧视分配。最后，个性化推荐服务可能会加剧算法的歧视，导致消费决策的同质收敛。该效应不仅消解了品牌竞争的初始条件公平，违背了品牌的社会责任，更是建构了数字市场的算法霸权。

三、战略实施框架与治理路径

通过上述对大模型技术赋能品牌营销的 SWOT 分析，对品牌营销面临的内部状况、外部环境有所了解，下面将构造大模型技术赋能品牌营销的战略分析矩阵，可以为企业制定科学的品牌营销战略。

（一）增长型战略（SO 战略）

1. 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在大模型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共生理念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需突破传统的“条块化”模式，构建涵盖“目标共制-资源共建-师资共育-成果共享”的全周期协同培育体系，扩大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和供给效率，拓宽传统育人边界。

2. 探索用户合作创新

基于 AI 部署的营销平台正在打破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形成多主体协同创新网络。品牌管理者利用 AI 模型和消费者双向沟通，激发消费者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同时 AI 在互动过程中更新自己，并感知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3. 数字孪生赋能的沉浸式体验

企业应构建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体验平台，实现用户行为数据在虚拟人、实体店与线上场景中的三维映射，并通过远程交互提供服务和体验。虚拟数字人、数字场景等营销策略创新，不断重塑时空、环境为用户提供沉浸感的购物体验，并与其产生情感连接。

（二）扬长避短战略（ST 战略）

1. 强化技术创新网络与研发动态投入

企业需要加强对大模型技术的迭代与优化，同时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创新平台，构建横向技术联盟，以消除单一企业封闭式创新难以应对 AI 的高额研发成本与快速迭代压力，持续并齐大模型技术发展趋势，提升技术实力。社会应该鼓励创业公司、人工智能开发者积极探索企业端和消费端的应用，以形成可垂直推广和复制的产业生态。

2. 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与合规框架

采用联邦学习、差分隐私等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确权，对于敏感信息实施分级加密、动态脱敏。设立跨部门的

数据治理委员会，对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 AI 伦理审查清单，并引入第三方认证机构对数据安全风险进行合规审计。

（三）扭转型战略（WO 战略）

1. 智能审核机制的范式构建

企业和平台可以建立区块链+AI 的审核机制，保证生成质量可追溯，确保审核过程的透明性与不可篡改性。同时，结合可解释性 AI 技术对结果生成逻辑进行逆向审核，防止算法黑箱导致的错判。

2. 版权管理与合规培训

面对作品版权问题与合规风险，行业应建立“创作前授权认证—生成中水印嵌入—传播后侵权监测”的三阶段保护机制。区块链技术的引入正在构建可信的 AI 服务网络，生成内容产生的日志记录可以解决版权归属与效果追溯难题。

3. 用户认知行为的科学重构

基于神经行为学理论构建用户认知图谱，通过神经模拟、脑电波分析等技术捕捉消费者的深层次需要特征。同时，企业可以利用结果采纳反馈分析中融入情感计算过程，提升品牌与用户的情感连接。

（四）防御型战略（WT 战略）

1. 数据治理的韧性框架

数智化品牌营销应构建“内生安全+外部监管”的双重防护体系。一是在技术上，通过同态加密，保障训练过程的隐私安全；二是建立风险评估矩阵，对数据生命周期实施标准化认证。

2. 算法公平的闭环治理

企业应定期对大模型进行算法偏见的识别和对齐，确保算法的公平。一是采用对抗性测试方法识别潜在歧视，通过区块链技术定位偏见来源。二是建立第三方机构算法审计制度，定期发布算法审计报告，披露其关键信息。

结语

当下大模型技术为品牌营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未来，品牌营销的发展战略必须与 AI 技术同步进步，不断探索大模型技术的新应用和新场景，确保大模型技术的良性发展。最终，大模型技术的应用将推动品牌营销进入一个更加智能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 [1] 马小林.关于大模型技术应用于广电领域的思考[J].中国传媒科技,2024,(01):83-87.
- [2] 尤丽娜,周诗涵,周荣庭.“大模型技术+”:虚拟现实媒介内容生产机制研究[J].出版科学,2024,32(03):32-41.
- [3] 方文剑. 基于用户行为序列的推荐算法研究及应用[D]. 东华大学, 2022.
- [4] Rombach R, Blattmann A, Lorenz D, et al. High-Resolution Image Synthesis with Latent Diffusion Models [Z]. arXiv, 2021(2021).
- [5] Wang, Y., Pan, Y., Yan, M., Su, Z., & Luan, T. H. (2023). A Survey on ChatGPT: AI-Generated Content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IEEE Open Journal of the Computer Society, 4, 280–302.
- [6] Cui R. Optimiz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ing strategy based on deep learning Model [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Nonlinear Sciences, 2023, 9(1).

Brand marketing reform driven by big model technology

Haiqiang Cui¹

(Business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 '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Large model technology can produce high-quality text, images, music and software by analyzing a large number of digital material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rand marketing. First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path of big model enabling marketing,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help brand marketing, uses SWOT method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brand marketing application, constructs the brand marketing strategy analysis matrix,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brand marketing strategy.

Keywords: large-sized model; brand marketing; SWOT analysis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新进展

谢天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沙坪坝 401331)

摘要: 制度变迁理论历来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议题, 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动态变化, 制度变迁理论也经历了理论创新, 这些创新增强了有关于制度的理解。学界对此进行了丰富研究, 本文系统回顾了近年来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文献, 发现以下几方面新进展: 第一, 对制度变迁动因的探究; 第二, 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第三, 制度变迁复杂性的多层次分析; 第四, 话语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最后, 展望了制度变迁理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 动态博弈分析; 话语制度主义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32

一、引言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深入理解制度变迁对于揭示经济发展的动因和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以下简称 AJR)三位学者, 以表彰他们关于“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贡献, 再次将全球学术界的目光聚焦于制度经济学(杨子砚、周颖刚, 2024)。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相互交织、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 制度变迁理论不仅展现出深刻的理论价值, 也表现出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 从而激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丰富的研究成果(田湘波, 2023)。

在过去几十年中, 制度变迁理论已经从简单的静态分析发展到更为复杂的动态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更多地关注制度的结构和功能, 而近期的研究则更加重视制度变迁本身, 以及这些变迁对经济表现和发展策略的影响。本文对近年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系统回顾, 希望能够更好地跟踪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奠定知识厚度, 并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二、制度变迁动因探究

学界目前对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关注点主要在内生变迁。制度变迁并非偶然现象, 其发展方向也非随机, 而是具有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源泉(高帆, 2024; 曲铁华, 2024), 并且相对来说, 内生动力比外在因素更能直接影响制度变迁(崔宁波等, 2021)。虽然以上学者指出了内生动力的重要性, 但要更全面理解制度变迁的动因, 还需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可作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的动力(祁占勇, 2022), 黄丽静和朱敬(2024)进一步强调, 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不仅是制度的自我学习, 还是利益主体的互动竞争。这一观点为探究制度变迁的动因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 个体认知、学习过程和学习效应等学习因素已被新制度经济学纳入制度变迁的研究框架。认知是制度变迁内生动力的核心(丰雷等, 2019), 变迁主体具有动态特征的学习过程则能产生新的制度构思, 成为制度变迁的解释基础(黄凯南、乔元波, 2018; Wang et al., 2022)。学习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认可, 但具体机制要进一步明确。张云翔(2022)研究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内生性政策学习识别和转化外生性因素, 进而推动制度变迁。学习理论不仅能够刻画制度变迁的细节, 还能通过辅助进化理论解释制度的内生性特征, 并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影响制度变迁: 学习类型的相关概念有助于阐释制度的内生性; 引入学习行为的制度研究有助于分析不同层次间的互动; 行为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特征能够具体化(孙丹、丰雷, 2024)。一个全面且细致的包含

作者简介: 谢天(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制度变迁。

通讯作者: 谢天

学习行为的制度分析框架,不仅能够整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路径,而且能够促进微观行为与宏观制度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Bell (2017) 通过融合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引入新的代理维度到历史制度主义,以期将制度稳定与变迁纳入统一框架,有效回应现实事件。在理论构建中必须将制度稳定与变迁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进行动态分析,超越传统上对制度稳定或变迁单一维度的探讨(李凤云, 2023)。制度逻辑的理论构建对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至关重要,从而使制度理论能够更科学地指导实践发展(石明明、张小军, 2023),并避免因研究框架的片面性而导致的不利影响(马正立、赵玉胜, 2022)。在制度变迁动因探究上,尽管各流派均能从自身视角解释制度变迁,但受限于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解释往往缺乏完整性和有效性,因此,学界开始寻求对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观点的综合,以期获得对制度变迁及其动因的全面理解。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交流与融合已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实践(马雪松, 2022)。

三、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AJR 三位学者荣获 202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利用殖民地发展的历史自然实验,对制度如何影响繁荣做了实证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研究共同深化了对制度作用的解释。但是为什么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主动改变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有益的制度变迁为何不能实现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Acemoglu et al. (2001) 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分析框架,用于对制度变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该框架融合了制度变迁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理论,揭示了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集团在社会冲突面前的动态博弈结果就是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承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而解释了为何政治科斯定理在制度变迁中并不适用(阿西莫格鲁, 2016)。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对国家兴衰以及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Acemoglu et al., 2005; Acemoglu & Robinson, 2008)。通过将社会冲突与制度、社会力量相结合,他们为制度改革的策略和时机选择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Acemoglu et al., 2001)。

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将制度变迁视为理性参与者战略选择的结果,并整合到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模型中。这一分析框架不仅为理解制度变迁、经济政策以及内生制度理论提供了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而且对于揭示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意义。Powell (2024) 在 AJR 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了无限期动态重复博弈中的承诺问题。Acemoglu 和 Robinson (2023) 最近的一个研究是扩展基础模型,以便探讨政府执行规则有效性和国家能力建设的问题。吴军 (2021) 构建了多元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乡村经济社会治理制度变迁过程。

但是 AJR 的研究也有一定局限。他们的研究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再到经济结果,存在一个单向的层级结构,这一假设在简化复杂的现实情况以进行理论建模时是必要的。然而,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演化的,不同的制度之间可能存在耦合结构(卓晔, 2023)。另一方面,他们将文化视为外生变量,削弱了他们理论的解释力度,文化是影响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Joanna & Rafal, 2021)。此外,对他们的制度变迁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仍然存在许多困难(李宝良等, 2024; Diallo, 2022),所以,目前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仍然缺乏坚实的实证证据支持。

四、制度变迁复杂性的多层次分析

学界开始认识到制度变迁并非仅限于单一层面的现象,近期的研究更加关注制度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依存性。相互依存或互补的制度与特定制度能进行内生互动和演化(黄建洪、陈伟光, 2024; 盛广耀, 2017),既定的制度安排产生于特定的宏观环境,宏观环境与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影响制度变迁(沈国兵、沈彬朝, 2024; 汪彬, 2023)。在探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演进时,中央、地方、基层政府、干部及农民等多方行动者在持续的互动中共同推进了协商制度的发展,并实现了有效的治理成果(王永香、李忠鹏, 2024)。组织场域同样受到关注,在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犯罪治理需要多组织机制的协同作用,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和社会组织应该适应制度转型,克服路径依赖,并通过再制度化实现组织优化(戴洁, 2024)。丰雷等 (2019)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强调了中央与地方间的互动对制度演化的推动作用。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制度的生成与变迁往往会受现有制度的约束,且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和协同作用对制度发展必定具有影响(严东、唐鸣, 2024)。制度学者正逐渐将制度视为一个复合体系,而非单一实体,并基于此观点发展出新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旨在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邹旭等 (2024) 的研究发现,在工业用地配置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之间进行了充分的互动。这些行动者分别以制度供给者、

制度创新者和制度需求者的身份,在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探索、调整和深化改革阶段,主导了制度演变的方向。李笑宇和任宗哲(2024)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从变迁历程、变迁逻辑到制度效能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为解读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化、理顺新时代中国财政体系提供了思路和启示。有学者认为单个制度要素并不构成高成长型创业的必要条件,政府、市场与社会构建有效的制度组态,实现多元制度的互补和协同,能够激发高成长型创业(郑馨等,2024)。如果将制度视为多种要素构成的复合体,那么有关制度变迁的观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制度学者正尝试通过整合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变量,以更有效地阐释制度变迁的动因。朱庆环和杜文平(2024)指出,学区制度变迁在宏观层面受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变革的影响;在中观层面,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教育管理体制对其产生制约;而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政府、学校和社会集体行动的结果。

五、话语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

话语制度主义由美国学者 Vivien Schmidt 最早提出, Schmidt (2010) 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中关于制度变迁内生性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整合与拓展,融入政治学视角,将意识与制度间的话语互动过程定义为话语制度主义。

岳圣淞(2024)借鉴话语制度主义理论,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变迁为案例,提供了国际制度话语格局演变的连贯解释逻辑。话语制度主义与政策分析具有关联,话语通过政策过程将理念转化为行动,进而推动制度变迁(吕佩安,2017; King, 2024)。在话语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制度变迁重视话语的沟通维度,其中有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话语的交互性,即准确表达、传递并合法化信息的过程;其次是话语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中行动者角色的重视,尤其是那些具有思想并能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行动者(沈燕培,2017;王帅杰,2024)。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新兴流派,话语制度主义强调行为者间的交流、对话、辩论和协商等互动行为对制度及政策变迁与执行过程的影响。

从话语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并非其他理论流派所假设的那般稳定不变,而是更接近于可变的政策。陈静(2024)在其研究中分析了美国智库如何通过话语或观念与美国决策者进行“协作性对话”、与美国公众进行“沟通性对话”,以期影响和形塑美国决策者对华科技政策和公众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对华科技政策的演变,并牵动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刘胜湘和唐探奇(2024)指出秩序愿景差异通过制度反馈促成了秉持不同制度变迁方案的国家集团形成,通过大国博弈影响秩序愿景的协调方式,进而影响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变迁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岳圣淞,2023)。观念的效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依赖于具体的情境,并通过特定的语言得以表达,因此,一种独特而有益的话语分析能够克服传统观念分析的固有缺陷,从更为动态的视角探讨制度变迁的相关议题。Rambaree(2021)从国际制度的演化规律出发,将行为体间的话语互动视为解释制度变迁的核心变量,并尝试为制度竞争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提供连贯性的解释。

六、结语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制度变迁理论的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进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制度变迁动因的探究;第二,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第三,制度变迁复杂性的多层次分析;第四,话语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变迁。学者们的研究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制度变迁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结论。尽管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有三个问题形成了学界的基本共识。一是在假设前提上,大多数学者认同在研究制度时应采用行为者非完全理性的假设,强调人类行为和意识的主观性及局限性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崔兵,2022;黄凯南,2021)。二是在研究视角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宏观研究聚焦于宏观环境变化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而微观研究则着重分析行为者在制度变迁中的具体影响(Hudik, 2021)。三是在路径研究上,学界正逐步摒弃断裂式变化的思维模式,转而认为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内生性的、逐步演化的过程(孙晓华等,2024;张道根,2022;Koreh, 2019)。上述这些前沿探索为进一步构建更一般化、更全面的制度变迁理论奠定了基础,相信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在此领域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本文的分析强调了继续深化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数字化、人工智能与制度变迁。Acemoglu 的最新研究也聚焦于人工智能,评估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Acemoglu, 2024)。技术进步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已经显著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和管理制度,促进了新的制度形式和管理实践的出现。然而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配套基础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的完善,制度变迁理论与

数字经济结合有利于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通过发挥制度优势,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子砚,周颖刚.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深度评析[J].管理评论,2024,36(10):3-8.
- [2] 田湘波.制度同构理论研究评述: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的视角[J].决策与信息,2023,(07):47-61.
- [3] 高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逻辑与实践特征[J].上海经济研究,2024,(02):17-29.
- [4] 曲铁华.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制度变迁:内在动力、总体特征及历史经验[J].社会科学战线,2024,(01):219-230.
- [5] 崔宁波,范月圆,巴雪真.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逻辑与展望——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J].中州学刊,2021,(10):33-40.
- [6] 祁占勇,闫丽媛,王鹏伟.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制度主义取向及其行动路径[J].基础教育,2022,19(06):46-56.
- [7] 黄丽静,朱敬.我国普通高中建设制度变迁脉络、逻辑与路向[J].教学与管理,2024,(10):7-12.
- [8] 丰雷,江丽,郑文博.认知、非正式约束与制度变迁:基于演化博弈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02):165-177.
- [9] 黄凯南,乔元波.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分析——基于多主体的学习过程[J].经济研究,2018,53(12):161-176.
- [10] WANG H, CHEN B, KOPPENJAN J. A refined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approach to incremental policy change: The case of process-tracing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PPP policies between 1988 and 2017 [J].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2022,7(1):27-51.
- [11] 张云翔.地方数字经济监管中的多层级政策学习与监管模式变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04):101-111.
- [12] 孙丹,丰雷.动态制度变迁中的学习行为——理论发展回顾与探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01):182-193.
- [13] BELL 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dimensions of agency: Bankers, institutions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J].Political studies,2017,65(3):724-739.
- [14] 李凤云.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制度可塑性悖论初探[J].比较政治学研究,2023,(02):120-139.
- [15] 石明明,张小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23,(09):4-23+204.
- [16] 马正立,赵玉胜.制度逻辑理论建构:基本原则与整体模型[J].重庆社会科学,2022,(05):114-128.
- [17] 马雪松.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2,(06):187-197.
- [18]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5):1369-1401.
- [19] 达龙·阿西莫格鲁.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不成立:社会冲突、承诺以及政治学[A].比较(吴敬琏主编).第 84 辑[C].中信出版社,2016.
- [20]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Institu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A].in Aghion, P. and S. Durlauf (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C],Vol.1A,Amsterdam,NL:Elsevier,North-Holland, 2005.
- [21]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1):267-293.
- [22] POWELL R. Power sharing with weak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2024,36(2):186-211.
- [23]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Weak, despotic, or inclusive? How state type emerges from state versus civil society competition[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23,117(2):407-420.
- [24] 吴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乡村治理结构优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21.
- [25] 卓晔.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04):126-155+160.
- [26] JOANNA K D, RAFAL M. Institutions without Culture: On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s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21,55(3):656-676.
- [27] 李宝良,郭其友,郑文智.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202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4,46(11):138-152.
- [28] DIALLO B.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 to testing institutional hypotheses: the case of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J].Empirical Economics,2022,62(5):2587-2600.
- [29] 黄建洪,陈伟光.“圈层式创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微观机理研究——基于苏州片区创新实践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4,(10):60-68+93.

- [30] 盛广耀.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与户籍制度改革分析[J].经济学家,2017,(04):59-66.
- [31] 沈国兵,沈彬朝.高标准贸易协定与全球供应链韧性:制度环境视角[J].经济研究,2024,59(05):151-169.
- [32] 汪彬.多层次交互式制度创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新理路[J].中国行政管理,2023,39(08):89-99.
- [33] 王永香,李忠鹏.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J].求实,2024,(02):18-31+109.
- [34] 戴洁.制度转型、组织行为与犯罪的多元治理——一种新的犯罪解释论及治理框架[J].法学,2024,(02):85-101.
- [35] 丰雷,郑文博,张明辉.中国农地制度变迁 70 年:中央—地方一个体的互动与共演[J].管理世界,2019,35(09):30-48.
- [36] 严东,唐鸣.制度互动:理解制度变迁的一个视角——以匈奴为案例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J].江汉论坛,2024,(06):57-64.
- [37] 邹旭,马贤磊,石晓平.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制度变迁逻辑——基于“主体互动-制度共演”框架的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24,17(02):176-195+200.
- [38] 李笑宇,任宗哲.历程、逻辑与效能: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4,13(05):82-95.
- [39] 郑馨,鲍舒琴,安雯雯.穿越衰退与繁荣:复杂制度组态如何激发高成长型创业[J/OL].南开管理评论,1-38.
- [40] 朱庆环,杜文平.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学区制演进的历史脉络与制度逻辑[J].教育科学研究,2024,(06):36-42.
- [41] SCHMIDT V A.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2(1):1-25.
- [42] 岳圣淞.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J].东北亚论坛,2024,33(02):98-113+128.
- [43] 吕佩安.话语何以重要?——话语性制度主义之政策分析[J].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17,13(02):37-61.
- [44] KING C J. Explaining Housing Policy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J].Social Sciences,2024,13(9):468-468.
- [45] 沈燕培.理念、话语与制度变迁——话语性制度主义介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03):323-329.
- [46] 王帅杰.比较教育中的话语制度主义:一种连接全球与地方的理论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2024,51(11):46-63.
- [47] 陈静.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中的智库角色——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J].情报杂志,2024,43(11):61-67.
- [48] 刘胜湘,唐探奇.秩序愿景再均衡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09):96-129+162-163.
- [49] 岳圣淞.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J].当代亚太,2023,(04):131-165+168.
- [50] RAMBAREE B B. Discourse and power in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Cogent Social Sciences,2021,7(1):1852673.
- [51] 崔兵.不确定性与制度的认知本质——基于扩展的海勒模型[J].社会科学家,2022,(01):115-121.
- [52] 黄凯南.制度理性建构论与制度自发演进论的比较及其融合[J].文史哲,2021,(05):142-153+168.
- [53] HUDIK M. Push factors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21,189:504-514.
- [54] 孙晓华,唐卓伟,马雪娇,等.知识产权制度渐进式改革之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演进[J].经济研究,2024,59(09):136-153.
- [55] 张道根.经济制度变迁逻辑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J].学术月刊,2022,54(01):58-67.
- [56] KOREH M, MANDELKERN R, SHPAIZMAN I. A dynam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s[J].Public administration,2019,97(3):605-620.
- [57] ACEMOGLU D.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24.

New Development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Xie Tia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has long been a key scholarly concern. As economies, politics and societies evolve, the theory itself has been repeatedly reinvented,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nstitutions are and how they work.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rapidly expanding literature of the past decade and identifies four major advances: Firstly, new explanations of the driver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econdly, dynamic-game analyses of the change process; Thirdly, multi-level approaches to its complexity; Fourthly, the perspective of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aper concludes by mapping out promising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providing a reference point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ynamic Game Analysis;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杨斌 黄巧婷 许杰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成都, 610106)

摘要: 本研究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基础, 深入探究体育科技创新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和案例研究等方法, 系统分析了体育科技创新在提升产业效率、促进人才培养和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 体育科技创新呈现出企业快速发展、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产品服务多元化等特征。然而, 当前发展仍面临技术研发投入不足、行业标准体系不完善、专业人才匮乏、市场竞争加剧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健全标准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市场布局等针对性建议, 以期为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体育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 体育产业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612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 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和竞争优势,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 以知识、技术、数据等新要素为重要支撑。在体育领域, 新质生产力催生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 推动体育科技创新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体育科技创新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提高竞技体育水平”。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 不仅能够提升竞技体育水平、促进全民健身发展, 还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本研究聚焦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体育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力求全面把握体育科技创新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体育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深刻改变传统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研究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体育科技创新的影响与发展趋势, 对于促进体育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体育科技创新的意义

1.1 体育科技的概念界定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 同时也带动了体育相关科技的发展, 在近几年内, 也逐步运用到了体育事件中。体育科技主要是指以新一代信息科学技术(如人工智能 AI、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为核心驱动, 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 深度融合于体育产业全链条的创新体系, 如在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体育产业管理和体育教学中都有一定应用。

1.2 提升体育产业效率, 推动经济增长

1.2.1 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效率

根据麦肯锡公司发布的《2023 年全球体育产业报告》, 数字化转型正在显著提升体育产业链的效率, 为行业带来深远变革。报告显示, 采用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体育企业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 运营效率平均提升了 35%, 同时运营成本降低了 20%以上, 这得益于数字化技术对流程的优化和资源的精准配置。在产品研

作者简介: 杨斌(2001—) 硕士, 研究方向: 运动训练;

黄巧婷(1986—)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运动与体质健康;

许杰(1986—)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

发环节,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使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40%,不仅加快了产品上市速度,还显著提高了设计的精准度和创新性。在生产制造方面,智能化生产线的部署使产品良品率提升了15%,同时将产品一致性控制精度提高到99.5%以上,进一步保障了产品质量。在营销与服务领域,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帮助企业降低了30%的获客成本,用户转化率提升了25%,实现了更高效的目标用户触达和更高的市场回报。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体育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推动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创新升级,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1]。同时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运行机理与纾解路径》中指出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之举,更是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2]。

1.2.2 智能化升级优化训练效果

智能化训练系统的广泛应用为竞技体育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根据国际体育科学与技术协会(ISSA)发布的《2023年全球运动训练技术趋势报告》,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正在显著优化运动训练效果。报告显示,采用智能化训练系统的运动员在多个关键指标上取得了显著提升:训练效率平均提高了25%,运动表现平均提升了15%,同时受伤风险降低了30%。此外,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训练方案使训练效果进一步提升了20%。这些数据表明,智能化技术通过精准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反馈,不仅帮助运动员更高效地提升竞技水平,还显著降低了训练中的受伤风险,为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和个性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3]。

1.3 增强运动员竞技水平,促进体育人才培养

体育科技创新为提升竞技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运动生物力学分析系统通过高速摄像和传感技术,实现动作细节的精确捕捉和分析,帮助运动员优化技术动作。新一代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心率、血氧、肌肉疲劳度等生理指标,科学预防运动损伤,降低受伤风险。智能训练器材根据个人特点自动调整训练参数,提供个性化训练方案,显著提高训练效果。同时,在训练方法创新方面,虚拟现实技术为运动员提供了身临其境的训练环境,特别是在高风险项目的技术动作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高台跳水训练中,运动员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动作模拟和技术优化,大大降低了训练风险。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系统通过海量数据分析,为教练员提供科学的训练决策支持,教练员的执教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远程训练系统的应用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优质教练资源能够惠及更多运动员,促进了竞技体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1.4 丰富大众健身体验,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近年来,体育科技的快速发展为大众健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乐趣,有效提升了国民健康水平。智能穿戴设备、健身APP、虚拟现实(VR)技术等科技产品的普及,使人们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健身数据、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并享受沉浸式的健身体验。例如,智能手环可以实时监测心率、步数、睡眠等数据,帮助用户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健身APP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和专业指导,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健身APP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用户对居家健身课程的需求显著增加,于是推出了更多适合居家锻炼的课程,并邀请专业教练进行线上直播指导,吸引了大量用户参与,APP的用户活跃度显著提升,用户满意度也大幅提高,有效促进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VR技术则将健身房搬进家中,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各种运动项目。此外,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也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全民健身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2.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体育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

2.1 体育科技企业蓬勃发展,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我国体育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全国体育科技相关企业也逐步扩大。根据产业检测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体育科技相关企业达到5278家,较2020年增长了84.8%,这一数据体现了体育科技企业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反映出行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结合长三角地区年营收规模突破2000亿元等区域经济数据,进一步表明该领域市场潜力巨大。从区域分布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区域集中了大部分的企业资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高、创新活力强的产业集群。其中,长三角地区的体育科技企业数量最多;珠三角地区在智能制造和硬件研发方面优势明显;京津冀地区则在大数据分析和软件开发领域形成特色。从企业类型结构来看,智能装备占制造企业大部分,主要集中在可穿戴设备、智能训练器材等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也有相当占比,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方面具有优势;数据服务企业,专注于为专业赛事和大众健身提供数据支持;其他类型企业

占包括研发服务、教育培训等。这种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有效支撑了体育科技创新的全面发展。

2.1.1 投资热度持续攀升，融资规模不断扩大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未来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方向。自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以来，如何推进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政府机构、学术界及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课题（肖淑红等，2024）[4]。由德国研究机构 SportsTechX 发布的《2024 全球体育科技投资报告》指出预计 2024 年底全年体育科技投资领域的融资和并购活动的总规模将在 96 亿美元左右，平均单笔融资规模相比 2023 年翻番，来到 2100 万美元左右[5]。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在 2024 年中全球 AR/VR 体育相关内容市场的规模预计会突破 28 亿美元，新兴的体育科技产业和技术势必也会带来更大的投资。

2.1.2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积累持续加强

体育科技领域正经历从“跟跑”到“并跑”的质变，创新能力提升体现为研发范式革新与跨界融合加速。企业通过 AI、生物传感、材料科学的交叉应用，在运动表现分析、伤病预防等场景构建技术护城河，如智能装备从数据采集向实时决策演进，算法模型深度嵌入训练全流程。技术积累则呈现“雪球效应”，硬件制造工艺、软件底层架构的持续迭代，推动解决方案从单一产品升级为系统生态。新质生产力通过知识共享网络重构创新链条，产学研协同突破芯片功耗、数据安全等共性难题，形成“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商业转化”闭环。这种以需求倒逼创新、以创新定义需求的动态循环，正在重塑全球体育科技竞争格局。

2.2 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推动科技与体育融合

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促进体育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从顶层设计推动体育科技创新发展。重点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地方政府配套政策持续跟进，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创新，建设体育科技产业园促进产业集聚，实施人才引进计划优化创新环境。

2.3 体育科技产品多样化，满足不同需求

体育科技产品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在竞技体育领域，专业训练设备、赛事分析系统等产品不断升级迭代，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训练科学化水平。在大众健身领域，智能跑步机、智能球类产品等创新产品层出不穷，通过智能算法提供专业运动指导。在体育教育领域，虚拟教学系统、在线培训平台等新型产品助力提升教学质量和培训效果。

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体育科技创新面临的问题

3.1 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3.1.1 研发投入强度偏低，基础研究薄弱

当前体育科技领域呈现“强应用、弱基础”的结构性矛盾，研发投入偏重短期见效的技术迭代，对底层原理、新材料等基础研究支撑不足。企业创新多聚焦场景适配性改良，在生物传感、芯片设计等核心环节仍依赖进口技术，折射出创新要素错配的隐忧。资本对商业变现的追逐加剧了技术空心化风险，产学研协同机制尚未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死亡之谷”。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体育科技创新需跳出“快餐式”研发逻辑，通过构建跨学科基础研究平台、完善长周期投入机制，重塑“原始创新-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生态闭环，避免关键领域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

3.1.2 创新资源分散，协同效率不高

创新资源整合不足，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调查显示，仅有 25% 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创新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资源共享程度低，导致创新效率难以提升。此外，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其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完善，合作项目推进困难。在现有的合作模式下，各方在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问题上缺乏明确的规范与协调机制，导致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矛盾与分歧，影响项目的顺利推进。以 2023 年为例，体育科技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这不仅造成了科

研资源的浪费，也使得企业的创新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进一步制约了协同效率的提升。最后，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与合作桥梁，使得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机会有限，难以形成紧密的创新共同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体育科技创新领域的协同效率难以实现质的飞跃。

3.1.3 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风险承担能力有限

当前体育科技企业创新呈现明显的“浅层化”倾向，大量资源集中于技术改良与模式复制，对颠覆性创新及底层技术攻关投入谨慎。市场主体受短期回报压力与风险敞口制约，普遍选择成熟技术路径进行“微创新”，导致同质化竞争加剧而技术壁垒难以形成。产学研协同松散、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削弱企业长期投入意愿。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需通过风险共担机制重构与创新生态开放化，激活企业突破“舒适区”的内生动力，实现从风险规避向战略引领的范式转换。

3.2 行业标准缺乏，影响产品质量和安全

体育科技产品标准体系建设滞后，质量标准、安全标准、技术标准不健全。新兴领域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安全隐患。标准执行监督机制不完善，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市场秩序混乱。标准研制工作投入不足，标准更新速度慢，难以适应产业快速发展需求。

3.3 人才短缺，制约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体育与科技交叉复合型人才匮乏，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高端技术人才供给不足。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教育培训与产业需求脱节，实践机会少。企业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职业发展通道不畅，人才流失严重。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不够科学，创新积极性未得到充分激发。

3.4 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面临生存压力

随着市场参与主体增多，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部分企业为抢占市场盲目扩张，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获客成本攀升，市场推广费用高企。部分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发展后劲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力，企业创新成果易被模仿。

4. 促进体育科技创新发展的有效策略

4.1 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技术研发能力

4.1.1 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促进资源整合

建议在国家层面规划布局一批体育科技创新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资源。可借鉴“新型研发机构”模式，采用市场化运作机制，吸引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特色建设专业化创新平台，如智能器材创新中心、运动大数据中心等，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创新网络。

4.1.2 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提高合作效率

创新合作模式，可采用“项目+平台+基金”的方式推进产学研合作。通过设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组织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打通创新链条各环节。建议设立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

4.1.3 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至关重要。建议在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风险分担等方面制定明确规则。可采用“股权+分红”的激励方式，让科研人员分享创新收益。同时，建立创新风险补偿机制，降低创新主体的后顾之忧。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搭建创新平台促进资源共享。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各方创新积极性。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4.2 完善行业标准，保障产品质量与安全

在国家层面,加快制定体育科技产品的基础通用标准。对于运动数据服务,建立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的全流程标准规范,明确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要求。在虚拟现实训练系统领域,制定图像分辨率、延迟响应、交互性能等核心技术指标标准。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化监管体系。建立标准实施评估制度,定期开展标准符合性检查。组织开展产品质量抽检,重点关注产品安全性能指标。建立产品质量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发布质量预警信息。同时,建立标准实施激励机制,对严格执行标准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推动企业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将标准要求融入研发、生产、销售全过程。建立企业质量信用评价制度,将质量管理水平与企业信用等级挂钩。

4.3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构建专业化团队

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支持高校设立体育科技相关交叉学科,如"体育数据科学"、"智能运动装备工程"等新专业。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增加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课程。建立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及早接触产业实践。构建分层分类的企业培训体系,针对不同岗位和层级制定培训计划。建立内部讲师制度,发挥骨干员工的传帮带作用。引入外部专家资源,开展前沿技术培训。建立线上学习平台,实现培训资源共享。设立技能等级认证制度,激励员工持续提升专业能力。

4.4 拓展市场渠道,提升企业竞争力

优化企业发展战略,明确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创新营销模式,降低获客成本。加强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提升用户体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运营效率。加强行业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明确产品定位和发展方向。建议采用"专精特新"发展战略,在细分领域做精做深。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重视用户体验,通过产品创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同时,注重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新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开展精准营销。通过大数据分析,深入理解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网络,提升营销效率。加强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企业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构建数字化运营体系。通过引入企业资源规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等系统,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决策流程,降低运营成本。建立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式,提升市场响应速度。

结语

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体育科技创新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本研究发现,体育科技创新在提升产业效率、促进人才培养以及改善民众健康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当前体育科技创新还面临着诸如研发投入不足、标准体系不完善、人才短缺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诸多挑战,但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完善行业标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及创新营销模式等举措,可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未来,体育科技创新既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协同努力,在技术创新、标准建设、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体育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体育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服务竞技体育发展、促进全民健身、增进人民福祉。

参考文献:

- McKinsey & Company. (2023). The Global Sports Industry Report 2023.
- 沈克印,谢昕.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运行机理与纾解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5,59(02):42-51.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A). (2023). Global Trends in Sports Training Technology 2023.
- 李怀续,康露.体育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战略要点、突破难点与实践进路[J].中国体育科技,2025,61(02):73-84.
- SportsTechX. (2024). Global Sports Tech Funding Report 2024.
- 国家体育总局. (2023). 2022 年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
- 科技部、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加强体育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意见[Z]. 2022-05-18.
- 魏贤军.论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4,23(05):23-28.
- 李树旺,路嘉明,凌骏明,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与研究范式[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4,58(06):9-16+88.
- 沈克印.数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与推进路径[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论文摘要集——专题报告(体育产业分会).武汉体育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023:3.

潘凯凡,沈克印.以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阻滞因素与推进策略[J].体育学刊,2024,31(02):7-14.

Anderson K, Smith P. Wearable Technology in Sport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Sports Medicine, 2023, 53(4): 678-692.

李鑫,李赞,赵慧敏,等.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向[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03):1-8.

陶玉流,王越,吴相雷.体育新质生产力:方向抉择、当代使命与未来前景[J].中国体育科技,2024,60(04):64-71.

马超,孙明.体育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05):67-75.

孙志远.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与机制[J].中国流通经济,2024,38(05):28-40.

柴王军,翟昊敏.新质生产力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4,39(03):287-294.

陈林会.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推进路径[J].体育与科学,2024,45(03):7-15.

张强,李明.后疫情时代体育科技创新发展路径研究[J].体育学刊,2023,30(05):89-96.

马力,王平.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标准研究[J].体育科技,2023,44(03):56-63.

王健,李强.我国体育科技创新政策效果评估[J].体育科学研究,2023,27(06):90-97.

孙波,李华.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效能评价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04):78-85.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ing Spor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Yang Bin, Huang Qiaoting, Xu Jie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deepl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por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studies,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por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nhancing industrial efficiency, promot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mproving national health levels. 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he impetu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por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api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ntinuous increase in policy support, and diversified product and service offerings. However, current developmen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omplete industry standard system,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intensified market competi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mproving the standard system, innovat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ing market layout,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por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orts Industry

基于 NVivo 内容分析的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网络评论研究

储紫玲¹

(1.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毕业论文是高校对学生在校期间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一次系统检测,在保证本科生教育质量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现状不容乐观,论文质量不断下滑。因此,有许多人提出,要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要求,这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分析“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相关新闻的舆情走向,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关注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的利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更好的为高等教育服务。

关键词: 本科生; 毕业论文; 舆情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51

一、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呼声在坊间不绝于耳。在学术规范性训练较少、学生知识水平和写作态度层次不齐、实习和考研事物较多等诸多因素的叠加之下,本科毕业论文成为了一些师生共同的“痛苦”是一种常态。2024年5月22日,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本科生论文何以成为一些师生共同的痛苦”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该文章简要又不失精准的指出了本科生毕业论文为何会成为师生共同痛苦的原因,如本科生四年接受的学术训练少、针对学术写作这门课程还缺乏相应系统的教材以及师资水平存在差距等等。最后,文章也一针见血的指出,高校该如何切实提升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让学生掌握系统的写作方法、提高学术规范意识等观点。这些言论不仅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高校学生的共鸣,掀起讨论的热潮,也涉及了政府决策、公众态度和媒体舆情。因此,及时洞察本科生毕业论文是否引发网络舆情,掌握公众对政府相关政策或指导性意见的态度和看法,能够助力我们监测公众在此问题上的情感强度,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措施来释放和缓解这些情绪。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使之朝着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方向迈进。

舆情分析,即公众舆论分析,是一个深入探索和理解公众对于特定事件、话题、品牌或个人的看法和情绪的过程。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舆情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变。舆情分析的重要性因此日益凸显,它成为了政府、企业、媒体以及社会各界决策的重要依据。

舆情分析的基础是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来自各种渠道的公众意见信息。这些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媒体、新闻报道、论坛讨论、博客文章、评论反馈等。通过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辅助,这些海量信息可以被高效地抓取、分类和存储,为后续的分析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在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后,舆情分析工作便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对信息进行深层次的思维加工和分析研究。分析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度、情感倾向、主要观点、讨论热点等。通过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公众舆论的潜在趋势,预测事件的发展走向,甚至发现可能存在的危机和风险。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因此对本科生毕业论文是否该取消问题的网络舆情进行分析,也可以从侧面了解社会公众对相关政策的态度和认可度,帮助政府在一些高校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好的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相应人才。

二、研究设计

(一) 质性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储紫玲(1997—),女,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通讯作者: 储紫玲

该报道自 5 月 22 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随之在被转发在各大社交媒体,包括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等,热度一路攀升,引发极大的热议。报道自发表以后热度一路上升,并于 5 月 22 号达到极值,从 5 月 23 号热度开始下降并于 5 月 25 日开始下降到事件搜索指数的平均值。因此对 5 月 25 日之前网民关注度最高的一段时期的评论进行分析效果最好。

质性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依赖研究者自身作为研究的主要手段,在自然发生的环境中,通过多种途径收集资料来全面探讨社会现象。这种研究采用归纳法来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并形成相关理论,同时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交流,来理解和解释他们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意义。²与量化研究相辅相成,质性研究侧重于深入解析现象,尤其擅长揭示群体行为的核心特征,对于本文探究网民评论及其情感特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此研究中,我们采用的质性研究工具 NVivo 能够有效应对大量网络评论的分析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 样本的抽取

本文以微博上有关“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讨论回复最高的帖子为例。微博一向是年轻人关注时事、政治、各种新闻的聚集地。而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的报道也恰恰跟这些年轻人息息相关。因此,选取微博这个社交平台作为本文数据的提取地,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本文以微博上的帖子作为研究对象对网友评论进行内容分析,不仅可以在数量上满足研究要求,还可以体现出网友评论的个性与多样性,对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很好的拓展作用。³根据百度搜索指数表现出的事件热度变化情况,研究者选择爬取 5 月 22 日事件发生后至 5 月 25 日的网友评论。

利用网络爬虫软件“八爪鱼”共爬取到评论 1556 条,再经过逐条检验,删除空白评论、表情评论以及无用评论,如 (@Halo) 后,共获取到有效评论 1349 条,可以保证样本数据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三、研究过程

(一) 文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对文本首先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用 spss 软件对评论文本进行字数分析获得文字字数的极小值为 2,如“支持”“取消”等等,极大值为 93,平均每条评论字数为 47.21 字。

将评论文本导入 NVivo 软件,将词汇的最小数字设置为 2,对所有评论进行词频分析。其中,“取消、论文、流泪、毕业、支持”是排名前五的关键词。从中可以看出网友们对这个新闻的关注倾向,更多的还是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从“流泪、支持、取消”的等关键词中还能深度挖掘出网友的对这个事件的情感态度,词汇云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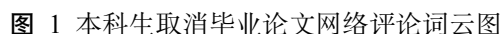
(二) 编码过程

1. 主题编码

编码是指通过逐行逐字的阅读把这些评论文本进行标签化分类,这些不同类别在 NVivo 中叫做“节点”。编码的结果就是把这些分散的网民评论组织成统一的节点。自由节点是一个与其他节点没有清晰逻辑连接的“独立”节点,树节点是将自有节点进一步归纳分类形成的节点。

在对 1349 条评论进行逐字逐行的阅读分析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相似的评论,例如“毕业论文都很形式主义”;“只会纠结格式”;“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等”,将这些相似的评论总结到一起,形成一个节点,命名为“形式主义”。以此类推,共得到树节点 3 处,自由节点 21 处。也就是说,本研究将评论归纳总结为三大维度(树节点),包括支持、反对以及表达情绪情感桑部分。再从这三大维度各自扩散出其他细分维度(自由节点),包括形式主义、没有意义等。最后,括号中的数字代表此节点处网友评论的数量。

通过对网络评论进行情感分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公众对“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这一事件的看法和情感倾向。情感分析,又称意见挖掘,是对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深度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掌握公众观点,为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提供参考。在情感分析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情感词典的分析和基于机器学习的分析。本文采用 NVivo 软件对文本进行简单的情感分类,将公众对于该事件的情感态度大体上分为四类:中立、负向、正向以及混合。其中,“混合”是指评论文本中既包含了正向的情感态度也包括了负向的情感态度,这种情感态度不计算到正向或者负向任何一个情感态度之中,而是独立存在。



编码节点

165

关于“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这一事件，公众的情感倾向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情感分析发现，大多数网友（780 条评论）持中立态度，认为取消或保留毕业论文都有其合理之处，既看到了毕业论文在锻炼学生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其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浪费时间等问题。持负向情感态度的网友数量虽未具体给出，但少于中立态度，他们主要对毕业论文制度表示不满和质疑，认为毕业论文往往沦为形式主义，缺乏实际意义，且撰写过程耗时费力，不如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实践中去。相比之下，持正向情感态度的网友数量较少（127 条评论），他们认为毕业论文是锻炼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专业领域的前沿知识，掌握科研方法，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因此主张保留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要求。此外，还有部分网友（具体数量未给出）持混合情感态度，既支持毕业论文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体现了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复杂看法。

通过对网络评论进行情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大多数人对“本科生取消毕业论文”这一事件持中立态度，认为取消或保留都有其合理之处。持负向情感态度的网友认为毕业论文存在形式主义、浪费时间等问题，主张取消或改革。持正向情感态度的网友则认为毕业论文是锻炼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主张保留。

混合情感态度的存在反映了公众对该事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针对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高校应加强对毕业论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减少形式主义成分，提高毕业论文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加强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科研和实践的机会。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了解公众对毕业论文制度的看法和需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和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数据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各个主题编码和情感编码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各个节点表现出来的突出特点，以此作为切入点获得事件发生后网友评论展现出来的问题，进而提出管理控制对策。本文选取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以及典型特征的节点为例，对网名评论进行过分析。

2.1 本科生不具备科研能力

2.1.1 节点分析

“本科生不具备科研能力”节点当中共有 103 个网友表示，“本科生不具备科研的能力”，“本科生没有创新可言”“应该研究生有论文要求”等等。其中，还有网友表示，本科生四年学的都是基础知识，大学课堂根本没有教学生如何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更不懂如何做科研，发现创新点等等。也有许多网友跟风表示支持，纷纷高喊要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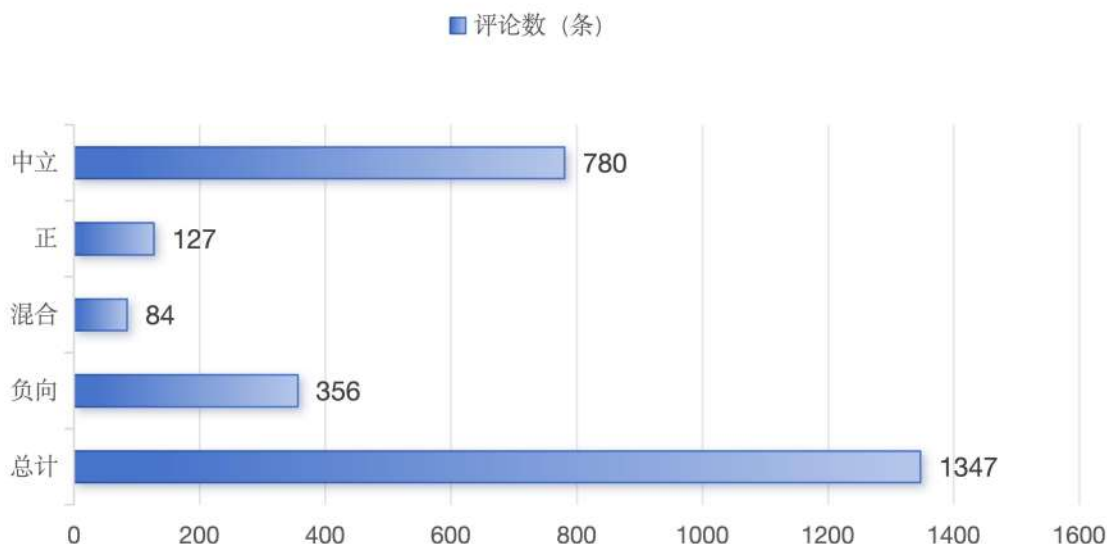


图 2 网友评论情感态度图

出现以上情况可能的原因有：一、科研资源分配不均：部分高校或专业在科研资源上投入不足，导致本科生难以获得足够的科研机会和资源。二、科研教育缺失：部分高校在本科阶段缺乏系统的科研教育，导致学生缺乏科研基础知识和方法。三、科研氛围不浓厚：部分高校科研氛围不浓厚，缺乏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的政策和机制。

四、学生自身因素：部分本科生对科研缺乏兴趣，或由于学业压力、时间管理不当等原因，难以投入足够的精力进行科研活动。

2.1.2 对策研究

针对以上情况，本研究给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加强科研教育资源投入：增加科研投入：高校应加大对科研项目的投入，为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科研机会和资源。二、完善科研教育体系：在本科阶段开设科研方法、数据分析等必修课程，培养学生的科研基础知识和方法。三、优化科研氛围：建立科研激励机制：设立本科生科研奖学金、科研成果展示会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加强科研团队建设：鼓励教师组建科研团队，吸纳本科生参与，提供指导和支持。四、提升学生科研兴趣与能力：开展科研兴趣培养活动：举办科研讲座、研讨会等，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和热情。五、加强科研实践训练：组织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实验、实习等，通过实践提升科研能力。六、加强科研指导与辅导：完善导师制度：为每位参与科研的本科生配备导师，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七、建立科研辅导平台：搭建线上或线下的科研辅导平台，为学生提供科研方法、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辅导。八、加强舆情引导与沟通：积极回应关切：高校应积极回应网友和学生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关切和建议，增强透明度和互动性。九、展示科研成果：通过校园媒体、网络平台等渠道展示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和优秀案例，提升社会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认可度。加强科研教育宣传：加强对科研教育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学生对科研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2.2 形式主义节点

2.2.1 节点分析

在“形式主义”节点当中，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没有意义、走个过场”等等，网友的评论也都是从“毕业的论文的意义”这一话题展开。在这一个节点当中，一共有 150 名网友表示“毕业论文完全是走个过场”、“一直在纠结格式”“创造不了任何的学术价值”等等。也还有部分网友表示毕业论文就是为了挣学生查重和打印的费用等等。由此可见，在一个节点当中，网友们评论的最大问题就是过于片面和激进。会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本科生在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往往缺乏系统的科研训练和指导，导致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科研方法的掌握不足，使得学生在面对研究问题时难以深入分析和解决。二、评价体系不合理：当前的评价体系过于注重格式、字数等表面要求，忽视了论文的创新性、实用性和学术价值。这种评价体系容易让学生产生“应付差事”的心态，忽视了毕业论文的真正目的。三、导师指导不足：部分导师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投入和关注，未能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建议。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不畅，导致学生在撰写过程中遇到问题时难以得到及时解决。四、学生心态问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负担而非提升自我的机会。学生在撰写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论文质量不高。

2.2.2 对策研究

从节点特征分析，提升网友对毕业论文价值的认知，可铲除负面情绪土壤，抢占必要性宣传先机；教育部需反思并纳入学生问题改革——当前评价体系重格式、字数轻创新实用，易让学生应付、抵触，唯有根本解决，才能消除网友反感。

本研究建议：一、改革毕业论文制度，明确以培养科研能力、创新思维为目标；二、优化选题机制，鼓励结合兴趣与专业选题；三、完善评价体系，兼顾科研过程与实践能力，减少形式依赖，高校同步加大科研投入；四、优化导师队伍，提升导师水平以保障指导质量；五、强化科研能力培养，将科研方法课纳入教学，举办科研竞赛与实践活动；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咨询缓解学生压力；七、建立学生互助、导师团队等支持网络；八、加强舆情引导与宣传，及时回应关切，普及毕业论文意义。

2.3 创新点难找，难度大

2.3.1 节点分析

在此节点当中，一共有 95 名网友表示“哪有这么多的创新点”、“大学生哪有那么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研究生的事，本科生哪里来的创新”等等，评论中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创新点要求的讨论也持续升温，众多网友纷纷表示，由于本科生科研经验和学术积累有限，难以在毕业论文中体现出显著的创新点，认为这一要求过于苛刻且不合理。这种声音在社交媒体、教育论坛及学生群体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形成了较为强烈的舆情态势。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一、科研经验不足：本科生通常处于学术研究的初级阶段，缺乏足够的科研经验和数据积累，难以在短时间内产生突破性的创新成果。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部分高校或专业在科研资源、导师指导等方面存在不足，限制了本科生参与高水平科研项目机会，进而影响了其创新能力的培养。三、评价体系单一：当前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评价过于强调创新点，而忽视了对学生基本科研素养、文献综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考察。

2.3.2 对策研究

一、调整评价体系：多元化评价标准：将创新点作为评价的一个方面，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应同时考虑学生的科研态度、文献综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二、分段评价：根据学生的年级和专业特点，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如低年级侧重于基础理论和方法的掌握，高年级则鼓励探索和创新。三、加强科研能力培养：开设科研方法课程：将科研方法、数据分析等课程纳入本科教学计划，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四、提供科研实践机会：鼓励和支持本科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学术竞赛等，通过实践锻炼其创新能力。五、优化导师指导：明确导师职责：规定导师在毕业论文指导中的具体职责，包括选题指导、进度跟踪、创新点挖掘等。强化导师培训：定期举办导师培训班，提升导师的科研指导能力和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意识。六、营造良好科研氛围：举办学术讲座和研讨会：定期邀请学者、专家进行学术讲座，为学生提供与高水平学者交流的机会，拓宽视野。七、建立科研激励机制：设立科研奖学金、科研成果展示等平台，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和积极性。八、加强舆情引导：及时回应网友关切：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回应网友关于毕业论文创新点要求的质疑和建议，增强透明度。九、开展宣传教育：通过校园媒体、网络平台等渠道宣传本科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引导师生正确理解毕业论文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罗建河.大学生就业的网络舆情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0,(12):117-120.
- [2]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12.
- [3] 史一凡.基于 NVivo 内容分析的暴恐事件网络评论研究——以昆明“3.01”暴恐事件为例[J].情报探索,2023,(04):78-83
- [4] 冯狄. 质性研究数据分析工具 NVivo12 实用教程 [M]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30
- [5] 张帅, 王文韬, 李晶. 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10):94 – 100.

A Study on Online Comments about Abolishing Undergraduate Theses Based on NVivo Content Analysis

Chuziling¹

¹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bei, Wuhan² Affiliation, university name, city, country

Abstract: The undergraduate thesis is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apply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acquired during their academic studies, and it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state of undergraduate theses is not optimistic, with a consistent decline in their quality. As a result, many people have proposed abolishing the requirement for undergraduate theses, which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n social media. Analyzing the public opinion trend of news related to "abolishing undergraduate theses" helps us better focus on students' needs and social interes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further serve the cause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Undergraduate student; Undergraduate thesis;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影视短剧赋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

夏新¹

(1.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433)

摘要:《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中提到,截至2024年12月,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人,使用率达59.7%,较上半年提升7.3个百分点。事实上,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来看,在这种爆发式增长背后,不仅代表一种媒介形式上的成功,更反映出技术革命、要素创新与产业转型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深层融合。AIGC、多模态生成、VR、AR等智能技术,正悄然改变传统文化叙事的语法与边界,而政策与资本的双重助推,则进一步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影视短剧已逐渐从纯粹的内容产品,跃升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不容忽视的战略载体。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影视短剧;中国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校级科研课题“影视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研究”(CYKY202401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52

一、新质生产力在影视短剧中的融合体现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其实,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通常指单位时间内人们生产的物质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数量,而新质生产力是在社会日渐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背景下,生产力因科技创新加速、新型产业崛起而呈现的新形式和新质态,是数字经济时代更具融合性和引领性、更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代表生产力演化中的能级质变。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形态——它强调以创新为核心驱动,追求高科技、高效能与高质量的三重整合。如果仔细审视影视短剧领域,便会发现这一理念已渗透至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结构互动中。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高效结合。在此要求下,影视短剧行业需要优化劳动者队伍,培养掌握新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提升编剧、导演、演员等专业素养,让他们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艺术表现完美结合;同时,运用前沿的拍摄设备、制作软件、传播平台等,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素材,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传统技艺等转化为优质内容,对经典故事进行创新改编,融入现代元素,吸引观众。在影视短剧行业,技术层面已有了显著的创新,如文生剧本、文生视频的AI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在生产形态层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关于“微短剧+”行动的号召,短剧目前正迈向更多资本聚集、更大团队与更大平台进行制作和运营的新阶段。

而政策往往在产业转型中扮演催化剂的角色。2025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明确提出“从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选择重点领域,大胆实践,加大组织、引导、投入力度,实现微短剧题材类型的突破,同时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仅意味着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促使我们思考:短剧确实能够承担起文化提质与传播创新的双重使命。事实上,一些区域实践已经提供了肯定答案。如2025年1月获“繁星闪耀·微短剧之夜”年度创新创意的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贵州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咪咕文化、华策影视等联合出品《大力村超人》等深度融合地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作品。这些案例表明,只有当技术工具、文化资源与人才创新真正实现系统协同,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要素优化配置”才可能从理论走入现实。

二、影视短剧赋能传统文化传播的多维变革

基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影视短剧通过三个层面赋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一是劳动者层面,需培养具备跨领域技能的人才,提升创作的文化与技术能力;二是劳动资料层面,诸多数字技术可丰富影视短剧文化表现,智能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和翻译技术实现短剧承载的文化多元传播;三是劳动对象层面,通过挖掘文化素材,创意改编传统文化,结合新鲜元素,吸引不同年龄和层次的观众,为文化传播注入活力。

(一) 劳动者:复合型人才推动内容创新

劳动者的质变即劳动者素养的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短剧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依赖技术或资本,更根本的是人才结构的优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据中国电视剧产业报告(2024)显示,行业对既懂文化、艺术又掌握技术应用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同比增长40%。这种需求变化实际上提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是否低估了“人”作为创新节点的作用?为回应这一趋势,多所高校设立了“微短剧创作与运营”相关方向,侧重跨学科教学与项目制学习。而从实践层面来看,诸如“AIGC短剧工作坊”推出的《非遗守艺人》系列,在播放量破千万的同时,带动相关非遗商品电商访问量增长82%。这些现象似乎暗示,高素质人才正在成为衔接传统与现代、技术与叙事的关键行动者。他们并不直接生产文化,而是通过创造性转译,使文化变得可触达、可共鸣、可传播。

(二) 劳动资料:智能技术重构视听体验

在影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所谓“新”是指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生产力,是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而影视创作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值得深入探讨。它大幅降低了短剧创作门槛,并在效率层面取得显著突破。例如央视推出的《中国神话》,借助文生视频技术,自动生成上古神话场景,制作周期缩短75%,成本压缩至传统影视的四分之一,全网播放量接近2000万次,引发了行业外部的热议;DeepSeek工具30秒生成包含非遗元素的分镜脚本,即梦AI生成《墨韵新生》中古画修复动态过程,精度达0.1毫米级,节省传统CG成本76%;而《美猴王》则通过虚拟制片与实时渲染,构建出实景与AI交织的“虚实融合”体验。技术在这里不再是外在于文化的工具,而是内化为一种新型叙事语言——它改变了内容的生产方式,也重新定义了文化表达的可能性。在思考智能技术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时,我们往往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简化叙事。但实际上,AI技术之所以能重构视听体验,是因为它们与内容、受众和语境之间建立了深刻的互动关系。以《AI看典籍》为例,它通过ChatGPT生成对话脚本,结合VR构建可交互场景,使观众获得与历史人物“面对面”交流的体验。播出期间互动量超300万次——这个数字或许说明,传统文化传播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内容,而是连接的方式。在视觉层面,《丝路寻踪》借助超分辨率算法复原敦煌壁画,并结合3D动画还原商队场景,最终在B站获得超4800万播放量和10万余条高度情感化的反馈。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技术在这里不再只是工具,它已成为一种情感翻译器——将遥远的文化记忆转化为可共情的当代体验。

(三) 劳动对象: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播势态

在挖掘地方文化IP的过程中,影视短剧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弹性与适应力。《逃出大英博物馆》以“文物回归”为情感内核,在国内国际平台均取得热烈反响;而《太极侠影》则尝试将中国太极与好莱坞类型元素相结合,成功进入欧美主流市场并取得良好评分。《以和为贵》融合佛山醒狮、武术等元素,全网传播量超5600万,带动祖庙文旅订单增长300%;《墨韵新生》通过悬疑剧情呈现古画修复工序,使“古画修复”百度搜索量增长420%。这些案例似乎指向同一结论: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建立在跨文化共情与叙事创新的基础之上。而从“短剧+文旅”的实践来看,其价值已远超短剧内容本身。《子归子归》带动湖北宜昌旅游收入增长34%,《美猴王》推动连云港文旅订单量环比增长210%。这些数字背后隐含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影视短剧正在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基础设施,它不仅传播内容,更激活经济、连接地域、塑造认同。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可能性,那么短剧的未来就远不止于一种媒介形态,而更可能成为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场域。但是也应该注意的是,目前

AIGC 技术难以支撑起作品叙事, AI 生成的镜头所承载的叙事内容有限, 比起讲好故事, 技术带来的更多是视觉奇观刺激, 换句话说, 在一定程度上, 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使得 AI 短剧需要胜任的题材种类繁多, 由于技术限制, 像是偏向现实主义的故事在 AI 镜头语言下表现难度较大, 而需要想象力的场景和角色形象反倒容易创造,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AI 短剧在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题材时的生产力。

三、传播效能与社会价值

(一) 激活年轻受众的文化认同

微短剧的实践为激活不同年龄群体受众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视角。《我的归途有风》以非遗美食为线索, 结合都市情感叙事, 在小红书发起挑战活动, 曝光量超 3 亿并直接带动特产电商销量; 《漫话三国》则以二次元动画加网络流行语的方式, 使三国故事在 B 站“00 后”“90 后”用户中获得广泛共鸣; 又如短剧《剑影仙踪》与一款热门仙侠手游合作, 剧中角色形象与手游角色高度相似, 并且在剧情中融入了手游的经典任务和情节。这种联动方式吸引了大量手游玩家观看短剧, 同时也让短剧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到游戏圈。许多年轻玩家表示, 通过短剧对中国仙侠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对其中蕴含的侠义、修仙等元素产生了浓厚兴趣, 进而主动去了解相关的传统文化。这些成功似乎暗示, 传统文化并非缺乏受众, 而是缺乏恰到好处的“转译界面”。短剧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它不改变文化的内核, 但改变了文化的语法。

(二) 推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对包含微短剧在内的网络剧片发放行政许可, 这意味着短剧从“上线备案”进入“网标”新时代, 在强化对短剧内容质量与合规性的监管力度的同时, “短剧+”模式持续渗透至各行各业, “AI 短剧”模式开始涌现。例如快手的 AI 短剧《山海奇镜之劈波斩浪》借助可灵 AI 提供的视频生成技术支持, 全流程支撑剧本创作、角色设定、分镜规划到最终的视频合成。随着“短剧+”模式的不断成熟, 其产业链正在文旅、非遗、电商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 政策层面, 北京、上海等地通过资助计划与创作基地打造产业集群; 内容层面, 《锦绣匠心》不仅节目热播, 更带动苏绣产品销量增长 145%、培训报名人数上升 200%。我们或许可以说, 短剧的跨界融合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嫁接”——它通过叙事作为接口, 将不同领域资源重新组合, 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网络。这种模式的成功不仅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耦合”特征, 也重新定义了文化生产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 国家对短剧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

(三) 增强国际传播话语权

国际传播一直是中国文化输出中的难点, 而微短剧正在提供一种新的解决路径。中法合拍《釉色伊人》以青花瓷为主题, 在 CGTN 和法国 TV5 Monde 同步播出; 《茶香四溢》则通过剧集展播与茶艺体验吸引 40 余国观众参与。这些案例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播规模, 更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对话而非独白”的传播哲学。它不再急于输出结论, 而是侧重于构建共情空间; 不再强调文化差异, 而更凸显情感共通。这种转变或许正是国际传播中最需要的思维转向。随着各种视频生成模型的商用落地, 影视短剧预计将在动态合成与实时交互等领域继续突破。有预测指出, 2025 年中国微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 50 亿元, 其中传统文化题材占比超过 30%。但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保障持续的成功, 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在短剧赋能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 不仅要推动 AIGC、VR 等技术应用, 也要避免题材同质化与过度娱乐化; 不仅需完善创作扶持政策, 还要着眼于海外推广与传播效果优化。

四、结语

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变革无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 同时也拓展了其在全球舞台上的传播空间。然而, 若要使传统文化真正通过影视短剧这一媒介实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单靠技术赋能或市场自发机制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政府构建合理的政策与法规框架, 以激励企业、高校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短剧创作, 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合规性监管, 确保文化表达在创新中不偏离法治与伦理的基本轨道。同时, 政府部门应当主动促成跨界合作, 推动如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从而在体验层面重塑文化感知的方式; 高校等育人机构有必要

推动在相关专业中增设 AIGC 短剧创作方向课程,旨在通过教育增强从业者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诠释能力,这不仅关乎技术训练,更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塑造;而在公众参与层面,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这些举措看似侧重于技术应用和活动创新,实则是在重构文化传播的生态,一种依赖多元共治、强调情感联结且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生态系统。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影视短剧中的传播不仅是一个技术或创作问题,更是一项涉及新质生产力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

影视短剧通过技术、叙事与传播模式的创新,正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关键媒介之一。未来,短剧的发展需要在技术深化、内容提质与生态构建中寻求突破,以实现文化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双重提升,以适应在面临不断挑战的过程中,影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王满林.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产力: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历史考察[J].江汉论坛, 2021(03):24-29.
- [2] 刘志彪, 凌永辉, 孙瑞东.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 2023(11):59-66.
- [3] 宋冬林, 丁文龙.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实现东北振兴新突破[J].学术交流, 2023(12):105-122.
- [4]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5] 邓又溪,朱春阳.网络微短剧何以创新文化遗产影视化传播——基于《逃出大英博物馆》的案例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09):161-171.
- [6] 罗兰.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遮蔽与解蔽——基于传播修辞学视角[J].云南社会科学,2025,(04):141-147.

Research on Short Video Dramas Empower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Xia Xin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As mentioned in th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nline Audiovisual Industry (2025), by the end of December 2024, the user scale of short video dramas had reached 662 million, with a usage rate of 59.7%, an increase of 7.3 percentage points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n f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ehind this explosive growth lies not only the success of a media form, but also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actor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AIGC, multimodal generation, VR and AR are quietly changing the grammar and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narration. Meanwhile, the dual promotion of policies and capital has further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is proces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hort video dramas have gradually evolved from pure content products to an indispensable strategic carri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Key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rt Video Drama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生成模式与视觉叙事建构

张茂铃¹

(1.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433)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迅猛发展, 其对经典艺术的“转译”已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本文旨在超越“工具论”或“威胁论”的简单二元叙事, 深入探讨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内在机理与文化意涵。文章首先剖析了AIGC“转译”的三种核心生成模式: 风格迁移的“滤镜式”转译、元素解构与重组的“拼贴式”转译、以及基于文本描述的“语境重构式”转译。进而, 论文重点分析了在此转译过程中, AIGC如何通过对经典视觉元素的挪用、重组与再语境化, 建构出一种介于“复古”与“赛博”之间的混生视觉叙事。这种叙事一方面消解了经典艺术的“灵韵”与权威性, 另一方面又催生了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参与式的、流动的新的艺术话语。本文认为, AIGC并非简单地复制或破坏经典, 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转译器”, 重塑了我们理解、接受和参与艺术史的方式, 其本质是技术逻辑与人文精神的一场深度对话。

关键词: AIGC; 经典艺术; 转译; 生成模式; 视觉叙事

基金项目: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校级科研一般课题: 数智时代重温艺术经典的当代价值研究 (CYKY202400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53

经典艺术作品, 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星月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以其独一无二的“灵韵”(本雅明, 1936)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传统的艺术传播与二次创作, 多依赖于临摹、印刷、展览或基于原作的阐释性创作, 其过程深受物理媒介和个体技艺的限制。然而,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出现, 正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通过深度学习海量的艺术数据, AIGC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 它不是“复制”经典, 而是对其进行“转译”——将一种艺术语言, 如传统水墨画, 在另一种算法模型中进行解码与再编码。当前, 围绕AIGC与艺术的讨论多集中于版权争议、作者身份或对人类创造力的冲击。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 本文认为, AIGC的“转译”实践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艺术话语”, 它既是技术美学的体现, 也是当下文化逻辑的映射, 为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史与未来艺术形态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一、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生成模式

AIGC对经典艺术的“转译”主要呈现为三种核心生成模式。其一为“滤镜式”转译, 通过风格迁移技术剥离并套用经典作品的视觉风格。其二为“拼贴式”转译, 深入解构经典符号与元素后进行跨语境重组, 生成超现实图景。其三为“语境重构式”转译, 依据文本描述从无到有地生成符合特定艺术流派或时代精神的图像。这三种模式由表及里, 共同构成了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方法论体系。

(一) 风格迁移的“滤镜式”转译

在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诸多实践中, 风格迁移的“滤镜式”转译作为最直接且最易为大众所感知的模式, 率先展现出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结合的独特面貌。该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一种技术性的分离与再融合: 通过算法将经典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风格”——例如梵高画作中那充满生命力的急促笔触、莫奈笔下光影斑驳的色彩关系, 或是中国水墨画特有的墨韵层次——从其原有的具体“内容”中剥离出来。经过这一过程, 艺术风格被转化为一种可被量化和调用的数字资源, 仿佛一个功能无比强大的超级“艺术滤镜”, 能够被施加到任何指定的目标图像或场景之上。这种转译模式所生成的作品, 在美学上往往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性与趣味性。例如, 将一座由钢铁玻璃构成的现代都市天际线, 用梵高《星月夜》中那旋涡翻滚、色彩炽热的笔触重新演绎; 或将一张

普通的个人肖像照片，赋予达·芬奇《蒙娜丽莎》那般神秘而柔和的晕涂法效果。其美学的核心魅力，正源于“风格”与“内容”之间的错位与融合，这种时空的嫁接制造出一种跨越历史维度的奇异感，满足了现代人对新奇视觉体验的追求。在社会文化层面，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极大地降低了公众接触和“使用”经典艺术风格的门槛，使得任何个体无需经年累月的技艺训练，也能一键“拥有”大师的视觉语法，参与到以往被视为高深莫测的艺术创作之中，从而推动了某种程度上的艺术民主化。然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由此而生：它通常止步于对经典艺术最表层、最显性视觉风格的模仿与套用，更像一种高级的视觉化妆术，而难以触及原作背后深厚的历史语境、情感张力与精神内涵，即那些构成艺术“灵韵”的深层要素，因而也最易流于表面化和同质化的生产。

（二）元素解构与重组的“拼贴式”转译

在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多元谱系中，元素解构与重组的“拼贴式”转译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刻和激进的介入路径。这种模式已不满足于“滤镜式”转译那种在表面施加风格化处理的方式，而是如同一位拥有精深艺术史学识的“数字考古学家”，直接深入到经典艺术的肌体内部，对其核心的视觉元素——诸如特定的母题、象征性符号、典型人物乃至经典场景——进行精准的识别、提取和解构，继而依据算法逻辑或用户指令，将这些文化碎片进行创造性的、乃至是颠覆性的重组。其技术根基在于跨模态模型与扩散模型的协同工作，前者赋予AI理解“敦煌飞天”“宋画花鸟”“苏州园林”等抽象文化概念的能力，后者则负责将这些概念从原有的历史与叙事语境中抽离出来，视觉化为可被自由调配的元件。当用户输入如“一个由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般技法构成的高达机甲”或“《韩熙载夜宴图》的场景发生在未来太空站”这样的指令时，AI便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视觉缝合实验。这种转译所生成的作品，不再是单一风格的再现，而更像是一种“超现实主义拼贴”，它强行打破了经典艺术固有的叙事结构与物理逻辑，将原本分属不同文化坐标与时间维度的符号进行并置，从而营造出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与想象张力。例如，将八大山人笔下孤傲冷逸的游鱼与赛博朋克世界的霓虹光影交织，或是让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以像素化的形态矗立于一张电路板之上。这种实践充分暴露了AIGC将整个艺术史视为一个庞大“数据库”的本质，它以一种近乎“暴力”的美学姿态，对文化遗产进行任意的提取与合成，创造出连古典大师都无法企及的超现实图景。这不仅是技术能力的展示，更是后现代“挪用艺术”在算法时代的极致演进，它从根本上挑战了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与语境特定性。

（三）基于文本描述的“语境重构式”转译

在AIGC“转译”经典艺术的诸多模式中，基于文本描述的“语境重构式”转译无疑是最具深度与颠覆性的一种。它超越了针对单幅作品的形式模仿，直接作用于艺术风格、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象等抽象层面，通过对海量艺术史知识的内化与演绎，实现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生成。这种模式高度依赖大型扩散模型强大的跨模态理解能力，当用户输入如“一幅展现唐代长安城元宵盛景的工笔重彩画，细节繁复、气象恢宏”或“一幅采用北宋范宽雨点技法描绘的星际山脉”等提示词时，AI并非在数据库中寻找现成图式进行拼贴，而是依据其对“唐代绘画”“工笔重彩”“北宋山水”等概念所蕴含的笔法特征、色彩体系、空间观念乃至美学精神的深度理解，重新合成出既符合历史语境又独一无二的视觉文本。例如，AI能够生成一幅并不存在于艺术史中的“杰作”：它可能完美融合了敦煌壁画的绚丽色彩与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笔意，描绘出飞天穿梭于未来城市的奇幻场景；或是运用八大山人孤傲冷逸的笔墨语言，去呈现一个极具现代感的荒诞主题。这种转译的本质，是对整个艺术史脉络的模拟与对话，它迫使观者思考：倘若石涛面对今日的数字景观，会如何运用他的“一画”理论？这模糊了“考据复原”与“主观创造”的传统边界，使AIGC如同一个能够贯通古今的“超级大脑”。在中国传统艺术的语境下，这种模式的意义尤为深远，它不再是简单的形式搬运，而是试图捕捉并转译那种蕴藏在笔墨、气韵与空白之中的，只可意会的东方美学精神与哲学观，从而在算法逻辑与人文传承之间，开辟出一个充满张力的创造性空间。

二、戏谑与参与：AIGC转译下的视觉叙事建构

（一）对经典权威的“戏谑”性消解

在AIGC对经典艺术的转译过程中，一种显著的叙事特征在于其对传统权威所进行的“戏谑”性消解。这种消解并非源于有意识的批判，而是内嵌于技术本身的“硬化”逻辑与平民化基因之中。当AI被指令生成“一群兵马俑在现代化的开放式办公室里敲击电脑、参加视频会议”，或是“八大山人笔下的翻白眼动物戴上耳机沉浸在电子音乐中”的图像时，一种强烈的文化错位感与幽默感便油然而生。这种创作实践通过将庄严肃穆的经典符

号进行降维、变形并置入世俗的、当下的日常语境，有效地剥离了它们长期以来被博物馆、艺术史叙事和学术话语层层包裹的“神圣光环”。曾经需要怀着敬畏之心在特定文化场域中仰视的经典，在此被轻松地拉下神坛，转化为社交媒体上可传播、可调侃、可再创作的视觉素材。这本质上是一种“平民式”的解读与参与，它拒绝单向度的权威灌输，代之以平等的、娱乐化的互动交流，是技术民主化在文化领域最为直观的体现。然而，这种充满活力的戏谑姿态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忧虑：当《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人物被转译为现代派对上的狂欢者，当敦煌飞天的庄严宝相被解构成时尚品牌的虚拟模特，这是否构成对文化遗产尊严的轻慢与“滥用”？这种忧虑凸显了在技术狂欢背后，关于经典诠释的边界、文化敬畏感的维系，以及如何在促进创造性转化的同时防止意义被虚无化消解等一系列亟待深思的课题。

（二）从静观到“参与”的叙事流动

中国传统艺术的鉴赏历来强调“静观”的审美范式，无论是面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壮阔青绿，还是品味倪瓒笔下萧疏淡远的太湖竹石，观者总被置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保持审美距离的凝视位置，作品本身具有完整的、自律的权威性。然而，AIGC对经典的转译彻底重塑了这种关系，建构起一种深刻的“参与式”叙事流动。在这一新范式下，任何用户都不再是沉默的欣赏者，而是通过修改提示词直接介入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例如，一位爱好者可以不再仅仅仰望《清明上河图》所凝固的北宋市井风情，而是通过输入指令，让AI生成“张择端风格的未来苏州平江路数字街景”，或尝试“用唐代敦煌壁画的色彩与飞天形象演绎《红楼梦》大观园的中秋夜宴”。经典作品由此从一个封闭的、神圣的文本，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可被无限改写、续写和交互的“艺术数据库”。叙事不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每一次指令的调整、每一种奇思妙想的注入而不断流动和演变。艺术的中心从最终的、静态的“作品”转移到了动态的“生成过程”本身，作者权也被分散给了背后的算法模型与前端无数参与互动的用户。这种转变的核心，是将艺术从一种单向的、权威的“灌输”，转变为一场多方的、平等的“对话”。它仿佛将顾恺之“迁想妙得”的创作心法交予众人，使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与算法的互动中，将自己的文化想象与情感体验编织进经典的脉络之中，从而在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场域里，催生了一种充满能动性、创造性的新生态。

三、灵韵的消逝与重构

面对AIGC对经典艺术日益深入的“转译”，我们无法回避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灵韵”（Aura）概念及其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命运。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深刻指出，艺术品的“灵韵”源于其“原真性”和“此时此地”的独特性，而机械复制技术则导致这种灵韵的消逝。如果说机械复制时代使艺术品的“光晕”因大规模复制而黯淡，那么AIGC时代的“转译”则对这一经典理论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挑战。

一方面，AIGC的转译实践确实在本雅明所言的意义上加剧了灵韵的消逝。当算法将《富春山居图》的笔墨意趣转化为可任意调整的参数，当敦煌壁画的飞天形象被解构为可无限重组的数据单元，这些数字产物的本质已与“原真性”彻底分离。它们不再是具有物质实体和历史痕迹的“真迹”，而是可被无限复制、修改和传播的数字代码。另一方面，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种“新灵韵”的重构。这种新型灵韵不再依赖于物理实体的独一无二性，而是生成于AIGC特有的创作过程之中。当创作者输入“以宋代山水画意境描绘元宇宙景观”的指令时，算法每次生成的图像都具有不可复制的随机性——这种由算法内在随机性带来的“此刻”的独特性，结合创作者与AI系统之间动态的、交互式的对话过程，共同构成了一种数字时代特有的审美体验。譬如，一个基于“八大山人笔意”生成的数字水墨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视觉结果的呈现，更在于生成过程中对传统笔墨精神的当代诠释和互动探索。这种基于过程而非结果、基于关系而非实体的灵韵，使艺术创作从对“原作”的崇拜转向对“生成性”的珍视。

AIGC对传统艺术的转译因而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它既消解了基于物质性和原真性的传统灵韵，又催生了一种基于算法随机性和人机协作的新灵韵。这种转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的生存方式——或许正如凤凰涅槃，传统艺术的“灵韵”并非简单地消失，而是在技术的熔炉中以一种新的形态获得重生，继续在数字时代延续其审美生命力和文化价值。

四、结论

AIGC对经典艺术的“转译”，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实践。它通过“滤镜式”“拼贴式”和“语境重构式”等

生成模式，不仅改变了经典艺术的视觉形态，更建构了一种戏谑、参与的新的视觉叙事。这套叙事打破了艺术史的线性权威，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化逻辑，并重塑了公众与艺术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AIGC 不是一个中立的工具，而是一个携带着自身逻辑的“行动元”。它转译经典的过程，既是技术能力的展示，也是技术观念对人文领域的渗透。其带来的版权、伦理和艺术价值评判体系的重构，是未来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最终，AIGC 的“转译”启示我们，经典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它正是在不断的被解读、被模仿、被挑战乃至被“误读”的过程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力。AIGC 作为这个时代最有力的“转译器”，正迫使我们将经典艺术从静止的博物馆中释放出来，投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创造性的、动态的、全球性的对话场域之中。在这场对话中，人类并非旁观者，而是通过与算法的协同，共同书写着艺术史的下一篇章。

参考文献:

- [1] 高峰.AIGC 赋能计算艺术的实践路径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为例[J].中国艺术,2025,(04):45-58.
- [2] 王羽晨,李姗姗.基于 AI 技术研究非遗鲁锦与西方抽象艺术图像的融合[J].名家名作,2025,(24):125-128.
- [3] 张悦.AIGC 艺术的美学边界与价值反思[J].艺术传播研究,2025,(05):29-39.
- [4] 滕小鹏.复制性与想象力-当代数字艺术中的机械性因素[D].鲁迅美术学院,2025.
- [5] Han ,Qi ,Liu, et al.About Exploration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Perspective of AIGC[J].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2025,1(6):
- [6] Li Z .The Function and Influence of AIGC in the Creation of Short Video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J].Research and Commentary on Humanities and Arts,2025,3(1):
- [7] 王建磊,解玲玲.AI 痕迹与数字灵韵: 看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另一种视角[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98-107+171.

The Generation Mode and Visual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AIGC

"Translating" Classical Art

MaolingZhang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technology, its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art has become a striking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paper aims to go beyond the simplistic binary narrative of the "instrument theory" or "threat theory" and delve in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AIGC's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art. First, the paper analyzes three core generation modes of AIGC's "translation": the "filter-style" translation based on style transfer, the "collage-style" translation featuring element decomposition an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context-reconstruction-style" translation grounded in text descriptions. Furthermore,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how, in this translation process, AIGC constructs a hybrid visual narrative that lies between "retro" and "cyber" by appropriating, reorganizing, and recontextualizing classical visual elements. On one hand, this narrative dissolves the "aura" and authority of classical art; on the other hand, it gives rise to a new artistic discourse with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one that is participatory and flui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IGC does not simply copy or destroy classics. Instead, as a powerful "translator," it reshapes the way we understand, receive, and engage with art history, and its essence constitutes an in-depth dialogue between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humanistic spirit.

Keywords: AIGC; Classical Art; "Translation"; Generation Mode; Visual Narrative

喝不喝：多媒介视域下酒桌场景性别角色期待与反思

王路宁

(湖南南华大学, 湖南 衡阳 421000)

摘 要：隶属于我国酒文化的“酒桌文化”，渗透于广告、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之中，其酒桌场景中对两性的性别角色的呈现，隐藏着男女性别权力失衡的矛盾，表现出深刻的性别偏见。通过格伯纳培养理论，分析并发现此类传播现象既反映了社会对于该场景乃至其他生活类延伸场景的性别角色期待，也反过来塑造和维持了社会旧有价值体系。

关键词：酒桌文化；性别角色；媒介建构；性别偏见；性别平等

基金项目：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2023D006）

DOI：doi.org/10.70693/rwsk.v1i10.1457

我国拥有悠久的制酒、饮酒历史，当前的酒文化产业也是部分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目前的酒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传统酒类的健康风险与当前健康意识提升之间的矛盾”，“传统酒类产品销售单一化与消费群体饮品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传统酒桌场景下的两性矛盾”等，这些矛盾在酒桌场景下更为显著。两性对于酒桌场景的认知显然并非生来如此，到底是什么塑造了“酒桌场景”中的性别角色呢？我们尝试从广告、影视、文学作品等大众媒介文本中寻找原因。

一、广告媒介酒桌场景中之性别角色呈现

70 年代，世界妇女组织（NOW）便呼吁正视媒体对女性角色报道的正确性及刻板情形。90 年代我国《中国妇女报》曾发起过“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讨论，并发现广告中的女性有两种刻板印象：一是传统贤妻良母，二是超前消费、吃喝玩乐的“现代花瓶”。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女性意识空前觉醒，大部分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在工作中寻求社会价值，力图摆脱男性附属品的角色。但直至 21 世纪，广告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单一片面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有学者对 2004 年获奖的中国电视广告片进行定量研究，发现男性总体上仍体现主动、独立、权威等性别特征，而女性则被刻画成年轻性感、被动、自主性不够等特征^[1]。

表 1 酒类广告女性角色定位统计表

酒品	数量	女性年龄	女性服装	女性角色定位	广告场景
白酒	31	99.7%（20-35 岁）、0.3%（60-75 岁）	47%（传统服装）、30%（正式服装）、23%（休闲服装）	33%（服务）、17%（聊天）、50%（固定角色）	15（酒局、酒会、家庭场景）、7（传统历史场景）、6（自然场景）、2（学习工作场景）
红酒	16	88%（20-35 岁）、12%（60-75 岁）	38%（礼服）、12%（复古）、19%（专业）、31%（便装）	19%（聊天）、81%（固定角色）	8（酒会等）、4（自然场景）、4（生活背景）
果酒	21	9%（20-35 岁）、91%（60-75 岁）	26%（礼服、旗袍）、74%（日常装）	43%（聊天）、57%（固定角色）	11（酒吧等聚会场所）、6（家庭聚会场合）、4（室外场所）
啤酒	16	94%（20-35 岁）、6%（其他年龄）	50%（便装）、39%（正式服装）、11%（比基尼）	50%（聊天）、50%（固定角色）	8（生活场所）、5（酒吧等）、3（科幻场景）

作者简介：王路宁（1991-），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地方文化

酒广告是各类广告中主要以男性群体为受众的,该类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定位最能够准确反映女性在大众媒体报道中的主流印象。而这类广告中,女性频繁被塑造成花瓶形象,身着暴露服饰,呈现服务姿态,意图将“品美酒”等行为与“赏美人”符号等同。据学者抽样统计^[2],截止2020年,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大视频网站中86支酒类广告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定位单一,如表1所示。

其中固定角色主要分为伴侣角色、晚辈角色、成功女性和工作白领,白酒广告中女性多为伴侣角色,承担服务功能,红酒广告中女性多为知性优雅的形象,啤酒和果酒的广告中女性更偏年轻化,塑造时尚、前卫的形象,其中以固定的“酒桌场景”为背景的广告占到广告总数的70%以上,而这些场景中,女性无一例外均是服务者的角色。

这些广告中基本都有男性角色,主要呈现了以下定位,如表2所示:

表2 酒类广告男性特点统计表

广告品类	男性角色特点
白酒	权威人士(牛栏二锅头)、商务精英(习酒)、文化传承人(衡水老白干、贵州醇)、家庭支柱(老村长)
红酒	专业人士(巴贝拉)、商务人士(威龙)、青年人(杰卡斯)
果酒	家庭成员(柒悦)、专业人士(杰克熊猫)
啤酒	Party青年(哈啤)、足球名将(力波)

除果酒以女性为主要呈现者外,其他广告都以男性为主要角色。白酒和啤酒广告多沿用传统男性形象,阳刚、成功的男性形象,红酒广告则掺杂家族历史积淀的元素,倾向于突出具有酿酒传承的专业人士或成长中的青年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的白酒广告中男性形象呈现多样化趋势,如衡水老白干、贵州醇及老村长等白酒广告中男性角色并非传统的男性角色定位,多是带有地域特色或家庭氛围的普通人,但究其原因主要与上述白酒的消费人群定位有关。不过,凡是在酒桌场景下完成的广告剧本设定,男性角色无一例外均是成功人士形象。

广告中的性别刻板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容易形成思维定式,造成主体意识错位,进而引发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譬如市场上一款以女性消费者为主的低度果酒却以男性的口吻撰写广告语,其中一则说:“姐们儿,祝你新一年兜里的钱像男人一样够花”,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视为“背叛”主要消费群体。究其根本是看似“女性主义”话术,实则典型的以男性主体意识制造“伪女性代言”,将经济实力默认为男性专属特质,将赋权女性简化为“达到男性消费水平”的物化标准,并未将两性至于同等地位来叙事。

二、文学、影视作品中酒桌场景中之性别角色呈现

影视文学作品应该是当前受众最广的媒介,而它们也多脱胎于纯文学作品。其中,纪实文学就如实地记录了男性在酒桌场景下的“自我呈现”,比如下面两段文字:

(1) 来客了,大家都握着啤酒瓶直接“吹”,好像都没有用啤酒杯的习惯。……喝到高兴了,意气昂扬的男人们就开始耍酒疯,打赌,就看谁能一口气吹掉这样一大瓶。吹完一瓶也不会醉,就是肚子胀。男人们不停地离席到门口的竹园里“放松”,“放松”回来继续“吹”下一瓶。(蒋丽英《乡居笔记》)

(2) 在四川各处的急诊室里,洗胃是最常见的。病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因为跟抽烟一样,喝酒也是男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在四川,喝酒绝不仅仅是寻常的休闲放松。它通常带有竞技性质,通常要喝白酒,一种口感极其浓烈的粮食酒。男人们总是端着满杯跟人敬酒,因而很容易就有恃强凌弱的势头。……在听过一大堆吓人的故事,知道了四川男人在喝酒时会表现出无谓的英雄气概。([美]彼得·海斯勒《江城》)

酒桌场景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的公共场景。无论男女,也许酒局的参与者私下“滴酒不沾”甚至厌恶饮酒,而在社交酒桌这一“前台”(Front Stage)场景中却须努力扮演“千杯不醉”的角色,以便维持社交形象,或塑造与“后台”(Back Stage)私人场合中截然不同的强者形象。例(1)记录了苏州一带乡村小岛的乡土人情,席间男性们经常以酒斗胆量下“赌注”,即便喝到肚胀,也会挣扎着出去“放松”一下回来继续吹。处于该场景下的男性往往并非以“品酒”的心态喝酒,是约定俗成的“规矩”让他们不得不喝。例(2)是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眼中的《江城》酒桌社会,小城市的酒桌文化强行赋予男性某些特质,即“无谓的英雄气概”,“喝酒……带有竞技性质”,酒桌如战场,“酒”已然异化为权力符号,而非简单的酒水饮料。

文学及影视作品中“酒桌”主要生成了两种“隐形权力”:

身份权力的确立 酒桌被视为权力游戏的缩影,座次安排、敬酒礼节都有讲究。通过酒桌互动,参与者们相互确认身份和地位。身份不同的人通过“敬酒”等方式试探彼此的权力边界,例如洪放《秘书长》中,“刘一路”

借敬酒提诉求，还极其细致地观察被敬者的反应，比如“被敬的有的只是泯了一点”，便接收到了对方“不会应许”的信息。

比“敬酒”更具有强制意味的“劝酒”活动，则隐藏着深层次的权力博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常见于官场或职场类小说、电视剧，比如金林的《县委大院》里主人公“仲霏”苦于陪酒的活儿不好干，“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不讲感情，只能甘挺硬装”。莫言小说《酒国》里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烹食婴儿”的案件却陷身酒席，席间敬酒者还把酒桌行为与国家利益挂钩，说：“咱们喝的是爱国酒，抵制洋酒，这是对国家的支持。”

劝酒者多数巧用临时构建的强硬式“内群体”社会认同^[3]，谁劝酒谁就是规则的化身，“不喝”就是违规，会被归为“外群体”。故而才让“面子不可或缺”“喝了就是一家人”成为酒桌上的“集体默契”。

品行评估权力 酒桌可指摘的除了劝酒还有隐藏在酒桌之下的“晋升捷径”：陪好了酒等于升迁有望。与其说酒等于权力，不如说酒桌背后有“品行评估权力”。中国人历来信奉“酒后吐真言”，喜欢在酒桌上对个人品行进行审视，而“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又是深植于中国有史以来的官僚选拔机制中的，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乃至唐以后科举，无一不是选取道德品行端方之人。

酒量大小是如何与品行高低挂上钩的呢？头功当属现代武侠小说了，“酒桌文化”与“江湖文化”“侠义精神”糅合为一体。以古龙和金庸武侠小说为例，他们笔下的江湖人物，个个嗜酒如命，以酒交友、对酒消愁，产生了“古之侠者，嗜酒如命”的“定型化效应”，“酒”被打造成了江湖场景中必不可少的核心“符号”，是家国情怀与情义自由的化身。浸淫于酒局之人多希冀成为“萧峰”“令狐冲”等这般振臂一呼而天下英雄云集的人物。这一影响并不是小范围的现象，70年代至90年代武侠浪潮风靡全国，金庸一人就有15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包括36部电影和66部电视剧，共102部之多。侠义精神和“酒文化”也随之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江湖式“酒桌文化”。

读者与观众通过武侠小说或电视剧构筑的武侠世界，消化吸收了诸如“酒局是仪式化的权力表演”（歃血饮酒为盟）、“酒局是人情施受的合理场所”（共饮一碗酒者结拜为兄弟）、“酒局是信息博弈的隐秘场所”（利用敌人酒后吐真言伺机探虚实）等设定，将虚构的江湖规则渗透至现代都市酒桌。“喝不喝”成了无法选择的问题，“劝酒”演变成“逼酒”，刻意打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酒桌江湖”。

三、酒文化传播中性别角色期待与反思

从广告到纸端，从纪实文学到小说，从小说到影视剧，正如格伯纳所说，大众传媒展现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的某些倾向性（譬如江湖习气的酒桌文化）促使人们心中的“主观现实”支配了符号环境，观众们毫无知觉地按照电视世界里的价值观来认知世界、处理事务，即便这种认知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他们也会因循刻板印象和认知惰性而懒于修正，这种影响是长期深远的、潜移默化的^[4]。饮酒文化本身，若建立在适度原则之上，的确能够帮助建立信任、缩短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并在商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5]。在以极端的“资源交换与利益博弈”为目的酒桌场合，大部分话语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伦理上隐含诸多不合理性，酒桌便沦为权力滥用的温床。譬如“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不仅是一种“身份确认”，还是一种个人意志的强制性剥夺，是对上下尊卑权力关系博弈后所得结果的强化。而“迟到自罚三杯”“入座先干三杯”等话语则不仅是一种惩罚性措施，还通过公开的羞辱感迫使迟到者接受惩罚，完全忽视了对于酒量不佳或身体不适的人来说应遵循“饮酒适量原则”。

酒局中的话语互动不仅反映了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也再生产了这种结构。因此，喝酒在中国文化中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号，承载着复杂的权力和地位意义。男性常常无法跳脱酒桌，而女性又常常被排除在“酒桌权力游戏”外。大多数当代作家的小说中，女性但凡与“酒”沾边便脱不了负面形象，实则还源于女性在常见的现实酒桌场景下性别角色定位极其负面。一本实用类指导书《中国式饭局口才术》是这么描述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女士就可以可怜兮兮地说“我真的不能喝，请大家见谅”，这时最好有一两个同伙在旁客串给你做“污点证人”，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装可怜敬酒……这样一来一去，高手倒下了，菜鸟还在喝。

这本书在讲述饭局社交技巧时刻意区分了男性和女性在酒桌文化上话语特点。强调女性应利用性别优势，避免喝酒，非喝不可就“扮可怜”，这一策略实则是鼓励女性扮演弱者角色，强化了女性需要被照顾的刻板印象，并暗示她们需通过情感策略而非直接对抗来保护自己。但同时又鼓励女性“装可怜敬酒”，保持被动姿态的过程中迂曲地“进攻”。

如此矛盾的话语策略背后是矛盾的社会文化逻辑，女性虽被排除在“权力游戏”之外，但又被默认为可以“非直接竞争”方式参与权力游戏，女性需通过表演性策略（示弱、媚态等）在男性主导的酒局中生存，反映了职场与社交场合中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凸显了女性主体性与被动的社会工具化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社交规则中她们既要发挥能动性，又无法完全摆脱客体地位的困境。

无论是以纸媒还是电视传媒为媒介的传播中，“酒桌”上都展现了不容忽视的性别偏见。一旦“酒”在某些职场领域被默认为权力符号，成为默认的职场表现和晋升评价标准，就必须引起重视了。从更大视野范围内来看“酒桌权力游戏为男性专属”等问题，这也是近年来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回潮^{[6][7][8]}的表现之一。

如何改善呢？已然成型的观念打造的主观性世界秩序其实是很难改变的。现有的秩序通过教育体系、媒体叙事、法律框架等制度化渠道，将特定世界观塑造为“自然真理”，即便旧秩序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也会不自觉地维护所谓“真理”。传统的媒体叙事与当今社会的社交媒体算法（个性化定制）正不断加剧“信息茧房”，形成固化的群体认知闭环。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传媒最主要的效果并非在于改变受众，而是维持某种社会结构，使观众对世界的认知符合既有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政治经济秩序^[9]。因此，只有从法律制度层面、传播技术层面、文化教育层面几个层面出发，“三维联动”，在教育领域和公共媒介领域引入性别平等文化思潮，扭转新媒体的传统性别意识叙事模式，完善法律法规，为建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提供政策保障，才能最终达成全面改善此类问题和现象的目的。

法律制度层面：在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强化重要制度的顶层设计，为反对就业及职场生活中的性别歧视专门立法，让反歧视者有法可依。当前我国虽然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等法律条款中规定了性别平等，但依旧缺乏专门针对就业性别歧视的综合性法律，应有法律条款明确界定包括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和报复等在内的就业性别歧视的概念和类型，并规定详细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针对文化传播内容中“性别歧视”含量过高的内容，譬如“酒桌骚扰”情节过多，受众易误认为此类现象极为“普遍”且“正常”。应有法可依，依法下架，禁止传播，对于不利于青少年儿童性别平等意识塑造的读物，也应设立特定的法律法规判定此类读物为分级阅读类书籍，不得向特定人群售卖。

传播技术层面：若传播内容本身就存在价值取向问题，那么传播过程便是不平等权利设定的再生产过程，因此有必要从传播内容审查和传播方式两方面入手，对历时和实时传播内容，尤其是酒桌场景中所涉及的“性别偏见”“性别歧视”元素进行分级评定，逐渐减少此类传播内容的公开出版、发行，鼓励“平等意识”元素入场，最终达成“旧有价值”逐步退出机制。

表3 性别歧视指标量表

测量指标	量化标准 1	量化标准 2	量化标准 3
直接歧视（权重 α ）	显性歧视词汇：利用 NLP 情感分析+歧视词库匹配，每出现 1 个敏感词+1 分，叠加不超过 5 分	刻板印象符号：多模态分析，统计性别与职业相关比例，符号强化度 $\times$ 出现频次（如全男性领导画面 5 分）	制度性排斥条款：法律文本解析，识别“仅限男性”等表述。条款明确性 $\times$ 限制程度（完全排除 5 分）
间接歧视（权重 β ）	语境暗示偏差：语义角色标注&知识图谱推理（如“适合女性”等隐含关联），推理链长度 $\times$ 关联强度（1-5 分）	统计性歧视：女性角色在家政、护理、教育等行业的集中比例，年龄歧视等。（合理性偏离度 1-5 分）	结构性障碍：女性因生育而丧失晋升机会，或必须获得男性帮助才能成功等设定。（合理性偏离度 1-5 分）
隐性偏见（权重 γ ）	社会观念调查：对两性相关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如“女性是需要呵护的花朵”。（合理性偏离度 1-5 分）	媒体内容分析：视觉构图上存在的隐形偏见，如海报的图像分割，主角与配角的性别比。（构图偏离基准值 $\times 2$ ，基准：人口比例）	叙事框架倾斜：故事语法分析（受害者/拯救者角色的性别分配模式）（角色分配异常度 $\times 1.5$ ）
后果呈现（权重 δ ）	社会模仿风险：与已知历史歧视事件相似度。（相似度百分比 $\times 5$ ）	群体污名化指数：歧视内容在特定网络社群的扩散速度。扩散速率 $\times$ 社群规模系数（0.1-5）	法律对抗成本：同类案件平均诉讼时长与赔偿金额变化（成本排名上升则 5 分）

基于自由创作的前提，有必要建立类似于格伯纳的“暴力指标”^[10]的“性别歧视指标”，对公开出版、发行的纸质媒介和电视媒体进行等级化认定。“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偏见”乃至“性别歧视”是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其界限又不是绝对的。必须详细审查传播内容中的相关元素，对两性区别化事件乃至“性别歧视”的发生频率、表现形式、角色关系等维度进行编码和统计，揭示性别歧视内容的普遍性及其对观众认知的长期“涵化”作用。

全面的性别歧视指标(Gender Discrimination Index)量表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量化,如表3所示。

我们可以利用上述量表将广告、小说或电影、电视剧中短暂呈现的“虚拟世界”从上述四个维度进行全面量化,利用NLP情感分析、知识图谱、歧视词词库等对文本进行分析,识别其中的歧视性语言、架构或行为,并根据歧视的显性程度与社会危害性,为不同测量项分配权重。拟定一个“歧视元素”量化公式:

公式: $GDI = (\text{直接歧视发生率} \times \alpha) + (\text{间接歧视强度} \times \beta) + (\text{隐性偏见渗透度} \times \gamma) + (\text{后果严重性} \times \delta)$

权重为1,每部分最高级别为5分,总分45。权重不是一成不变的,权重 $\alpha - \delta$ 可在0.1-2之间滑动,部分指标的权重的设定可受传播介质的限定特点而有所偏差,需根据实情随机调整。从当代传播方式来看,社交媒体成为实时更新的内容创作及传播的重要平台,内容创作自由度极大提升,社媒使用者们一方面无法在海量信息中分别优劣,一方面个性化推送又极易造成信息茧房。若用户本身就偏好性别歧视的内容,则将愈发强化不合理的性别意识形态。因此也可从平台管理和技术算法入手管控内容传播中的性别歧视元素。平台大多已设置非算法推荐区,如微博的“广场”版块,抖音的“推荐”版块等,可将流量分配给编辑精选内容,并保证精选内容符合中立原则。对于系统检测到的具有性别歧视偏向的用户,可强制算法在推荐时保持内容多样性阈值,如每10条推送必须包含3条跨立场内容。

文化教育层面:教育乃国之大事,具备培养人才、塑造价值观、推动社会进步的战略价值,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性别意识形态受到教材、图书内容和教师的日常言语行为的极大影响。近年随着公众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教材、图书中一些隐性的性别偏见也被公开讨论。

参考文献:

- [1]徐芳等.广告中的女性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广告中的两性形象比较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6(3): 7.
- [2]周子柔.网络视频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20: 12.
- [3]姚德薇.集体认同建构与现代性的多元呈现: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2.
- [4]GOFFMAN E. On face-work: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J].Psychiatry. 1955 18(3):213-231.
- [5]李瑞雪.涵化理论研究沿革与现状综述[J].传播与版权 2014(7): 1.
- [6]顾辉.国家、市场、社会和家庭交织影响下性别观念的回归[J].社会科学辑刊 2014(3).
- [7]杨菊华等.近20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 2014(6).
- [8]许琪.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 2016(3)
- [9]刘少博.女性主义法学视域下的就业性别歧视法律问题探讨[M].法制博览 2025(1): 156.
- [10]潘源.文化铸就兴国之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147.

To Drink or Not: Gender Role Expectations and Reflections in Drinking Table Scenarios from a Multi-Media Perspective

WANG Lun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China

Abstrac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drinking culture, the 'drinking table culture' permeates advertisements, literary works, and films. The portrayal of gender roles in such drinking-table scenes conceals a contradiction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men and women, revealing deep-seated gender biases. Through the lens of Gerbner's cultivation theory,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type of media phenomenon not only reflects society's expectations of gender roles in this and other everyday-life scenarios but also, in turn, shapes and sustains the existing societal value system.

Keywords: Drinking culture; gender roles; media construction; gender bias; gender equality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可视化分析

黄 蕾¹ 韩 晨¹ 刘浩宇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 为了深入掌握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的研究热点, 以预测该领域的趋势走向。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6.3.1R3 这一可视化分析工具, 对 CNKI 数据库中 2000 至 2024 年间的 225 篇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涵盖了文献发表量、研究机构单位以及关键词等维度, 通过构建知识图谱来揭示研究进展和趋势。分析结果显示结果: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发文量 2000 - 2013 年增长缓慢, 中期 2014 - 2016 年逐年上升, 在 2020 - 2022 年达到高峰, 2022 年发文量最多为 40 篇, 随后在 2024 年下降到 10 篇; 研究机构中体育类院校优势显著, 师范类排第二大类, 综合学校排第三大类; 研究主题多聚焦于体质健康、体质; 本研究深入探索了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的研究现状, 为今后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幼儿体质健康; 可视化; 文献计量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64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中国知网 (CNKI) 作为文献检索的平台, 通过设定“幼儿体质健康”为检索词, 时间范围为 2024 年 12 月 17 号之前的所有相关内容。经过精确检索, 初步获得了 319 条相关文献。随后, 通过人工筛选排除了 58 篇会议论文, 最终确定了与“幼儿体质健康”主题紧密相关的 112 篇期刊文章和 103 篇学位论文, 共计 225 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这一过程确保了研究数据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运用了由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研发的信息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 通过视觉化手段展示科学知识的结构、模式和分布。研究中使用的 CiteSpace 版本为 6.3.1R3, 用于收集的文献进行格式转换和可视化分析, 分析方法包括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关键词聚类及突现词分析等^[3]。研究的时间范围覆盖了 2000 年至 2024 年, 并将时间切片设置为每年, 通过这种方法, 系统地识别和追踪科学文献和期刊中的模式热点和趋势, 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价值。

1.3 数据处理

在软件设置中, 选择了一年作为时间切片, 同时涵盖了文献的题目、摘要、作者关键词以及数据库补充的关键词作为术语来源。节点类型选择了关键词, 以便于捕捉研究主题。为了精炼共现网络, 启用了“Pruning”功能, 对网络进行优化处理。完成参数配置后, 启动了分析过程, 并选择了“visualize”选项来呈现知识图谱, 从而揭示了该领域内的研究动态和趋势。

2 分析

2.1 文献发表情况

作者简介: 黄 蕾(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幼儿体育;
韩 晨(1988—),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
刘浩宇(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幼儿体育。

通讯作者: 韩 晨

检索获得的“幼儿体质健康”年度发文量如图 2.1 所示，可以看出发文最早为 2000 年，发文数量在这 24 年间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尤其在 2020 - 2022 年期间，发文数量达到了高峰，2022 年发文数量最多，达到 40 篇。

2000-2013 年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发文数量从 2000 的 1 篇，涨到的 2013 年的 6 篇。

2014 - 2016 年，发文数量分别为 5 篇、6 篇和 7 篇，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两个比较大的增长节点，一个是 2020 年发文数量为 18 篇，增幅为 8 篇，一个是 2022 年发文数量为 40 篇达到峰值。随后在 2024 年下降到 10 篇。

通过分析，在 2019 年进行了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统计调查，并在 2020 年公布调查结果，2020 年大量文献对幼儿体质健康相关部分进行了研究。2020 年至今，年发文量呈现下降趋势，幼儿体质健康热度逐渐消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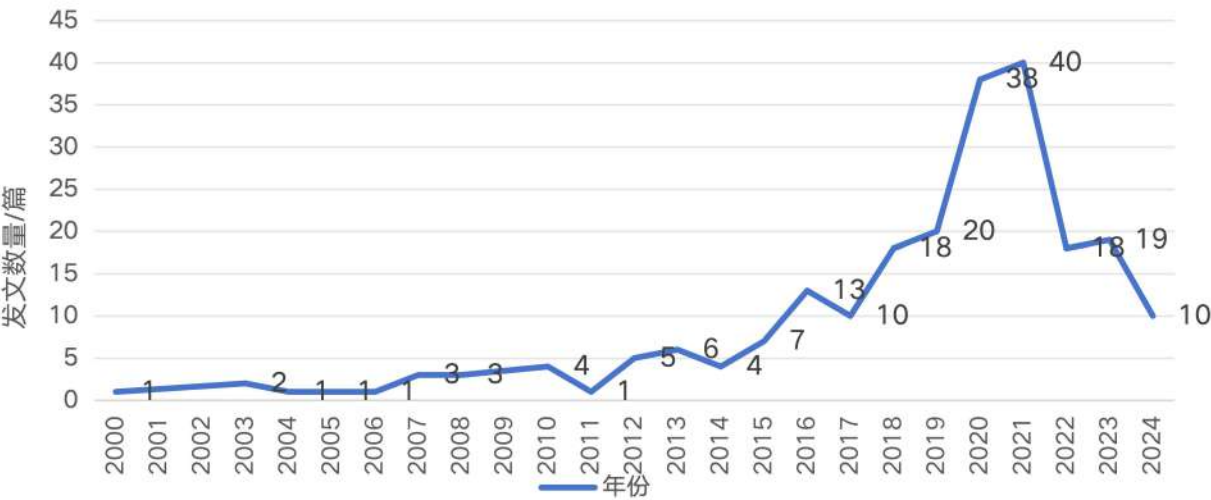


图 2.1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领域发文量

2.2 发文机构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 15 位的机构如表 2.1 所示，在这 24 年间，幼儿体质健康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在各机构之间呈现出一定的集中趋势。

表 2.1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 15 位的机构

排序	发文量	机构	占比
1	11	北京体育大学	4.89%
2	9	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	4.00%
3	6	上海体育学院	2.67%
4	6	成都体育学院	2.67%
5	4	首都体育学院	1.78%
6	4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1.78%
7	4	河南大学	1.78%
8	4	宁夏大学	1.78%
9	3	华中师范大学	1.33%
10	3	福建师范大学	1.33%
11	3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1.33%
12	3	吉首大学	1.33%
13	3	长沙师范学院	1.33%
14	2	新疆师范大学	0.89%
15	2	四川师范大学	0.89%

北京体育大学以 11 篇的发文量位居榜首，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以 9 篇紧随其后。有多个机构的发文量相同，例如上海体育学院和成都体育学院均为 6 篇，首都体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河南大学、宁夏大学均为 4 篇等。从占比来看，北京体育大学占比 4.89%，是占比最高的机构。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占比 4.00%，排名第二。其余机构占比相对较小，多数在 1.33% - 2.67% 之间。机构特点分析其一体育类院校优势明显，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等体育类院校在幼儿体质健康研究中表现突出。其在体育专业领域的深厚学术底蕴和专业人才优势。其二师范类院校积极参与，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等师范类院校也在该领域有较多发文。其三综合类大学研究多元，像河南大学、宁夏大学等综合类大学也在幼儿体质健康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2.3 关键词

2.3.1 关键词共现与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能够精炼地反映一个知识领域内研究议题的核心与焦点，而出现频率高的关键词凸显了当前研究主题的演变和重点所在^[4]。在设定好关键词节点并进行适当的筛选后，得到了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2 展示，其中圆圈的大小表示了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圆圈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由表 2 可知，国内近 24 年幼儿体质健康频次主要有 6 个关键节点，幼儿 (90)、体质健康 (67)、体质 (41)、幼儿体质 (23)、幼儿体育 (16)、动作发展 (6)。



图 2.2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图

表 2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表(前 15)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高频关键词
90	0.69	2000	幼儿
67	0.46	2006	体质健康
41	0.31	2004	体质
23	0.20	2007	幼儿体质
19	0.08	2008	影响因素
16	0.17	2018	幼儿体育
14	0.06	2007	身体素质
10	0.05	2010	身体活动
8	0.01	2013	儿童
8	0.04	2011	健康促进
8	0.05	2008	现状
7	0.02	2008	健康状况
6	0.01	2012	体育游戏

6	0.02	2007	体育活动
6	0.09	2014	动作发展

2.3.2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关键词的共现性，聚类按其包含成员数量的大小降序编号，聚类的规模越大，则编号越小。最大的编号为#0，然后是#1，依此类推。聚类模块值 Q 的取值为 $0-1$ ，通常 $Q>0.3$ 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为衡量整个聚类成员同质性的指标， S 值越接近 1，代表该聚类成员的相似性越高，一般认为 $S>0.5$ 代表聚类合理， $S>0.7$ 则聚类令人信服^[5]。 Q 值和 S 值用来衡量聚类效果，代表网络整体结构特征，本次关键词聚类 Q 值为 0.5667， S 值为 0.82489，聚类理想。如图 2.3 所示，根据研究主题的聚类规模大小排序，关注度排名依次为#0 儿童、#1 体质健康、#2 幼儿、#3 幼儿体质、#4 幼儿体育、#5 体育素养、#6 动作发展、#7 影响因素、#8 身体活动。



图 2.3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2.3.3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专注于沿时间轴展示知识的演进过程。关键词按时间进行排列，通过观察关键词在时间线上的位置 and 变化，可以了解研究焦点的转移和新出现的趋势。依据图 2.4 可以观察到，从 2000 年幼儿是最热研究关键词，2016 年逐渐出现体质健康、幼儿体质、体质等内容，2016 年体质健康状况为热点研究内容，随时间变化转化为学龄前。2018 年，幼儿体育、幼儿体能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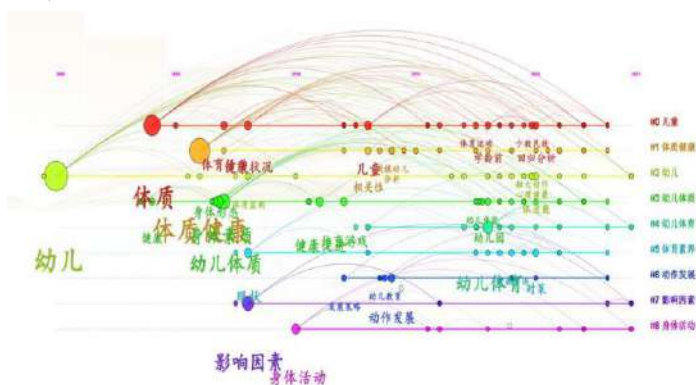


图 2.4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图

2.3.4 关键词突现

关键词突现，可以识别出在某一时间段内突然频繁出现在文献中的关键词。帮助研究者追踪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预测未来研究趋势^[6]。对幼儿体质健康研究方向进行突现检测，可了解在不同时期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分布。如图 5 所示。将 γ 值设为 0.1，选择前 15 名突现关键词。其中强度排名前 3 位的关键词分别

是：对策突现开始于 2020 年，突现强度为 2.01，是所有关键词中突现强度最高的，突现结束于 2021 年；城镇幼儿的突现强度为 1.75，突现开始于 2014 年，结束于 2016 年；现状突现强度为 1.57，突现开始于和结束都在 2021 年。热点持续时间排名前三：体质测试（8 年）；分析（3 年）；体育运动（3 年）。目前幼儿体质健康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是儿童、学龄前和全民健身，持续时间直到现在。

2007 - 2018 年研究重点向体质测试、幼儿相关问题（如城镇幼儿）和分析方法等转移，反映了对健康评估和幼儿发展等领域的重视。

2018 - 2024 年研究方向更加多元化，包括社会支持、对策研究、心理健康、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相关问题以及全民健身等，表明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心理和健康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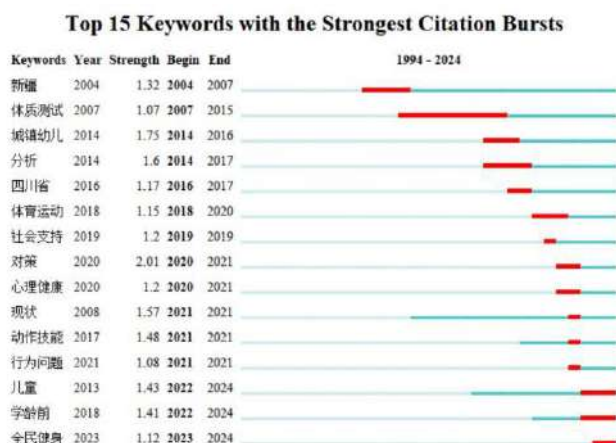


图 2.5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关键词突现分析图

(1) 体质测试

幼儿体质健康的具体评价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身体形态指标，包括身高、体重、胸围、坐高、上臂部、肩胛部、腹部等^[6]。这些指标反映了幼儿的基本生长发育情况。第二身体素质指标，如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10 米折返跑、走平衡木等。这些指标评估了幼儿的力量、速度、灵活性和协调性等身体素质。第三

身体机能指标，包括安静心率等。这些指标反映了幼儿的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第四粗大动作发展，通过粗大动作发展测试（Gross Motor Development Test, TGMD-2）评估幼儿的粗大动作能力。这反映了幼儿在大肌肉群控制和运动技能方面的发展水平^[7]。

(2) 体育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学生体育，把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次颁发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都将体育运动列为必修课程。体育课程不仅增强学生的体质，还培养学生的运动技能和情感价值观，促进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8]。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基础教育也随之发展完善，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创新也是大势所趋。国家和社会所需的是全面型、综合型的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而体育运动是实施其他五育和生活的物质基础^[9]。

(3) 全民健身

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旨在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在“十二五”时期，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十三五”规划中继续得到落实，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并为 203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10]。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2000 - 2024 年关于幼儿体质健康相关文献的系统分析，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发文量、发文机构和关键词进行了深入挖掘，为全面了解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现状提供了有力依据，并得出以下结论。

3.1 文献发表情况

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研究的发文量在 2000 - 2022 年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2022 年到 2024 年大幅下降。早期

(2000 - 2013 年) 增长缓慢, 中期 (2014 - 2016 年) 逐年上升, 在 2020 - 2022 年达到高峰, 2022 年发文量最多为 40 篇, 随后在 2024 年下降到 10 篇。发文量在各机构间有集中趋势, 体育类院校优势显著, 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和成都体育学院发文量居前列。师范类院校如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也积极参与。综合类大学如河南大学、宁夏大学等也有一定占比。体育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大学在幼儿体质健康研究中各有所长, 应加强跨机构合作。将先进的幼儿体育训练方法融入幼儿教育课程体系; 综合类大学可以利用多学科优势, 联合其他院校开展跨学科研究等。

3.2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共现与高频关键词方面“幼儿”“体质健康”“体质”等是高频关键词。关键词聚类方面, 聚类分析显示研究主题多样且聚类效果理想, 涵盖儿童、体质健康、幼儿、幼儿体质、幼儿体育等多个方面。关键词时间线图部分, 从时间线来看, 研究焦点随时间变化, 从早期的幼儿逐渐扩展到体质健康、幼儿体育、学龄前等多个方向, 体现了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的过程。关键词突现方面, 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突现关键词, 如 2020 - 2021 年“对策”突现强度最高, 2014 - 2016 年“城镇幼儿”突现明显等。当前儿童、学龄前和全民健身是热点研究领域且持续至今, 研究人员应继续关注领域动态并持续进行研究。

3.3 小结

本研究分析了国内幼儿体质健康的研究现状, 为今后幼儿体质健康相关研究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1] 刘俊蓉. 山西省 3-6 岁幼儿体质现状的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 2006.
- [2] 侯剑华, 胡志刚. CiteSpace 软件应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现代情报, 2013.
- [3]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2): 242-253.
- [4] 李杰, 陈超美.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 (第三版)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2.
- [5] 王利红. 幼儿体质与健康促进家园共建研究[D].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2011.
- [6] 朱琳, 冯宁, 李志强等. 广州 3 ~ 6 岁幼儿 2106 名体质特点的调查[J]. 中国临床康复, 2006.
- [7] 吴升扣, 姜桂萍, 张首文等. 3 ~ 6 岁幼儿粗大动作发展特征与体质健康水平的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4.
- [8]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
- [9] 李兵. 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J]. 新课程(教研), 2011.
- [10] 胡鞍钢, 方旭东.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内涵与发展思路[J]. 体育科学, 2016.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Based on CiteSpace

Huang Lei¹, Han Chen¹, Liu Haoyu¹

¹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and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is field, this study used CiteSpace 6.3.1 R3, 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ol,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225 relevant literatures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4. The analysis covered dimensions such as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and reveal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by constructing knowledge graph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on domestic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research grew slowly from 2000 to 2013,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the middle period (2014-2016), reached a peak from 2020 to 2022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40 papers in 2022), and then decreased to 10 papers in 2024; among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spor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d obvious advantages, followed by normal universities (the second largest category) and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the third largest category); the research themes mainly focused on physical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in depth,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related to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Keywords: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Visualization; Bibliometrics

以情动人：微短剧中的情感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关照

——以《家里家外》为例

陈 矿¹ 姜文瑾¹

(1.成都大学 影视与动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 在微短剧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套路化、浅层化等问题依然存在, 内容精品化转型已成趋势。《家里家外》以真实生活为基底, 通过“去戏剧化”的情感表达与小家庭叙事, 体现出数字流量下的时代质感; 同时借助川渝方言、地域符号, 营造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质感, 展现温暖现实主义的审美特质。其创作路径表明, 只有坚持精品化路线, 充分激活地域文化资源, 微短剧才能在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实现良性平衡。

关键词: 微短剧; 情感叙事; 温暖现实主义

基金项目: 南充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新媒体时代影视剧碎片化传播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塑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NCQSN25C035); 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基地民族民间艺术与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数字技术赋能川剧跨界融合与跨文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MZMJYB2503); 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体育电影身体美学与美育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NCTY24B01); 涪江流域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日常生活饮食影像中华传统美学与隐性美育研究”(FJSY2024ZC01)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77

近年来, 微短剧作为短视频平台催生的内容形态, 正经历从“流量驱动”向“内容为核”的转型。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 截至2024年12月, 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达6.62亿人, 使用率高达59.7%, 显示出强劲的市场活力。然而, 尽管微短剧热度持续攀升, 其创作与传播过程中仍面临不少现实困境。一方面, 从叙事层面看, 大量作品依赖“重生”“复仇”“系统外挂”等套路, 情节设置趋于极端, 人物关系类型化严重, 反映出个体主体性迷失、情感畸变等社会性问题^[1]; 另一方面, 从整体质量来看, 微短剧作品数量虽多, 但整体艺术水准偏低, 内容同质、制作粗糙, 深层文化表达与审美价值尚待提升^[2]。

一、情感真实的实现路径

在流量驱动的行业逻辑下, 当前不少微短剧为了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注意力, 过度依赖“爽感”叙事与情绪反转, 形成了快节奏、高刺激的情感表达模式。这种创作方式虽然具备即时的情感宣泄功能, 却因情节设定过于悬浮、人物塑造趋于工具化而导致现实逻辑的溃退, 叙事合理性与艺术价值双双受损^[3]。作品在不断复制“逆袭”“复仇”等模式化套路的同时, 也加速了观众的审美疲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家里家外》在创作上回避了强情绪的戏剧化渲染, 而是以贴近生活肌理的细节叙事和内心流动的情感铺陈为核心, 实现了由“去戏剧化”的情感表达达到“情感—情怀”递进的双重探索。这种创作路径不仅让情感表达回归真实、克制与深刻, 也为微短剧在情感叙事上的品质化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

作者简介: 陈 矿 (1980—),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学

姜文瑾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影视传播

（一）情感表达的“去戏剧化”转向：回归生活逻辑的真实感

在当前微短剧的创作生态中，“加速叙事”与“即时满足”成为常态——情节的推进高度依赖紧凑的剧情设计与高效的情感传递，通过瞬时情感体验契合观众的快节奏消费心理^[4]。然而，这种创作逻辑往往服务于短时间内的感官刺激，导致故事情感逻辑与生活经验的脱节，使作品更像是情绪宣泄的快消品而缺乏长久的情感共鸣。

当前微短剧创作普遍依赖高强度的戏剧冲突（如复仇、逆袭）制造“爽感”，通过密集的情绪反转刺激观众，而《家里家外》一反多数微短剧依赖情绪浓缩与冲突爆发的叙事策略，其情感表达的核心特征在于弱化外部冲突的强度，聚焦日常情境中的内在情感流变。这种转向并非消解矛盾，而是将人物关系的变化置于生活逻辑的真实轨道中，通过细腻的行为细节与克制的情绪处理实现情感传递。

例如剧中经典的“毛衣修补事件”便是情感真实表达的典型代表。蔡晓艳发现继女陈爽心爱的绿色毛衣已经变小，并且有了一个很大的破洞，便用粉色毛线续织修补。这一举动最初引发陈爽的抵触（因毛衣是生母遗物），但蔡晓艳并未强行覆盖原有记忆，而是在绿色毛衣的基础上，修补破损处，并用粉色的新线在下摆续织毛衣。告诉她“我只是替你妈妈继续爱你”，陈爽在邻居问起时回答“毛衣是妈妈打的”，暗示了情感的接纳。继女对继母从误会到接纳的桥段，既没有激烈语言对抗也没有夸张行为，而是在家庭场景中，通过“新旧毛线的交融”传递情感转向，使情感发展符合生活经验逻辑。

这种“去戏剧化”的表达并不削弱叙事的感染力，反而强化了作品的现实质感。正是通过这种贴近真实生活的情感生成方式，《家里家外》在微短剧的快节奏语境中，提供了一种更为克制、细腻而深刻的叙事可能，使观众在熟悉的日常中感知情感的真实与温度。

（二）从情感到情怀：以小家庭映射大时代的生活图景

2024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冯胜勇提出，微短剧的表达路径应实现从“表达情绪”向“表达情感”再到“表达情怀”的迭代升级。这一观点为现实题材短剧创作提供了方向，也为《家里家外》实现叙事内核从情感真实向时代情怀的延展奠定了政策与审美的双重支撑。

《家里家外》剧集对时代情境的呈现十分鲜明。创作团队将故事背景与1981年那场特大洪水相连，既还原了历史记忆，也为剧中家庭关系的重组提供了现实隐喻：国家在灾后重建中重拾希望，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也在相互理解中缓慢构筑起新的秩序。导演杨科南曾直言，“大环境的重建对应小家庭的重组”，这一创作立意使情感表达与时代主题深度融合。

更广阔的时代画卷还通过多条生活线索展开。1978年，陈海清结束知青岁月返城，遇到了卖蛋烘糕的蔡晓艳；1982年南下广州的经历，让他见证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1983年冷冻机厂效益低下，蔡晓艳下岗。同年邵一帆被误诊为眼癌，急需十万元手术费的危机，让陈海清毅然辞去冷冻机总厂厂长职务，下海谋生；在经商过程中遭遇八万元投资被骗。这些叙事片段不仅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中交织的机遇与阵痛，也折射出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与抉择。

正因宏观的历史变迁与微观的家庭故事彼此呼应，《家里家外》得以突破传统家庭剧的叙事边界，呈现出带有平民视角的时代影像史诗。它的“情怀”不是抽象口号，而是通过历史温度、生活记忆共同生成的时代感——一种能被看见、能被感知、也能被铭记的集体情感记忆。

二、温暖现实主义的影像表达与情感关照

温暖现实主义“面向现实的困顿和艰难，甚至不回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堪。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办法是温暖的，阳光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和建设性的”^[5]。这种创作理念要求作品在如实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同时，提供一种能够修复、抚慰与激励人心的情感出口。《家里家外》作为典型的温暖现实主义微短剧，并未停留在对现实疾苦的揭露层面，而是在面对家庭困境与社会矛盾时，以积极温暖的方式给出回应。正是在“真实反映问题—温暖化解矛盾”的路径中，《家里家外》实现了对温暖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具体化呈现，为微短剧提供了一种兼具现实深度与人情温度的叙事范式。

（一）现实关照：直面现实困境的温暖姿态

“一部作品要想成为‘温暖现实主义’的，必须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意味着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实地呈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状况”^[6]。《家里家外》在创作中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底，通过面对家庭困境与社会问题的细腻刻画，呈现出温暖、积极的应对姿态。

剧中，邵一帆被误诊为眼癌，需要十万元高昂的手术费，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足以击垮一个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然而，作为继父的陈海清表示“砸锅卖铁也要治病”，甚至辞去冷冻机厂厂长的职位，下海经商，邻居

刘婶虽自身生活拮据,听说孩子生病后,仍送上一篮鸡蛋,表达最朴素最直接的关怀;陈海清在经商过程中被骗八万元后,家人并未因此互相指责、彼此埋怨,而是选择团结一致、共渡难关。这种处理方式既还原了社会转型中人们在骗局冲击与就医负担下的脆弱处境,也以互助、包容的情感姿态,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温暖化解困境的路径。

此外,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剧集同样展现了温暖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蔡晓艳在小姑子陈雪梅遭遇丈夫出轨和家庭暴力后,不仅收留她暂住,还帮她寻找新的住处,并在单位广播中公开揭露其丈夫的恶行,以此捍卫亲人的尊严与安全。这一情节直面婚姻危机与家庭暴力等社会议题,但并未以冲突撕裂为结局,而是通过家人之间的守望相助与主动作为,展现出积极进取的情感温度。

《家里家外》在情节设置中始终坚持“真实反映问题—积极化解矛盾”的创作路径,使其在现实主义的深度和温暖叙事的厚度之间找到平衡,体现了温暖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既直面现实、又不失人情温度的美学精神。

(二) 视觉与听觉的在地化符号系统:竖屏语境下的地域构建

温暖现实主义在创作中不仅依赖故事情节的推进,更需要通过细节化、在地化的文化元素来承载情感与价值观。视觉与听觉作为两大感官入口,共同构成了影像的符号系统,在《家里家外》中,二者相辅相成,既还原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图景,又在观众心中唤起了跨越时间的文化情感共鸣。这种从空间物象到方言声场的多维表达,不仅塑造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质感,还在竖屏影像的叙事语境中获得了更强的沉浸性与在场感。

竖屏影像天然具备营造“在场感”的优势,它通过凸显人物、隔离背景,让观众产生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沉浸体验。在竖屏微短剧中,这种体验不仅来自画面构图的视觉聚焦,更源于拍摄者与叙述者的合一——观众感知到的,不是冷静的旁观,而是仿佛置身其中的参与。当镜头锁定在生活细节与空间符号时,竖屏所形成的“第一人称”式在场感,能够放大情绪共振,让观众在视觉凝视中感受故事温度。^[7]这种“沉浸”,并非依靠猎奇刺激或情绪爆点来获得,而是将观众带入到那个具体的生活场景,让他们与角色共享相同的呼吸节奏、情感流动和日常肌理。

在视觉层面,《家里家外》借助这种竖屏的“近距离”凝视,将大量具有地域性与时代感的空间物象纳入叙事之中——海鸥牌手表、青羊牌电视机、天府可乐、蛋烘糕摊——不仅是生活道具,更是那个年代的文化标记。这些物象作为影像符号,会在观众心中形成一种文化语境,当这些符号被聚合时,就能整体性地渲染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生活温度。它们并非简单的怀旧装饰,而是嵌入在角色日常行为中的使用物:海鸥牌手表作为嫁妆,被陈海清戴在了蔡晓艳手腕上;青羊牌电视机闪烁着中国女排夺冠的画面,成为街坊邻里共同的精神记忆;蔡晓艳家在购入电视机后,邻居们纷纷聚拢到她家客厅,一同守在屏幕前见证中国女排的胜利,欢呼与泪水在狭小的空间里交织,映照出那个年代人们的集体激情与民族自豪;街头的蛋烘糕香气混合着油炸声和人声,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味觉与听觉想象。这些物象的存在,使得观众可以将个人记忆与影像记忆叠合起来——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而言,这是一次直接的记忆召回;对未经历年轻观众而言,则是一次陌生而具体的文化进入,借助物象建立起历史的可感知通道。

在听觉层面,方言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方言能够带宁观众进入特定地域文化的叙事场域^[8],《家里家外》全程使用川渝方言,台词的节奏、声调、用词中自带生活气息,使人物关系的温度在对白中自然流淌。在剧中,这种时间召回让观众仿佛回到了那片街坊院落,听见了真实的生活声音。蔡晓艳责备孩子的“你个瓜娃子”,虽带训斥,却夹杂着亲昵的意味;邻里间一句“莫扯”足以终止争执,还保留了情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家里家外》在声音设计上精细地将方言对白与环境音相融合。街坊院里传来的锅碗碰撞声、邻里闲谈的背景声、菜市场的吆喝与讨价还价,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声场。这种声场不仅增强了沉浸感,还让观众感到故事发生在真实可触的空间中。方言与场景环境音的结合,可以让现实感和情绪张力更加深刻而具感染力^[9]。这种声音美学让观众在听觉上完成了从外部旁观到内部参与的心理转化,从而在情感上更容易与角色命运产生共振。

视觉与听觉的在地化符号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影像中互为补充:空间物象为观众提供可视化的历史坐标,方言与环境音则赋予这些空间以生活温度。当二者在竖屏语境中结合时,便形成了一个能够触发集体怀旧与文化认同的情感空间。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具体的物品与语言,而是一个个带着温度、味道、声响的生活切片——它们共同指向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支撑。

三、《家里家外》带来的微短剧创作启示

微短剧的兴起,不仅整合了长视频的叙事深度与短视频的传播效率,还形成了数字视听文化发展的新增长点。作为兼具叙事沉浸性和日常审美体验的文娱形态,它能够在有限时长内快速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为受众提供丰

富、多元且具有现实关照的文化消费选择。与此同时，微短剧的发展也受到政策导向、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使其在社会文化塑造中展现出日益重要的影响力。^[10]

在这一背景下，《家里家外》不仅展示了微短剧在内容创作上的可能性，也为行业提供了实践样本：一方面，它通过精细的人物刻画与价值导向明确的剧情实践了精品化创作路线；另一方面，它深度激活了地域文化资源，使文化、空间与观众的情感认同实现了有效联动。

（一）坚持精品化创作路线：从流量至上到内容优先

当前，微短剧在快速发展中呈现出“量大而质低”的乱象。一方面，资本裹挟下的创作趋向于猎奇化与同质化，沉迷于“霸总”“重生”“穿越”等套路化情节，以低成本、快产出的方式追逐流量红利；另一方面，部分作品在价值导向上偏离现实，过度制造矛盾冲突与低俗桥段，导致社会口碑与审美水准双双受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多次开展专项治理，2024年共下架违规微短剧2.5万余部，并且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连续出台政策，从遏制“恶婆婆”等脸谱化人物形象，到治理“霸总”题材泛滥、清理AI“魔改”、规范片名导向，再到提出微短剧要“爽而有度”，都在引导行业回归现实主义与精品化创作的正轨。

在此背景下，《家里家外》以真实细腻的人物塑造、富有温度的情感表达和深度嵌入的地域文化，走出了一条以内容质量和价值导向为核心的精品化创作路径，不依赖单一“爽点”博取关注，而是通过情节与情感的双重递进赢得观众口碑，这不仅为行业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创作样本，也印证了微短剧完全有能力在有限时长内实现艺术品质与市场认可的平衡。

《家里家外》的成功正是对2025年3月1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的《管理提示(微短剧要“爽”而有度)》“微短剧创作要‘接地气’，不能悬浮，要回归生活、回归艺术本身；人物设定应当关注人民群众需求、体现现实关怀的同时，坚持基本常识，坚守主流价值，传播主流文化，带给受众美好与希望；言情设定倡导正确的婚恋观，不回避人的局限性，不脱离生活的多维度，展开立体刻画，并赋予文明和温暖的价值底色。”等政策内容的生动回应，也为未来微短剧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参照。

（二）地域文化资源的有效激活：空间、文化与文旅的联动

《家里家外》的另一大启示在于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有效激活。与一些作品流于“打卡式展示”不同，该剧并未将文旅元素符号化、消费化，而是把它们深深嵌入生活叙事之中。例如剧组没有选择宽窄巷子、锦里、武侯祠等耳熟能详的地标，而是走进双流区军工厂家属院、彭祖山景区、青龙老街、青龙老电影院等年代感极强的空间。通过这些极具生活温度的场所，观众得以触摸到成都的另一面——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有普通人烟火日常的质感。这种空间符号与叙事情境的融合，使影像中的“物”转化为“情”，最终沉淀为集体怀旧与文化归属。

段义孚通过“恋地情结”理论系统阐释了人与环境的情感互动机制，强调感知体验与价值取向在构建空间认同中的核心作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进一步将地方界定为文化情感的具象化载体，地形地貌的物理差异与空间实践的符号共同塑造出了承载着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文化地理元素。人地互构关系揭示出地方既为人类提供物质栖居空间，也是主体认知世界、建构自我的精神场域。^[11]在《家里家外》中，地域空间不仅作为叙事背景存在，更成为情感触发器，强化了观众与特定地域的情感联结。进一步来看，地理批评(Geocriticism)理论强调，空间并非静态的舞台，而是叙事与文化的生成场。剧中的厂区大院、老街影院，因影像赋予的情境与人物命运而被重新激活，成为观众与成都、乃至整个川渝文化的共情场域。这意味着微短剧若要真正释放文化价值，必须让地域元素进入叙事的“血液”，而不是停留在表层陈设。

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像激活，也为文旅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文旅融合创新论坛”指出，“科技+视听+文旅”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文旅产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网络视听内容凭借矩阵传播、话题传播与技术传播优势，可以让文旅变得可感、可触，推动资源盘活与消费释放。《家里家外》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案例：上线三天全网播放量超10亿，热度破7000万，不仅引发观众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的怀旧热潮，也带动了对当地历史空间、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的关注，从而释放出文化和旅游的综合消费潜力。

更重要的是，这类“文旅微短剧”强调的并非单一的“旅游”，而是让观众透过剧情感受到一个地域的文化内涵。它不是宣传片，而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人物真实、情感饱满、剧情动人。正因如此，观众才会愿意跟随角色的情感轨迹去“重访”那些空间，并在无形中完成文旅与文化的双向认同。未来微短剧创作若能在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入上下功夫，就能实现艺术品质、文化认同与产业价值的“三赢”，真正走出从流量到精品、从消费到共鸣的转型之路。

结语

在当前微短剧快速发展、类型繁多但质量参差的背景下,《家里家外》以真实的情感表达与温暖现实主义关照,突破了模式化、浅表化的创作桎梏,成功营造出兼具生活质感与情感温度的影像世界。《家里家外》的成功不仅说明精品微短剧能够在快节奏和强情节中融入现实主义深度,还展现了其在艺术价值与社会关怀之间取得平衡的可能性。其在家庭叙事创新、地域文化再现以及文旅联动等方面的探索,为微短剧的精品化转型和产业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样本与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 [1]梁亦昆. 时代症候的影像呈现——对白日梦式的微短剧的文化批评[J]. 当代电视, 2025(01): 55 – 60.
- [2]胡智锋, 李斐然. 网络微短剧的发展现状及思考[J]. 传媒, 2024(16): 15 – 18.
- [3]滕佳丽, 张奕玮. 微短剧叙事异化及其优化路径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5(05): 84-87+133.
- [4]陶喜红, 李佳林. 竞速文化的情感体验: 网络微短剧的情感文化建构[J]. 新闻爱好者, 2025(07): 61-66.
- [5]胡智锋, 尹力, 滕华涛, 等. 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温暖现实主义[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2, (06): 4-23.
- [6]郑丕博. 新时代影视创作中的温暖现实主义——以三部热播电视剧为例[J]. 文艺评论, 2024, (01): 109-118.
- [7]张骋. 从“横屏”到“竖屏”: 论影像符号表意机制的变革[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01): 111-117.
- [8]线晨.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方言使用的文化张力[J]. 电影文学, 2025, (11): 148-152.
- [9]罗莉, 张涵涛. 方言影视作品的地域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J]. 电影评介, 2024(03): 92-96.
- [10]何天平. 微短剧治理: 矛盾调和、生态调适与“新常规”重建[J]. 编辑之友, 2025, (05): 29-38.
- [11]刘梦笛. 媒介地理学视域下乡村文旅微短剧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视听, 2025, (11): 3-6.

Touching Hearts with Emotions: Emotional Narratives and Warm Realism in Micro-short dramas

——Take "Inside and Outside Home" as an example

Chen Kuang¹, Jiang Wenjin¹

(1. School of Film, Television and Anim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Sichuan, China)

Abstract: While the micro-short drama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problems such as formulaic and superficial content still exis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high-quality content has become a trend. "Inside and Outside Home" is based on real life and, through "de-dramatiza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mall family narratives, reflects the contemporary texture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ffic. At the same time, by drawing on the dialects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regional symbols, a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al texture is created, showcasing the aesthetic traits of warm realism. Its creative path indicates that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high-quality route and fully activating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can micro-short dramas achieve a virtuous balance between artistic value and market value.

Keywords: microshort drama; emotional narrative; warm realism

湿热地区独立式住宅绿色建筑被动式设计策略

周澧骊 陈翠婉 李妙玲

(1.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801)

摘要: 高温高湿环境下独立式住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能耗激增与人居环境的不适感。设计过程应立足当地气候与居住行为, 制定合理的绿色建筑设计策略来实现节电、提高舒适度及实现邻里和谐的多重目标。围绕建筑朝向、建筑遮阳、建筑通风三大被动式设计策略, 从形体设计、微气候调节到行为适配展开讨论。改变传统单一标准为集成目标, 耦合多项被动式设计技术。将节能减排、提升热舒适、减少阴影纠纷、调节微气候等内容作为研究重点。独立式住宅的绿色建筑被动式设计策略将塑造可复制的节能低碳技术系统, 为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独立式住宅; 绿色建筑; 遮阳; 通风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编号: 25GYB146); 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2025年度科研课题项目(项目编号: GDHRS-25-01-04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490

1 前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城市化进程同步高速推进, “高温-高湿”复合胁迫已成为制约湿热地区人居环境品质与建筑能效提升的关键瓶颈。居住建筑夏季空调负荷的40%~60%源于太阳辐射得热, 而在夏热冬暖与夏热冬冷气候区, 独立式住宅因形体系数大、围护结构散热路径单一, 其能耗密度已逼近同类公共建筑。在此背景下, “绿色建筑”与“被动式设计”成为降低建筑运行碳排、提高居住舒适度的关键路径。代表性气候适应性被动式设计策略可分为三类: 建筑形体朝向布局、建筑遮阳设计、建筑自然通风设计。

2 湿热地区与被动式绿色建筑

典型的湿热地区城市包括我国海口、广州、桂林等, 以及新加坡、迈阿密等国外城市。这些地区的气候特征是夏热冬暖、高太阳辐射、静风场。就实地测量数据看, 该地区年降水量在1200mm以上, 年平均温度均高于20℃。而“绿色建筑”在本研究中采用国标《GB/T50378-2019》的定义, 即在建筑全寿命期内以绿色环保建材、绿色节能、绿色生态环境为导向, 以构建健康、舒适、高效的使用空间为目标的新型建筑。至于“被动式设计”则是绿色建筑理念践行中能以建筑设计为导向的应用策略。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建筑本体设计, 如建筑形态与朝向、围护结构与材料、自然通风、遮阳构造、景观绿植等, 来实现热舒适与节能的设计策略。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不依赖或最小化机械系统, 以实现低能耗的目的。

早期湿热地区的建筑实践缺乏应对气候问题的整体观策略, 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的热工与能耗表现。孤立地考虑遮阳、通风、垂直绿化、高反射屋面等技术手段, 因而无法将多项被动技术纳入多目标优化框架。而近年来, 随着“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日臻完善, 被动式设计被纳入多元维度的集合设计策略。在过程维度强调被动式设计在生命周期内的运维调适与材料碳排^[1]; 在性能维度上关注能耗削减热与湿环境改善; 在人文维度则聚焦居住者视觉体验、热舒适感知与行为的交互。可认为, 在湿热地区独立式住宅语境下, 绿色建筑被动式设计策略将气候条件、建筑设计、人居环境相协同, 借助被动式系统与居住者的自适应行为的结合来实现建筑低能耗、热舒适

作者简介: 周澧骊(1992—),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公共建筑设计。

陈翠婉(1991—),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绿色建筑设计。

李妙玲(1986—), 女, 讲师, 研究方向为景观建筑设计。

通讯作者: 李妙玲

度最大化、高湿高热风险最小化的目标。

3 绿色建筑被动式设计策略

3.1 绿色建筑朝向与布局设计

朝向是直接决定太阳辐射输入与风向夹角的核心变量,早期项目以纯南北向为建筑布局最优解,但是湿热地区风速高、湿度大,单纯南向可能削弱穿堂风。因而后续实践中尝试将建筑长轴与夏季主导风向成锐角布置,可有效改善室内通风效果。此外,在群体布局中通过前后排形体错位还能打破风影区,后排建筑正面风速接近前排建筑的八成。如果突破单一矩形形体设计,引入L形、U形等半围合形体,能形成较好的风廊空间,有利于局部微气候的改善。室外半围合空间设置景观庭院,通过树荫或者建筑遮挡可以进一步调控辐射,让更多的空间面积处于阴影下,室外庭院日均温度有3℃以上的降低。突破传统单一的“布局最优”或“朝向最优”的标准后,朝向与布局的耦合设计,呈现了非线性、多维提升的显著成效。但是在场地情况复杂的独立式住宅中,由于建筑面积或用地的限制,很难实现高度自由、灵活的建筑布局设计与朝向选择。因此,相较于遮阳或通风设计,朝向与形体布局并非多数独立式住宅的设计策略重点。

3.2 绿色建筑遮阳设计

建筑遮阳早期侧重探讨固定式外遮阳的几何参数对建筑冷负荷的影响。例如,水平构件出挑深度、遮阳百叶倾角、相邻百叶间距等。这是一种“遮阳系数-太阳辐射得热”线性模型的分析框架。一般认为,遮阳构件投影系数越高则制冷能耗越低^[2];可有研究发现,当遮阳构件深度超过某临界值后,其对采光的不利影响将高于自然通风带来的节能收益。因此此后的建筑实践中开始在阴影遮蔽、通风效果提升、舒适的采光环境中谋求遮阳构件几何设计的优化平衡。近年来,建筑遮阳设计开始聚焦于:传统型遮阳构件的新发展、表皮设计与遮阳的结合、立体绿植景观的遮阳效用等。基于传统固定式外遮阳体系,设置可根据太阳高度角自动调节的电动百叶,还能将节能效率进一步提高10%以上。被动式遮阳设计因此成为绿色建筑系统中,一种兼具能耗控制与热舒适度的常见技术手段。

3.3 绿色建筑通风设计

在密度城市中,独立式住宅很难通过与周边环境的水平向布局设计来调控通风效果。因此在建筑形体内部进行设计,能获得更稳定的通风效益提升。常见的设计策略有:遮阳表皮形成双层立面改善通风、结合“烟囱效应”或对流的建筑剖面形态设计、作为气候调节器的庭院空间。其中双层立面系统是被动通风的新方法,其本质是利用内外两层表皮间400mm到1500mm宽度的空腔,形成耦合了热压与风压的气流驱动腔体。而通过剖面设计形成的“烟囱效应”是利用热压差驱动空气流动,在昼夜温差较大的地区能有显著效果。可对于湿热地区其昼夜温差多低于5℃,通过竖井形成的拔风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在我国华南沿海地区则多利用夏季主导风形成的风压,通过内部的对流改善通风,如遇到台风天气则可关闭门窗,或通过可调节百叶避免过度通风。当遇到夜间风速较低的情况则可以通过手动开窗,让内外热压主导通风。最后,可结合庭院引导通风来改善微气候,通过合理设计其高宽比,结合植被蒸腾作用以及水体蒸发可以形成很好的通风效果,并营造宜人舒适的室外环境。

4 独立式住宅绿色建筑遮阳设计实践

4.1 传统型构件遮阳

构件式遮阳(fixed-element shading)指以水平、垂直、综合式及挡板四类基本几何原型为骨架,通过钢筋混凝土、铝合金、穿孔铝板、陶土百叶等材料与构造,直接成为建筑立面或屋面组成部分的遮阳装置^[3]。与活动百叶或内遮阳产品不同,构件式遮阳一旦建成即与主体结构同寿命,因而对独立式住宅的全年能耗、立面美学及邻里关系具有长期锁定效应。近年来,有不少湿热地区的独立式住宅项目,尝试将遮阳构件与建筑空间或立面造型进行新的结合。位于印度的VAAZH住宅(表1-A)将建筑屋顶与水平式遮阳结合,塑造了独特的弧线型多层脱离的水平遮阳构造。弧形遮阳构件下覆盖的是半室外走廊与景观庭院,曲面下沉屋顶朝向西侧,能有效遮挡烈日的直射。综合来看构件式遮阳的新趋势是:形式由单一转向复合,材料由重质转向轻质,构造由固定转向可调节,设计由经验式转向参数计算。

表1 绿色建筑遮阳设计策略

A 构件遮阳	B 表皮遮阳	C 绿植遮阳
		
VAAZH 住宅, 印度	瓦巢住宅, 越南	Erasto 住宅, 墨西哥

4.2 新型表皮式遮阳

表皮式遮阳 (shading-skin system) 指将遮阳功能与建筑外围护结构一体化设计, 通过穿孔板、双层通风腔体或可调百叶等构造, 在遮挡太阳辐射的同时, 借助“文丘里效应”与“烟囱效应”主动诱导气流, 降低独立式住宅制冷负荷。与构件式遮阳相比, 表皮式遮阳具有双层界面、空腔通风、微气候调节三大特征, 尤其适用于湿热地区高湿、弱风、强辐射的极端情况^[4]。

位于越南河南省的瓦巢住宅 (表 1-B) 设计了双层立面, 内部是大面积玻璃幕墙, 保证了良好的采光, 而外部是如波浪形的层叠镂空表皮。垂直的内墙与成倾斜角度的瓦片外墙间设置有多处绿化阳台, 外壳与内墙间形成了空隙, 有利于微气候的调节。仿佛悬空飞舞的瓷砖其标准尺寸是 340mmx200mmx12mm, 它们水平布置左右错位, 较小的尺寸不会阻挡空气的流动, 但密集的排布又兼具良好的遮阳效果。综合来看表皮式遮阳在湿热地区呈现以下趋势: 传统单层穿孔的优化, 空腔厚度精确计算, 孔隙率的数值平衡, 与其他因素的智能联动。

4.3 新型绿植式遮阳

立体绿植式遮阳 (3D green shading) 指将种植乔木、灌木、藤蔓或模块化绿墙系统与建筑屋顶、阳台、立面或架空层等三维空间与结构构件想结合, 形成“植被-间层-围护”复合遮阳体系。按照空间维度可分为: 屋顶梯田式绿化、立面垂直绿墙、阳台或露台花槽绿化、空中庭院立体园林四类。其遮阳机理兼具植被遮光、蒸腾降温、空腔通风三重效应, 尤其适用于湿热地区太阳辐射强、通风需求大的独立式住宅。

位于墨西哥的 Erasto 住宅 (表 1-C) 是一栋藏匿于热带绿植景观中的地域性建筑。其首层与顶层有大面积的底层花园与屋顶花园, 而中间楼层还设置了极宽的出挑阳台, 阳台三侧布置有 U 字形的绿化花坛。基本上每一层都设置有 360° 的玻璃幕墙, 使得几乎所有室内空间都能直接接触绿色景观。而茂密的阳台绿植与出挑深远的平台又能极好地避免太阳的直射。综合来看, 绿植式遮阳在湿热地区中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单一绿化走向技术集成化, 结构构件轻量化, 运维智能化。

5 独立式住宅绿色建筑通风设计实践

5.1 遮阳表皮与自然通风的结合

湿热地区建筑外墙难以同时兼顾采光、通风与遮阳, 因此“双层墙”成为一种具有“呼吸特征”的新型被动式构造, 开始广泛应用。建筑表皮在设计时为了统一且连续的形式美感, 多与建筑主体外维护结构脱离。这样表皮外壳与内层外墙间自然产生了风压空腔, 可以通过表皮的形式与开孔率等要素来调控空腔内的气流。常见的表皮通风原理包括: 利用穿孔遮阳板表皮强化室内对流, 更易形成穿堂风; 其次是利用空腔间隙从下而上形成拔风的烟囱效应。尤其在环境条件复杂的城市用地中, 外表皮可以确保较好的隐私性, 并形成特点鲜明的外观形象。在住宅改造中, 同样可以在建筑原有立面外侧通过附加的轻质、通透的表皮改善通风效果。原有建筑外挂新型表皮立面可在离地 1.2m 左右的高度设置进风口, 如果建筑顶层设置有阁楼空间或者通风隔热间层, 还可以形成由立面延续至屋顶面的“连续烟囱通道”。

位于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的林中小屋（表 2-A），建在典型的湿热气候环境中，其立面全部用水平条状木百叶包裹。木条百叶具有良好的遮阳效果，同时由于间隙的控制，并未影响内部采光。外部表皮并非紧贴内部空间，部分区域如休闲区、餐厅直接以类似架空层的形式出现。公共区一侧的百叶外墙还可以向上收拢，完全打破内外空间的界面，也就形成了一处巨大的通风腔体。从此项目中可见表皮式遮阳与自然通风的良好结合，并且由于活动式百叶窗的存在获得了空间形式的更多可能性。

表 2 绿色建筑通风设计策略

A 表皮与通风	B 剖面与通风	C 庭院与通风
		
哥斯达黎加小屋	陶瓷住宅，越南	叠园宅，广州

5.2 建筑剖面与自然通风设计

与双层墙中利用空腔形成烟囱效应类似，在建筑内部设置天井或垂直向错开的开敞式空中花园将建立起三维立体的气流引导体系^[5]。这需要设计者突破传统二维的布局思维。在底层空间与建筑迎风面合理组织形体开口，将气流引入建筑深处，并形成垂直向的气压梯度差，住宅内部中间楼层灵活错动布置敞开式花园或可开启外窗，而顶部楼层通过整体式遮阳架或通风隔热间层等构造，进一步引导气流形成复合型的自然风立体通道。一般情况下低处进风口应设置在常年主导风上风向，其高度应离地 1m 左右，以引导气流经过居者活动区；而高处出风口可结合主导风下风位布置，出风口离地 2.5m 以上，以获得更好的拔风效果^[6]。其中，中庭、天井、通高空间等要素是实现良好通风效果的关键，这类空间能将水平分布的气流进出口联系起来。根据模拟计算，此类垂直竖井空间的通高高度若能达到建筑总高一半，将获得更佳的烟囱效应通风。

位于越南小镇的陶瓷住宅（表 2-B），由著名建筑师武重义设计。该项目是商住一体的项目，房屋还兼具陶瓷产品售卖的功能，其外观使用独具当地特色的粗糙陶瓷砖作为表皮材料，兼具了遮阳与通风的效果。此外，其内部空间地上有 5 层，在 2-4 层临街一侧设置了通高的空中花园，3-4 层设置了通高的内部起居空间，整座建筑还灵活插入了多处块状花园，顶层有种植绿化隔热层。可见本项目在用地局促的情况下，灵活地将表皮遮阳与剖面的竖井通风系统相结合，不仅获得更佳的通风效果，亦在嘈杂环境中塑造了优美的绿景空间。

5.3 景观庭院与自然通风设计

庭院空间在多地区、多民族的传统建筑中都获得了广泛应用，这是因为庭院空间能拓展人的活动范围，实现更好的采光、通风、采景效果。将建筑水平向形体布局与庭院空间结合，能建立起稳定的自然风压差。对于用地较为充裕，可以布置室外庭院的独立式住宅项目，可通过不同尺度与形态的围合，来塑造庭院空间。例如 L 形、U 形体量形成的半围合边庭，回字布局形成的内向庭院等。建筑形体的平面布置还可以采用前后错位、对角开口、迎向风口、前放后收等布局手段构建清晰的水平向气流路径。有研究表明，建筑进深不应大于建筑高度的 5 倍，以免穿堂风无法形成连贯的风道^[7]。同时在湿热地区还可以通过树荫、水体蒸发散热、减少硬质地面等手段进一步降低庭院温度。

由源计划事务所设计的位于广州的“叠园宅”项目（表 2-C），是一座具有典型岭南地域特征的新式岭南庭院住宅。建筑内的功能房集中于西北与东南角，呈对角布置，而西南与东北两侧则设置开敞廊道，整体布局疏密有致，开阔畅朗。而东侧还布置了多处小水院，利用水体进一步降低夏季东南主导风向的热风。在西北下风向亦对角布置了小型庭院，获得了较好的水平向导风效果。

6 结语

被动式设计策略在独立式住宅中的运用是一种高效且低碳的绿色建筑技术,标志着被动式节能设计从早期单一目标的设计思维转向了多维协同,多元互动的范式。通过建筑形体造型设计、被动式遮阳策略、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有机融合,独立式住宅可以突破传统固定式遮阳或孤立技术的桎梏,展现了高密度住区中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可持续路径探索的可能性。这些实践不仅揭示了被动式策略的多重价值,更反映了设计环节中转向“居住者中心”的认知进化。通过微气候现场实测、居者行为追踪、多目标优化与数字孪生验证,独立式住宅的绿色建筑设计将进化为可自我感知、社区共治的“绿阴微系统”,在每一栋小屋与城市整体之间织就低碳而和谐的生活图景。

参考文献:

- [1]赵俊刚,董鑫,尹名强,等.基于碳中和及气候适应性原则的被动式建筑应用潜力研究——以重庆市为例[J].气象与环境学报,2022,38(05):1-14.
- [2]丁玉贤,孙维娜.基于 eQUEST 模拟的严寒地区内廊式教学楼节能优化研究[J].上海节能,2022,(02):145-152.
- [3]郑毅.城市建筑中绿色节能技术的选择与应用[J].河南科技,2014,(13):170.
- [4]李诗婷,杨红,谢静超.双层外墙体系类型及其在极端湿热气候区的适应性浅析[J].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2017,(11):57-61.
- [5]曹天骥.绿色建筑理念在商办建筑设计中的应用[J].佛山陶瓷,2025,35(06):160-162.
- [6]杨川.被动式通风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分析[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5,(13):97-99.
- [7]张良钰.夏热冬冷地区大学校园院落空间被动式设计策略研究[D].东南大学,2017.

Passive Design Strategies for Green Buildings of Detached Houses in Hot-Humid Regions

Zhou Lili , Chen Cuiwan , Li Miaol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10080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rimary challenges faced by detached houses in hot and humid environments are surg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discomfort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design process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local climate and occupant behavior to develop appropriate green building design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achieve multiple objectives: energy savings, improved comfort, and enhanced neighborhood harmony. Focusing on three key passive strategies—building orientation, solar shading, and natural ventilation—the discussion spans from architectural form design and microclimate regulation to behavioral adaptation. The approach shifts from traditional single-criterion methods towards integrated goals, coupling multiple passive techniques. Key research priorities includ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mproving thermal comfort, minimizing shadow-related disputes, and regulating the microclimate. The passive strategies for green detached houses will shape a replicable system of energy-saving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 Detached house; Green building; Solar shading; Ventilation

数字人赋能江苏吴江古镇文化传播机制与文旅产业升级研究

张蕴¹

(1.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数字人技术在吴江古镇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升级中的应用,旨在通过数字人赋能文化传播,推动文旅产业的创新与发展。研究分析了吴江古镇的文化资源,并结合长三角古镇群的数字人应用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了数字人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通过设计符合吴江古镇特色的数字人IP形象,本研究提出了数字人技术在文化传递、游客互动和沉浸式体验中的应用模式。重点构建了数字人赋能的文化传播机制,以吴江同里、黎里、震泽三镇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数字人原型设计。此外,研究探讨了数字人如何推动文旅产业的升级,促进文化IP的数字化转型,为吴江古镇文旅产业的商业化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为吴江古镇文旅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与方案。

关键词:数字人; 文化传播; 文旅产业升级; 数字化转型; 吴江古镇

基金项目:2025年度苏州市吴江区社科重点应用研究课题; 2025年度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对策类(Y2025LX037); 2025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5SJYB1160); 2025年度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25-AFCEC-61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08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的融合应用,为文化传播和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人(Digital Human)作为一种具有拟人外形、语音交互与智能回应能力的新兴媒介,已广泛应用于新闻播报、影视娱乐、政务服务与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它不仅具备全天候的服务能力,还能够以个性化与沉浸化的方式与用户进行互动,从而显著提升文化内容的传播效率与体验深度。国际上,BBC等媒体率先采用数字人进行新闻播报,欧美博物馆也广泛尝试虚拟讲解员与沉浸式互动展览。在中国,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文化服务提升的重视,数字人技术逐步应用于新闻传媒、电商直播以及“数字文旅”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如杭州的“宋韵数字人”、敦煌的“数字藏经洞”、成都的“三国虚拟导览”等案例,表明数字人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文化遗产和旅游景区提供全天候、多维度、沉浸化的传播方式。这一趋势表明,数字人正逐渐成为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从“技术驱动”转向“文化内容驱动+场景应用驱动”。本研究基于人工智能艺术设计与文化传播的交叉学科视角,探索数字人赋能江苏吴江古镇文化传播机制与文旅产业升级路径优化策略,助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推广与传播。

1.2 研究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聚焦苏州吴江古镇文化与文旅产业,紧密结合国家“数字中国”建设、“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要求,从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新的角度切入,具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理论价值方面,本研究填补了“数字人+区域文化传播”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空白。尽管数字人技术在新闻播报、娱乐、虚拟偶像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在区域文化传播中的系统研究仍较为薄弱,尤其在文化内容数字转译与深度体验方面。其次,实践意义方面,本研究为吴江古镇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提供了路径建议,助力当地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最后,政策意义方面,本研究为地方政府在制定数字文旅战略时,如何在本地

作者简介:张蕴(1981—),女,博士,研究方向为数字文创;造型艺术

通讯作者:张蕴

化文化背景下引入数字技术、激活文化资源、实现文化内容与商业模式有机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数字赋能文化”和“产业创新融合”双轮驱动。

2 研究综述

2.1 数字人相关研究

国内外关于数字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实现层面,主要涉及虚拟人保真度 (Volonte, M et al.2016)[4]、角色个性 (Zibrek, K et al.2018) [5]、动画和语言、表情、动作 (Zibrek,K et al. 2015) [6]; Baxter, M et al. 2021)等方面,以提高虚拟主播的逼真度和表现力,避免用户产生恐怖谷效应(Mitchell, W. J, et al.2021)[7]。二是应用场景层面,涵盖电商 (程雨轩, 2023) [8]、虚拟偶像 (喻国明,2020) [9]、影视娱乐等领域 (胡筱,2022) [10]。数字人在文化传播 (郭嘉, 2022) [11]、数字文旅 (朱永琼, 2023[12]; 陈意山, 2023[13])、教育培训 (雷媛,2025) [14]等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喻国明, 2022), 成为提升文化影响力和传播效率的重要工具。已有研究表明,数字人技术结合文化 IP (徐晨雨, 2024) [15]可以极大提升文化传播的沉浸感与互动性,增强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然而现有数字人研究多停留在通用模型研究,有关数字人在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中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目前,在文化传播领域,部分研究聚数字人作为“文化符号”的转译角色,强调其在非遗传承、数字博物馆中的应用;在文旅产业方面,主要围绕虚拟导游、智能讲解员等初级应用展开,对其在提升游客体验、丰富场景演绎方面有所探讨;然而,针对“数字人”如何与区域文化特质深度融合、构建新型传播机制以及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江南水乡古镇这样的独特文化地理空间内,更缺乏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案例。

2.2 文化传播与文旅融合相关研究

国内外关于“文化传播与文旅融合”的研究大体沿着三条脉络展开:文化记忆与认同建构、技术媒介与场景再造、制度—市场协同与可持续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旅游研究普遍以 Butler (1980) 生命周期模型为核心,强调文化资源作为吸引物的经济效用。进入9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 Nora 提出“记忆场”(lieux de mémoire) 概念,指出文化遗产并非自然延续,而是通过仪式、叙事与象征被不断重构的集体记忆实践。该范式为后续文旅融合研究奠定了“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石,使焦点由“经济收益”转向“意义生产”。[16]

国外研究呈现媒介化与体验转向。国外学界较早关注技术在文化旅游关系中的中介作用。Ryan 等 (2019) [17]通过对克罗地亚、埃及等地案例的系统分析,发现数字影像、AR/VR 等媒介不仅延伸了遗产的时空边界,更重塑了游客的具身体验与情感卷入。研究体验转向, Pine & Gilmore (1999) [18]提出“体验经济”后,文化遗产地被视为“体验剧场”,文化传播由单向展示转向多感官、互动式叙事。牛津、剑桥等高校图书馆的“文学旅游”项目即通过场景叙事与角色扮演,将静态馆藏转化为沉浸式文化体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路线”计划 (1987) 与欧盟“智慧旅游”城市网络 (2013) 强调跨区域资源整合、社区参与和环境伦理。[19]国内研究在政策驱动下的出现范式转换。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后“文旅融合”被上升为国家战略,研究议题迅速从“产业增加值”扩展到“文化认同、国家形象与软实力”。理论方面也更加深入,黄永林 (2019) [20]指出,文旅融合的本质是“文化再生产”,即通过旅游场域实现文化资源的符号重构与价值再造;徐翠蓉等 (2020) [21]进一步提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双螺旋模型,强调旅游者在互动仪式中完成身份认同。技术嵌入研究方面,随着5G、AIGC、数字人等技术成熟,国内研究出现“数智文旅”新分支。既有研究已完成了从“经济—文化二元论”到“记忆—认同—体验”范式转换。

3 吴江古镇文化特征、传播现状与问题分析

3.1 吴江古镇文化资源概况

苏州吴江古镇的文化资源在区域文明谱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首先,退思园代表的苏州古典园林、京杭大运河吴江段及古纤道,构成了大运河 (吴江段) 与苏州古典园林的世界文化遗产矩阵,凸显了其在东亚园林艺术与水利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同里、黎里、震泽三镇分别承载江南水乡聚落原型、商贸与现代化变迁、丝绸与丝路经济演进的核心叙事。此外,退思园、师俭堂、柳亚子故居等文化遗址,构成了跨时空的文化遗产序列,提供了区域社会史、技术史与思想史研究的实证空间。本研究选取同里、黎里、震泽三镇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数字人技术赋能吴江古镇文化传播机制与文旅产业升级路径。

3.2 地方需求与问题提出

吴江区位于长三角核心区域,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貌与丰富的文化资源,保存了园林建筑、古桥古街、丝绸工艺等物质文化遗产,并承载了丰富的非遗传统和地方叙事。目前《吴江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1-2025)》明确将“数字文旅”列为三大主线之一,提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长三角数字文化先行区”。此外,《大运河文化带(吴江段)建设规划》提出“文化数字化保护+沉浸式体验”双轮驱动,要求各镇建立一镇一数字文化IP。吴江区已启动数字文旅平台,并上线了“指游吴江”入口,完成旅游大数据中心升级。然而,吴江区在数字文旅发展方面仍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文化传播方式仍以传统的人工讲解和展板说明为主,传播内容碎片化,缺乏系统性与情感共鸣,游客大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其次,新一代游客倾向于数字沉浸、互动与个性化定制的体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未能满足这一需求;再次,尽管数字人技术在其他领域已获得应用,但在区域文化与数字人的深度结合上,尚未形成系统方案与可复制路径;最后,吴江古镇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式数字人应用,目前主要集中在智慧景区和文化内容的展示上,未能充分开发其互动潜力。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文旅融合”战略的背景下,吴江古镇亟需创新文化传播路径,突破静态展示和单向传播的局限,转向动态化、叙事化和互动化的表达方式。引入数字人技术作为文化传播主体,不仅可以实现文化遗产的现代化转译和沉浸式再现,还能通过互动与情境建构推动游客情感投入与文化认同,为地方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

3.3 长三角典型古镇比较与启示

在长三角区域,浙江乌镇、西塘,苏州周庄等典型古镇均已经布局数字人,数字人的特征和应用场景以及功能性上侧重点各有不同。从表1详细分析可见,乌镇数字人的布局重点服务先行、系统最重,多端同步;周庄突出IP叙事、AR沉浸;西塘定位“夜游国风主播”主打内容、社媒爆款。三者分别代表了数字人在古镇场景中的“工具-剧情-内容”三种主流路径。经调研分析,从不同纬度比较分析如表格1所示:

表1 长三角典型古镇数字人应用比较表

维度	乌镇	周庄
角色定位	“小乌”官方全域导览官	“沈万三”元宇宙NPC+品牌代言
上线时间	2024.10	2024.4
技术形态	超写实 3D 数字人+多语言 TTS	超写实 3D+实时云渲染
部署终端	官方小程序	数字周庄”小程序
核心功能	景点讲解、问答、多语言、路线推荐	场景叙事、数字藏品发放、剧情任务
交互深度	自然语言问答+多轮对话	剧情任务+任务链
数据闭环	景区中台实时回流,支持二次营销	与票务、电商数据打通
商业化	会员语音包	数字藏品

4、数字人赋能文化传播机制构建

数字人的介入能够突破单向传播和静态展示的局限,实现文化内容的模块化转译、角色化演绎和情境化体验的特征。以下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

4.1 构建适用于古镇文化传播的数字人模型

在古镇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过程中,数字人作为一种创新的媒介,不仅能够扮演文化传递者的角色,还能够通过深度的互动与体验提升文化传播的效果。针对同里、黎里和震泽三镇的文化特色,我们提出三种不同的数字人原型设计模型和IP形象效果图,具体如下:

(1) 同里古镇

同里古镇数字人设计模型角色设定:姓名“水如”,性别女性,年龄约20岁,典型的江南水乡女性形象,温婉、端庄,面容柔和;服饰和发型融入水乡的传统风格,展现出古镇的江南气质;性格温和、文雅,具有深厚的江南水乡文化底蕴,善于表达水乡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充满智慧和亲和力。身份功能是数字化的江南水乡文化传递者;通过细腻的叙事传递同里古镇的历史文化,涉及园林艺术、传统水乡生活、名胜古迹等内容。互动方式采用数字人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与游客进行对话,提供实时的解答,增加游客的参与感。同时,她可以带领游客参观虚拟园林、古街道等,进行沉浸式文化体验;应用场景多为景区导览、虚拟沉浸、社区平台互动,形象IP设计效果如表2所示。

表 2 古镇数字人原型设计模型和 IP 形象效果图

名称	角色设定 1（真人形象）	角色设定 2（Q 版形象）	实景应用场景效果
同里 古镇 水如			
黎里 古镇 丝梦			
震泽 古镇 蚕娘			

(2) 黎里古镇

黎里古镇数字人设计模型角色设定：姓名“丝梦”，性别女性，年龄 30 岁；具有典型的丝绸产业背景，服装设计充满江南丝绸元素；性格聪慧、细腻，注重传统丝绸制作工艺的传承，充满热情，擅长讲述黎里古镇的丝绸文化和商贸历史。身份为黎里古镇的丝绸文化传承者与推广者功能，负责向游客介绍黎里的丝绸制作工艺、历史背景以及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传递讲解内容为黎里古镇的丝绸历史、丝绸的制作工艺、染色技巧等，带领游客了解从蚕桑养殖到丝绸织造的全过程；互动方式与游客进行虚拟互动，游客可以参与到丝绸制作的各个环节，例如通过虚拟界面学习织布、染色等技术，同时数字人丝梦根据游客的兴趣；应用场景通过移动设备或 VR 头显，游客可以与数字人丝梦一同参与虚拟的丝绸制作过程，甚至进行丝绸的在线交易体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丝梦可以通过直播或视频，展示黎里古镇的丝绸产品，带动线上丝绸交易；数字人丝梦还可以作为虚拟教师，提供关于丝绸文化的在线课程，向全球观众推广黎里的丝绸工艺和商贸历史。形象 IP 设计效果如表 2 所示。

(3) 震泽古镇

震泽古镇数字人设计模型角色设定：名字“蚕娘”，性别女性，年龄 30 岁；外貌特征：体现丝绸与丝路商

贸文化的深厚,服装采用具有丝绸光泽的金色、深紫色和蓝色,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她的形象中得到了体现;性格特点:稳重、睿智,深知震泽作为丝绸与丝路经济的重要角色;她传递着历史的厚重感和丝绸的细腻感;身份与功能:震泽丝绸文化与丝路经济的讲解者;作为震泽古镇的文化大使,蚕娘负责讲解震泽丝绸的历史背景、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以及商贸历史的演变;文化内容传递:讲解传递震泽古镇的丝绸与丝路历史,讲述古镇如何在丝绸之路起到商贸交流与文化传播的纽带作用,特别是丝绸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互动方式:通过虚拟环境,游客可以参与到丝绸的制作、交易和历史重现等互动活动中,体验丝绸如何从震泽传播到世界各地;应用场景虚拟游览与互动:通过 AR 或 VR 技术,游客能够在织云的引导下游览震泽古镇的丝绸作坊、丝绸市场,甚至体验虚拟丝绸交易和丝绸文化的演变过程;跨文化传播:通过社交媒体和直播,蚕娘可以展示震泽丝绸的传统工艺及其在全球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作用,增强古镇的国际知名度。形象 IP 设计效果如表 2 所示。

4.2 传播机制的运行流程

从目前以文化资源“内容数字资产化”到“体验再循环”的运行流程,具体如下:

(1) 文化内容模块化转译

将复杂的文化内容进行模块化转译,按需拆解并逐一呈现。例如,文化基因抽取,依托吴江已完成文保点“一宅一码”数据库,将蚕桑礼仪、莼鲈诗词等碎片化文化元素转化为可编码的文化模块。又如,吴江古镇的丝绸文化可以分为历史背景、丝绸工艺、丝绸产业发展主要模块,数字人可以根据游客的兴趣与问题深度展开讲解。每个模块可以通过虚拟角色扮演进行展示,并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通过这种模块化的内容结构,文化传递的逻辑性和层次感得到增强,也便于游客快速理解和接受。

(2) 角色人格化演绎

数字人角色化的演绎是提高文化传播亲和力与互动性的核心要素。通过设定具有地方特色的虚拟角色,如同里退思园仕女“水如”、黎里古镇“丝梦”、震泽“蚕娘”等。游客不仅通过与数字人的互动了解文化内涵,还能够通过“角色任务”互动获得参与感和成就感。

(3) 情境化体验

在吴江古镇文化传播中,数字人能够通过情境化体验提升游客的沉浸感。例如,情境脚本生成。运用 AIGC 技术将模块与角色按时间、空间、情绪维度动态拼装,生成可即时切换的“微剧场”脚本。通过数字技术和虚拟场景的搭建,使文化的传递不再是简单的信息灌输,而是通过情感共鸣与身临其境的体验来达成。数字人通过 AR 眼镜、夜游、直播带货、小程序语音四个端口同步输出,实现“白天研学、黄昏演艺、夜游沉浸、线上种草”的多端情境体验。

(4) 数据回流与迭代

游客停留轨迹、情感标签、消费链路实时回传吴江 DAYUN 平台,驱动二次优化形成“内容资产-情境体验-数据再生产”的闭环。通过对游客互动数据的实时收集和分析,数字人能够不断调整其表达方式和内容深度,以实现更加个性化和高效的文化传播。具体来说,数字人在与游客的互动中不断采集游客的行为数据如停留时长、情感反馈、问答内容、任务完成度等,并基于这些数据进行自我优化。

综上,数字人技术在后发古镇的价值不在于再造一个同质化数字古镇,而在于以模块化文化资产、人格化叙事主体与情境化交互场域,构建一条“文化基因-数字人-游客共创”的新型传播机制。

5、数字人驱动文旅产业升级的模式研究

数字人技术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推动了产业从传统景区运营模式向更加多维度、互动性、个性化和沉浸式体验的转型,优化并拓展了产业链。首先,数字人通过其角色设计和互动模式,能够将吴江古镇的文化资源进行模块化和情境化演绎,提供个性化的文化讲解和深度互动,尤其通过直播平台吸引年轻观众,增强文化传播效果。其次,借助 VR 和 AR 等技术,数字人提供沉浸式体验,游客能够主动参与历史场景和文化内容的互动,增强情感投入和文化认同。此外,数字人还可以实现文旅消费模式的重构,通过虚拟展示丝绸、园林工艺等产品并引导游客在线购买,同时根据游客需求定制个性化旅游路线,推动文创产品创新和商业化。数字人技术还帮助吴江古镇将传统文化符号和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化 IP,进行跨平台传播与商业化,延伸文旅产业链,涵盖虚拟旅游和数字文创领域,实现产业的创新与持续发展。通过全域数字文旅平台建设,吴江古镇的文化、文创产品与旅游服务得以整合,数字人直播模式突破地域限制,提升全球文化传播效果,推动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还需要关注数字人如何适应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探索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特别是在向外国游客传递吴江古镇文化内涵方面的有效策略。

6、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人技术如何赋能吴江古镇文旅产业的升级与创新,分析了其在文化传播、游客体验提升和文创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潜力。研究基于吴江古镇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同里、黎里和震泽三镇的文化特色,提出了数字人技术在各镇文化传承与传播中的应用方案。通过梳理吴江古镇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符号,设计了三位数字人角色 IP: 水如(同里水乡文化使者)、丝梦(黎里丝绸文化传承者)、蚕娘(震泽丝路文化引领者),每个角色通过沉浸式体验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感与参与感。

在文化传播机制方面,研究设计了数字人形象的升级方案,强调通过情境化演绎和模块化转译,将吴江古镇的历史文化转化为互动性强的内容。数字人不仅作为文化讲解员,还能扮演历史人物或地方符号,打破单向传播模式,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文化共创。

在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方面,本研究提出了数字人技术推动文旅产业转型的路径,包括赋能文化传播、提供沉浸式体验、重构文旅消费模式、推动文化 IP 数字化转型等。通过数字人直播、虚拟展示和线上互动,打破地域限制,提升文化传播的全球效力,推动吴江古镇文旅产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数字人将在吴江古镇文旅产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人技术将推动吴江古镇从传统景区运营模式向多维度、互动性和沉浸式体验模式的转型,助力文化传播和产业升级。为此,政府、企业与学术界需要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数字化文旅产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确保吴江古镇在全球文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促进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徐云飞.虚拟数字人在智媒时代的战略角色——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智能化应用为例[J].E-Commerce Letters, 2024,14:963.
- [2] 喻国明,潘佳宝.试论我国国际文化影响力传播的路径与策略[J].传媒观察,2021(4):11-18.
- [3] 数字文旅发展思考 https://www.iii.tsinghua.edu.cn/info/1058/2064.htm?utm_source=chatgpt.com
- [4] Volonte M,Duchowski AT,Babu SV.Effects of a virtual human appearance fidelity continuum on visual attention in virtual reality[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virtual agents.2019:141-147.
- [5] Zibrek K,Kokkinara E,McDonnell R.The effect of realistic appearance of virtual characters in immersive environments-does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y play a role?[J].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2018,24(4):1681-1690.
- [6] Zibrek K,Hoyet L,Ruhland K, et al.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motion type and emotions on the perception of gender in virtual humans[J]. ACM Transactions on Applied Perception (TAP),2015,12(3):1-20.
- [7] Montanha R H, Raupp G N, Schmitt A C P, et al. Micro and macro facial expressions by driven animations in realistic Virtual Humans[J]. Entertainment Computing,2025,52:100853.
- [8] 程雨轩.数字人技术在电商直播中的应用与挑战研究——以淘宝数字人主播为例[J].E-Commerce Letters, 2025,14:1.
- [9] 喻国明,杨名宜.虚拟偶像:一种自带关系属性的新型传播媒介[J].新闻与写作,2020,(10):68-73.
- [10] 胡筱,薛莲,周隽.虚拟数字人出演网络微短剧国际化传播策略——以“现象级”虚拟数字人柳夜熙为例[J].编辑学刊,2022,(05):27-33.
- [11] 郭嘉.虚拟数字人在图书出版领域的多元身份构建研究[J].科技与出版,2022,(08):56-63.
- [12] 朱永琼,宋章通,方浩.“文旅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的应用[J].传媒,2023,(03):55-57.
- [13] 陈意山,欧阳日辉.元宇宙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23,(02):132-140.
- [14] 雷媛,李秀艳,宋永刚.虚拟数字人赋能教育出版社数智化转型的实践与思考[J].出版广角,2025,(01):46-52.
- [15] 徐晨雨,祁悦,郭瀚之等.基于 AIGC 的西夏文化元素提炼及混合现实数字人互动设计[J].包装工程艺术版, 2024(20):49-57.
- [16] Nora P.在记忆与历史之间:记忆的场所[J].表征, 1989: 7-24.
- [17] Siddiqui M S,Syed T A, Nadeem A, et al. Virtual tourism and digital heritage: an analysis of VR/AR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2022,13(7).
- [18] Pine J, Gilmore J H. 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C]//Health Forum Journal. Health Forum, 2001,44(5):10-16.
- [19] Khovanova-Rubicondo K M.文化路线作为新型旅游发展的源泉:来自欧洲理事会计划的证据[J].《数字时代的国际遗产杂志》, 2012,1 (1_suppl): 83-88.
- [20] 黄永林.文旅融合发展的文化阐释与旅游实践[J].学术前沿,2019(11):16-23.

- [21] 徐翠蓉,赵玉宗,高洁.国内外文旅融合研究进展与启示:一个文献综述[J]. Tourism Tribune/Lvyou Xuekan,2020,35(8).
- [22] 晏轶超,程宇豪,陈琢等.基于神经网络的生成式三维数字人研究综述:渲染与学习[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 2023,53(10):1858-1891.
- [23] 包仪华,涂子奇,骆乐等.数字人面部表情迁移:从人脸表示到表情迁移综述[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 [24] 语音合成综述U大模型时代的变革与趋势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10744396179182346?utm_source=chatgpt.com.
- [25] 陶建华,李雅.情感计算研究进展[J].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 2016,12(10): 62-70.

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Humans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Tourism Industry Upgrading of Wujiang Ancient Town, Jiangsu

Zhangyun

¹ *Su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2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 technology in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ourism industry upgrading of Wujiang Ancient Town. The aim is to empower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rough digital human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Wujiang Ancient Town and conducts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with digital human applications in the ancient town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veal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digital human technology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By designing digital human IP images tailor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ujiang Ancient Town,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digital human technology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urist interaction,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s. The study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a digital human-enabled cultur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using the ancient towns of Tongli, Lili, and Zhenze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esigns digital human prototype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discusses how digital humans drive the upgrading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P,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Wujiang Ancient Town's tourism industry. Ultimately, this research offers feasible paths and solution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Wujiang Ancient Town.

Keywords: Digital human; Cultural transmission; Tourism industry upgra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ujiang Ancient Town

阿彼察邦《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的梦境叙事与文化意蕴

陈矿¹ 杨贺¹

(1.成都大学 影视与动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泰国新浪潮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电影一直备受世界电影界的关注与青睐, 对于梦境元素塑造与探析是其导演风格的标志性特征, 探讨阿彼察邦通过运用梦境推动电影叙事、强化视听表达以及助力文化传承、对于理解导演创作理念与风格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梦境视觉呈现、声音设计、叙事手法的分析, 揭示梦境与佛教轮回观、身份认同、社会隐喻的深层关联, 阐释其在电影艺术与泰国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价值与深刻内涵, 解读导演隐藏在光影中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梦境叙事; 泰国新浪潮; 阿彼察邦; 文化内涵

基金项目: 成都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四川省泰国研究中心项目“新世纪泰国电影新浪潮美学研究”(SPRITS202424); 南充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外医学交流与发展研究”专项课题“叙事医学视域下新世纪中外电影临终关怀研究”(项目编号: NC24ZW24); 中国电影地缘文化研究基地项目“藏地电影新浪潮审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5ZC131); 2025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项目编号: FJ2025B101)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0

20世纪末泰国民族影业在世纪末陷入危机: 好莱坞影片大行其道, 本土影片追逐利润, 现代观影方式下观众分流, 本土电影制作模式老化, 电影票房人气急速下降。面对泰国电影业岌岌可危的局面, 一批奋楫笃行的年轻导演尝试以个人化的创作来对僵化的民族电影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泰国导演市场院线空置、投资锐减、审查松弛, 反而让一群刚从欧美或本土电影学院毕业接受国际视野教育的、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青年导演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舞台。泰国导演朗斯·尼美毕达用《鬼妻》把恐怖类型与民俗记忆缝合, 韦西·沙赞那庭以《黑虎》将街头漫画美学移植到胶片, 彭力·云旦拿域安则在《六月·爱逝》中让曼谷霓虹与寂静街巷互为镜像,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凭《极乐森林》把生态美学、乡村神话与长镜头诗学融为一体。他们抛弃歌舞升空的陈腐套路, 用极简预算、数字摄影、非职业演员、碎片化叙事, 创造出自成一格的“泰国新浪潮”。这股浪潮先在釜山、鹿特丹等国际影展引发惊叹, 继而回流本土, 重新点燃观众对大银幕的好奇, 使泰国电影在21世纪初迅速复苏, 并以独特的热带魔幻现实主义姿态跻身于世界影坛前沿。

泰国新浪潮中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处女作《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 2000), 因其独特叙事风格和镜头表现力, 一开始就受到国际电影界特别关注。《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2010)在国际影坛上备受赞誉, 影片讲述罹患绝症的泰国农民波米叔叔回到乡间, 等待死亡的到来。夜里, 亡妻的幽灵与失踪多年的儿子(化作红眼猩猩灵)突然现身, 与他平静地共进晚餐, 仿佛陪伴他最后一程。在睡梦中, 梦到了一位悲伤公主在森林中献身鲶鱼, 为寻找前世, 波米携家人穿越热带丛林, 被神秘力量引至山顶洞穴, 他认定这是自己“第一世”诞生的子宫。影片在长镜头与幽暗丛林中交织人、鬼、兽与轮回, 以梦境式的超现实诗意叙事探讨生死、自然与因果轮回, 呈现佛教“万物有灵, 因果循环”的哲学意韵。该电影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更引发了世界影坛对电影中梦境叙事与文化意蕴的深入探讨。在这部影片中, 梦境不仅仅是对于角色内心精神世界的反映和简单的叙事手段, 而是将梦境融入全片, 片中处处未提梦, 却处处又有“梦”。梦境让影片具有别样的审美意蕴, 展现了人物更深层次意识状。非线性的梦境叙事又为影片产生碎片化、循环往复的错乱时空, 实现了前世与今生在影片中共存, 为观众具象地描绘了超现实梦境空间, 展现了人物多元的情感状态与复杂的思想探

作者简介: 陈 矿(1980—),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美学与比较文学

杨 贺(1998—),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影视美学

通讯作者: 陈 矿

索。^[1]

一、梦幻视听编织起奇异神秘的前世今生

阿彼察邦用不常见的色彩、悠长呼吸感的镜头运动、边界模糊的画面创造了梦幻的梦境，又用精心设计与编织的自然声音与富含神秘质感的音乐让观众陷入其中，电影的视听语言是以视听通道构筑的人类全面感官的幻觉感受。

（一）隐藏于潮热丛林深处的画面构建错乱时空

阿彼察邦通过梦境叙事为观众构建了奇幻的“前世空间”，为电影增添了热带丛林中独有的幽谧、潮热、神秘的美感。电影画面中色彩常常是自然森林的深绿色，天空撒下光芒穿过树叶映射在雾中的蓝青色以及土地的褐色，这不仅为影片增添了一份幽暗、神秘的自然色彩，还营造出一种压抑而又深邃的梦幻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未知的错乱时空世界之中。影片开头在水雾弥漫中，一头伫立在丛林中的水牛构成了整个画面，镜头随着水牛移动到丛林深处，森林的红眼精灵出现在镜头中凝视着观众，而潮湿的山中薄雾、幽深的丛林深处、怪异的红眼精灵等元素奠定了整部电影神秘、幽谧的美学基调。

镜头运动的平稳缓慢与悠长的呼吸感也是本部影片的一大特色，这种拍摄手法使得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每一个神情与角落里的每一处光暗变化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电影中今生世界的镜头常常以一种缓慢而平稳的方式向前推进或向后拉远，使观众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感受画面中的传递出来的信息，也具有稳定现实的意义。而在波米叔叔变成公主与鲶鱼的前世时空时，画面中边界的模糊和镜头带有睡梦时悠长的呼吸运动性是构建奇幻梦境空间的关键元素，表现着前世梦境般的朦胧感，似乎就在眼前却又像永远触摸不到，前世时空与今生世界的交织与变换通过这些模糊边界和悠长呼吸感镜头运动的影像得以完美地展现，让观众能体会梦境现实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与融合。梦境并非对现实世界的再现与模仿，而是一种受深层意识和思维驱动呈现出来的无序、多变的时空状态。^[1]导演通过与日常现实世界不同的的前世错乱的时空纠缠与交融的画面表达了波比叔叔对于死亡、因果轮回的特殊思考。

阿彼察邦还在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自然元素来构建梦境的奇幻空间。潮湿的丛林、流动的河流、粗旷的山脉、幽暗的洞穴等自然景观元素在电影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阿彼察邦导演的影片中独特的美感来就最主要就自于大自然的美，它们不仅为梦境提供了一个具体环境，还赋予了梦境一种生命原始的能量和神秘。在波米叔叔的梦境中，这些自然元素往往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它们能够引发一系列神奇的事件，使得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不禁对这个奇幻的梦境世界产生思考。影片中人们对于各种神奇事件并不感到惊讶，似乎是时常发生的事件，对于回魂的妻子，变成精灵的儿子都不觉惊讶，似乎就像在梦中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正常的。

（二）来自现实与梦幻交错的声音筑造神秘时空

导演将梦境作为一个幻觉的外化视听元素，在电影中再现梦境是将显意转化为隐意的过程，^[2]而声音的建构是消解主人公波米叔叔自我意识空间与观影者内在空间之间阻隔的关键。波米叔叔的前世时空是与今生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导演用声音引导观众进入前世梦境，为区分现实、想象与梦境发挥了很大作用。阿彼察邦在自己的黑胶唱片《隐喻》（Metaphors）中这张唱片汇集了阿彼察邦作品中的音乐和声音，包括他多年来构思的电影和艺术装置，由阿彼察邦与他的声音艺术家里特和清水浩一（Koichi Shimizu）自制。他们从《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电影中挑选了自己最喜欢的曲目，一是《破晓》（Dawn of Boonmee），这段音乐出现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其间的自然声响和水牛哞叫录自泰国的幔岩山国家公园。阿彼察邦用音乐勾连影像，以丛林环境音为底音，脚步声细碎，一种作用于心理的蜂鸣（drone）慢慢上扬。与传统的有节奏的音乐不同，这首音乐完全是自然声音，没有旋律与节奏等元素。在片头神秘的音乐、丛林的深处传出的细碎噪音、老牛移动的细碎声构建了一副原始神秘、充满生命力的幽暗丛林，声音指向性明显是要推动观众进入导演构建的自然梦幻的潮热丛林中去。而第二首被收录的音乐是《恐高症》（Acrophobia）这段音乐出现在《波米叔叔》电影结尾，大意是一个恐高症的男人，祈求自己的爱人从天空回到地面。音乐营造了一幕如梦似幻的场景，像是看电视发呆时的神游天外，也可能是睡梦中的无边想象。在变为森林中的红眼精灵的儿子，回到家中向波米叔叔等人讲述自己变为精灵的经历时，也伴随一阵神秘的音乐，像是森林呼吸声一样的悠长、厚重、玄妙。这段音乐为波米叔叔儿子变为精灵的过程增添了一份神圣、幽谧，也是在暗示观众进入到想象的梦幻空间。无论是哪种，音乐都发挥了将现实与梦境分割，也推动观众进入角色的深层内心世界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阿彼察邦在电影中还融入了泰国传统民族音乐元素，这些传统音乐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还能唤起观众对泰国文化的好奇和关注。在前世中，公主行走在丛林时悠扬的、富含民族特色的泰国音乐旋律回荡在森林之中，通过画面可以清晰看见是由公主队伍随行的乐师吹奏，音乐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幽谧丛林空间的塑造，同时，也让观众感知与现实不在同一时间中，这种对于民族传统音乐的适度运用也加深了该电影的文化内涵，使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感受泰国文化的魅力。

阿彼察邦合作多年的音效师阿克里查勒姆·卡拉亚那米特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利用环境氛围来讲述故事，

这比音乐更重要。”在电影中阿彼察邦会很巧妙地运用自然音效、构建出了多层次的声音景观。声景是将声音视作直接与身体感官互动的环境,从听觉者的经验和感知空间出发,来阐释由人的听觉方式在内心形成的环境印象的过程。^[3]《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注重写实的自然声音和声音空间细微变化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梦境的叙述解读和错乱空间认知的区分。不同的场景中,声音细微的差别,构成了观众对与不同空间的认知。在前世梦境中,公主穿行在丛林时,远处传来的微风呼呼声、树叶沙沙声与近处的角色低语声相互交织,为观众营造出入不同梦境的隔离带。而今生现实世界中,则是夏日夜晚的蝉鸣声,微风声、树叶声构建了夏日炎热的声音环境。虽然声音种类是大相径庭,但细微处的差别确认观众清晰的感知这是不同的空间。而在影片最后,都市的喧嚣声、嘈杂的电视声、酒馆的热闹声又让观众感知到与贴近自然的乡村截然不同的现代城市空间。这些声音设计不仅使梦境构建更加真实可感,更通过声音的节奏、风格、环境的强弱变化,引导观众的情感起伏。电影声音空间的建构对于观众的体验而言,它的内容给主体带来感知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声音价值的可变性,这是他们感受到空间意义的关键。^[4]阿彼察邦利用自然音效的声音设计让观众在无意识接受声音的叙述时转变为了对认知世界的深入。风声、雨声、鸟鸣声等自然声音不仅为梦境场景增添了一份真实生命的力感,也引发观众的联想和想象,使其更加深入地感受到梦境的虚幻。

二、叙事营造打破线性时间束缚的自由时空

阿彼察邦导演钟爱于非线性叙事的方式创作电影,《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在现实、幽灵、前世动物与洞穴子宫之间循环往复,时间被折叠的梦境模式都彰显着阿彼察邦对深藏于人物内心更加隐秘的意识的捕捉,这也拉近了观众与电影的距离,引起深层次的共鸣。电影中的梦境叙事往往能让时空进行交错,导演通过时空的转换来区别不同于日常时空对人物内心深处的想象呈现。

(一) 虚幻与无法触摸的梦境无限空间

佛洛伊德在《释梦》中解释:梦是被压抑欲望的伪装满足。而荣格认为梦是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的交汇。梦境叙事将“梦”看作独立的叙事模式,打破线性时间、因果逻辑与单一视角,强调潜意识驱动、非常态空间和碎片式。阿彼察邦通过非线性结构、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波米叔叔的前世记忆、当下生活以及对未来的预感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这种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单一性、指向性,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感知与期待,从而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电影的解构中。“非日常”的空间作为导演用以表现梦境的载体,其独特的形式往往能起到唤起特定情感的作用。^[5]

《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夏日夜晚,当波米叔叔与小姨交谈时,死去的妻子出现在饭桌,波米叔叔并未表现的惊讶,随后变为红眼精灵的儿子也回到家,也未觉得意外,他只是想了解失踪儿子的经历。在这一空间中死去的妻子、变成红眼精灵的儿子与波米叔叔在同一屋檐下一同交谈,翻看着以前照片。这一空间本身设定在一个不真实存在,只存于波米叔叔想象中的梦境空间中。这一空间所展示的内容体现了它的虚幻性与错乱性。而镜头本身却又以平静的长镜头与平视镜头为主,镜头的平静又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边界,特殊的梦境空间暗示着波米叔叔对于亡妻与失踪的儿子的思念。随后儿子开始讲述自己变为精灵的过程时以俯视镜头为主,以上帝视角观看儿子的经历,表示了波米叔叔在头脑中的想象,因为这一空间中展示的事情也是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多年未归的儿子了无音讯,或者是在重病临终之际对于儿子的思念之情塑造了这一空间。在波米叔叔前世的梦境中,波米叔叔变成了面容丑陋的公主,穿行在森林之中,却被轿夫嫌弃,来到了一处瀑布之下,为了获得姣好的面容,向水中会说话的鲶鱼献上了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前世本身是虚妄的、没有被证实的。这一错乱的梦境空间只是波米叔叔在睡梦中存在,醒来之后又对着亡妻的灵魂述说,仿佛是梦中梦,前世的梦醒来之后依旧沉睡在思念妻子的梦中。这一空间是波米叔叔所向往的,期望亡妻并没有死去,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伴在自己身边,对于前世的追寻也是对于死亡的理解: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又进入到下一次的因果循环之中。

(二) 循环与交错的梦境无序时间

梦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模仿重现,而是受人潜意识驱动、集体经验与现实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无序的、受情感影响呈现出的多变状态。^[6]因此梦境往往是碎片式时间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不再是正常的时间叙事。故事可以随意的支配时间,穿连时间,但也不是无目的、无意义的,时间在这之中受意识所支配,服务于情感需求。

《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前一刻可能只是平常的夏日夜晚,后一刻突兀的进入妻儿团聚的梦境之中,也许是前一刻重病在床休养,后一刻又变为了面容丑陋的公主。整个故事仿佛是一场梦境,打破原有的时间线,不断的跳入另一个时间。梦境跳脱时间线成为了连接波米叔叔现实与意识活动的重要桥梁。通过梦境,观众能够看到波米叔叔没有用言语所表达的内心深层活动,这些梦境不仅解释了他今生的性格与命运,还为电影的叙事增添了更多的层次和深度。在夏日的晚餐,因为思念妻儿而进入到了梦境之中。重病在床时,不可避免的思考着死亡的意义,进入到前世的梦境之中。而在森林深处的洞穴之中时,临死之际因为怀恋生命,感慨一生,意识又再一次进入到了梦境之中。看似杂乱无序的时间线却又都是受波米叔叔所控的,这些不同的梦境经历相互交织,构成

了波米叔叔丰富复杂的情感与意识世界。

梦境叙事的方式要求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解角度。观众无法在传统的线性叙事电影中那样的持续性思考,也不能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理解故事的发展,而是需要在不同的时空之间跳跃和转换,自己在脑海中构想出一个属于自己理解的故事。观众在试图理解与解构电影的过程中,不禁会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进行反思与回响,从而达到与阿彼察邦电影的梦境互动。

三、梦境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阿彼察邦在电影中还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元素和象征手法来增强叙事的深度和复杂性。例如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洞穴元素,波米叔叔住的房子中只有一扇高高的窗户,波米叔叔最后逝去的地方也是前世出生的地方。梦境中的各种元素往往具有多重含义,多次出现的丛林既是角色内心情感的外在显化,也是社会现实的内在隐喻。虽然电影中梦境是错乱的,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过程和导演内心的映射。^[5]

(一) 佛教轮回观的具象化表达

阿彼察邦热衷于制造梦境表达人物内心世界,我们也能通过梦境探寻阿彼察邦电影的共性与思想。泰国被称为“宝象佛国”,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泰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彼察邦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着佛教思想,而佛教生命观念中轮回观也是其电影的明显特征。《恋爱症候群》叙述相差40年但在同一地点发生的两段故事,《热带疾病》里士兵逐渐化为虎灵,《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的梦境成为探索前世今生、体悟生命轮回的媒介。在梦境中,他目睹自己在变成水牛、公主、精灵以及过去前世中的种种轮回,这些经历让人领悟到生命无常、万物皆有灵、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通过梦境回忆前世,阿彼察邦将抽象晦涩的佛教轮回观念转化为具体可见的视觉与情感体验,观众能在电影中感悟到这宗教生命观念的深刻内涵。

在电影中,波米叔叔的前世梦境常常呈现出一种不知“我”在何处的特征,这种特征正是佛教轮回观的生动写照。“我”能是任何一事物,我的前世可以是水牛、公主、鲶鱼,我可以是万物,万物皆能是我。人总是像梦境一样处于上帝视角观察整个世界,在似我非我的状态中。而每一个梦境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前世,而这些前世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一幅宏大的生命画卷。在梦境中,波米叔叔认为自己在过去人生中所犯下的错误的因造成了身患绝症的果,现在所受的痛苦都是自己的“业”的回应。他为抵消“业”而赎罪和修行,离开城市回到乡下贴近自然,包括收留外国打工人都都是为了忏悔所犯下的错误以及努力为未来带来希望和转机。在最原始佛教中轮回并不是灵魂在轮回,而是因果相续的“识流”,并没有永恒不变的灵魂,只有“无我”。推动轮回的是身口意行留下的业力,在成熟时,善业向上,恶业向下。不断的轮回中直到对缘起法的最终觉悟,达到涅槃、脱离轮回苦海。

在电影中,阿彼察邦通过梦境将这种生命的认知具象化,观众在阿彼察邦的电影世界中感受生命的因果和轮转。这种观念的具象化的表达方式不仅让佛教生命轮回观更易于理解和接受,还引发观众对自身生命和存在的深刻思考。

(二) 身份认同与存在困境的探索

梦境是波米叔叔探寻自我身份、面对认同困境的重要途径。在梦中,他不断与自己的前世身份探索,试图寻找自己在生命无尽轮回中的共性。前世梦境揭示了他内心的自身认知的迷茫与生命轮回的挣扎,这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自我个体面对群体社会快速变迁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普遍焦虑。阿彼察邦导演通过电影中的梦境叙事,引导观众反思自身处在时代洪流中的身份认同。

在波米叔叔的梦境前世中,他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自我认同状态。他在某个梦境前世中是一个面容丑陋的公主,而在另一个梦境中却是一头被人奴役耕作的水牛。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不仅让波米叔叔感到困惑和迷茫,也让观众开始思考自己在生命轮回与时代变迁中的身份和定位。主要源于他们对自己边缘身份的强烈认同,这种认同使得他们能够深入挖掘边缘人物,并且生发出某些普世情感。^[5]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许多人发现自己面临着类似的身份认同困境。他们不再属于传统的自我和文化,人好似变成了现代社会这台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没有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人的特异性,找不到自我存在感,又无法完全融入新的环境和文化之中。这种身份的割裂和迷茫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外来文化入侵、战争影响、历史动荡曾使得泰国人民一直处于不安,急于寻找社会认同,而泰国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也急于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波米叔叔的梦境,观众能够看到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还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在电影中,波米叔叔的身份困境往往与泰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紧密相连,反映了泰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

(三) 社会隐喻与文化传承

《能召回前世的波米叔叔》中的梦境不仅是个人内心世界的隐秘角落,更是社会现实个人冲突的广阔镜像。那些在梦中浮现的潮湿丛林,像是被现代社会遗忘的角落。这些梦境画面不仅仅是简单的画面,它们是现代化浪

潮下泰国乡村自然的真实写照,是那些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异化之人的无声呐喊。和尚在梦中脱掉袈裟走进歌舞厅,曾经被无数双手虔诚地供奉,如今却在角落里默默承受着岁月的侵蚀。泰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宗教信仰正在被现代化所冲击,前世梦境中公主用身体换取美貌,暗示着人类急于用自然资源换取短期利益,雇佣外劳暗示着通过廉价的外劳换取了经济发展。一切被改变的背后,是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逐渐流失与被迫改变的悲哀,也是社会边缘群体在时代变迁中找不到归属的困境。

波米叔叔的梦境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守护者,默默记录着泰国社会的每一次变化。那些藏在梦境里的民间传说、军人形象、自然变化是泰国社会文化的展现,它们代代相传,记录着泰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在波米叔叔的梦境里,这些传说不是沉睡在历史前进的路程中,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被波米叔叔的梦境唤醒,通过他的前世回忆和梦境经历,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佛教故事也在这梦境里找到了新的归宿,那些关于善与恶、万物有灵、因果报应的古老教义,不再是寺庙里缥缈的香火,而是融入了波米叔叔的生活,成为他面对生命无常、寻找内心平静的指南针。这些梦境,不仅让泰国社会文化在现代的前进中重新展现,也让那些可能被遗忘的社会记忆,重新被城市中的年轻一代所看见、所感受。

四、结论

在 20 世纪末,泰国本土电影市场面临重重危机,市场流失严重,一群敢于创新、勇于挑战的本土年轻导演撑起了泰国民族电影的崛起,他们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吸取外国电影优点,坚持本土创作,为泰国民族电影献出了自己的力量。阿彼察邦作为泰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深刻的文化内涵、坚持民族特色的电影创作作为泰国电影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打开了一束引人注目的强光灯。阿彼察邦通过梦境元素将深厚的佛教生命观进行具象表达,梦境成为探索生命奥秘与体悟轮回真谛的媒介,让观众真切地感受佛教智慧。同时,梦境也隐喻泰国人民在经历外国文化侵入、战争伤害、历史变迁后,探寻身份认同与面对存在困境的途径,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在现代化城市中自我认同缺失与身份焦虑。

参考文献:

- [1] 李伟. 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基于幻觉重构的电影创作[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1, (05): 24-30..
- [2] 王如一. 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梦境叙事[J]. 电影文学, 2024, (23): 51-54.
- [3] 董宸. 听觉、幻觉与符号记忆: 电影《沙丘》声音设计的新范式与参考 [J]. 电影文学, 2025, (04): 89-93.
- [4] [奥]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张爱卿, 译. 南京: 江苏 文艺出版社, 2010: 78.
- [5] 张良. 边缘文化、宗教背景与艺术探索——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电影创作综述[J]. 当代电影, 2019, (11): 48-55.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s film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Dream narrativ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Chen Kuang¹, Yang He¹

(1. School of Film, Television and Anim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films of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a Thai new wave director, have always been highly regarded and favored by the global film community. The exploration and portrayal of dream elements are hallmark features of his directorial style. Examining how Apichatpong uses dreams to advance film narratives, enhance audiovisual expression, and facilitate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rector's creative philosophy and style.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sound design,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dreams, unveiling their deep connections to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dentity, and social metaphors. It elucidates their unique value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film art and Thai culture, and interprets the director's ideological insights hidden within the shadows and light.

Keywords: Dream narrative; Thai new wave;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Cultural connotation

基于符号转译的红色文化活化设计与品牌传播策略研究 ——以江西抚州为例

杨菁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 红色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但当前红色文化创意产品普遍存在符号化、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江西抚州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 本文以该地为例, 通过系统性的梳理抚州红色文化历史, 解构其精神内涵与重塑视觉符号体系, 运用符号转译与文化活化等设计理论, 探寻红色文化基因产品的创设计新范式。并通过构建产品、体验、传播三维体系, 拓展市场渠道, 深化品牌传播, 系统性提升红色文创产品的用户情感共鸣度、市场竞争力与产业经济价值。

关键词: 红色文化基因; 创意产品设计; 江西抚州市; 品牌塑造传播

基金项目: 抚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抚州市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编号 23SK1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26

引言

红色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瑰宝, 承载着革命先烈砥砺奋进的伟大历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赓续红色精神、汇聚社会能量、牢筑民族自信。江西抚州作为原中央苏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有着独特历史地位、丰富遗址遗物及众多杰出人物。红色文化产品是继承传播红色文化基因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 但当前市场红色文化产品普遍存在同质化、符号化、表面化、缺创意等问题。许多产品都是对符号简单复制与堆砌, 缺乏对红色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活化运用, 导致其美感不足、浮于表面、功能单一, 因此难以激发当代消费者共鸣和购买意愿。基于此, 本研究以江西抚州为研究对象, 采用符号转译与地域文化活化混合方法, 设计出兼具历史深度、情感温度、艺术美感的系列红色文化产品, 构建品牌 IP 并传播。

1、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当代价值

红色文化创意产品通过具象产品承载红色文化精神, 是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和弘扬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举措, 其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如下五点:

政治教育价值。传统的红色文化教育往往较为晦涩且带有一定的“说教性”, 而文创产品则通过纪念品、艺术衍生品、创意文具等具象化的日常物品在购买、使用、分享的过程中将概念化的革命精神, 进行常态化的潜移默化的价值传播与塑造。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

文化传承价值。红色遗址、遗物、精神不应该冰冷而静默, 它们是有生命的活文化。通过对抚州红色符号的现代转译与活化设计, 设计出兼具实用和美学的创新性文化产品。此举不仅能避免红色文化遗忘、僵化, 亦能塑造红色文化品牌 IP, 激活抚州文化复兴, 带动当地经济, 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协同赋能。

社会情感价值。红色产品是承载红色基因和老一辈革命家精神的具象载体。通过红色文创产品激活民族集体情感, 将“集体记忆”内化为“个人情感”, 让红色文化精神真正“活”起来。

经济产业价值。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品牌 IP 具有巨大虹吸力。全产业链的红色文化设计及品牌推广不仅能促进如包装、印刷、材料、加工等传统相关产业升级, 亦能带动数字创意、科技应用与文旅融合等新行业为抚州

作者简介: 杨菁(1986—),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

通讯作者: 杨菁

科技与经济发展等提供新的增长点,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交融互益。

品牌与传播价值。在全球化视野下, 红色文创不仅是本国文化对内传承的重要工具, 亦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媒介。红色文创产品可以通过美学性、趣味性突破语言障碍, 让世界人民直观感受到中国人民的不屈的品质, 奋斗的精神, 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为中国增加全球文化软实力。

2、抚州红色文化基因概述及优势分析

红色基因是新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群体性的和深层性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内核, 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核心灵魂,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和财富。抚州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村落、红色建筑、名人、标志事迹、文学艺术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具体如下:

其一、深厚的历史地位与核心价值优势。首先, 抚州作为“中央苏区北大门”, 乐安、南丰、黎川等县市是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 是保卫红都瑞金的战略屏障和军事要塞。爆发了如: 康都会议、苏区北线保卫战、洵口战役、等诸多重要革命事件; 除此之外, 抚州亦是“红色戏剧”的发源地。瞿秋白、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等文艺先驱在此领导并创作演出了大量革命戏剧, 是党文艺事业的坚实基础。

其二、丰富的实物遗址与文物势。抚州拥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红色旧居、战斗遗址、红色文物等, 如: 康都会议旧址、抚州起义纪念馆、黎平会议旧址、登仙桥战役旧址等共 200 余处; 红色文物如乐安红军竹制密码本、资溪秘密交通竹筒等共 2000 余件; 黎川湖坊村标语墙、红军书法家舒同手迹等红色标语九大密集区。其三: 杰出的历史人物与精神传承优势。抚州是许多开国将帅战斗过的地方, 亦涌现了诸多著名英雄人物, 如: 江西党团组织主要创始人赵醒侬(江西南丰县人), 中共四川省委早期领导人傅烈(江西临川上顿渡人), 战功显赫的无冕上将符竹庭(江西省广昌县人)等等, 他们伟大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抚州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括而言, 据此开展的抚州红色文化基因, 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①标语基因: 舒同书法艺术、现存 353 条红军手写标语、“扩红”“查田”等特色口号等; ②器物基因: 资溪秘密交通竹筒、广昌竹钉/土铳、黎川红军竹编药箱等; ③空间基因: 康都会议旧址、金溪后龚红一方面司令部、宜黄黄陂战役指挥所、黎川湖坊闽赣省委旧址、抚州起义纪念馆、黎平会议旧址、登仙桥战役旧址等。

3、符号转译与地域文化活化设计释义

在设计学领域中, 文化转译表达的是一种设计观念。文化转译的性质在于解释, 它超越了机械的描述, 致力于挖掘文化背后的深层含义和价值。在设计实践中, 文化转译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现代表达^[2]。

“活化”这个词语本身是化学中的一个用语,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形成了一种新型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理念, 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活化”强调以利用促进保护, 通过给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 将文化遗产从静止、无活性的状态转变为具有活性的状态, 从而让文化遗产“枯木逢春”, 使其在功能上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3]。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①深入挖掘与主题提炼, 将红色文化事迹讲好; ②红色革命的“宏大叙事”转换为“个体情感共鸣”; ③从单一展示到科技赋能的多维度沉浸式情感体验; ④从红色文化产品设计到红色品牌 IP 塑造传播; ⑤红色产品与抚州文旅双向赋能。

4、以江西抚州为例的基于符号转译与地域文化活化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及品牌推广研究路径与举措

4.1 加强抚州红色文化元素挖掘与整合。

提升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水平过程中, 在这一过程中首要任务便是针对江西抚州市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的梳理, 加强各项资源的整合, 通过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及梳理过程逐步探索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路径^[4]。

4.2 基于深度阐释的抚州红色文化符号转译研究。

传统的红色文创产品大多是对革命符号简单的复制粘贴, 而符号转译则是对文化深度剖析后的活化应用。具体转译方法如下: ①形态转译。将具象红色遗产、遗物、标语等符号提炼为抽象设计语言, 并融入产品设计的语义系统。如提取“舒同书法”中特征鲜明的单个文字、偏旁部首或笔划, 将其从二维平面设计为三维立体产品(文具、灯具、首饰等); ②材质转译。摒弃对材质简单模仿, 深入解析材质特性与其文化隐喻, 找到能体现其内涵

特征且更实用的现代的材质。如广昌竹钉，是革命战争中重要的“冷兵器”，其原始材质为竹与铁。竹钉材质特性为中空、有节、但坚韧，寓意着隐忍、以弱克强。通过材质转译方法可将其设计为管状花器，将竹钉的尖锐转化为插花时花枝的挺拔。^③叙事转译。叙事转译侧重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与情感脉络，据此设计出有情感链接的“叙事型”红色文创产品。如以红军手写标语为文化元素，可设计出包含拓印工具、带有镂空标语字样的模板、特制的纸张的套组产品。用户将模板覆盖在纸上，用蘸有颜料的海绵拓印，在一次次亲身实践中加强了对革命先烈的情感追忆。

4.3 抚州红色文化地域活化创新应用策略。

在推动创新性抚州红色文化产品设计的过程中，面临着同质化和“千城一面”的困境，因此，一种以地方为本的地域活化设计至关重要。地域活化设计超越了传统静态模式，以设计为链接，激发地域内生活力。具体采用两步走策略：

第一，抚州红色资源梳理与内涵挖掘阶段。此阶段需对抚州历史遗址、文物史料、英雄事迹等进行全面调研、分类与数字化建档。此举重点不是资源简单罗列，而是对抚州红色文化的历史语境、精神价值与情感叙事的深度剖析，以此提炼出具有代表性、感染力和当代意义的红色“文化基因”，为抚州地域活化设计打下基础。

第二，基于“文化叙事+现代设计”双向赋能的抚州红色文化活化设计策略。一方面，坚持“叙事性”设计，将历史事件、人物、遗址、遗产等用视觉化、场景化的方式融入产品，增强产品的文化代入感和情感共鸣。如：东陂战役及相关革命遗址为例。提取战争中坚守、牺牲、守护的核心精神，对其形态进行现代抽象几何化处理，设计为夜灯。夜灯的功能是在黑暗中提供光明，守护夜晚安宁。这与革命先辈们守护家园的情感充分吻合；另一方面，在设计过程中也应强调现代性与实用性，避免流于表面的“假大空”设计。以当代审美和实用功能重构文化表达，使文创产品兼具艺术美感和日常价值，真正融入现代生活。

4.4 通过构建产品、体验、传播三维体系，塑造抚州红色品牌 IP，拓展市场渠道，深化品牌传播。

红色文创产品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专业的产品设计，更与有效的品牌塑造、传播与市场拓展亦密不可分。为实现抚州红色文创从“产品”到“全产业发展”的跨越，可构建以“产品”、“体验”、“传播”为支柱的三大发展体系，整合线上线下双渠道。

第一、“产品”是红色文化载体，需构建体系完备、覆盖全面的多元矩阵。具体可分为以下四大类：①基础纪念品。形态大多为徽章、钥匙扣、纪念币、明信片、文创袋等，设计重点为高辨识度，突出地域文化特征（如抚州标志性革命遗址、遗物、口号等）、成本可控、售价较低，是核心 IP 符号，满足客户“到此一游”的需求，是流量变现基础；②文创日用品。形态上以文具类、生活类、服饰类等为主，其设计要点为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兼顾审美性和实用性，以此实现顾客高频次、长时间的品牌曝光和文化浸润；③艺术收藏品。此类产品侧重与知名艺术家、非遗传承人等合作的雕塑、艺术瓷器、金银纪念章、精装书籍等。此类设计强调稀缺性、极致工艺、材质、工艺及艺术价值；④数字文创品。该产品类型是随着科技发展的新兴文创产品，产品形态为 NFT 数字藏品、AR/VR 体验、小程序、视频/音频产品等，设计侧重互动性、科技感及社交属性，可以打破距离边界，吸引年轻受众。

第二、“体验”提升产品本身价值，主要分为线下和线上体验两大部分：1、线下沉浸式体验：①抚州红色文化 VR 场馆体验。随着数字科技发展普及，展示空间早已不是传统单一静态展示，而是运用声、光、电及 VR 打造沉浸式、互动性、多维度的情景还原空间。让受众通过超现实沉浸体验，变成红色历史的“体验者”和“参与者”；②抚州红色文化手工工坊。打造诸如红军土铳制作、草鞋工坊、军械模型工坊等；③抚州红色文化文旅融合。将 VR 体验场馆、手工工坊、文创商店、主题民宿等串联起来，形成有综合效益的区域产业链。此外，江西抚州市某景区在塑造红色文化品牌时，还可将红色文化历史内涵长相在门票设计中，为游玩旅客提供更大便利^⑤2、线上互动体验域。打造小程序、APP 等线上展示平台，突破物理边界，拓展用户渠道。

第三、“传播”的核心是通过链接产品、体验与用户心智，打造一个能引发价值共鸣、充满人情味的品牌 IP 是重要途径。①抚州红色文化品牌 IP 打造。传统文创产品往往聚焦于外在形态与视觉设计层面，往往未能深入揭示文化内涵的深层底蕴^⑥。品牌 IP 塑造则通过标志性形象、产品等，实现情感共鸣。如：以抚州红色文化中典型性标识中的红星、粗布军装、笑容和坚毅的眼神等元素，配以右手握拳放在胸前动作设计卡通 IP 形象。并将

形象广泛应用于如红色产品包装、广告宣传、景区呈现等。②跨界合作，破圈引流。如以与隅田川咖啡品牌联名，推出“红色活力包”。将咖啡粉装在小“子弹”里，每颗“子弹”印有不同的红色金句，咖啡包装则设计为“红军医药箱”的样式。

总结：本文以江西抚州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基于符号转译与地域文化活化途径的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与品牌塑造传播策略。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系统化创新设计与品牌推广传播，让红色文创产品摆脱同质化、符号化困境，有效提升文创产品的创新性、情感共鸣、市场竞争力及持续生命力，最终实现弘扬红色文化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参考文献：

- [1]许迅.网红经济视域下江西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策略[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23.42(2)
- [2]梁仁贵.文化转译视角下南丰傩面具插画及衍生品设计[D].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24
- [3]陈瑶.活化与创新:依托非遗文化传承的现代艺术设计[J]. 文化学刊, 2020, (06): 33-35.
- [4]陆娟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红色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研究——以广西红色文化产品创意实践工作坊为例[J]. 纺织报告,2024(1):36-38.
- [5]陈璐.红色文化品牌化建设对文创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J]. 松原日报, 2025
- [6]贾述涵.基于红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品设计[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2,2(06):30-32.

A Study on the Revitalization Design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Red Culture through Semiotic Transmutation: A Case Study of Fuzhou, Jiangxi

Yang J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angXI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Red cultural genes represent a spiritual monu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current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ommonly suffer from issues such as excessive symbolization and severe homogenization. Fuzhou, Jiangxi, possesses abundant red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is regio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red culture in Fuzhou, deconstructs its spiritual essence, and reshapes its visual symbol system. By applying design theories such as symbolic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t explores innovative paradigms for creating products infused with red cultural genes. Furthermore,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products, experiences, and communication, it aims to expand market channels, deepen brand dissemin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nhance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industrial economic value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words: Red Cultural Genes;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Fuzhou City, Jiangxi Province Brand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

商业人像摄影中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平衡策略研究

汤成琦^{1,2}

(1. 蒙古国研究大学, 乌兰巴托 11000; 2.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音乐与影视艺术系, 江西 南昌 330052)

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化时代商业人像摄影中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平衡问题, 通过分析功能性、审美性和传播性三维需求结构, 提出在前期沟通阶段采用“视觉画像”和“关键词矩阵法”量化需求, 拍摄阶段运用“妥协模型”兼顾商业目标与艺术表达, 后期制作实施“基础修图+艺术修图”的双层策略, 最终构建出“艺术创作要素-客户需求”映射模型, 为摄影师在算法审美盛行和 AI 技术普及的行业环境下, 实现商业价值与艺术创新的动态平衡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 商业人像摄影; 客户需求; 艺术创作; 平衡; 算法审美; 视觉叙事; 安全管理; 文化适应; 国家安全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8

一、引言

在当代数字化浪潮的驱动下, 商业人像摄影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数码影像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以及人工智能 (AI) 影像处理工具的广泛运用, 共同推动了摄影产业生态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 商业人像摄影不仅承担着展示人物形象与品牌价值的功能, 还成为了社会文化与美学传播的重要载体。然而, 随着市场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审美取向的个性化, 摄影师在平衡客户商业诉求与自身艺术表达时, 遭遇了新的困境。

一方面, 商业客户的核心诉求正从“功能导向”向“体验导向”和“情感导向”转变。客户不再满足于单纯传递产品或人物信息, 而是追求视觉语言的独特性与符号化, 以此塑造差异化的品牌形象。这一需求促使摄影作品必须在视觉叙事、风格塑造和文化符号方面展现出更强的辨识度与艺术深度。然而, 另一方面, 行业的生产逻辑却趋向于“流程化”“模板化”和“快速产出”, 导致创作在标准化操作中丧失了原创性与审美张力。因此, 如何在满足客户商业需求的前提下, 保持作品的艺术创新与审美价值, 成为了摄影师面临的核心难题。

同时, 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加剧了视觉审美的同质化。平台推荐机制往往以“点击率”和“视觉冲击”为导向, 促使摄影师不断复制“高曝光”模板, 以迎合市场偏好。这种现象压缩了摄影的个性表达空间, 使“视觉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视觉创造力”, 导致创作趋于公式化与同质化。此外, AI 修图技术与自动化构图算法的广泛应用, 虽然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摄影师的艺术主导权, 使摄影行业的专业边界日益模糊。在这样的技术生态中, 商业摄影师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在影像生产链条中的角色定位——既是执行者, 也是创作者; 既是服务提供者, 也是视觉叙事者。

基于此,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商业人像摄影中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平衡策略。通过剖析典型客户类型及其核心需求, 本研究试图揭示商业目标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张力, 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可行的调和机制。论文将构建一个“商业诉求—艺术创作”双维度映射模型, 以评估创作过程中客户导向与创作导向的互动关系, 进而探寻实现二者动态平衡的可操作路径。在理论层面, 本研究期望为商业摄影领域提供新的美学解释框架; 在实践层面, 则为摄影师提供策略性指引, 助力其在市场导向与创作自由之间寻求最优平衡, 实现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双重提升。

二、研究背景

伴随全球影像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持续加速, 商业人像摄影的创作生态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传统摄影遵循“技术—美学—市场”三位一体的逻辑运行, 而在当代视觉文化语境下, 这一体系正被重塑。商业摄影的本质, 已从以往侧重于“形象再现”的视觉任务, 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兼具叙事性、符号性与社会性传播功能的综

作者简介: 汤成琦(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商业广告摄影、视觉艺术与数字影像技术。

通讯作者: 汤成琦

合媒介。摄影师不再仅仅是“技术操作者”，而是成为“视觉叙事者”，他们借助构图、光影、色彩等艺术手法，在满足客户商业诉求的同时，赋予作品独特的文化语义与审美深度。

然而，市场机制与创作机制之间的张力也在不断增大。当下商业人像摄影市场最为突出的矛盾，是“个性化需求”与“标准化生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于摄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涵盖客户需求表达、拍摄流程设计、后期修图以及成品输出。随着客户对“定制化体验”与“视觉差异性”的强调日益增强，他们期望作品能够展现独一无二的风格符号与品牌气质。然而，商业摄影行业为提升产能并控制成本，普遍采用流程化、模块化与模板化的生产方式。这种标准化操作虽显著提高了效率，但却削弱了作品的原创性与艺术独特性，致使摄影作品在视觉语言上趋于同质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一矛盾进一步加剧。Instagram、抖音、微博等平台的算法机制引导着“视觉流行”的形成，推动主流审美的快速复制与传播。摄影师为追求曝光与传播效果，常被迫迎合流行趋势，而忽视个人风格与艺术探索。这种“算法审美”（algorithmic aesthetics）现象导致影像创作趋向“视觉可预测性”，即作品更易取悦算法而非表达艺术观念。于是，摄影作品愈发多地被生产为“算法友好型图像”，而非具有艺术独立性的作品。这种以流量为导向的创作逻辑，使商业摄影陷入了“市场迎合”与“艺术贫乏”的两难困境。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与自动化修图系统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摄影行业的技术边界。AI工具的高效性与普及性，使非专业从业者也能轻易产出具有商业水准的图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摄影师的专业竞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AI在图像生成中的“审美学习”机制倾向于强化主流风格，进一步压缩创作者的风格多样性。因此，摄影师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艺术角色，思考如何在机器生成与算法控制的环境中，保持作品的人文精神与艺术原创性。这种技术驱动的环境既是挑战，也是推动摄影艺术创新的契机。

此外，从文化传播视角来看，当代商业人像摄影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转变。客户不再将摄影单纯视为“记录形象”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身份认同与社会符号表达的重要载体。个体通过人像摄影塑造自身的社会形象，而品牌则通过摄影叙事强化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商业摄影因而成为视觉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审美取向、创作方法乃至传播模式，都直接受社会文化结构与消费心理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摄影师不再只是被动响应客户需求的执行者，而是需要主动解读客户文化意图的“视觉策划者”。他们必须理解品牌与个体背后的文化语境，才能在影像创作中实现真正的沟通与共鸣。

综上所述，当代商业人像摄影的矛盾不仅是“创作个性”与“商业效率”的对立，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结构性问题。摄影师在新的市场与技术格局中，需在标准化生产与个性化表达之间寻求平衡；在算法主导的传播机制中，重申艺术的独立性与审美价值。本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在当代商业摄影实践中实现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协调统一，从而推动行业的美学与市场的双重进化。

三、研究价值

当代商业摄影正逐步形成“算法导向型创作逻辑”，摄影师需在内容视觉冲击与艺术深度之间寻求平衡，使作品既契合社交媒体算法偏好，又能保持艺术表达的独立性。本研究将借助数据分析与案例比较，揭示“传播导向型客户”在内容策划、构图语言及互动策略方面的核心特征。通过对三类典型客户需求的系统识别与特征提炼，本研究将为商业摄影领域提供科学化的客户分层模型与需求数据，为后续的艺术映射分析奠定基础。

目标一：构建艺术创作要素与客户需求的映射关系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构建一套系统化的“艺术创作要素—客户需求”映射模型。该模型将摄影创作的关键要素（如光影、构图、色调、姿态、叙事等）与客户需求的三个维度（功能性、审美性、传播性）相对应，进而揭示商业摄影创作各环节的协同关系。

光影与情感传达的映射

光线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种情感语言。在企业客户的作品中，常运用硬光来凸显权威与力量，而个人写真则更倾向于使用柔光以传达温柔与亲密。研究将结合样本分析，归纳光影在不同客户需求下的表达规律，形成可量化的艺术决策依据。

构图与身份象征的映射

构图是摄影语言中最具叙事功能的要素。不同客户群体通过构图位置、视角与空间设计来表达身份定位。例如，品牌形象照偏好中心构图与对称布局，以展现稳定与权威；而个人摄影更倾向于非对称或留白构图，以传达个性与自由感。这种视觉语法的差异正是客户需求与艺术选择相互作用的体现。

色调与品牌/情感认知的映射

色彩心理学表明，颜色可直接影响受众的情感与记忆。企业客户偏好冷色调与中性色，以传达专业与理性；而社交传播型客户则倾向于明亮饱和的暖色调，以增强视觉吸引力与点击欲望。本研究将运用实验与案例分析方法，构建色调与客户审美偏好的统计映射关系。

通过上述映射模型，研究将为摄影师提供结构化的创作决策工具，使其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根据客户类别与传播目标，精准选取视觉语言要素，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同步优化。

目标二：形成标准化流程与个性化创作指南

第二个研究目标是形成兼具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创作流程。标准化旨在确保摄影项目的执行效率与质量控制，而个性化则保障每个作品的艺术独特性与客户专属体验。

在此框架下，研究将通过田野调查与访谈法，梳理商业摄影全流程（前期沟通—拍摄执行—后期制作—成品输出）的关键节点，建立操作规范与审美指导原则。在个性化方面，将设计可调节的“客户体验模板”，允许摄影师根据客户文化背景、性格特质及审美风格进行差异化调整，实现定制化输出。

通过达成这一目标，本研究不仅将提升摄影项目的可控性与客户满意度，更为摄影教育与行业培训提供参考范式，推动商业摄影从经验型创作向科学化、系统化创作模式转变。

四、研究内容

本章围绕商业人像摄影中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平衡问题展开，主要涵盖两个部分：（一）需求分析维度与（二）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平衡策略。通过对需求结构的多层分析与策略性实践探讨，旨在构建一套可操作的、系统化的商业摄影平衡体系，使摄影创作在满足客户功能与传播需求的同时，保持艺术独立性与创新性。

（一）需求分析维度

在商业人像摄影中，客户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复合化的特征。本文将其划分为三个核心维度：功能性需求、审美性需求与传播性需求。三者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摄影项目的创作方向与最终价值。

1. 功能性需求

功能性需求是商业摄影的基础层面，指摄影作品在具体使用场景中的实用功能与目的性要求。因此，摄影师在前期沟通中，必须对客户的目标使用场景、输出格式及视觉效果进行精准界定。在商业环境中，摄影师必须兼顾创作理想与交付标准，建立规范化的沟通与审查机制，以防止创意偏离客户预期。此外，功能性需求还涉及摄影作品的可复制性和品牌延展性——尤其在大型企业宣传中，摄影图像往往需兼容多种媒介载体（网站、海报、宣传册等）。因此，摄影师应在拍摄前构建统一的视觉语言体系，以确保图像风格的一致性和后续可用性。

2. 审美性需求

在满足功能性基础之后，审美性需求成为客户评价作品价值的关键因素。商业摄影的审美不仅受个人偏好影响，更体现出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审美趋向。近年来，随着“视觉消费”观念的兴起，客户愈发重视影像的情感传递与符号表达。他们期望照片能体现品牌气质或个体风格，如“高级感”“极简风”“生活化”等审美标签。然而，客户审美与摄影师艺术追求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客户倾向于可识别的流行风格，而摄影师追求形式创新与视觉差异化。例如，“INS风”摄影虽在商业市场广受欢迎，但其高重复性的构图与色调也造成了审美疲劳。因此，摄影师需在流行视觉语言与独立艺术创意之间寻求平衡，通过色彩微调、光影创新或叙事性构图，赋予作品独特的审美层次。商业摄影的艺术价值不仅源于形式创新，更源于“文化语境中的审美重构”。本研究将在问卷与访谈数据中进一步剖析客户审美偏好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摄影师提供精准化的视觉策略参考。

3. 传播性需求

在当代传播语境中，图像已成为品牌沟通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客户的传播性需求体现了摄影作品在不同平台与受众中的传播效能。社交媒体算法的影响使得摄影作品不仅需具备视觉吸引力，还必须符合平台的技术规范与传播逻辑。例如，企业客户需要主视觉图在微博或公众号中兼具“识别度与延展性”；个人客户则希望照片能在朋友圈、小红书等平台中获得更多点赞与转发。摄影师因此需了解各平台的视觉特征与算法偏好：如Instagram偏好高亮饱和度图像，抖音与小红书更倾向于生活化与“真实感”表达。此外，传播性需求还体现在图像的“跨平台一致性”上。商业摄影的传播效果取决于视觉语言的连续性与符号统一性，而非单张照片的冲击力。因此，摄影师在创作时应构建系统的传播策略，包括视觉模板设计、品牌语调一致性、社交互动引导等方面，以实现作品的长效传播价值。

（二）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的平衡策略

在商业摄影实践中，客户需求与艺术创作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可通过策略性调和实现动态平衡。本研究将商业摄影流程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前期沟通与准备阶段、拍摄阶段与后期制作阶段，并针对每个阶段提出可行的平衡策略。

1. 前期沟通与准备阶段

前期沟通是实现客户满意与艺术表达协调的基础环节。在此阶段，摄影师需通过访谈、问卷与品牌研究等方法，构建客户“视觉画像”。这一过程包括分析客户品牌价值、目标受众、风格偏好及心理预期，摄影师应在沟

通初期引导客户将模糊的审美需求转化为可量化指标，如关键词描述、色彩倾向与情感目标。例如，企业客户可通过“关键词矩阵法”明确其影像定位（如“创新”“稳重”“信任感”），摄影师则据此设计光影方案与构图草图。通过系统化的前期沟通，既能减少项目执行偏差，也为摄影师在创作中保留艺术空间提供依据。

2. 拍摄阶段

拍摄阶段是客户需求与艺术创意最直接碰撞的环节。为了兼顾商业目标与艺术表达，摄影师需在技术决策中构建“妥协模型”（trade-off model）。例如，柔光布光可满足商业客户对肤色柔和度的要求，而通过改变光线角度与层次，仍可保留光影的艺术张力。此外，团队协作是保障平衡效果的关键。现代商业摄影多为团队作业，包括化妆师、灯光师、视觉指导等。摄影师在其中承担“创意中枢”角色，需要综合客户意见与团队建议，确保创作方向统一。通过“协同创作机制”（collaborative creation system），摄影师能在满足商业功能的同时实现艺术创新。

3. 后期制作阶段

后期阶段不仅是图像修饰过程，更是艺术表达与商业需求融合的最终体现。本研究提出“双层修图策略”：基础修图层：满足客户的实际应用需求（色彩校正、噪点去除、光线平衡等）；艺术修图层：在不影响商业用途的前提下，通过艺术化调色、光影重构与视觉滤镜赋予作品独特的美学氛围。后期创作是商业摄影“再艺术化”的关键环节，摄影师通过色调重构和象征性视觉元素的引入，可以重新定义作品的情感意义。因此，本研究将在实证部分构建后期评价模型，从客户满意度与艺术价值两个维度评估修图层次的平衡效果。

总结

综上，本章从客户需求分析到平衡策略构建，系统论证了商业人像摄影中“客户导向”与“艺术导向”的互动逻辑。本研究通过功能性、审美性与传播性三维需求结构分析，以及多阶段平衡策略的提出，为商业摄影实践提供了可验证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路径，奠定了后续实证研究的框架。

参考文献：

- [1] 顾铮. 世界摄影史[M].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
- [2] 赵刚. 世界摄影美学简史[M].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
- [3] 肖春雷. 猎色：国外后现代摄影[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 [4] 宿志刚. 中国摄影史略[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 [5] 谷久闻. 商业摄影[M].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
- [6] 王传东，夏洪波. 商业摄影与创意[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 [7] 熊谷晃. 商业静物摄影构图与用光[M]. 曾剑峰，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

Research on Balancing Client Needs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in Commercial Portrait Photography

Tang Che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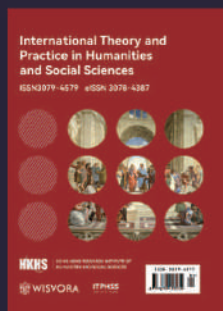
(1.Ulaanbaatar, Mongolia; 2.Jiangxi Taihao Anim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Department of Music and Film Art, Xichang, Jiangxi)

Abstract: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balance between customer needs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commercial portrait photography in the digital age. By analyz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demand structure of functionality, aesthetics, and communicability, it proposes to quantify demands using 'visual profiling' and 'keyword matrix method' during the initial communication phase. During the shooting phase, the 'compromise model' is used to consider both commercial goal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In the post-production stage, a dual strategy of 'basic retouching + artistic retouching' is implemented. Ultimately, a mapping model of 'artistic creation elements - customer needs' is constructed, providing systematic solutions for photographers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ommercial value and artistic innovation in an industry environment where algorithmic aesthetics are prevalent and AI technology is widespread.

Keywords: Commercial portrait photography; Customer needs; Artistic creation balance; Algorithmic aesthetics; Visual narrative; Safety management; Cultural adaptation; National security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